

朝服

马基雅维利

与他所创造的世界



THE GARMENTS OF COURT AND PALACE

Machiavelli and the
World That He Made

[美] 菲利普·博比特 著 杨立峰 译

Philip Bobbitt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朝服

马基雅维利

与他所创造的世界

THE GARMENTS OF COURT AND PALACE

Machiavelli and the
World That He Made

[美] 菲利普·博比特 著 杨立峰 译

Philip Bobbitt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服：马基雅维利与他所创造的世界 / (美) 菲利普·博比特著；杨立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2698-4

I．①朝… II．①菲… ②杨… III．①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 Niccol 1469-1527)－政治思想－研究 IV．①D095.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245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朝服：马基雅维利与他所创造的世界

〔美〕菲利普·博比特 著

杨立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制

ISBN 978-7-100-12698-4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9.75

定价：48.00 元

**THE GARMENTS OF COURT AND PALACE: MACHIAVELLI AND THE
WORLD HE MADE (OLD TITLE: MACHIAVELLI'S THE PRINCE)**

by PHILIP BOBBITT

Copyright © 2013, Philip Bobbit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tlantic Books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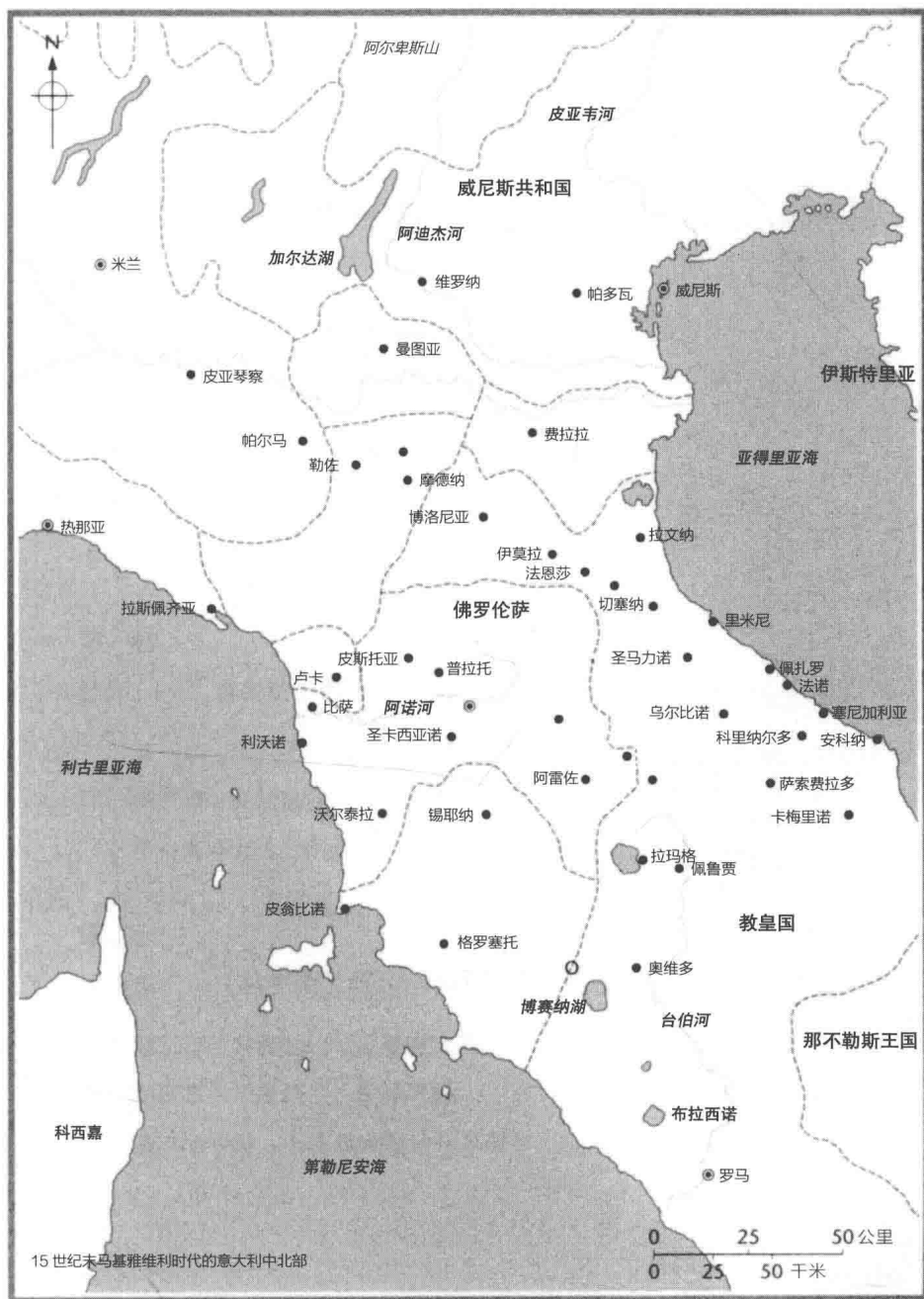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献给圭多·卡拉布雷西
最卓越的匠人



15 世纪末马基雅维利时代的意大利中北部

目 录

序言 治国之道——马基雅维利的悖论 001

邪恶巫师与他的媚臣宝书 011

第一卷

秩序——《君主论》的重要结构

第一章：现代国家的出现 025

第二章：政治家能够升入天堂吗？ 037

第一卷小结：《君主论》是一部宪政专著 051

第二卷

论国家——《君主论》与《论李维》的关系

第三章：共和国的“后果论义务” 055

第四章：武备精良，法律严明 073

第二卷小结：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哲学 086

第三卷

virtù 与机运——上帝并不想决定一切

第五章：virtù 来自于战神，机运来自于维纳斯 089

第六章：马基雅维利的历史观 103

第三卷小结：马基雅维利的命运哲学 116

第四卷

时机——《君主论》有趣的时间选择

第七章：波吉亚家族与梅迪奇家族 119

第八章：马基雅维利的宪法 133

第四卷小结：马基雅维利的视野 160

马基雅维利悖论之解 161

结语 撒旦的神学家 183

致谢 199

人物表 207

年表 211

注释 231

引文说明 261

参考文献 263

索引 275

译后记 301

序言

治国之道

马基雅维利的悖论

一直以来，人们对马基雅维利和他的著作都抱有浓浓的兴趣，¹但为何如此，却很难说清楚。¹《君主论》经常被描述为一本改变了世界的巨著；然而，尽管把它列入此类巨著之列是无可质疑的，但对它的解释却五花八门且互相矛盾，以至于由它所引发的世界中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疏忽之下的结果，这种疏忽或许会令马基雅维利感到好笑，但大概不会让他感到惊讶。

实际上，甚至对于马基雅维利那些最基本的观点也仍然存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他是一位直率的极权主义者还是一位尊重人权的共和主义者？他是一名基督徒还是一名异教徒？他认为立法者更重要还是战士更重要？他本质上是一位有道德的作家还是一位无耻的非道德主义者（*amoralist*）？他是第一位认真思考治国之道的政治学家——就像伽利略之于天文学那样——还是一位坚决拒绝预测的

不可知论者？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人文主义者还是一位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他相信人类事务是已然确定的，还是相信个人的自由意志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总能找到支持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的明确证据。有些学者认为他的思想本就缺乏内在一致性，还有一些学者断定这些思想是以讽刺的方式表述的，或者是以某种更为隐晦的诺斯替主义的方式表述的。在本书中，我对上述每一个疑问的观点都是明确的，而且尽管我努力为自己的各个论断组织证据，但我所引证的那些事实或段落对于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们来说并不会陌生，当然，对于一些普通读者来说或许并不熟悉。但是，我希望我的独特视角——作为一名宪法学者和外交与战略史学者的视角——能够提供一种方式，把这些引文、事件和推断整合为一个有说服力且合情合理的模式；而且希望我在先前的著作中所阐释过的、在本书中再次引入的那些概念，能够提供一个结构性的、有用的途径，以便帮助读者理解马基雅维利复杂且有时明显充满矛盾的著述。

本书是一部注疏性著作，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一位才华横溢的马基雅维利研究者——曾经有力地解释说：“一部注疏性著作是要指出并解释原作者的意图，因此就要假设原作者有这样的意图，假设此意图值得探究，而且假设它并不是显而易见的。”² 我的主要目的是赋予读者能力，以使他能够利用我所提供的分析来阅读《君主论》，并且使他能够得出一些经他自己判定、符合马基雅维利本意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与《君

主论》一样希望撇开许多正统观念，虽然这些观念符合很多对国家大事感兴趣之人的心意，但一旦采纳这些观念，就会破坏他们理解并实施治国之道的能力——一种马基雅维利千方百计试图增强的能力。我相信，一旦按照我所建议的方式来阅读马基雅维利——把他当作一种以战略与法律之结合为基础的新的宪政秩序的预言者，他的著作就能够对外交家和政治家产生切实的巨大助益。此外，由于他以历史的视野来看待现代国家的出现及其基本的伦理特质——这种视野依旧适用于我们，而且只要世上还有国家存在，就会一直如此——因此，他将依然具有影响力。最后，由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与马基雅维利的时代相类似的时代——一种新的宪政秩序正在形成的时代，因此他的著作将为更多的当代人感兴趣。³ 马基雅维利通 3 过阐释君主国（the princely state）第一次对国家形态学进行了描述；而这种宪政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将逐渐演化为王国（the kingly states）、领土国（the territorial states）、帝制的国家—民族（the imperial state-nations），并最终演化为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工业民族国家（the industrial nation states）。与以往相比，这个成就更加明确，正如现在更加确定他遭到了他的落伍的同代人的严重误解。

自从《君主论》于作者逝世后的1532年出版以来，有五个具体的理念构造着对它的理解，正是这些基本的背景性假定导致了那些由来已久的学术问题，这些问题在当前的马基雅维利研究中仍旧十分突出。并且，这些假定本身就是马基雅维利悖论的始作俑者。⁴ 这个悖论就是：为何一个人的著作能使他成为自亚里士多德之后最

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或许可以去掉这个“之一”，同时对于他实际上在说什么却又存在着如此深刻的分歧？

第一个背景性理解是，《君主论》是一部“鉴书”（mirror book），它是对古代一种创作体裁的模仿：著作者在宫廷上向君主或官方谏言该如何行事。西塞罗的《论义务》（*De officiis*）就是这种体裁的代表作，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有影响的例子。^{*}然而，《君主论》显然与这类著作极不相同，因为它并没有建议统治者遵循古典的德性，而是力主在某些情况下统治者应该抛弃那种做法。这种认为《君主论》是一部反常的鉴书的观点构成了以下此种主张的基础：

- 4 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就是蔑视古典德性或基督教德性的君主。这个主张已经引起了大量的争论。尽管这个主张及其引发的争论都源于第一个背景性理解，但二者并不等同于它。批评者们或许在关于马基雅维利写作这本鉴书是出于警告还是指导上有分歧，但他们都同意无论其意图为何，它都属于鉴书这一范畴。

第二个基本理解是，《君主论》是一部试图服务于独裁政体的著作，因此与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表达的共和主义理念是相抵牾的。这种看法导致了下列疑问：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时

^{*} 例如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奈的《侍臣论》和伊拉斯谟《论基督君主的教育》，都是写给西班牙国王查尔斯（即后来的查尔斯五世皇帝）的建议；约翰·斯凯尔顿的《君主之鉴》（*Speculum principis*）是一部写给亨利八世的著作，可能已经遗失了，现有一个版本——很可能不是献给亨利的那版——保存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参见 F. M. Salter, “Skelton’s *Speculum Principis*”, *Speculum*, vol. 9 (1934): 25.

掩饰了他的真实意向吗？他的观点随着他年龄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吗？马基雅维利的著作集是本身内在不相一致的，还是它是以某种方式写作以此来隐藏他的真实意图——因为它们可能冒犯他的政治庇护者？

第三个基本观点是，《君主论》表明了马基雅维利对天数与命运问题的解决方法。《君主论》把机运（*fortuna*）与 *virtù** 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这么做是试图回应这个问题：君主是否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马基雅维利的回答是“他能”，方法主要是通过充分地实践 *virtù*。马基雅维利所给出的关于机运与 *virtù* 相斗争的隐喻是有关一条毁灭性河流的隐喻，机运的洪流可以由堤坝与水渠——人类智谋与计划的产物——来阻挡和疏导。在《君主论》中，具备此种 *virtù* 的领导人的主要例子是残暴的尼采式人物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马基雅维利似乎是他的粉丝。但是这种观点也导致了若干难题。因为切萨雷·波吉亚最终垮台了，而且并没有多大程度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马基雅维利在谈到其他同时代的人物——其中有教皇朱利叶斯二世和佛罗伦萨的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时指出，时代的特性决定着成功与否；而且他总结说，没有哪个人的本性是如此灵活可变从而能够始终适 5

* 鉴于 *virtù* 这个概念的内涵极为丰富，且汉语中无恰当的词语与之完全对应，加之它对于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又极其关键，因此译者保留其原文，希望读者结合语境体会其内涵。——译者注

应时代的变化。因此，这些理由似乎表明 *virtù* 并不足以左右命运。为了解释这个矛盾，常常有人暗示或许马基雅维利最终接受了后者，当他晚年发现自己远离权力且不再能够影响时局之时，接受了这种更为绝望的观点。

第四，众所周知，《君主论》最初是打算献给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朱利亚诺·德·梅迪奇（*Guliano de'Medici*）的，而且长期以来有人假定——这种假定具备有力的证据⁵——这部著作是在对这种可能性的渴望下创作出来的：熟悉马基雅维利并为他所钦佩的朱利亚诺，或许会恢复他佛罗伦萨秘书厅秘书长的职务。这就是有些作者把《君主论》描述为一部“求职申请书”的原因。但这种解释引出了这个问题：实际的题献对象是朱利亚诺的继承者洛伦佐，他并没有表现出赏识马基雅维利的迹象，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事实上曾经读过这本书，甚或收到过它。此外，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撰写的夸张结语——他敦促解放意大利——在献给无能且感染梅毒的洛伦佐时，看上去完全不切实际。

最后，常常有人主张，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割裂了政治和道德。有人指出，对于许多人文主义者来说，正确的政治选择就是合宜的道德选择。善即真理（*the good is the true*），反之亦然。然而，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君主有时必须选择去冒犯一些马基雅维利自己也认为是符合德性的价值——这些价值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所倡导的价值没有什么差别。这个主张引发了下列问题：由于《君主论》把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所以它就是政治科学的肇

端吗？马基雅维利倡导政治活动与任何支配性道德规则相分离的现代观念，因而就是“一位恶之导师”吗？

在我看来，这些关于《君主论》的基本的、结构性的理念都是错误的，因而，它们所引发的那些学术问题基本上都是伪问题，或者至少是极其夸大的问题。以这样一种论断为基础，我打算用一种 6 单一的、内在一致的且有说服力的解读方式来解决马基雅维利悖论。我自知，对于我这样一位既不是研究文艺复兴的学者，更不是马基雅维利二手文献方面的研究专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激进的、甚至自恃过高的目标。那么，我如何来支撑这些大胆的主张呢？

我将表明，在我们对《君主论》及其姊妹篇《论李维》所做的解读中，所遗漏的是它们的宪政要素。马基雅维利处于从封建秩序向第一种现代国家——16 世纪的君主国——的宪政秩序进行转变的过渡期。他几乎是唯一认识到这种变化之人，而且他的著作必须依据这一判断来解读。这或许让人感到困惑，因为有时同一个词——例如“国家”（lo stato）——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依据的是马基雅维利是否在论及君主的地产、地位或者关于君主国的一种新奇理念（即一种新的宪政秩序）。这种情况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著作的原初性误解。如果依据它的宪政目标，以及这些目标与 15 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动态战略局势的关系来阅读马基雅维利，则会对上述五个背景性假定得出全新的看法。

在本书中，我将接受马基雅维利的伦理与道德；接受他有关应该——作为一个实践问题——如何统治国家的理念；接受他关于国

家形成的历史进程的理解；而且把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当作是对变化中的宪政秩序的反映。我主张《君主论》并不主要是一部政鉴书，而是一本宪政专著，相应的结果是他的道德格言得到了广泛误传。我主张，马基雅维利信奉而且一直信奉《论李维》中所倡导的共和制政体，《君主论》中的道德格言不否认这一点，也并不与之相矛盾。我主张，他关于机运与 *virtù* 论述中的前后矛盾，只有置于宪政情境中并且依据他一生丰富的外交与战略经历加以理解才能得以协调。我主张，《君主论》——与马基雅维利一生中其他重要的首创之物一样——的写作，以及这本书本身的结构和它令人费解的成就，都是意大利统治者们所面对的战略机会的结果。当时，宪政秩序从封建制向君主国的转变出现在他们面前，马基雅维利首先看到了这些机会，他不顾一切地设法为当时的政治领导人们加以阐明。

这是进行宪政与战略研究的马基雅维利。他关于这些主题的伟大著作，以及这些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至今没有得到正确理解。这个马基雅维利才是他的重要性的真正根源，我的批判和评论因此将围绕这个马基雅维利展开，而不是围绕着他的某些批判者们所描绘的那个“邪恶巫师”展开，也不是围绕其他人所描绘的那个温和的自由人文主义者展开。这并不是说传统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就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缺少了这个宪政纬度，这种研究就是极不完善的，从而也是误导人的。

因此，在这篇序言之后是我对马基雅维利的这些伟大作品的理解，这种理解在我对历史、战略和法律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找到了共

鸣与和谐。这就是我所发现的马基雅维利——一位宪政论者。我希望我的这种个人视角会得到宽恕，如以赛亚·伯林在谈及马基雅维利的批评者时所指出的那样，“这里已经存在超过二十种的解读，因此，再添加一种解读，也不会被视为一种无礼”。

媚臣宝书
邪恶巫师与他的

托马斯·莫尔：里奇大人最近改信了马基雅维利的学说。 8

理查德·里奇：噢，没有。

诺福克公爵：噢，我听说过这个意大利人，令人作呕的书。

莫里的女儿，玛格丽特：它很实用，大人。

——罗伯特·鲍特：《公正的人》第一幕

“结果证成手段”或许是马基雅维利从未说过却又最广为人知的名言。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句话实际上是对《君主论》中一个关键句子的“严重误译”。¹ *e nelle azioni di tutti li uomini, e massime de' principi, dove non è iudizio da reclamare, si guarda al*

fine。* 这个被广为援引的只言片语——*si guarda al fine*——可以译为“一个人必须考虑结果”，但是依据上下文理解，它实际上指的是君主的行为对自己的名望产生的结果，即他所获得的指责或称赞，而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²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读者们常常乐于从他者对某部经典著作的批判中获取知识，这可以使人除了从原著获取知识外，又增加了其
9 他的来源，而且为读者的博学提供了素材，同时省却了独自研究原著需要付出的辛劳。但令人遗憾的是，对马基雅维利的理念进行篡改的做法由来已久，自《论李维》《君主论》分别于 1531 年和 1532 年首次出版后就开始了。1576 年，一位胡格诺教派评论者让蒂耶（Innocent Gentillet）³ 出版了一本法语著作《论如何成为好的治理者：反马基雅维利》**，他在这本书中列出了据说是源自《论李维》和《君主论》的 50 条格言，并对每条格言进行了尖刻的评论。让蒂耶抨击了那些他显然认为是属于马基雅维利立场的格言，包括关于如何使用朝臣的格言（3 条），关于宗教在立国中的作用的格言（10 条），以及关于君主进行统治需要遵守的适当规则的格言（37 条）。让蒂耶把这些格言翻译为法语，并攻击它们是令人作呕的和

* Bondanella 把这句话译为“在所有人的行动中，尤其是君主，并不存在公正的仲裁者，因此，一个人必须考虑最后的结果”。Bondanella and Musa, *The Portable Machiavelli* (Penguin, 1971), p. 21。

** 该书原文书名为 *Discours sur les moyens de bien gouverner et maintenir en bonne paix un royaume ou autre principaute: Contre Nicolas Machiavel florentin*。

邪恶的。他显然深信这种对于阴谋诡计的佛罗伦萨式热衷，外加对暴力的崇尚，已经随着凯瑟琳·德·梅迪奇的到来进入了法国人的生活。凯瑟琳是《君主论》的题献者梅迪奇公爵的女儿，是新教胡格诺教派的迫害者。她曾经把马基雅维利的理念教授给她的朝臣们，指导他们按照意大利政治的方式行事。这种邪恶的肖像——国家背叛、邪恶与暴力的化身——由此开始，我们也继承了它的遗产。让蒂耶的格言的确构成了一种鉴书，因为它们完全剥掉了马基雅维利著作中的宪政要素。

第二年（1577年），让蒂耶的这本书由另一位胡格诺教派避难者译为拉丁文 *Commentariorum de regno aut quovis principatu recte & tranquille administrando, libri tres: Adversus Nicolaum Machiavellum Florentinum*。这位译者在译者序中警告英国人警惕马基雅维利式理念，他认为这些理念应该为新教徒在法国的受迫害负责，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随后，在1602年，让蒂耶这部著作的英文版出版，书名为《论实现善治和在一个王国或其他君主国维持和平的手段：反对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它实际上是依据 10 拉丁语版本翻译过来的。**

尽管马基雅维利的两部主要著作《论李维》和《君主论》分别

* 英文原文书名为 *A Discourse upon the Meanes of Wel Governing and Maintaining in Good Peace, a Kingdome, or Other Principalitie: Against Nicholas Machiavell the Florentine*。

** 这个版本标注的年份是“1577”，这曾经令许多学者感到困惑，他们假定译者帕特里克是在译出后推迟到1602年才出版；现在基本上都认为，“1577”这个年份只是对拉丁语版本的复制。

到 1636 年和 1640 年才出版英译本，但已经明确证明下面这个假定是错误的：除了借助让蒂耶的著作外，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人们并不知晓马基雅维利。因为，在当时英国的图书馆中存有这两部著作的意大利语版本、法语版本和拉丁语版本等，虽然数量相对很少。例如，我们在英格兰大法官斯蒂芬·加迪纳（Stephen Gardiner）的备忘录中找到了，他在 1553—1555 年向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也就是玛丽女王的丈夫进谏的关于如何治理英国的一些建议。加迪纳的手稿直接从《论李维》和《君主论》中摘取了许多段落（大概有 3000 多字）。由于他并没有注明出处，我们可以由此推断，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朝臣们基本上是熟悉这些原著的。

我们从一些信件和日记中了解到，这个时期英国人阅读过马基雅维利的著作，而且我们知道当时许多英国人都具备阅读意大利语著作的能力。当时，意大利语在亨利王朝得到广泛教授，伊丽莎白一世就会说意大利语，而且能说意大利语被看作英国廷臣的一项必要技能。例如，诗人托马斯·怀亚特（Thomas Wyatt）就熟读路易吉·阿拉曼尼（Luigi Alamanni）的诗歌，而且翻译了这位佛罗伦萨诗人的一部书信体讽刺作品。阿拉曼尼是马基雅维利的密友，而且是奥里切拉里花园小组（Orti Oricellari）的成员之一，马基雅维利曾经把一本小书题献给他。但是，出于类似的理由——朝臣们懂法语，而且很容易获得法语著作——下面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由于帕特里克（Patericke）所翻译的让蒂耶著作的英译本直到 1602 年才出版，因此让蒂耶的令人诅咒的马基雅维利形象并不为伊丽

莎白一世时代的读者们所了解。恰恰相反，我们可以看到，早在 11 1578 年让蒂耶的马基雅维利形象就在英国普及开来。最好的例证就是剑桥学者加百利·哈维（Gabriel Harvey）⁴，“他发现错误版本比正确版本传播的要快……他对原著非常熟悉，而且作为一位学者本应尊重它，然而他却由学者沦为小册子作者，并且采用了让蒂耶的文本，原因就是它在戏剧性和猛烈抨击方面更加具有耸人听闻的可能性。”⁵

同样是在 1578 年，约翰·斯托克伍德（John Stockwood）讲演并发表了“圣保罗十字架布道”（A Sermon preached at Paule's Crosse）。在这篇文章中，斯托克伍德宣称“被赤裸裸的无神论者马基雅维利的言论”惊呆了：

他不知羞耻地以最不敬神的方式教授君主必须轻视虔诚与真正的信仰……这种有害言论和大量类似的污言秽语并没有让这位厚脸皮的佛罗伦萨芝麻官感到羞耻和恶心，他教导君主不需要重视宗教或者虔诚：而是这种无耻的禽兽思想应该成为其他国家唯一的施政指南，而且成为朝臣们的可兰经和上帝，他们要通过学习成为无神论者而把这种无耻的箴言付诸实践。但是上帝要求把他从我们国家驱逐出去。

最后一句中的控诉——马基雅维利为朝臣们写了一部可兰

经⁶——是从让蒂耶那里逐字翻译过来的。⁷

甚至，有些曾经努力阅读过马基雅维利原著的学者，也常常会发现让蒂耶的歪曲很有诱惑力。在后来的1603年，理查德·巴克利爵士（Sir Richard Barckley）仍在重复像“一部朝臣的可兰经”这样的诋毁之言。

但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包括像阿尔贝里科·贞提利（Alberico Gentili）和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大学者。⁸ 克拉伦登勋爵（Lord Clarendon）认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在17世纪中期写道，“与那些从二道贩子那里道听途说的人……相比，马基雅维利是正确的。”⁹ 然而，一般来讲，是让蒂耶的这种歪曲且残缺的解读支配了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想象，因为他的马基雅维利形象提供了持久的模
12 型。¹⁰ 在1590年的某个时刻，一位演员在伦敦的某个舞台上，讲述了关于马洛的《马耳他岛的犹太人》的开场白。这位演员乞求马基雅维利精神现在飞临英格兰，他声称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死于1527年，而是已经占据了法国天主教领导人吉斯的灵魂。在法国最近的宗教战争中，吉斯曾残酷地镇压过清教徒，随后被刺杀身亡。

尽管人们都认为马基雅维利已经死了，

然而他的灵魂却飞越了阿尔卑斯山脉；

而且，吉斯现在死了，但这个灵魂离开了法兰西，

在欣赏风光，在与他的朋友们嬉戏。

对某些人来说，我的名字或许令人作呕，

但那些热爱我的人，那些赞美我的人，
让他们知道我就是马基雅维利。¹¹

很快，在《亨利六世》第一幕中，莎士比亚就提到了“臭名昭著的马基雅维利”，而且在第三幕中，他借葛罗斯特的嘴说道：^{*}

我比蜥蜴更会变色，
我比普罗秋斯更会变形，
连杀人不眨眼的马基雅维利也要向我学习。¹²

这样一种把马基雅维利式君主当作一种令人着迷的邪恶化身的形象，在弥尔顿《失乐园》对撒旦的刻画中达到了顶峰。¹³ 这位地狱之君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形象，弥尔顿认为他体现了《君主论》中的缺陷——没有基督教德性的德性，同时表现出地狱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度，一切取决于唯一主宰者的奇思异想；这个理念与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所主张的，共和政体正是由于它们的稳定与节制而得到赞同的理念相呼应。不过，正是这种恶魔撒旦般的形

* 事实上，这部戏剧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君主实例，他由于没有遵从《君主论》中的建议而一败涂地。纯粹出于个人的原因，爱德华四世忽略了缔结王室婚姻的重要性，这表明他不适合做君主，因此他的追随者们抛弃了他。只有不择手段的葛罗斯特被描述为理解统治的技艺；如克利福德在第二幕第六场中所说：“亨利王呀，假如你像别的君王那样，像你的父王和祖父那样，决不让步……”感谢保罗·沃德夫为我提供这个建议。

象赋予了我们随时可以调用的马基雅维利观念，代表着一种对于奸诈与残酷的墨菲斯托菲里斯——德国传说中的恶魔，浮士德将灵魂出卖给他——式偏好。*

虽然《君主论》中有些段落明显在倡导对政治采取一种冷酷无情的视角，但我们将在随后诸章中认识到，要正确理解这些段落，就必须结合马基雅维利的全部著作，并且必须联系他的外交经历、他所处的宪政背景以及当时意大利发生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事件。

虽然如此，这个紧迫的问题依旧存在：关于马基雅维利，到底是什么使他以这样一种魔鬼般的形象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这种形象一直在增加他神秘的特征，并且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他的魅力？**人们说，魔鬼总是有最好的台词，而且有许多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讽刺诗式作品，会确保他的恶名，尤其是如果他的思想是混乱的且挑衅性的话。但是，除了机敏的文字游戏外，肯定还有其它要素来解释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所带来的震惊与不安。

* 这很有可能就是有暴力倾向的说唱艺人图派克·夏库尔 (Tupac Shakur) 决定用 “Makaveli” 作为自己艺名的原因，是墨索里尼把《君主论》描述为“政治家的最高指南”的原因，是希特勒在他床头放置一本的原因，而且也或许是有人在滑铁卢废弃的拿破仑营帐中发现有这样一本书的原因。在百老汇音乐王国，甚至有一首对马基雅维利式反对传统德性看法的抒情歌曲，叫作“七种致命的美德” (The Seven Deadly Virtues)。

** 实际上，曼斯菲尔德指责维罗里对马基雅维利进行了净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降低了他的说服力。参见 Harvey C. Mansfield, review of Viroli's *Machiavell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3, issue4 (1999) : 964。

下列每个要素都为从根本上扭转马基雅维利读者们的期望奠定了基础。如我们将看到的，随着封建制度让位于君主国，欧洲的宪政秩序出现了一种深刻变化。只有马基雅维利这种最有预见力的观察家和最有能力的分析家才能认识到这种变化的本质，除了他之外，极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此外，让蒂耶裁剪所体现的这种审慎的说教式体裁——献给封建君主们的鉴书——被《君主论》的内容肆无忌惮地颠倒过来，因为后者主张大规模地摒弃这种著作体裁——至少上溯至西塞罗——中献给君主的建议，而且实际上甚至主张摒弃这种建议本身的目标。另外，必须承认，抛开它的讨论共和的姊妹篇《论李维》来说，《君主论》招致误解和夸大的原因部分就在于它的简洁和有限的讨论范围。最后，马基雅维利试图协调人们的命运、天资和运气的努力，使他得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拒绝当时主流的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的各种假定。虽然这个方案预示的是几个世纪后人们的普遍共识，但它却是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无法理解的。* 在本书中，我将对以上几个立论一一进行详细探讨。它们每个都对马基雅维利时代的假定构成了严重挑战，而且或许使得他最初的读者们无法正确地认识他。更为遗憾的是，现在有些读者仍然受累于那些最初的错误印象。我希望表明马基雅维利应该如

* “马基雅维利共和国的基本功能是组织人们的自然能力，以这样一种方式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集体性地创造个人无法达到的更多的荣耀、领土和财富。” Kenneth Austin, reviewing Markus Fischer's "Well-Ordered License: On the Unity of Machiavelli's Thought",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33, issue 2 (2002): 539, 540.

何被记起——作为一名伟大的宪政理论家。

- 15 与其最重要的前辈修昔底德一样，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一位具有哲学倾向的作者，他利用自己为官过程中所了解的人类经验来理解和帮助他人理解政治行动的本质。修昔底德曾经做过雅典的将军，他对这个作为一个历史实体的古典国家非常感兴趣——它的风俗、幻象以及持久的自我观念。相对地，马基雅维利曾长期担任佛罗伦萨的外交官和高级官员，他对这个新古典国家的道德后果感兴趣——主要是，当一个人代表这个国家行动时，这个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新特质。

修昔底德留给我们历史研究这样的知识性学科，我们还从他那里继承了冷静的作风、整理证据的方法以及拒绝把超自然的介入当作人类事务决定性要素的态度，这些都是历史学家应具备的特征。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也具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类似遗产，它告诫我们要避免一厢情愿，在我们评价自身行为时要把自己从虚伪中解放出来，而且要现实地理解成功的政治家所必备的品质多样性。但与修昔底德的遗产不同的是，马基雅维利没有带给我们一个统一的学科。它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具有冲突性解释的罗夏万花筒，而且其实践价值是让人半信半疑的。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悖论。

事实上，马基雅维利是君主国的诗人—哲学家，是新古典现代国家的理念和必要条件的阐释者。这才是他最重要的遗产，而不是那些手段和计谋——他徒劳地把它介绍给无法领会其本意的同代人，并认为他们有可能成就创立这样一个国家的伟业。他是文艺复

兴时期教会的对手，确实如此，但他既不是一个路德那样的具有神学动机的基督教改革者，也不是一个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那样的赤手空拳的预言家。他是修昔底德以来最重要人物，他认识到并阐明了法律与战争之间的基本的、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这种新型国家的特征。他提前五个世纪预见到了这种政治论证类型：不可避免且不能简化地需要递归人类良心*来解决政治争端。16 尽管他并没有把它描述成这样，但他的确是一位“后果论义务”（duty of consequentialism）的拥护者，这种义务源于作为一个民主共和国领导人的职责。最后，在《君主论》以及《论李维》——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作《论国家》（*The State*）——中，对于社会稀缺（social scarcity）的状况有明确的断言，即我们绝对无法同时地最充分地满足我们的所有价值。¹⁴对这个社会与政治生活事实的认识，使得马基雅维利产生出他在其著作中所描述的循环运用各种政策与品质的观念，正如随时间的变化，我们会努力去保全我们已经破坏的价值，并被迫抛弃那些我们曾经实践的价值。

* 参见 Philip Bobbitt,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Blackwells, 1991), pp. 163 *et seq.*

第一卷

秩序

——《君主论》的重要结构

《君主论》的总体结构证明了这个流俗的假定——它仅仅 17
是一部鉴书——是错误的；相反，其结构决定性地确证了它
主要是一部关于宪政秩序的专著。但是，这有什么区别吗？
《君主论》是否仅仅是一部鉴书为何会如此重要？因为正是这
种对于他的目标的误读，使得——不，而是强烈地招致了——
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把他当作一个恶魔。如果期望的是一
本鉴书，他的读者得到的将会是一面镜子。

《君主论》的研究者必须掌握的最重要的术语就是 *virtù* 与机运 19 (*fortuna*)。本书第七章将对二者进行详细讨论，并分析它们对于马基雅维利著作的重要意义。但另外一个概念秩序 (*Ordini*) 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正是现代国家秩序的悄然出现，激发了马基雅维利那些极富远见卓识的洞见。¹ 由于 *virtù* 与机运这两个概念主导着《君主论》，而秩序理念是《论李维》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术语，因此它作为我们理解《君主论》的一个关键概念的地位通常被忽略了。²

秩序指的是与——但不限于——国家的基本法律联系在一起的制度结构、宪政结构以及道德假定。³ 最贴近其本意的英语表达或许是“宪政秩序”。如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工业民族国家，这种宪政秩序出现在 19 世纪末的美国和德国，而且主导了整个 20 世纪。但是，出现于 16 世纪早期的第一种现代国家不是民族国家，

而是君主国。

15 世纪末期，中世纪社会的宪政秩序并不是分割为几个分立的
国家，每个君主在他的领土内享有主权，而且不存在外在于君主治
域的世外桃源。相反，盛行的却是多种义务与多种实体相互交叠在
20 一起的一个复杂体系。垂直权力受到水平方向的制约。例如，虽然
君主能够向对他负有义务的封臣们要求军事服务，而且虽然其中有
些领主拥有农民依附于其上的土地，但君主对于他的封臣的农民并没
有直接的权威。此外，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笼罩在普遍的、包罗万象
的教会控制之下，它横跨所有社会共同体，而且直到 15 世纪，它对
其每个教区中的遗嘱与婚姻都拥有最高裁判权。最后，由工匠、商
人和承担其他职能的市民所构成的中世纪社会的城市阶层，在许多
生活方面独立于牧师和贵族。这些市民中有大量的犹太人，尽管他
们通常要遵守严格的公共规章，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却是自治的。此
外，有些城市是自治城市，有些则处于君主的治理之下。

这种宪政秩序中的君主们并不是施行以下意义上的领土性统
治：拥有一块固定的领土，而且具有确定的位置和人口。他们也不
是各个国家的君主，毋宁说，他们统治着分散的区域，每块区域
都具有基本的王室机构，这种结构是非永久性的，而且仅仅对君
主本人是确定的。如亚当·沃森（Adam Watson）这位杰出的外
交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所指出的：“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并不是一
个由几个政治上截然不同的国家所构成的社会。但最初在意大利，
而后遍及这个区域，原本复杂水平结构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几个具有

垂直模式的领土国家，每个国家在其确定的地理边界内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威。”⁴

15 世纪的整个前 50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威胁着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这个不断增加的巨大危险驱使着大量有才干的人向西迁移来到意大利，他们中许多人受教于君士坦丁堡所储存的那些古典传统。在这座城市于 1453 年沦陷时，一种新军事技术的引入对它的失败起到了重大作用；这种技术也将使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最终劫数难逃，而且召唤着现代国家的出现。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指挥官穆罕默德二世的巨型火炮最终把君士坦丁堡此前似乎坚不可摧的城墙炸为瓦砾，这种火炮虽然对于长期的、固定的围城非常有效，但在其他场合却过于庞大笨重。然而，当法国工程师运用教会铸钟技术对这种青铜火炮成功实现轻量化时，他们为战争带来了一场革命。这就是查尔斯八世于 1494 年入侵意大利半岛时所携带的火炮。 21

1498 年，威尼斯议会宣告“当前对战争影响更大的是炮击力量而不是武装的士兵”。马基雅维利对 1494 年后的情况进行反思后，在 1529 年写到“以火炮的威力，无论城墙多么坚固，也能在数日内攻破”。⁵ 忽然之间，环绕城市的那些高墙、角楼、塔楼和壕沟都显得过时了。因此，意大利的那些富裕却脆弱的城市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用来拆除它们现在那些易受攻击的高大石墙，用较低的墙来取代它们，并把它们修到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从而可以在上面布置自己的大炮，遏制围攻的军队。它们需要更大的且更可靠

的军事力量，而不是曾经所依赖的、那些仓促征募的且不可靠的雇佣兵。它们需要比签约人的自然寿命具有更长有效期的联盟和条约，那种短暂性曾经是中世纪法律体系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特征。它们需要可以长期居留外国、处理联盟关系并报告情报的大使，以及始于这个时期的实际上是最早的常设公使馆。⁶它们需要一种行政机构，能够筹集并使用这些财政收入，而且能够维持半岛战争复杂的后勤供应。⁷

22 在国际法中，国家所有重要的法律特征——体现为诸如合法性、人格化、连续性、完整性以及最重要的主权等此类正式术语——都能够追溯到这个时期；自此，这些人类特征、人类身份的成分都转移到了国家身上。当君主——这些法律特征曾经附属在他们身上——需要常设性官僚机构的服务，以便处理一种突发的、更具危险性的战略竞争的要求时，这种转变就发生了。⁸

除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移民外，还有其他几个要素使得意大利成为继欧洲封建王朝之后的新宪政秩序的诞生地。意大利半岛当时由五个城市国家来统治：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这些国家的边界明确、相互接壤，而不是完全不相往来，在君主的王位继承上也并非相安无事。这些城市都很富有——佛罗伦萨的年收入比整个英格兰王国都要多，威尼斯的财政收入和它的土地产出在15世纪中期比法国多出60%；同时，欧洲世界正逐渐走向货币经济。⁹这些城市能够负担起官僚机构的费用，而且能够从中获益。此外，这些城市的财富为他人所觊觎——它们彼此之间也

相互觊觎；然而它们的人口太少，不足以建立强有力的军队，这使得它们不得不依赖雇佣兵的保护，或者向外国借兵。自 1494 年起，意大利成为西班牙、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竞相瓜分的对象。通过费迪南德与伊莎贝拉的联姻，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联合在一起，西班牙的势力得到巩固。法国在击败英格兰人和勃艮第人后也实现统一。现在，欧洲的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这些富裕但脆弱的意大利城市王国的安全上，因为它们面对着新的危险性军事技术，它使得那些曾经保护它们免受吞噬的高墙与深沟变得不堪一击。甚至连文人和艺术家们都呼吁制定对策，抵御入侵意大利的炮火。列奥纳多在这个时期的笔记中，绘制了一些关于机关枪、原始坦克和以蒸汽为动力的大炮的草图。米开朗基罗再三地呈递他所绘制的防御工事图 23 样，他认为这样的工事能够经受住那种新型大炮的轰炸。

最后——如我们将看到的，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除了威尼斯共和国外，其他几个城市国家中的领导权都面临一种合法性危机。

中世纪的欧洲可以粗略地分为两部分。在西部各国，王朝的权力已经移交给君主，他们受习惯法、封臣与贵族自治，以及城镇本地权利的制约。在这里，王朝合法性原则是健全的，但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一旦通过君主国的宪政革新得到解放，这些国家就将超越旧秩序并创造出一种新型宪政秩序，即 17 世纪的王国。

在欧洲中东部，君主受制于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双重权威，二者所选择的是代表着复杂的、相互竞争性利益的统治者。随

着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国家、尼德兰君主国以及德国部分地区开始要求独立性并不断积累财富和权力，它们发现自己面临着自身缺乏合法性的威胁，因为它们对独立性的主张既得不到教皇也得不到神圣罗马帝国的认可。如亚当·沃森指出的，“最突出的是意大利人，从梅迪奇家族、斯福扎家族和波吉亚家族一直到众多较小的统治者，拥有的是无合法性的权力。而西方的国王们具有合法性却没有权力。”¹⁰

一种秩序、一种宪政秩序的界定性特征，在于它能够为合法性提供基础。我们当下生活其中的工业民族国家的宪政秩序承诺：赋予我们权力，我们将改善民族的物质福利。封建制度的宪政秩序则通过王朝血统获得合法性：它宣布，赋予我们权力，因为我们的父亲（或叔伯）拥有它。但是，意大利新的君主国——它们的统治者
24 是“新型”君主即只具有微弱的（如果还有的话）王朝血统主张权，而且他们是通过主动采取重大行动上台执政的——的宪政秩序如何获得合法性呢？¹¹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几个主要城市国家的统治者的情况。在米兰，统治王朝世系终结于1447年。继位候选人之一是弗朗西斯科·斯福扎，他是一名雇佣兵，也是最后一位男性继承人的私生女的丈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三世宣布，由于米兰公国失去了合法的继承人，所以其领地应作为没收物归属帝国；而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也主张他们对米兰的王朝继承权。

佛罗伦萨可以说是一个共和国，但它事实上受梅迪奇家族的统

治。科西莫·德·梅迪奇于1434年结束流亡，返回佛罗伦萨并控制了执政团这个寡头统治机构。通过控制信贷与资本，科西莫能够在没有任何王朝血统正当性的情况下统治佛罗伦萨。事实上，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能够维持这个假象：他只是佛罗伦萨众多公民中的一员。但是，由于梅迪奇家族的这种统治依赖于能力与恩惠这种全新的基础，因此它对于这个觉醒的共和国来说总显得很脆弱。

在罗马，教廷受控于一个来自加泰罗尼亚的家族——波吉亚家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行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们完全无异，他让自己的孩子继承权力，而且运用教廷的权力——包括开除教籍和停止教权——来进一步扩张其家族的权力。然而，他并不具备君主那样的王朝世系性，而且不能保证他子孙后代的继承权。

那不勒斯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继承权争斗、不断重复的革命、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之后，被西班牙国王占据。它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西班牙发动进一步冒险的根据地，然而它的不稳定状态也为法国主张其对那不勒斯王国的权利提供了诱因。那不勒斯也成为意大利其他城市国家的一个榜样，即如果半岛之外的强大国王们入侵的话，会发生什么。

马基雅维利为这些合法性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这 25
种新古典* 国家自身的创造物，它可以使意大利的城市们进行战略

* “新古典”是指它概括了体现在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身上的古典国家理念。

性的自我重组，而且可以提高完成这种重组的领导人的才干。如马基雅维利所言：

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些意大利人从来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我们希望你的显赫王室可能做的事情，如果在意大利的多次革命和许多战役中，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似乎总是被消灭了，这并不是什么怪事。因为我们先前的战争方法过时了，而且又没有人来创立新的方法。因此，要使一个新近当权的人能够获得巨大的荣誉，莫过于由他创制新的法律和新的秩序。¹²

他所提议的“新的法律和新的秩序”具有一种物化作用，君主国可以借此实现客体化，并且与君主个人相分离。这意味着，只有可以成功保卫国家的君主才能为自己争得合法性，而这个国家则通过维持一种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王朝世系的合法性程序而使自身成就不朽。

然而，这些洞见却直接导致了对马基雅维利著作的致命误解。他对新君主的忠告——他为之建议的规则和手段——被封建的评论者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同时误读为对当前君主们的冷酷且不文明的建议。基于相同的原因，马基雅维利有关君主个人道德与其保卫国家的义务相分离的建议，连同他本人对基督教道德与政治行动相分离的思想，一起令批判者感到困惑和害怕。

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将表明，虽然马基雅维利针对建立、维护和捍卫一个君主国而提出的实践性建议通常有违直觉且与众不同地坦率，但它的新奇性事实上完全源于这个宪政秩序自身是新奇的；²⁶ 文艺复兴时期的治国之道中那些似乎最邪恶的做法，事实上在之前有很多先例（而且，当代也不乏例证）。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的治国之道并不是他对治国才能的原创性贡献；实际上，他所偏好的方法是从他自己的外交经验以及从古代寻找例证。他的原创性隐身于他的建议意在服务的宪政之中，他对二者进行分离的建议——关注手段而忽略其目的——导致了許多误解。

尽管许多论者会不同意，但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分离道德与政治行动，他也没有嘲笑基督教美德。我们将看到，他对君主领导的两个方面——个人方面与制度方面——的描述，本质上是合乎道德的。（以上两方面）分离且不再相连，这曾经是封建统治者们的情况，这两个方面转向了行动与责任的不同领域。在马基雅维利写下他热爱佛罗伦萨甚于热爱自己的灵魂时，他并不是在主张二者可以互换，而是表明——封建君主们的情况并不如此——他能够辨别统治与生活之间的不同。

《君主论》是一部深刻的宪政著作，预示了欧洲宪政秩序的变动以及第一种现代国家的出现。这就是它着眼于必须寻找合法性来源的“新”君主的境遇的原因。这就是梅迪奇家族、波吉亚家族、斯福扎家族和其他不具备王朝血统正当性的领导人面对的情况，但马基雅维利的解决方案——君主国——不仅仅是只为某个特定的强

大家族或城市寡头找寻合法性来源。依据定义，君主国是一种“新秩序”（new order of things）。“君主国”的重要性在于，把《君主论》所有部分——各种公国的性质、军队的关键作用、君主的行为与策略，特别是如何创立新的意大利国家——关联起来，更把《君主论》
27 与《论李维》联系在一起。马基雅维利写道：“因此，这个时机一定不要错过了，以便意大利经过长时期之后，终于能够看到她的救星出现。”¹³

1494年之后，马基雅维利设计出了以下提议：

（1）佛罗伦萨应该依靠应征入伍的民兵而不是雇佣兵；贪婪的本性将不可避免地使雇佣兵团败坏，他们会为了保存实力而逃避打硬仗，会为了更高的佣金背叛雇主，甚至在形势有利时会篡夺权力。

（2）“新”君主必须创立能够激发其臣民忠诚感的制度，在其他类型国家，这种忠诚感是由封建依附结构来保证的。

（3）法律组织与战略组织是相互依赖的，因此，需要强大而可靠的军队来保护公国的完整，尤其是它的法律。此外，为了确保“新”君主的臣民的忠诚，也需要做到恪守法律。

（4）为了有效推进外交工作，必须建立常设大使馆和精干的情报队伍。

（5）必须建立稳定的政府结构，它要比任何具体君主的奇思妙想和禀赋更为经久有效，而且能够为君主和他的继承者所依赖。

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在一个信念的推动下提出的：统治者不能仅是位君主，务必发展为君主国，否则必然会被更为强大的西班牙、法兰西和神圣罗马帝国所消灭。

亚历山大六世、他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朱利叶斯二世、里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从封建视角看问题，仅仅看到为自己家族的权力确立合法性的必要性。然而，马基雅维利认识到，这种新秩序是这些领导者所需的首要之物，而且君主国这种宪政秩序的出现能够为意大利创造一个未来，即可以使它 28 有能力抵御列强——而后者是未经变革的——的掠夺。因为，如果能够在意大利中部创立一个君主国，把罗马和名义上的教皇属地罗马涅与佛罗伦萨及其属地统一在一起，那么，一个令人畏惧的战略实体就能横空出世。这就是《君主论》以劝告梅迪奇家族抓住时机成就这一伟业作为结尾的原因。《君主论》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流俗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为马基雅维利寻找一位雇主，而是利用那样的人物来实现马基雅维利的意大利梦。

马基雅维利知道要实现自己的谋划有多难。在或许是《君主论》最关键的段落中，他写道：“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确立新的政治秩序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¹⁴

1962年,《时尚先生》杂志的编辑们出版了《每个年轻人都应该知道的事情》(*What Every Young Man Should Know*)。通过配以精致的卡通插图和关于类似常春藤服饰、恰当的邀请形式、引诱的手段等主题的专题文章,以及关于怎样选择大学和规避兵役的建议,这本书为了解20世纪50年代后期东海岸美国人的风土人情提供了一个窗口。这种为幸运的年轻人所写的书,经常取诸如《论君主的统治》(*De regimine principum*)或《君主之鉴》这类的书名,显然它们都把《君主论》作为一个样本。通常,这类著作讲的是一位国王或君主如何成功地获得权力,但这类体裁也包含一些有关教导统治者模仿或规避某些事物的文本。这些文本的作者包括亚里士多德,当然,肯定还有西塞罗,他的《论义务》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范。还包括写作《居鲁士的教育》

的色诺芬，写作《论君主政治》的托马斯·阿奎那，以及写作《基督君主的教育》的伊拉斯谟。¹ 高贵的读者们能够从这类作品中获得关于如何恰当行事的建议。在中世纪，这主要意指如何培养基督教统治者的德性，但与这类体裁的经典著作相比仍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尤其是都强调培养统治者的高贵品质，而且都表达了普遍赞赏的德性。

然而，在《君主论》的 26 个章节中却没有那么多的相同之处。

30 从第 1 章到第 11 章，关注的是各种类型的公国：世袭型的、新建立的、混合型的（已经建立的公国为了扩张而吞并他国领土）、市民型的（领导人由人民或贵族来选举），以及基督教会型的。如果这些章节被当作专题论文分别发表的话，没有人会怀疑它们本质上是有关宪政的。第 12 章和第 13 章处理的是公国的武装力量问题。

只有从第 14 章到第 23 章讨论的才是这种新秩序的君主。这些章节论述了君主的训练、行为和名誉，这些论述的方式或许被认为类似于经典鉴书中的建议，然而，即使是这些章节也严格地局限于讨论君主作为国家政治首脑——他必须确立并维持自身的合法性——的行为举止。事实是，这些章节中的建议与《君主论》之前的“君主之鉴”类作品的建议形成了深思熟虑的对立；正是这些章节一方面激怒了马基雅维利那些批评者，另一方面又令他的那些更具恶魔倾向的读者着迷，但二者都选择去完全忽视之前各章的重要性。

最后，从第 24 章到第 26 章，马基雅维利依据这种新宪政秩序

的出现来探讨意大利的未来，并探讨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创立一个统一国家的可能性。最后这几章表明，这本我们当作《君主论》来了解的著作实际上拥有一个激进的宪政目标，而那些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王侯和他们的廷臣所写的关于合宜行为的矫揉造作的作品是不会包含这种目标的。

在《论义务》²中，西塞罗写道，统治者必须避免不公正的行为，“或则用暴力，或则用欺骗，两者都是残忍的：欺骗好像是狡猾的狐狸惯用的伎俩，暴力好像是狮子惯用的手段；两者都是完全违背人性的，³但欺骗则更卑鄙”。与此相反，在《君主论》最有名的一段话中⁴，马基雅维利写道：

任何人都认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诡计，而是一本正直，这是多么值得赞美呵！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因此，你必须懂得，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

31

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⁵

虽然这段著名的评论与《论义务》中同样著名的那段截然相反，但它或许暗示《君主论》是一部自觉构思为鉴书的著作，差别在于它所建议的行为与通常所建议的完全相反。然而，在第15章中，马基雅维利告诉我们——有关那些教导君主们恰当行事的作品——“我想把关于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而只是讨论君主实际的行为方式及其真实结果”。这句话很容易招致误解：不是表明他在写一部与其他鉴书中的建议完全相反的书——如经常假定的那样，而是马基雅维利在宣布他拒绝这种描述乌托邦模型的哲学样式，即不顾现实情况而一味追求理想的目标。相反，他计划从现实出发去讨论那些他在政府任职和外交活动中所观察到的事件。他从这些

32 经验中得出了一些原则，用来避免脱离现实及相伴而来的重大危险。他开列出一些或是带来称赞或是招致指责的品质：慷慨 / 贪婪、怜悯 / 残忍、傲慢 / 和蔼、诚实 / 狡猾等，只是为了说明，这些品质是值得赞美的还是会招致指责，取决于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现实结果。因此，他总结道，君主不应该追求那些据说始终最值得赞美的品质，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行为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君主的首

要责任是避免亡国之耻而不是他的行为方式带来的耻辱；他必须采取那些能够兴国安邦的品质——即使它们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抛弃那些会危害国家的德性。

这是一个关键的差别：对君主的建议不是关于如何为了君主自身的目的来表现他自己，而是关于如何使所有其他行事规则从属于服务国家。这并不是说，遵守马基雅维利的建议，君主会成为更好的君主；毋宁说，它强调的是，关于如何为君的理念必须随着君主国的出现而改变，而且由于对政治有切身的观察，马基雅维利能够提出一些可以证明在这种新形势下有助益的建议。

我们可以通过马基雅维利对西塞罗的《论义务》的另一处引用来理解这一点。西塞罗主张统治者应培养“慷慨”这种德性，而且“应该避免贪婪之嫌”：“没有什么恶习比贪婪更令人厌恶了……特别是对于杰出人士和国家管理者来说。”⁶然而，马基雅维利在第16章讨论“慷慨与吝啬”这两种品质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看法。慷慨被认为非常有助于获得好名声；作为一名基督徒，君主应该行善而不留名。但是这只能为他赢得一种不吝啬的名声。相反，如果君主过于慷慨大方，就会导致臣民的税负增加和国家的贫困，这会触怒许多纳税之人，换来的却只是为数不多的受到赏赐之人的感激。结果就是，危险来临时，君主会被迫采取节俭的措施，从而又会被认为是吝啬的。⁷因此，君主——作为一国之主宰而不是作为一名基督徒来行事——为了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慷慨之人，必须节俭甚至吝啬，因为如果没有增加赋税，那就是对所有

人的慷慨，也仅仅只是对那些因此而没有得到他赏赐的极少数人显得不大方。试图效仿父亲之富丽堂皇的皮耶罗·德·梅迪奇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最终被迫提高税负。因而，慷慨就是浪费财产，要么导致贫困——为了慷慨而丧失权力，要么为了避免贫困而变得贪婪，而这又会招致憎恶。马基雅维利没有彻底贬损贪婪，而是把它看作一种由于其对君主不利而需要避免的品质，即它会影响君主的统治能力。因此，马基雅维利得出结论，拥有或许会带来指责的吝啬名声是允许的，因为这并不会招致憎恶，因而不会危害国家。

这是一个微妙的差别，它甚至误导了马基雅维利的一些最深思熟虑的批评者。例如，由于列奥·施特劳斯相信马基雅维利割裂了伦理与政治，因此总结说他是“一位邪恶教师”，教导统治者抛弃正义、仁慈与爱这些普世价值，而偏好残忍、暴力、恐惧和欺诈。⁸即使像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这样更为同情的学者，也把马基雅维利当作一位在政治问题上暂时搁置道德的“现实主义者”。同样，马基雅维利的一些辩护者居然也认为道德价值在政治领导人必须做出的重大决策中没什么地位，并据此认为相反的观点是一种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⁹但是，如我们将在下面各章看到的，事实上，马基雅维利是一位强烈的道德主义者。只不过，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在他代表人民而不是仅仅代表他自己行事时——的道德，就是要使君主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我们也将看到，这种观点与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国而非公国的决定性偏好密切相关，而且它也解释了为何仅仅阅读《君主论》而不阅读《论李维》

会对他的观点形成一种不完整的且常常是误导性的理解。我们是否应该接受个人道德次之的观点，取决于国家的性质与目标。¹⁰

马基雅维利是最早意识到这种差别的人之一，¹¹ 而且他的这个论断——担任公职之人的道德责任不同于其他人——是现代国家诞生时期的一个关键性洞见。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把这个洞见与现代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解释它的时机选择。封建君主将个人与政治合一，马基雅维利则认为国家绝不等同于君主个人，而且推断君主国的首脑应该依据这种区分进行统治。

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政治行动：脏手问题》（*Political Action: The Problem of Dirty Hands*）一文中也呼吁关注这个区分。^{*} 沃尔泽是在为一场关于战争规则的专题研讨会所提出的一个两难寻找答案：一个人有可能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吗，他必须在两种做法中选择其一，但两者对他来说都是错误的？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认为，当某人被迫在坚持一种重要的道德律令还是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人类灾难之间进行选择时，就会发生那种情况。¹² 沃尔泽把这种两难置于一位政府官员的情境中，³⁵ 而且得出了一个或许最为马基雅维利厌恶的结论：

^{*} Michael Walzer, "Political Action: The Problem of Dirty Hands", in Sanford Levinson (ed.), *Torture* (Oxford UP, 2004), pp. 61-76. 让-保罗·萨特的剧本《脏手》中对这种观点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达。其中，老练的政治家贺德雷向年轻而天真的理想主义者雨果解释实用政治的本质：“我呢？我有一双肮脏的手，一直脏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粪里去，血污里去。”

我并不认为我能够清白无瑕地进行统治；我们大多数人不相信那些统治我们的人是清白的……即使是他们之中的最杰出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进行统治就不可能做正确的事情。它意味着，政府的某个具体行为……或许依照功利主义标准来看是完全正确的，却给执行者带来道德错误的负罪感……另一方面，如果他保持清白，即选择“绝对论的”（立场）……他或许就不能履行他的职责。¹³

在沃尔泽看来，官员所承担的义务要求他必须去做我们其他人会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说谎、欺骗、杀戮甚至酷刑。这进而导致了大众对公职人员的道德蔑视。

（一位政治领导人）……被要求授权对俘获的反政府领导人进行刑讯，因为后者知道或可能知道在城市一些建筑物中安放的炸弹的位置，而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这些炸弹就会爆炸。他命令相关人员对这个人进行刑讯审问，因为他确信为了挽救那些可能死于爆炸的无辜之人他必须这么做，尽管他相信酷刑是错误的、实际上是极其可恶的，不是有时，而是总是如此……他并不是太适合政治但实际上他又是合格的。这就是道德的政治家：我们通过他的脏手而认识了他。如果他仅仅是一个道德的人，他的手

就不会弄脏；如果他仅仅是一个政治家，他就会假装它们是干净的。¹⁴

这个结论对于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统治来说具有相当消极的内涵，因为一旦知道了领导人有义务降低自己的道德品质，人们该选择什么样的领导人呢？而且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会追求这种角色？马基雅维利在个人品质与统治品质之间的区分为官员开脱了罪责，而且使他们的个人道德不受连累；而沃尔泽的公民既授权领导人充
36
当这种独特角色又否认对政府的行动承担任何责任，因而是伪善的，或更坏的。马基雅维利式国家中的官员绝不是拥有更脏的手，他们的手至少与我们其他人的手一样干净，而且可能更干净。

换句话说，马基雅维利并不是在建议君主为了保卫国家而忽视传统的、基督教的和古典的德性；而是要求身负保护国家之责的君主在必要时必需这么做。

假如你对（马基雅维利）所建议的政治手段表示反对，因为你认为它们从道德上说是可憎的，如果你因为它们……“令人震惊”、太可怕，于是拒绝这些手段，那么马基雅维利不会做出回答，也不会辩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完全有资格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做个自私的公民（或修道士），追求你自己的一块小天地。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也必定无法让自己负起对他人生活的责任。¹⁵

这对我们理解马基雅维利的基督徒品性具有重要意义。真正令让蒂耶这样的批评者愤怒的是马基雅维利在第 18 章中所主张的：虽然在任何时候都践行传统德性一定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比如，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君主显得具有上述最后一种品质，尤其必要”。¹⁶ 那种认为宗教可以用来控制人们的道德情感的观念，并不会真正令马基雅维利的那些老于世故的读者们震惊；但是认为应该建议君主把他的行为与他的宗教信仰相分离的理念，的确 37 是令人震惊的。想必只有魔鬼才会建议君主的良心去违背宗教的要求行事，然而在《君主论》建议君主们总是“显得”笃信宗教而不是真正笃信时，这是人们显然会从中得出的推论。

这也是一个深刻的误解。它已经导致许多读者误入歧途，而且误导一些人推断马基雅维利的基督徒品性与其声明和行为不一致。实际上，以赛亚·伯林就认为马基雅维利是一位异教徒。¹⁷ 让我们重温一下马基雅维利关于君主道德的论述。由此，我们将认识到它奠基于一 种基督教的现实观。

马基雅维利主张：

(1) 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会做出坏行为，这是人的本质。

如他在《君主论》第 17 章所指出的，“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

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这种对私利的痴迷是人性的一种基本功能，而且不会随时间而改变。

(2) 结果是，有时这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其中必要性——保护国家的必要性——要求君主为了应对那些狡诈的、贪婪的此类对手，而必须背离惯常的德性。

例如，欺诈“在战争中却值得称颂，以欺诈致胜的人，和以武力取胜者一样，都值得赞扬”；而且对“曾经欺骗过你的敌人”来说，更是如此。¹⁸ 对其他一些通常认为恶的德性——残酷、伪装和欺骗——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它们事实上是美德还是恶德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是保护国家所必需的。¹⁹

(3) 因此，这是一个谨慎规则，即统治国家的君主必须以其人可能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考虑到人的本质就是如此，²⁰ 而且考虑到统治国家的是人而不是天使，君主必须避免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他的对手将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来对待他。相反，君主必须学会以其人可能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代威慑论的语言。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是从最基本的人性要素中得出这种基本的治国箴言的。²¹ 38

此论证的三个部分都具有神学上的呼应。首先，《创世纪》中关于人被驱逐出伊甸园和失去神恩的解释，就把人性描述为从根本上讲是有罪的。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看到马基雅维利如何依据这种对人性的描述为他的法理学奠定基础。

其次，如果体面的行动的确会导致国家的垮台——如马基雅维利所论述的那样——那么，上面那个论证就是源于必要性的论证。马基雅维利写道，一个希望“总是体面地行事”的人必然会失败，因为他周围有许多不择手段的人；因此，“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如何依照必要性的要求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²²

这里的关键措辞是“依照必要性的要求”。如曼斯菲尔德所注意到的，马基雅维利把必要性从作为对人类行动的限制转变为一种驱动力——依照必要性选择善与恶。因此，马基雅维利写道：“如果可能的话，君主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要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²³ 在他的几部著作中，包括《君主论》在内，马基雅维利提醒我们别忘了摩西的各种骗术以及可怕的暴力行为，例如对崇拜金钱的以色列人的大屠杀。实际上，马基雅维利甚至进一步断言，那些成功建立国家的人因而是最为上帝所爱的。²⁴ 因此，问题就是：暴力或欺骗——狮子的方法和狐狸的方法——真的是统治者对之负有责任的人民获得幸福所必需的吗？

39 在摩西那里，上帝的命令和意志表达了必要性；在萨沃纳罗拉那里，他所说的与上帝交谈并按照其命令建立一种新秩序，是极为可疑的，因而不能依赖必要性。

马基雅维利从来没有把他的新宪政秩序宣称为神意，但他确实强调它的必要性。这意味着对真正的必要性的认真筛选，必须在任何暴力或欺骗行动之前进行。²⁵

最后一个呼应是救赎。1525—1527年，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当他再次活跃于政治与军事事务中之时，马基雅维利为他所属的一个宗教小圈子做了一次讲道。这次讲道的题目是《劝忏悔》(*Exhortation to Penitence*)，²⁶ 其中马基雅维利提到上帝“注意到人类的软弱”而且是最仁慈的，而不是“有仇必报”。最后这个措辞引人注目，因为，虽然我们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许多暴力事例，但它们总是指向公共利益，而复仇却是一种私人事务。

马基雅维利在这篇“劝诫”中写道，最大的恶是对上帝忘恩负义。这会导致第二大恶：仇恨自己的邻居。因为“那些不感激上帝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敌视他们的邻居”。²⁷ 马基雅维利在《用兵之道》中有更为简洁的表述：“那些蔑视上帝之人如何能尊重人？”²⁸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在作为君主国之首脑的统治者的责任中，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崇敬上帝，因为这是尊重人类的基础。^{*} 而《君主论》并不是一个由于它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缺陷而蔑视人类 40 的小册子；如果它的确如此，那么它就是让蒂耶所认作的那种著作；如果它的确如此，就没有理由在《论李维》和其他地方赞扬公共善，

* 那些为马基雅维利求助上帝而感到惊奇的人，可以思考一下 Sebastian de Grazia 的总结。他写道：“像分散于鹰嘴豆地中的罂粟那样……分散于他的著作之中的的是对上帝的许多引证。它们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显而易见的肖像。尼科洛的上帝是造物主、众神之主、幸运的、真实的、普遍的、万物之一、有人性的、无形的、应该感谢的、需要崇敬的、审判者、公正且宽容的、施行奖惩的、令人敬畏的、一种超越力量、不同于世界中的作用之物。” De Grazia, *Machiavelli in Hell* (Vintage, 1994), p. 58。

更没有理由主张君主的行为要从属于国家福祉的提升；此外，马基雅维利在谴责人们的忌妒时，把君主克服这种大众恶习的能力算作他的德性之一，也就没有意义了。

设想你希望把自己训练成一名职业扑克牌选手。这种训练的一部分是必须学习所有纸牌作弊花招：发底牌、手掌藏牌、做标记，等等。你必须学会这些技巧，如此你才能在别人试图骗你时识破它。但你自己一定会运用这些骗术吗？我认为这取决于你的比赛成绩，以及一旦你的骗行暴露，你的对手是否会执行比赛规则。对于“必须这样吗？”“我们不能做得更好吗？”这样的问题，答案并非完全由你掌控。

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公务活动中是十分正直的，指出这一点很有助益。在一个并非非常在意公为私用的时代，当他受谗臣指控腐败时，调查结果洗清了所有指控。尽管事实是，他长期官俸低微——他曾经扬言，如果他的薪水得不到偿付的话，就要卖掉他的马——而且经手大量的支出。

然而，我们所习以为常的那个误导人的马基雅维利形象，对现实世界具有某种吸引力。它与我们当前对官僚队伍、政治家、律师
41 的蔑视是一致的，这种蔑视是许多被那些力量——他们把那些力量等同于那些试图控制那些力量的人——吓坏了的人们的盲目反应，非常像为了一场火山爆发而指责火山学家。或许从来就是如此，至少自从国家——给我们带来了它所创造出的官僚队伍、律师和政治家——诞生以来就是如此。

第一卷 小结

《君主论》是一部宪政专著

在罗马神话中，雅努斯（Janus）是天门之神。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旧的宪政时代行将结束，而新的正在出现。《君主论》与《论李维》，一部回顾过去寻找经验教训，另一部期待还没有出现的未来。与雅努斯一样，《君主论》也有两副面孔，这是一种拓扑学的事实，不允许简化为一种单一的感觉，无论多么地认真负责。从来没有只有一面的硬币。

42

第二卷

论国家

——《君主论》与《论李维》的关系

常常有人断言，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国家”一词应该被拿来指代君主的地位或状况，而且，这确实是马基雅维利时代 *lo stato* 一词的最常见用法。但他在共和国的情境中对这个意大利语词汇的使用表明，他在这里，以及在其他地方，是在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来使用一个常见的词汇：用来描述一种与君主个人相关、但又与之相离的特征（identity）。 43

Tutti li stati, tutti e' dominii che hanno avuto et hanno imperio sopra li uomini, sono stati e sono o repubbliche o principati.

“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公国（*principality*）。”¹

1930年，剑桥哲学家布劳德（C. D. Broad）声称，我们可以 45
依据其赋予价值还是义务以优先性来界定各种伦理理论。接着，他
提出了下面这种现在广为采用的区分：¹

（如果我们认为）义务概念是基本的，价值概念是依
据义务概念来界定的……（我们可以认为）“X 内在是善
的”意味着，每个理性人认为欲求 X 都是适宜的。这种
理论可以被称为义务论。*

另一方面，如果价值概念是基本的，而且义务概念要依据它们

* *deon* 是“duty”（责任）或“obligation”（义务）的希腊语对应词。

来界定，那么这种理论可以称为后果论，因为它主张的是，“X 是正确的行为”则意味着 X 可能产生的结果至少与行为者此时可采取的任何其他行为之结果一样好。

在我们把义务论规则（“你不应该杀人”）与后果论规则（“在自卫中，即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杀死一个侵略者是允许的”）相对照时，我们是在对比绝对义务（绝对律令）与相对判断（例如，某种具体的手段由于其有助于一个可欲的目标而被证明为正当的）。*

46 在“二战”和“冷战”期间，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们经常说，他们受某些伦理行为规则——诚实、怜悯和不侵略——的约束，而且没有任何困境可以证明违反这些规则是正当的，而他们所对抗的独裁者们却不受它们的限制。据说，对后者来说，目的证成手段。

在我看来，这至少是不全面的。理解了这一点，就会理解马基雅维利对共和政体的信奉，对独裁制的敌视，以及《君主论》中一些更令人震惊的说法的基础。因为没有哪句话比“目的证成手段”这个后果论格言更与马基雅维利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后果论义务”（duty of consequentialism）起源于对共和政体的最深层的授权。²这是因为，这种国家的官员们必须在公职活

* 另外一种类型的理论，德性理论（*aretaic theories*），主张人们的行为既不应该依据绝对义务也不应该依据行为的后果，而是应该依据一个有德性的人所拥有的特性。我将在第六章讨论这种理论。

动中按照能够使其治下的人民的目标最大化的方式来行动。正是这种授权施加了这一义务：评价政策要依据它们所服务的目的，而且取消了那些多少在个人生活中存在的义务论的或者先验的道德律令。相反，专制者或独裁者可以说：“我的信仰施加给我一种义务，在我的统治过程中，我将把它置于公众之上，不管给他们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而且不管他们对自己的希望是什么。”马基雅维利对这种人的了解，或许始于具有超凡感召力的修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

萨沃纳罗拉因据说曾与上帝交流过而著名。大概有六年的时间，即从伟大的洛伦佐去世前两年一直到法国入侵意大利的两年后，他主导着佛罗伦萨。他是一位来自费拉拉的多明我会修道士，也是佛罗伦萨的圣马尔科修道院院长。他是一位颇有风度的传道士，一位改革派立法者，他在掌权期间，控制着佛罗伦萨人的道德与生活方式：他说服大众烧掉了虚荣之物（镜子、卜伽丘等人所著的书、弗拉·巴尔托洛梅奥和波提切利的油画、狂欢节面具，甚至假发都被认为会导致罪恶）；公开指责教皇和梅迪奇家族的腐败；倡议与法国结盟——这被证明对佛罗伦萨的外交来说是致命的；警告佛罗伦萨人，如果他们继续追逐名利的生活方式，将招致上帝的可怕报复。³或许可以说，他就是义务论的完美典型。⁴

在被开除教籍并遭受严刑拷问后，他否认自己真的与上帝交谈过，但在他被带离刑架绑在火刑柱上被烧死之际，他撤回了这个否认。就在萨沃纳罗拉垮台后，马基雅维利才有机会进入政坛，担任

战争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和第二秘书厅秘书长，这些职位是在萨沃纳罗拉的追随者们被解雇之后才空缺出来的。

马基雅维利对国家权力的态度绝不是绝对主义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从西塞罗开始。在《论义务》中，西塞罗写道：“有些事情如此丑陋，有些事情如此可鄙，以至于智慧之人甚至为了拯救国家也不会去用。”⁵ 这是义务论独断的一个例子。相反，马基雅维利坚持认为，“当国家安全处于危险之中时，人们不应考虑行为是否正当，是残忍还是仁慈，是荣耀还是耻辱；其实，他们应该把所有的顾虑抛在一边，一心思考能够拯救国家生命、维护其自由的策略”⁶。

虽然西塞罗把罗慕卢斯——他为了单独掌权来建立罗马而谋杀了他的兄弟瑞莫斯——当作犯了不可宽恕之罪的例子，⁷ 但马基雅维利

48 对罗慕卢斯* 的评论却是：“有人以非常手段治理王国或建构共和国，智者是不会给予责难的。行为使他蒙羞，结果将给予宽宥，此为当然之理。如罗慕卢斯之所为，只要结果为善，行为总会得到宽宥。因为应受到责难的，不是严厉的改良者，而是强取豪夺者。”⁸

“目的证成手段”这句话并没有抓住关键的区别，因为并不是任何目的都具有证成作用，也不是任何手段都是可证成的。相反，马基雅维利尽力想证明，只有那些服务于共同善的目的，即明确符

* Bondanella and Musa, *The Portable Machiavelli*, p. 22. 类似地，马基雅维利也把斯巴达国王克萊奧梅尼当作一个例证，他“把所有长老会成员（五位被推选的督政，决定着公共政策）和可能跟他作对的人斩尽杀绝”，因为，否则的话，他就无法恢复利库戈尔斯的公正且值得称赞的法律。（*Discourse*, book 1, chapter 9）

合公共利益，而不是仅仅有利于统治者的个人利益，才能够证成暴力。此外，为了服务于那个目的，这些手段必须加以严密地且均衡地调整。⁹如我们在前几章看到的，这种对于必要性的探究，对马基雅维利的推理是至关重要的。如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的，马基雅维利明确地谴责许多暴力做法，最突出的就是大规模驱逐人口以及各种虐待行为，他认为这些做法得不到必要性的证成，因为它们对共同善完全没有助益。

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军队于公元前 321 年受困于考迪纳隘口后的一次行动的讨论，是他反对统治国家之人按照义务论绝对原则行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的选择是要么在战斗中全部牺牲，要么是可耻地撤离——缴械之后被用绳子拴在一起返回罗马。罗马总督选择了后者。他声称，“罗马的生命”系于“军队的生命……为了保卫国家，可以采用任何方式，无论耻辱与光荣”。如果失去军队，“即使军队是光荣战死的，罗马也会灭亡，它的自由也从此丧失”。¹⁰

考迪纳隘口之役也被马基雅维利用来说明他的另一见解，即强 49
调手段与目的分析的均衡性。马基雅维利告诫，国家对暴力的运用只能作为最后的办法：“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不必诉诸武力，而是要把它保留到最后的时刻，在万般无奈时，再加以利用。”¹¹

这些观察表明，国家所追求的目的是要紧的：掠夺对于掠夺者和被掠夺者都是灾难性的；只有因共同善的安危的必要性才能证成暴力行为的正当性，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手段也是如此可耻，而不能加以运用。因此，手段也是要紧的：即使在它们能够

得到必要性的证成时，它们也必须受制于对那种必要性的有效性的调整和判断。在考迪纳隘口之役中，萨谟奈人向自己的领导人赫伦尼乌斯寻求建议，他劝说他们要么体面地放罗马人走，要么把他们斩尽杀绝。他的理由是，如果这支军队获得体面释放，罗马人就不会产生怨恨；而如果把它完全消灭，罗马也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重建军队进行复仇。这个建议就是要避免“中间道路”，而赫伦尼乌斯的儿子最后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从而既招致了罗马人的怨恨又没有大大削弱罗马的军力。

马基雅维利就曾批评他的保护人皮耶罗·索德里尼，因为后者拒绝运用决定性力量——可能被认为是独裁性的——服务于好的目的：¹²

皮耶罗·索德里尼相信，他可以通过他的耐心与善意克服他的敌人们的复辟野心。尽管他的远见卓识让他知道必须做些什么，而且他的敌人们的运气和野心，也使他有可能会消灭他们，可是他从未动过这样做的念头。他本来应该知道，他的行为和意图是由结果的成功来判断的；而且应该知道，如果他成功了，那么大家都会承认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祖国的安宁，而不是为了他的个人野心。遗憾的是，他不仅丢掉了他的城市以及其自由，而且丢掉了他的声誉。¹³

这个共同善论旨贯串于马基雅维利著作的始终，而且对于理解他的思想也是不可或缺的。¹⁴ 马基雅维利借助它来区分我所谓的“恐怖之国”和“同意之国”——国家的合法性是基于对其公民的胁迫还是基于他们的意愿。¹⁵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前一种政治安排是这样的，其公民“可以在任何时候被肆意虐待，而且正是这种永恒的可能性，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恐惧，使公民产生奴性，而这种奴性与自由社会中的地位和责任是完全不一致的”。¹⁶ 50

与此相对，“从共和自治中获得的共同利益”是“不必为自己担惊受怕”。¹⁷ 正是出于这个缘故，马基雅维利鄙视独裁政治，那里出现的总是一个“恐怖之国”。他明显偏爱共和国而不是君王之国，¹⁸ 因为，“毋庸置疑，这种共同善只有在共和国中才会获得”¹⁹。：

看看雅典人在摆脱了皮西斯特拉图斯的专制统治后，在一百年里取得了怎样的丰功伟业，真是令人啧啧称奇。再看看罗马人在摆脱国王以后，取得了何等辉煌的成就，更令人叹为观止。其原因不难理解，成就城邦之丰功伟业者，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共同的利益。²⁰

马基雅维利的洞见——官员在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时必须忽略他们的个人道德准则——很少被置于法律情景中加以评估，尽管对我们如今所生活其中的国家来说，是法律而不是君主的判断指导着那些统治者。君主和共和国都“需要受到法律的管束。能够为所欲

为的君主，无异于疯子；能够为所欲为的人民，必属不智”。²¹

有时，这个关于法律之必要性的论点与必要性本身的角色似乎是相冲突的，而且导致一些评论者提议，紧急状态——当国家安危命悬一线时——能够证成对严格守法之原则的背离。在美国，常被
51 引证的例子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他在美国内战期间暂时停止了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的效力——这直接违反了美国宪法中的一个明确条款——目的是执行戒严法，结果逮捕了 13000 多人。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这个例子，就会认识到林肯的行动是为了保护国家的法治，而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性的道德律令（如消灭奴隶制）。1861 年 7 月 4 日，他在向国会递交的一篇为自己的决定予以辩护的咨文中写道：

简单来说，为避免违反一部法律，是不是该让除此法律之外的法律全都无法执行，甚至让政府本身都分崩离析？即使在政府相信，现在忽视一部法律最终导致的却是维护它的情况下，官方的誓言也不能被违反而任由政府被推翻？²²

这显然是一种后果论论证，但是需要认真审视一下它如何挑选目的和手段。所追求的目标（目的）——用来证成对法律的违反（手段）——是事实上维护法治，所选择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与这个共同善目的相适合。当一位领导人有意识地违反法律——杰弗逊在

无国会授权的情况下购买路易斯安那，罗斯福不顾中立法案帮助大不列颠——时，他并不是与一位实施某种公民不服从行动的公民处于完全相同的境地。与这位公民相同的是，一个“同意之国”的代表必须接受与他的违法行为相称的任何惩罚；但与普通公民不同的是，他或许不是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来从事与公共善相冲突的行为，即他没有把包括他的道德准则在内的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因为他的公共权力完全来自共和国的授权：授权他按照它的利益行动。*

治国之道即表演之道

正确认识君主的行为与特质，是君主统治能力中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个理念是马基雅维利著作中的一个持久且微妙的主题。正是通过这种方法，马基雅维利才能够把他的这个主张——人民确实珍视诚实、慷慨、勇气、虔诚等品质——与这个观察——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品质会削弱国家——协调一致。凭借对“看起来是什么”与“实际上是什么”的辨别，以及以假乱真的能力，成功的君主既可以免受治下臣民的蔑视，还可以行使那些对维护共同善所必需的措施，即使这些措施与我们通常所赞赏的个人德性不一致。

* 罗伯特·卡沃在谈到法官时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察：“司法良知是一种巧妙的躲避者，而且应当如此。在它将不得不承认一个案件提出了一种道德两难之前，它将隐身于这种职业伦理的角落与缝隙之中，奔向角色限制的洞穴中，寻求权力分立的遮蔽。而且，实际上，这种隔离状态的存在是正确且适当的。” Cover, *Justice Accused* (Yale, 1975), p. 201.

我们再次从西塞罗开始讨论，他在《论义务》中写道：“如果有人以为凭伪装、空洞的夸耀……便可以使自己得到永久的荣誉，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荣誉会生根，还会延展，所有虚伪的东西会像小花一样迅速萎谢”²³，这是一种古罗马版本的美国精神，“你可能骗一些人一世，也可能骗所有人一时，但你不可能骗所有人一世”²⁴。马基雅维利拒绝这个建议，他坚持认为虚伪对于好的统治是必需的[参见前面列出的理由——如格拉吉亚（Grazia）所总结的，“君主不可能以大众理想化的方式来统治，然而，为了确保获得成功维护大众的利益所必需的支持，他必须表现为他就是在那样做”²⁵]，而且进一步认为，做到成功的虚伪并不是很难，因为“人们进行判断，一般依靠表象甚于依靠事实，即依靠眼睛更甚于依靠双手”。²⁶由于君主在很大程度上远离大众，所以对每个人而言，你是“如外表所示的那个人，很少有人能摸透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这些少数人是不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的”。

因此，对于一位君主说来，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我在上面列举的全部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我甚至敢说：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护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

乎人道，违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应当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语不是洋溢着上述五种美德的话语，并且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²⁷

这不仅仅是虚伪，更像是“骗人的鬼话”；但幻觉对于艺术——其中包括统治艺术——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忘记了，马基雅维利在去职后成为意大利当时重要的剧作家，而且时至今日，《曼陀罗》依然在舞台上频频演出。实际上，他的文学天赋才是热爱艺术的梅迪奇家族最终支持他的关键，他们曾因马基雅维利与皮耶罗·索德里尼和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关系而怀疑他。

除了这种表与里的区分——它对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至关重要，这位剧作家的另两项技巧也在他的建议中有所展现：创作出像罗慕卢斯、摩西和莱克格斯这样的准神话性主人公；君主借以赢得臣民忠诚并巩固权力的宣泄高潮（cathartic climax）。

在描述切萨雷·波吉亚从教皇领地罗马涅中切割出一个君主国的努力时，马基雅维利举出了拉米罗·德·洛卡这个令人难忘的例子。波吉亚任命拉米罗为自己所征服的一些城市的总督，后者用残酷的方式来管理这些城市，因而为这里的百姓所憎恨。在拉米罗的威吓工作完成后，切萨雷·波吉亚演了这样一出戏，年轻的外交官马基雅维利亲眼目睹：

因为他知道，过去的严酷已经引起人们对他怀有某些仇恨。为此，他要涤荡人民心中的块垒，把他们全部争取过来。他想要表明：如果过去发生任何残忍行为，那并不是由他发动的，而是来自他的大臣刻薄的天性。他抓着上述时机，在一个早晨使拉米罗被斩为两段，曝尸在切塞纳的广场上，在他身旁放着一块木头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子。这种凶残的景象使得人民既感到痛快淋漓，同时又惊讶恐惧。²⁸

在讨论罗慕卢斯和罗马建国时，马基雅维利借以下标准来评判暴力的正当与否：结果必须有助于共同善。这个标准也被用于切萨雷·波吉亚身上，他的暴力行径为罗马涅带来了和平并赢得了它的称赞。

不可接受的残酷²⁹

如果马基雅维利有严格的标准来衡量那些对个人来说显得不人道的品质，那么就可以推断必定存在一些不可接受的暴力做法。在《君主论》专门讨论西西里岛暴君阿加托克雷的第8章，他对这样的暴力行径进行了描述。³⁰ 如果单从其在位时间之长和能够击退外敌的入侵来说，阿加托克雷是位成功的统治者；而且在他的国家，
55 反对他的阴谋从来没有成功过。然而，马基雅维利显然鄙视他，而

且把他描述为一个“野蛮残忍和不人道”之人。因为正是阿加托克雷把锡拉库萨从一个由公民构成的共和国变为一个奴才遍地的独裁国家，从一个“同意之国”变为一个“恐怖之国”。

马基雅维利对阿加托克雷的看法非常关键，因为这表明马基雅维利愿意接受的暴力手段的界限；但他的这个看法也很微妙，因为阿加托克雷并不是一个漫画式恶棍，而是一个得到全面评价的、兼具非同寻常之德性和恶习的人。因此，他因其“出入危殆之境的能力和忍受困难、克服困难的大勇”，而被称赞为“没有理由认为他比任何一个最卓越的将领逊色”。然而，尽管阿加托克雷智勇双全，马基雅维利最终的结论仍然是，“然而他的野蛮残忍和不人道，以及不可胜数的恶劣行为，不允许他跻身于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完全能够区分清楚，一方面在某一点上——“那些意识到（强加‘一下子’式的必要的残酷，如马基雅维利所推荐的）的人，可以为他们与神灵或众人的关系提供一些补救措施，如同阿加托克雷那样”——对这个暴君加以赞许，而另一方面，在整体上对他的行径加以谴责。

尽管一些批评者或许猜想，马基雅维利会对一位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的成功的统治者进行开脱，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虽然马基雅维利称赞阿加托克雷的勇气和果断，但并没有为他开脱，因为阿加托雷斯所追求的目的是“一种绝对权力，即被政治与历史作家称之为‘专制’的统治形式”。³¹

类似地，尽管马基雅维利并不谴责使用酷刑的立场——他自己就曾遭受酷刑的折磨，被强迫要求承认参与了卡普尼的阴谋——令我们震惊，但他坚持认为，当实施酷刑是为了享受折磨人的快乐时，
56 这种行为就是不可接受的。他所举的例子是，雅典公爵割掉了一位公民的舌头，“如此残酷，以致送了他的命”。³² 马基雅维利也谴责一些使用异常酷刑的做法，他指出这位公爵用“新花样”*来折磨公民，使其获得了并非行为残酷而是本质上就是残酷的恶名。“这位公爵，如他的所作所为证明的那样，是一个残忍而贪婪的家伙……他应该受到憎恨。”³³ 同样，马基雅维利也控诉米兰公爵，指责他不“满足于处死他们，除非通过某种残忍的方式杀死他们”³⁴。

依据有利于共同善这个标准，这种病态的残忍显然是不可接受的。马基雅维利对大规模杀戮、驱逐与迁移的谴责，更为有力地表现了这一点。** 不证自明的是，消灭一大部分人口不可能不是为了共同善，因为它不可挽回地损害了百姓的共性（commonality）。³⁵ 类似地，马基雅维利要求处决对象应该总是限制为特定的政治领导人或军队将领——他们在人数上总是很少，而且行刑方式一定不能“损害整个共同体”。

* 比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中对“残酷和异常的处罚”的禁止，提前了几个世纪。

** 《君主论》第5章建议共和国的征服者为了自己的安全而疏散人口，这并没有依据这个措施对“共同善”的贡献来评价它。这个原则与罗马大规模处决叛军和暴动者的做法并不矛盾，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共同善，而且被杀者已经选择了拿起武器反对国家。（参见 *Discourse*, book III, chapter 49）

马基雅维利指出，不可能有比——在我们今天所谓的“种族清洗”方面——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在把 Marranos（指穆斯林和犹太人，他们曾经被强迫改信基督教）驱离西班牙中表现出的“虔诚的残酷”“更为悲惨和异常的例子了”。关于费迪南德对西班牙犹太人的驱逐，或他在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对美洲原住民的毁灭，同样也可以这么说。 57

根本要义在于，在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暴力做法之间进行区分，意味着存在某种后果论的标准，而这些暴力手段必须依据它加以衡量。对马基雅维利来说，这个标准就是国家之创立所要服务的公共利益——共同善。

* * * * *

以此为背景，现在我们就可以对《君主论》中最著名的一段话进行解释，这段话出自第 17 章，讨论的是这个问题：受人爱戴与令人畏惧相比，哪种情况更好？这段话的开端非常微妙，而且似乎违背了他关于表与里的区分。马基雅维利认为，有时候一个人为了避免以后的、更为残酷的做法，就必须表现得残酷，然而他之前曾建议君主有时必须残酷，但应该注意要显得仁慈。如果我们认识到，表里有别的妙处完全依赖于所采取的行动对共同善的贡献，那么这种表面上的前后矛盾就消失了。

我认为，每一位君主都一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人认为残酷。可是，他必须提防不要滥用这种仁慈。切萨雷·波吉亚是被人认为残酷的。尽管如此，他的残酷却给罗马涅带来了秩序，把它统一起来，并且恢复和平与忠诚。如果我们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认识到波吉亚比佛罗伦萨的人们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为着避免残酷之名反而让皮斯托亚被毁灭了。所以君主为着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对于“残酷”这个恶名就不应有所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些由于过分仁慈而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的人说来，是仁慈得多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但是，君主对于信任他人或者采取行动则务须慎重；不过，也不要杯弓蛇影、妄自惊慌。他应当慎思明辨，人道为怀，有节制地行事，以免由于过分自信而使自己流于轻率鲁莽，或者由于过分猜疑而使自己偏狭不能容人。³⁶

现在我们就能够理解下面这段话——它经常被断章取义地错误理解。它做出了这样一个有争议的断言，即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好：

关于这一点，发生这样一个争论：究竟是被人爱戴比

被人畏惧好一些呢？抑或是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好一些呢？我回答说，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两者合在一起是难乎其难的。如果一个人对两者必须有所取舍，那么，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儿属于你的。君主如果完全信赖他人而缺乏其他准备的话，他就要灭亡。因为用金钱而不是依靠伟大与崇高的精神取得的友谊，是买来的，但不是牢靠的。在需要的时刻，它是不能够倚靠的。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³⁷

换句话说，关于爱戴他人——我们所信赖之人——的义务的承诺，总是可以单方面地被我们违背，因为我们总是可以无需受爱戴者的同意就中断我们所承诺的爱戴。

相比较而言，一个有能力使其威胁生效的人所带来的畏惧，会造成一些我们无法单方面取消的习惯与反应。然而，我们不能错误地假定，对于政府，我们所畏惧的仅仅是它施加伤害的权力；同样

还应畏惧的是它撤销保护并因此妨害我们安全的权力。这些考虑把我们带到了下一章：法律的基础。

马基雅维利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关现代国家的第一位哲学家，是 59
因为他看到了 15 世纪末在吞没意大利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一种
新的、后封建的政治结构之产生的必然性。这种国家最终出现于
16 世纪，并通过《奥格斯堡和约》及其著名的“教随国立 (*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原则（即由统治者来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
确立了它们的地位。但这个预见常常被一些历史学家否认属于马基
雅维利，因为他们把现代国家的出现追因于 17 世纪的威斯特伐利

亚和解时期*和霍布斯与博丹对主权进行的解释。¹然而，这种现代国家肖像完全忽略了使主权理念成为可能的早期发展阶段的重要性。那种认为马基雅维利只是简单地预示了霍布斯和他的同代人的妥协性看法，虽然对马基雅维利的贡献有所承认，但仍旧未认识到他的洞见的重大意义。

60 问题总在于，尽管现代的君主国理念产生于15世纪末的意大利，但正式确认这种宪政秩序的崛起——即上文提到的“教随国立”原则，它常常被错误地归属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但实际上产生于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的宪制安排所应用的地区并不是意大利各国。这对历史学家和宪政与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提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一种新的宪政秩序形式出现并最终获胜的一般模式是，一个新兴国家——例如18世纪90年代拿破仑帝制国家—民族（the Napoleonic imperial state-nation），或者创立于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工业民族国家——打破通行的宪政秩序，而且依靠一场持续十多年的“划时代的战争”使这种新形式占据主导地位，在订立那些最终结束这类战争的和平条约的宪制大会上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 “威斯特伐利亚和解”指的是这种理念：于1648年签订的结束三十年战争的《明斯特合约》与《奥斯纳布鲁克条约》，造就了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主权国家国际秩序。我曾在《阿喀琉斯之盾》中批评这一断言，认为它的关键基础——包括统治者在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方面的角色，这意味着以领土为基础的国家——事实上始于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参见 *The Shield of Achilles*, pp. 502–508）

** 有时战争中的革新会破坏占主导地位的宪政秩序，有时现行宪政秩序的崩溃会引起战略与策略方面的变化。

然而，虽然是一位意大利思想家最早描述了这种君主国理念，但意大利的各个城市从来没有成功地创立这样一个国家。相反，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国们从帝国手中夺取了宗教特权，从而带来了这种宪政秩序的崛起。这些国家决定性地击败了封建王国理念，使其不再作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对手，虽然查理五世拥有广袤无垠的领地和堆积如山的财富。这场使君主国得以诞生的划时代的战争，实际上是马基雅维利时代爆发于意大利的哈布斯堡王室与瓦卢瓦王室之间的冲突。但是，当法国为内部宗教斗争所迫而退出这个领域后，其他国家继续参与了这场革新，而且正是它们的成就在奥格斯堡获得了正式承认。

无疑，马基雅维利的敏锐洞见得益于这个事实：他曾长期担任重要的军事与外交职务、行政官员、许多法令和至少两部宪法的起草者，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传记作者和历史学者，这是因为国家是由战略、法律与历史这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来界定的。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他能敏锐地预见到这种新宪政形式的出现，也得益于他终生对古代的典范性国家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似乎遗传自他的父亲贝尔纳多，一位以律师为职业的人文主义者。但是，伟大的作家和哲学家们的工作不仅仅只是对他们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圭恰迪尼是一位比马基雅维利更加仔细的历史学家，而乔瓦尼·达莱·班德·内雷是一位更有能力的军队领导人，他讥笑马基雅维利甚至没有能力让他的军队整齐地前进。然而，马基雅维利的天赋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在周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中看到了一种新现象，而其

他人却仍旧为旧结构所迷惑，即使是它们正在崩溃之时。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告诉我们，作为一名年轻的外交官，他如何受到路易十二老谋深算的顾问、鲁昂红衣主教的教导，对他说意大利人不懂战争，而他的有力回应是“法国人并不真正理解国家”。²

虽然中世纪欧洲的各种政治结构彼此交叠重合且各不相同，但这种现代新古典国家的独特特征是，它把战略和法律结合为一种拓扑学上独一无二的结构：战略关注的是国家的外部形势，而法律关注的是它的内部生活。马基雅维利在《用兵之道》中写道：“皇室的一座宫殿，尽管修建得豪华奢侈，装饰得富丽堂皇，要是没有任何防风防雨设施，那是很容易被毁坏的；一些结构，尽管很完善，要是没有武装在支撑，也会像皇室宫殿一样坍塌下来；没有军队的支持，好的制度也会变得同样的混乱，如同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³

没有哪个外交受制于他国的国家，能是独立自主的；也没有
62 个内部生活必须服从他国法律的国家，能是独立自主的。因此，现代国家通过确立这样一种内部与外部关系来与其他国家相区别，就像手套或薄膜一样——不能只有外表而不带内里，或者相反。相反，中世纪的政治实体都是相互渗透的，而且都处于教会的普遍权威之下。即使查理五世击败法国、吞并意大利而创建一个庞大的帝国；即使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他的继承人没有把教皇职权变为君王权；即使在马基雅维利正在忙着完成《论李维》之时，但马丁·路德没有提出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亨利八世没有挑战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对英国教会的领导权——又或者，即使这些事件的结果都是另一个样

子，马基雅维利的给人的印象差不多还会与现在一样——被看作一位腐蚀性的、魔鬼般的评论者。但是，这些事件的结果已然不可改变，而且欧洲宪制的转变确实是这些事件的一个结果。在阅读马基雅维利时将其著作与这种现实转变完全剥离，是一种拙劣的歪曲，正如视这种现实转变与他的理念发展毫无关系的观点之拙劣一样。

马基雅维利对法律如何获得合法性以及如何得到有效执行，采取了一种颇为理性的看法。⁴正如我们看到的，他进而把这种关于实现国内稳定的手段的评价应用于所有国家行为，包括与其他国家的外部关系。这种提议的背后，是他对战略与法律之间深层关系的认识；《君主论》中最广为引用的段落之一，就反映了这种认识：

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⁵

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犯了一种明显的逻辑错误：下面这个推论肯定是错误的，即假定没有良好军队的国家不会有良好的法律，那么国家有良好的军队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因为，如果只 63
给定了这个单一前提，那么肯定有可能的是，一个武备精良的国家也可以没有良好的法律，或者说，一个武备精良的国家是否事实上有良好的法律，是不确定的。

但是，这种错误对马基雅维利这样才思敏捷的人来说显得过于明显了，因此，这促使我们去深入探究他的“良好的法律”究竟意指什么，以及他为何得出结论说一个武备精良的国家会拥有良好的法律。其实，本书上一章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良好的法律指那些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共同善的法律。如马基雅维利自己在《用兵之道》中所写的：

它为了人们的共同善而制定的所有规章，为了让人们生活在对法律与上帝的畏惧之下而制定的所有法令，如果得不到保护，就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当得到组织得当的有效保护时，就不会如此，即使它们本身制定得并不是很好。⁶

显然，即使是在一个武备精良的国家，“良好的法律”实际上也可能制定得并不好。这暗示，良好的法律仅仅指的是得到遵守的法律。

这样，第二个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武装状况会影响其法律的效力？答案始于马基雅维利对法律之下的公共行为的性质的判断：

探究文明生活之道的人皆已证实，史书亦充满此类事例，即驾驭共和国并为其制定法律者，必把人人设想为恶

棍，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灵魂中的邪念。不出于万不得已，人无行善之理。⁷

如果这听上去十分令人震惊，我们应该记起它在美国法理学中是有同情性共鸣的。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51 篇）中，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这个观点得到了美国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赞成，他在 1897 年向波士顿大学法学院的听众们讲演时说，“倘若你们想了解法律，而不是别的什么，你们得以一个坏人的眼光看待它，坏人仅仅关心根据这一法律知识所能够预计的实质性后果。” 64

然而，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的合法性依赖于对其对手之行为的成功预期，进而建议国家的领导人必须按照某国对其所统治之国所采取的行为来对待该国。这个提议反映了马基雅维利的天赋，因为他得出了这个关于国家内部运作的洞见，而且把它推广到所有的国家行为。^{*}

这里举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就够了。在切萨雷·波吉亚安排好杀手并把拉米罗·德·洛卡杀死以泄百姓之恨后，就去与他

^{*} De Grazia 把这个动议称作“非黄金规则（Un-Golden rule）”，而且正确地指出，它是一个关于“道德哲学（及其在法律中的地位）”的问题，“（马基雅维利）把这个非黄金规则推到了制宪的高度，而且要求立法者首先运用法律”。（Grazia, *Machiavelli in Hell*, p. 302）

四个雇佣兵首领会面，他——正确地——怀疑他们在密谋反对他。接下来的事件被马基雅维利以便函的形式记录下来，寄给了佛罗伦萨人西尼奥列。波吉亚先是采取措施，抚慰这几个焦躁不安的雇佣兵军官，处死了他们的对手德·洛尔卡；接下来，他在西纳加利亚为他们设计了一个陷阱。这几个军官为了陪波吉亚回他的住所，而失策地与他们的卫兵分开了。到了波吉亚的住所，他们就被抓了起来。其中两个人——维特罗佐·维特里和奥利夫奥托·达·菲莫——很快被绞死了。两个星期之后，另外两人——格拉维纳公爵弗朗西斯科·奥尔西尼和他的弟弟保罗·奥尔西尼——也被以相同

65 方式杀死。就在抓捕他们的那天晚上，波吉亚还为马基雅维利送了行，他要动身回佛罗伦萨报告这些事情。十年后，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这样写道：

当我回顾公爵的一切行动之后，我认为他没有可以非难之处。恰好相反，我觉得他的做法值得那些试图创立国家之人效法。如果一个人认为，为了确保他的新的王国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害，有必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消灭掉，采用新的办法把旧制度加以革新，既有严峻一面又能使人感恩，要宽宏大量且慷慨好施，要摧毁不忠诚的军队，创建新的军队，要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使他们不得

不殷勤地帮助自己，或者诚惶诚恐不敢得罪自己，那么，他再找不到比公爵这个人的行动更生动活泼的范例了。⁸

如果这看上去骇人听闻的话，必须把波吉亚的行为放到它的大背景之中。首先，这些不是偏狭的、虐待狂式的罪行，而是实现波吉亚利用——但不完全依赖——自私、奸诈的雇佣兵在意大利中部创立一个新公国的计划所必须的措施。其次，这个由这些臭名昭著的事件构成的例子，使波吉亚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能够较少地使用暴力，因为一旦确立了他的残暴声誉，他就可以依赖人们的恐惧感确保他的意志得以执行。

马基雅维利的宪法拓扑学（constitutional topology）——如包着一层密密外壳的手套的内里——意味着国内安全和外部安全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⁹他写道，“每个人都知道，无论谁在谈论帝国、王国、公国、共和国时，无论谁在谈论指挥者时，都从最高等级开始，然后一直讲到双桅船的主人，即正义与军队。”¹⁰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马基雅维利完全没有假定强大的军队将必然带来良好的法律；而只是指出，没有强大的军队，有效的法律就是不可能的，尽管在一个武装精良且稳固的国家，法律得到服从的可能性很大。 66

所有这一切引出了这个问题：马基雅维利是如卡尔·施密特所主张的那样，从国家的战略需要得出他的国内法律原则的，还是如伍德罗·威尔逊所主张的，完全颠倒过来？任何对这一问题的回

答，都应该考虑到国家的战略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内部稳定与外部独立之间的关系。^{*}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尽管内里与外壳分别服务于不同目的，但一方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存在，而且，一方并不是源于另一方，而是二者共存于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之中。一方面，像弗朗西斯科·斯福扎这样的雇佣兵首领运用计谋获得权力并为自己和后代创立了一个公国：这看来是（曼斯菲尔德从《君主论》中引用过这个例子）一种战略性行动——征服——的一个例子，是对新君主的宪法地位的表述。类似地，马来泰斯塔在里米尼夺取了权力。另一方面，像费拉拉公爵（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引用过这个例子）这样的王位继承人抵御住了1484年威尼斯人的侵袭和教皇朱利叶斯二世在1510年的侵袭，“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地的统治已经历史悠久了，”¹¹这是一个王朝继承——一种宪政要素——的例子，是对战略成功的一种表述。

马基雅维利关于战略与法律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的观念，最清楚地表现在他执着于用征募的民兵来取代佛罗伦萨对雇佣兵的依赖方面。在《君主论》中，他声称军队可以是雇佣兵也可以是国民军。在意大利，雇佣兵体系——受契约或 *condotta*（军事服务合同）约束的雇佣兵——是富有但力量弱小的城市寻求自我保护

^{*} 例如，法西斯政权把战略冲突引入国内领域，这是施密特所宣称的潜在于所有政治之基础的友/敌区分的目的之一。而共产主义政党把内部阶级斗争输出为一种普遍冲突。人们或许说，像法国大革命或者西班牙内战这样的内战——引发了外部干涉——是内里翻出来的手套，因为战争吞噬了国内舞台而且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法律合法性发挥了作用。

的典型方式。¹²

“由于（意大利）许多年来依赖雇佣军”，结果却是，马基雅维利写道，整个半岛“遭受查理八世的蹂躏、路易十二世的掠夺、费尔迪南多的摧残和瑞士人的凌辱。……雇佣军和援军是无益的，并且是危险的……是不团结的、怀有野心的、毫无纪律、不讲忠义……他们的毁灭之所以迟迟出现只是由于敌人的进攻推迟罢了”。¹³可以肯定，这些判断得到了佛罗伦萨人在试图重新夺回比萨时与雇佣兵打交道的经历的充分佐证。

在皮耶罗·德·梅迪奇糟糕透顶的绥靖主义方针下，比萨被准许从佛罗伦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随后，这场惨败引发了1494年对梅迪奇家族的驱逐。此后，佛罗伦萨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试图夺回它的附属城市。然而，佛罗伦萨通过雇佣兵发动的战争在1500年惨败而归。1503年夏，马基雅维利与列奥纳多·达·芬奇计划把亚诺河改道，断掉比萨的水源；1504年，这项不切实际的谋划开始实施，但最终毫无效果。1505年，佛罗伦萨又开始发动第二次攻击，但就在比萨城墙被炸开缺口之际，十个雇佣兵组织的首领哗变，不愿意冒险把他们的资本——士兵——投入最后的决战。经历了一个星期的争吵和不断攀升的佣金要求之后，佛罗伦萨人放弃了这场战役。

在这种情况下，马基雅维利最终接到了索德里尼和执政团的授权，着手组建一支国民军。在1506年2月中旬，他已经成功地从莫格罗召集了500名农民，4月时他招募来了切萨雷·波吉亚的那位臭名昭著的军官唐·米凯罗特——他在西纳加利亚绞死了波吉亚 68

的那几个雇佣兵首领，他还是波吉亚妹妹的第二任丈夫——担任国民军的指挥官。¹⁴ 到夏天的时候，这支佛罗伦萨国民军已经在比萨地盘上进行作战了，而且在1509年6月，通过一次成功的围攻和封锁，最终迫使比萨人缴械投降。这是马基雅维利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刻，而且在佛罗伦萨他也得到了那些曾经畏惧国民军并试图破坏他的名誉的贵族势力的吹捧。

尽管这支佛罗伦萨国民军在面对西班牙的高度职业化的征服者——后者于1512年围攻普拉托，并最终导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垮台——时失败了，但马基雅维利从未动摇过他对国民军队的信心。在写于一年之后的《君主论》最后一章，他力劝梅迪奇“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一支常备国民军。《用兵之道》中大部分篇章都是在论述“国民军的方法”。理解了他为何在普拉托惨败之后还坚持己见，也就理解了他在“正义与军队”之间勾画的联系。

这支在普拉托抱头鼠窜的国民军，从来没有人马齐整过，也因此而没有进行充分的作战训练；另外，它的指挥官经常更换，阻碍了士兵发展对其领导人的忠诚。国民军不能建立起人数充足且稳定的队伍的原因是，佛罗伦萨人不信任他们曾经招募来的外省人，不给他们充分的公民权而且持续向他们征收重税。如马基雅维利在一篇讨论他为创立国民军而起草的法令的文章中指出的，佛罗伦萨人正在不公正地对待它的成员。如果一个共和国真的需要一支由自由公民组成的军队——一支通过“公共审议”（public deliberation）创立的军队——为祖国而战，那么同样正确的是，这些人必须受到公

正对待。贵族集团——他们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和农场主——阻挠与这些农民和农场主建立公正的关系，因而导致了整个共和国事业的失败。¹⁵

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对于国家内部的宪政生活与其外部的 69 战略事务之间的相互影响性关系来说，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例子。¹⁶ 到 18 世纪末期，对共和国充满热烈感情的国民军横扫欧洲，从而被证明是最为威力巨大的军队。* 这种战略结果是通过一种政治与宪制上的重新安排——法国大革命——实现的。然而，如我们已经看到，正是 15 世纪末法国的炮兵部队所带来的战略危机，最早刺激马基雅维利筹划用国民军来替代雇佣兵。因此，对于宪制方面与战略方面谁支配谁的问题来说，答案是二者相互支配。

* 拿破仑的战略改革，尤其是“全民皆兵”的做法，是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政治与宪制事件的结果，而马基雅维利的国民军——一种深刻的政治与宪制改革——是意大利战略环境不断变化的结果。换句话说，重要的战略变化并不会直接地引发宪制变化，反过来也是如此；它们相互影响。因此，如果没有发生重大的宪制变革，战略环境方面也不会有重大变化，反之亦然。参见 *The Shield of Achilles*, pp. 538–542; note above, p. XX (p. 69 in MS)。

第二卷 小结

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哲学

70

一个社会的习惯与风气(habits and ethos)将决定它的命运，因为这些东西塑造了一种文化应对变革的可能方式。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关于其宪制形式和实践的问题。在面对未来难以预测的各种情况时，战略改革与法律改革——国家的外壳与内里——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国家的成功或失败有着决定性影响。*

* 此外，我的看法是，当一个国家发展出一种战略上和宪制上更有活力的秩序时，它的形式和实践——更不用说它的价值——最后一定会被它所超越的那些国家采纳。参见 *The Shield of Achilles*。

第三卷

virtù 与机运

——上帝并不想决定一切

马基雅维利相信，在重大事件与人类特性相碰撞的时刻，自由意志 71
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新事态与个性的随机碰撞常常会造就新的环境，
而这些新环境又为不确定的人类行动创造出各种机会。人类无法控制机
运，也无法改变天性，但是，如果他有预判力而且勇毅地利用他所面对
的新机会的话，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它们的影响。

追随伊壁鸠鲁，卢克莱修设想宇宙是由细微的、不可见的且不可毁灭的微粒构成的。这些微粒在无限的空间中高速坠落，随时会偏离它们的直线轨迹而不可预测地相互碰撞。因此，它们的碰撞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必然性的结果，相反总能为可能性留有余地。通过这个假定，卢克莱修为自由意志提供了一个物理学基础。他在《物性论》第二卷中描述道，倾向（改变方向）就是“挣脱了命运的自由意志”。马基雅维利在这部著作的手抄本中，紧接着这句话潦草地写道“从运动中产生了多样性，从多样性中我们拥有了自由意志”。*

* 对比一下物理学家 John Wheeler 对“Twenty Questions”这种游戏的解释，参见 P. Bobbitt, *Constitutional Fate*, p. 238。结论是，我们只能得出或然性预言。

在下面这段话中，费里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描述了佛罗伦萨的一个望族卢切莱家族的纹章，他们家的花园就是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的写作地点，而到 1512 年以后，该地也成为马基雅维利知识圈子所在地，即奥里切拉里花园（the Orti Oricellari）。在它的华丽饰章上，他写道：

是一艘船，船的桅杆是一个裸体的女性形象，她高举的左手中是主杆，右手抓着张开的船帆的下部……我们知道乔万尼·卢切莱深深困惑的一个基本问题——它是从彼特拉克到布鲁诺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们的一个思想主题——就是 virtù 与机运的关系：一个人用尽他所有的理性力量和预见力，是否能够对抗命运的偶然？……船中部

的女性形象就是机运女神，她象征着暴风雨的力量。没有人能够成功地抵抗这个强大且残酷的神，但是能够认识到她的力量并且自我调整以适应她的任性的人——像船上的水手——就可以利用她的力量把船安全地驶入港口。¹

正如第二章中讨论的伦理问题一样，机运问题也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努力掌控生命中所不可预测之事件的个体；其次是必须应对这类事件的社会。而且，如马基雅维利处理领导者的伦理问题的思路一样，这两个方面也得到了不同的处理。

机运与个人

74 马基雅维利用古老的传统来描述机运：她是一位以任意且不可预测的方式来影响世界的女性，“没有同情，没有法律，没有公正……她把善踩在脚下，而高举邪恶……（而且常常）把不配者置于王座，让应得者一无所获”。²可以肯定，马基雅维利自己的生活就是机运的反复无常的实证。

马基雅维利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近距离观察到统治佛罗伦萨达 60 多年的梅迪奇家族的被放逐，以及萨沃纳罗拉的惊人崛起，之后垮台并被开除教籍，最终被施以火刑。在 29 岁时，马基雅维利已经从这种令人震惊的事件转折中获益，成为佛罗伦萨的官员。在萨沃纳罗拉死后的一个月內，马基雅维利被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大

议事会推举为第二秘书厅的秘书长，一个月后又被任命为“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的秘书，这个机构是执政团执行委员会，负责国防与外交事务。尽管他未能获准当律师，但已经获得了一个通常由律师出任的政府职位。作为秘书厅的秘书长，他是一名技术娴熟的官僚，起草关于内部事务的重要法令，履行助手的职责；作为十人委员会的秘书，他成为出使过欧洲几个最有势力的宫廷的公使，而且代表佛罗伦萨出访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数不清的雇佣兵首领和军阀、教皇以及各种各样的外国权贵。之所以没有获得大使的头衔，是因为他不是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他得到广泛认可：马基雅维利比他的上级们更为耀眼、更有影响力。“终身旗手”（共和国的政府首脑）皮耶罗·索德里尼让他处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马基雅维利冷静地避开了一些同时代人出于忌妒的诬告，* 而且通过改革佛罗伦萨的国防政策、创立民兵，在成功夺回比萨之 75 时，他成为他的同胞心目中的一位英雄人物。他的秘书厅同僚在一封写给他的信中描述了 1509 年 6 月 8 日比萨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人们的情绪：

当人们获知收复比萨的消息时，简直没有办法来表达

*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证据表明马基雅维利曾经使用暴力或诡计来促进他的个人前途或者报复那些曾经诽谤过他的人。

他们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欢欣高兴。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狂野地庆祝；城市上空绽开了漫天的烟火，即使是在21小时之后……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们是如此的狂喜，因此我要为你（写一篇西塞罗那样的人物才配拥有的颂文）……³

然而，同样是这支军队，在普拉托面对西班牙的军队时却可耻地落荒而逃了，这导致了索德里尼的逃亡、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崩溃和梅迪奇家族的复辟，以及马基雅维利意外失势和被放逐。在他的诗歌《论机运》——大约是与《君主论》创作于同一时期——中，马基雅维利写道：

当你沿着轮盘外部转动，
正处在幸福与美好的时刻，
她却常常会在半截改变方向；
而你又不能改变你的人格，
也不能扔下老天给你定下的秩序，
她就在半道上把你抛弃。

在乔万尼和朱利亚诺的领导下，梅迪奇家族重新掌握了权力。马基雅维利被撤职；而且尽管显然是无辜的，他受卡普尼密谋杀朱利亚诺一事的牵连，遭到逮捕和严刑拷问。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后，

通过滑轮整个人被吊到屋顶，然后重复地吊起来再重重地摔下，只有当胳膊脱臼重新接回时，才会停下来。尽管受到如此残酷的折磨，马基雅维利拒绝认罪，而且在监狱中日渐衰弱。就在此时，乔万尼·德·梅迪奇被选举为新任教皇，这提供了一个大赦的机会。马基雅维利被驱逐出城市，在他所继承的一个小农庄安顿下来。他的事业似乎就此结束了。然而，就在这种简陋环境中，机运女神却出人意料地眷顾了他，他开始专心研究一个长期以来令他着迷的问题。

对个人和社会来说，这个问题是相同的——上天赋予我们不可改变的个体特性，而机运女神却是无常的和变化莫测的：

凡是能让自己的方式与时代协调一致、因势利导的人，出错便较少，运气也更佳……但我们无法舍弃自己做事方法和习惯……索德里尼做事一贯仁慈而从容。时局与他这种处事方式相合时，他和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当后来世道有变，需要他放弃自己的仁慈和从容时，他却不知所措，他和自己的国家便一起覆灭了。⁴

这段话出自《论李维》中的一章，该章的标题是“若想总是福星高照，务必因时制宜”。由此可以推导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25章中的观察：“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协调，他们就会成功了；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但困难在于，人们并不能够支配他们

的天性。

那么，个人如何随时代的变化而与机运相符合呢？这个挑战将帮助我们解释马基雅维利对 *virtù* 一词的使用，这个词在他的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明确的是，该词对于众多评论者来说都是难以捉摸的。⁵ *virtù* 不是“美德”（*virtue*）——无论已经有过多少警告，⁶ 我还是要强调，绝对不能单纯用“美德”这个词来应对英语读者并期望他们理解马基雅维利 *virtù* 的思想。在马基雅维利明确地说，
77 君主最高形式的 *virtù* 就是做维护国家所必需的任何事情的能力时，把 *virtù* 解读为一种美德——或者解读为美德本身——在字面上显然就是错误的。

马基雅维利写道，机运女神是一位十分迷恋 *virtù* 的女性，这个意大利词源于拉丁词 *virtus*，而后者的词根是拉丁语 *vir*——意为“男人”（*man*）。我们自己的词 *virility*——意为“男子气概”——就源于此。正是这种类似拉丁文的、古典意义上的 *virtus* 才最好地符合马基雅维利对这个意大利词 *virtù* 的使用。

virtù 是各种男子气概特征的集合：勇气、坚毅、赞美技艺、有能力、足智多谋，尤其是果断运用自身的天资。⁷ 因此，真正的 *virtù* 是依据所追求的目标和完成它们所带来的结果来判断的，而且基于这个理由，不能被当作“美德”的同义词。实际上，关于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多次讲到，盲目遵守道德美德会产生无效的或者甚至灾难性的结果。或许最能对应 *virtù* 的英语表述是“有男子气概的精湛技艺”（*manly virtuosity*）。

机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机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⁸

这段话出自《君主论》，有些读者肯定会认为它会令人不快，但它实际上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基雅维利针对个人如何适应变化所提的建议。他（指个人——编者注）必须保持青年人的基本要素，这就是希望；必须永不放弃，坚持不懈；一条路走不通，就必须转向另一条。

遍览史册即可明白的一条千真万确的道理：人能辅弼机运之神，但不可与之对抗；人能使其跌宕起伏，却无法阻断其行程。当然，他们不应听天由命，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行踪诡秘的机运的走向，所以他们总是抱着希望；既然抱有希望，他们便不会听天由命，无论他们可能发现自己有何种命运，要付出怎样的辛劳。⁹

78

马基雅维利认为正是“机运的巨大且持续的恶意”迫使他在43岁时离开公共舞台。最初，他转而着手创作包括《君主论》和《论李维》在内的专著。当这些著作并没有得到掌权者的重视时，他于五

年后转向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体裁，创作了《曼陀罗》，这是一部讽刺喜剧，在欧洲文学名著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¹⁰ 在这部成功的戏剧之后，马基雅维利又创作了一部成功的喜剧《克莉齐娅》(Clizia)，而且他作为戏剧作家的名声修复了他与梅迪奇家族的关系，梅迪奇家族的教皇列奥十世就安排在梵蒂冈演出了《克莉齐娅》。随后几年，马基雅维利作为梅迪奇家族的一名顾问重返政治与外交舞台。这个由于其国民军而在1509年声名鹊起，仅仅三年后又由于这支军队的溃败而蒙羞的人，这时作为一位知名的低俗喜剧作家而重新接近了权力。¹¹ 在《曼陀罗》的序幕中，一位扮演作者的演员登上舞台，向观众致歉由于他的糟糕机运而转向了戏剧创作：

如果说这题材太过轻飘 / 配不上那些 / 显得睿智庄重
的人中好佬 / 就请对作者多多担待，他只能用这些空想奇
思 / 给他苦涩的日子添加点乐趣 / 他可不能改装易颜 / 因
为他被禁止 / 展现其德性的方方面面 / 他劬劳的努力也没
个报偿。¹²

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由于事态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利用既有品性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他必须寻找新的行动舞台，从他无法控制的力量那里争取行动自由，不懈地寻找那些适合其天资的新的领域，总是在搜寻、永不放弃地改变他所能够改变的——他付出努力的竞技场。

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指出，一个城市要想取得丰功伟绩，也必须展示出 *virtù*，即公民整体上必须具备这些品质。¹³ 做维护共同善所必需的任何之事的意愿，以及把共同体的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的意愿，对于社会和组成社会的公民个体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¹⁴ 一个社会的 *virtù* 将使它能够：

褒奖美德，不鄙薄贫穷，尊重军纪风尚和军纪规章，
迫使公民互爱，不拉帮结派，敬公甚于敬私。¹⁵

马基雅维利写道，当面对“事关国家安危的最终决定”时，每个公民必须认识到“不应考虑行为是否正当，是残暴还是仁慈，是荣耀还是耻辱；其实，他应把所有的顾虑抛在一边，一心思考能拯救其生命、维护其自由的策略”。¹⁶

但是，如果社会——就像它的统治者们——也必须培育这些 *virtù*，那么，它不也是面临着这个相同的问题吗，即机运女神会要求它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行动？马基雅维利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仅是极为巧妙的，也为理解他对人类思想的重大贡献提供了一把钥匙。

在 1506 年，马基雅维利给皮耶罗·索德里尼的侄子乔万·巴蒂斯塔写的一封信中指出，不同的行为却常常导致相同的结果，而

80 相同的行为在不同的情境中却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为何汉尼拔由于他的背信弃义、残酷和蔑视信仰而在整个意大利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而西庇阿则通过虔诚、忠诚和尊重信仰在西班牙获得了同样的声誉？为何洛伦佐·德·梅迪奇能够在佛罗伦萨通过解除平民的武装增强他的权力，而乔万尼·本蒂沃利奥在博洛尼亚通过武装民众实现了相同的结果？为何弗朗西斯科·斯福扎在米兰能够通过建立新的堡垒保护他的国家，而乌尔比诺公爵则通过拆毁现有的堡垒实现了相同目标？这些事例在写给小索德里尼这封信的六年后再次出现在《君主论》第25章中。马基雅维利进一步以教皇朱利叶斯二世为例阐释了这一点；尽管教皇在外交方面表现笨拙，但他的迅猛和热衷暴力为他赢得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胜利。马基雅维利相信，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的话，他可能会经历失败。这是因为“他永不会抛弃他的天性使他偏爱的那些方法”，¹⁷而他所处的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部分也是他自身努力的结果——而且因此将要求不同的“行事习惯”。

马基雅维利总结说，成功与否取决于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他们所处的时代，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行为可以实现相同的结果。这样的话，问题就是，一个人所处时代的性质是否与他的行为性质相一致，这本身似乎就是一个机运问题。实际上，成功仅仅会强化人们所偏好的行为模式，不管它们是否已不再与时代相一致。只有当人们可以正确地辨明时代的要求，并且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时，他们才能够掌握机运——如果一个人要引诱机运女神，他必须摸清

她的脾气。因此，马基雅维利建议，个人要对事情的变化保持警觉，这样他才可以改变他的行为所处的背景。但是，一个社会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马基雅维利的回答是创建现代国家。记住，机运女神只是“我们行动的半个主宰”；否则就“排除了我们的自由意志”，¹⁸但是“上帝并不想决定一切，因为那样就会剥夺我们的自由意志”。¹⁹由于现代国家不再等同于君主个人，因此当一个领导人的本质与性情不 81 再适合时代的要求时，它也并不必然注定遭受不可避免的失败。这就是共和国的伟大 *virtù*：它们允许大众的冷酷无情，这可以使它按照时代的要求更换它的领导人。

虽然汉尼拔在意大利赢得了一系列胜利，但“步调缓慢且谨小慎微”的法比乌斯能够保护罗马的军队。然而当罗马人就是否夺取主动权并入侵非洲展开辩论时，法比乌斯不出所料地声明反对这个策略。罗马人最终决定站在西庇阿这一边，他的本性更具侵略性。由于罗马可以使用法比乌斯也可以使用西庇阿，因此罗马能够取得巨大成就。²⁰

假如法比乌斯是罗马的君王，他是很容易输掉这场战争的，因为他不知如何因时而变。然而，他是出生在一个有着形形色色的公民和性情的共和国里。比如它有一个最适合于适时拖延战争的法比乌斯，后来又有一个能够适时赢得战争的西庇阿。

可见，与君主国相比，共和国有着更强盛的活力、更长久的好运，因为它有形形色色的公民，能够比君主更好地顺应时局。如上所言，只用一种方式做事的人，绝不会改弦易辙；如果时局已变，他的方式不再适用，他也就覆灭了。²¹

在 20 世纪，关于这一点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在他领导英国人即将战胜纳粹德国之时的竞选失败——事实上，英国国内的选举结果传来时，他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英国民众并不是忘恩负义，但他们的确准备好了用认真且善于调和的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取代这位英勇的战争领导人，他们认为他会更好地推动他们在战后所渴望的福利国家计划。

82 由于集体性 *virtù* 只能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冲突得以调节和规范，而且因此可以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中表现出来，所以它需要一个国家。确保社会的公民们“组织良好”，关键在于国家的宪法。这个解答是在《论李维》第一卷的第 1 章提出的。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如何通过决定“她如何得以组织”而“数百年维持如此强盛刚健的品格（*virtù*）于不坠”。《论李维》紧接着的一章强调的就是这一点：我们必须研究这个共和国的秩序（*ordini*）。*virtù* 是 *umori*（人们的脾气或性质）与他们的行事方式（即他们的 *modo di procedure*）在宪法框架内相互作用的结果。

维多利亚·卡恩（Victoria Kahn）曾经指出：“*virtù* 不能被叫

做任何一种事物”，它不是“概念导向的”，而是“问题导向的”；²²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它把 *virtù* 描述为完全是依情景而定的。马基雅维利认为这种灵活性是成功所不可或缺的，但它很少能够为人类个体所实现，也很少能够为个人永久地实现，因为个人天生只有很少几种行为方式，他是由于这些方式取得的成功而坚守它们的。但国家的宪法能够为它的公民提供许多不同的行为方式，也使他们可以依据现实的要求更换它的领导人。²³从君主的 *virtù* 到现代国家的 *virtù*，马基雅维利既提出了现代国家之必要性的理念，也通过他对一种灵活的宪法的呼唤提供了使机运女神站在自己这一边的方法。

“乔纳森·怀尔德……是一个江洋大盗，生在 82
上一世纪——一七五〇年前后。”

“那么，他对我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我是一个
讲究实际的人。”

“麦克先生，你一生最实际的事，就是应该闭
门读书三个月，每天读十二个小时犯罪史。任何事
物都是往复循环的——甚至莫里亚蒂教授也是如
此。……旧时代的车轮在旋转，同一根轮辐还会转
回来的。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将来还是要发生的。
我要告诉你一两件关于莫里亚蒂的事，它会使你感
兴趣的。”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恐怖谷》

在一个人听到以“历史的经验表明……”这样的说辞作为发言者就当下某一政策问题所提建议的开场白时，他可能会转身走开。如马克·吐温所言，历史或许常常押韵，但它很少重复，而且几乎无法准确知道从一个历史情境到另一个历史情境能得出什么推论。2011年，埃及爆发了一场革命。但它是1979年德黑兰事件——导致了一种威权主义的神权政治——的重复吗？或者，它的准确先例是1986年费迪南德·马库斯在菲律宾的垮台——带来的是一种虽然偶有骚乱但功能基本正常的民主政治——吗？在这两个事例中，都是与美国交好的独裁者被推翻，这与埃及的情况相似，但对于伊朗、菲律宾的公众和西方的利益来说，其结果又是极为不同的。

- 84 这样的话，看似很容易把马基雅维利对历史之益处的坚持，解读为他也是那种热衷于在他对当代外交问题提出建议时以那种说辞为开场白的人。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段落——单独拿出来以最幼稚的方式加以分析的话——或许会诱使人们那样想。^{*}然而，马基雅维利对历史的运用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¹我们只有意识到他对于时代错误问题（problems of anachronism）——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到前代的行为者如何真正地理解自身和他们自己的行为，当这些行为发生在我们只能模糊感知而无法充分理解的情景之中时——的处理方式时，才可能理解其在历史修辞上所使用的方法。²

^{*} 例如，《论李维》第1卷第39章中的这段话：“因此……审视既往以知未来，用古人之法国谬纠偏，即使找不到这样的办法，亦可根据类似的事件找出新的办法。”

时代错误问题是关于是否存在永恒真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变种。一方面，我们知道，历史的方法无可避免地具有不确定性，但是认为过往对我们而言无法企及，以至于我们完全无法领会过往对它的书写者及其同时代人的意义，就等于否认了历史学的可能性，而且把我们的先辈完全变成了异类。另一方面，如果存在永恒真理——这种情况下，主张不存在永恒真理的观点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真理——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它们确是真理，使其成为真理的东西也就必定能为我们所理解，至少原则上如此。但是这个结论把我们引向了认识论而非历史学。我在本书中的明确立场是，我既不完全接受这种观点：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工作是一种无法复原的事件，它推动了其他的事件，但永远局限于他的时代（好比一颗流星撞击地球并引发了一系列地球物理学事件）；也不完全接受另一方的观点：认为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先驱，提出了永恒且不可动摇的真理。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最基本的永恒真理是不变的人性，虽然它会 85
依据情景表现出不同的面相。如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所述：

聪明人常说：观既往可以知未来。这不是随意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无论何时，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古代看到对应的现象，盖其皆出自人为，而他们有着相同的感情，肯定也会有着相同的结果。³

但是，了解了人类的激情不会改变——即人们总是欲求同样的事物——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适应会发生改变的东西：机运女神所创造的总是出人意料的情景，人性必是在其之中得到不断的揭示。*

要实现这种适应，不能通过机械地把过去的事件和行动照搬到当下，从而把当前的事件仅仅当作历史的重演；而是要通过借助历史上事件得到明智处理的例子启发当前的行为者。⁴ 马基雅维利写道，古人的历史使我们可以体会到明君可以安全地生活在受保护的公民之间：

在充满和平与公正的世界……君主享有充分的尊严和荣耀，人民充满爱心，安居乐业。……如果一位君主认真研究另一些昏庸无能的君主的历史，他就会发现其中充斥着战乱引起的暴行、煽动造成的不和，无论平时还是战时的野蛮。众多君主命丧于刀斧之下，内外战事连绵不绝。⁵

马基雅维利对历史事例的运用——尤其是对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的事迹的详细阐释——严格来说，并不仅仅是一种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研究，而是对典型的、创造神话的人物——他们是相关事
86 件的制造者，这一点无可置疑——的创造。⁶ 这些人物更多是具有

* 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男人都欲求荣誉、名望、财富、权力和女性之爱；而他公开宣称，对女性的欲望需要加以阻止。

戏剧性的范例，而不是任何公民或领导人的实际行为，因为他们所例示的是人性的最好部分——或者最坏部分。马基雅维利是一位天才的戏剧作家，这一点或许强化了这一结论：他是在努力为他的读者们提供一种经验，它会如他的外交经验增强他的判断力那样增强读者们的判断力。培育这种判断力，对于保护国家所必需的 *virtù* 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这样，研究历史能够通过讲述古人们的戏剧性行为激发 *virtù*，而且由于这个原因，马基雅维利声称它比道德论述中的哲学箴言更具价值：

谁会比像法比乌斯、库里乌斯、雷古拉斯、德西乌斯、穆奇乌斯和其他无数的这类人更好地教授勇气、正义、忠诚、自我控制、率真和接受悲伤与痛苦？因而，如果说希腊人是以道德箴言胜出的话，而罗马人则能够造就更加引人注目道德成就的实例，这是更为伟大的事情。⁷

不是通过了解历史重大事件的事实，而是通过阅读关于历史的一种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的激动人心的解释，我们才能产生“那种感悟……品出历史中的真谛。否则，众人捧读历史，只能以耳闻历史典故而自娱，却从未想过效法古人”。⁸

马基雅维利相信，历史既是循环的也是不可逆转的——即国家在兴与衰的循环中前行，一轮循环后，它们会处于与起点类似

的境况，但绝不是回到了原点，因为这一轮循环已经创造出了新的情景。⁹

87 Virtù 使国家安宁祥和，但在这种安宁中会产生安逸，而安逸会毁掉城镇和乡村。这样，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的无法无天之后，virtù 常常会再次复归。统治人类的权力允许并要求这种过程，因此，没有任何东西在太阳之下能够永远挺立。而且过去、现在、未来永远都是坏事接着好事，好事接着坏事。¹⁰

事态循环之圈在历史中前行，虽然永远不可能回到它的原点，但会无休无止地重复它的模式。罗马曾经维持了几个世纪的强大与独立；但到了马基雅维利所处的时代，在一系列腐败教皇的统治下，它却在绝望地挣扎求生，无法应对外来入侵者的挑战。在受罗马统治的时代，法兰西仅仅是一块蛮荒之地，四分五裂，冲突连连；但在《君主论》问世之时，它已经成为欧洲最强大、最有权势的王国。在描述了兴衰循环——君主国堕落为僭主国，贵族统治堕落为寡头统治，共和国堕落为民主国——之后，马基雅维利注意到：“它们鲜能恢复原来的统治，因为没有哪个共和国能够生存如此之久，虽历经沧桑，遭遇种种变故，依然屹立不倒。”¹¹ 随后产生的是另一种国家，它在战略上和宪制方面更具活力，超越了停滞不前的国家。“也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共和国虽经种种努力，依然缺少智慧和

势力，不得不屈从于较它治理更佳的邻邦。”¹²

事实上，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设计的君主国的情况。结果证明，比起它所取代的封建制，它是一种在战略上和宪制上更为成功的模式；而它自身后来又被 17 世纪的更具活力、更加巩固的王国（kingly states）所取代。^{*}

我们前章所讨论的马基雅维利关于易变性——持续的且不可预测的变化——的思想，使得一些学者认为他是现代性的倡导者，因为现代的本质就是它处于持续的变化之中，总是正在变得更加现代。¹³ 但是，这种关于现代性的简洁洞见，忽略了马基雅维利的历史发展理念中的循环论那一面。类似地，许多学者抓住了马基雅维利的循环理念，用它来否认基本的、不可逆转的变化的发生，但却忽视了他关于宪制发展是大众精神面貌（popular morale）与战争之间相互作用之结果的敏锐认识。¹⁴

有些读者可能熟悉巴门尼德谬误（Parmenides' Fallacy）。¹⁵ 当一个人试图通过拿一种当前的事态与过去相比，而不是与还没有实现的其他可能事态相比，来评价它时，这种谬误就发生了；或者，当一个人试图通过拿一种未来的事态与当前的事态相比，而不是拿它与其他未来可能的事态相比，来评价这一事态时，这种谬误也会

* 参见 *The Shield of Achilles*, chapter 6-7。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意大利的改革——最早的君主国出现在意大利——最终主导了国际体系，而是北欧一些国家对这种形式的采用。类似地，并不是十八世纪末美国对帝国的改革战胜了领土国体系，而是一个稍晚一些的版本——拿破仑的法兰西。

发生。因此，“如果我们采取 X 政策，五年后我们会比现在更好吗？”应该被改问为“如果我们采取 X 政策，五年后我们会比不采取它更好吗？”* 例如，在面对一个卫生保健改革提议时，我们不应该问，对于我们现在的覆盖范围来说，它是否意味着保险费用会增加；而应该问，如果这项改革计划被采纳的话，比起不采纳它来，未来我们的保险费用会增加还是我们的覆盖范围会缩减。

为了弥补巴门尼德谬误，来考虑一下赫拉克里特谬误吧。它指的是，由于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即不存在始终如一，未来就不仅是不可预测和不确定的，也是任意的，且本身表现为具有无限延展性的。过往不具有任何限制性。这种观点隐藏在当代许多此类主张的身后：通过简单地加以宣告，我们就能够创造出未来的各种条件。** 作为这种谬误的一个恰当例证，我们考察一下那些要求把参议院排除在美国国会之外或者按照更为平等主义的原则重新分配它的席位的号召。¹⁶ 这种提议的改革在一部全新的宪法下面当

* 1980 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就发生了一个著名的巴门尼德谬误事例。里根州长在和卡特总统辩论时，为了批评总统的执政成绩，现场向听众发问：“现在的你们比四年前更好吗？”但是，由于国家的情况绝对不可能几年保持不变，不管哪个党执政都是如此，因此，更好的问题应该是：“如果杰拉尔德·福特当时继续担任总统，而且如果他也不得不应对不断上涨的油价、伊朗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高涨的利率等这些问题的话，你们现在的情况会更好吗？”

** 例如，在 21 世纪初，经常有人说，把源于恐怖主义的冲突称作一场“战争”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使国内的辩论形成对立的两派，会把更多的权威赋予军职人员和行政部门，会把恐怖分子提升至战士的地位，等等。但这种观点忽视了这个事实：即使是最严格的术语也不能规定现实；如果战争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仍然坚持拒绝以战争命名它，并不会改变这个事实，而且如巴格达的失守所表明的那样，还可能导致极其灾难性的军事行动。

然是可能的；但是它不可能是对于我们现有宪法的一个普通的修正案，因为这个按照州来分配名额的参议院是这部宪法最初能够在那个存在深刻分歧的制宪会议上得以通过的关键基础——宪法文本有所记录。^{*}以这种方式修订这部宪法，就是试图一方面盗用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却又废除其关键基础。

为了避免这两种谬误，马基雅维利主张，每种政治形式都是从其前代形式中获得当前的构成要素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独一无二的或者是无中生有的——因为人性是始终如一的，而且成功的政府形式都是对各自前代形式的回应，这种回应是通过努力应对不断的 90 变化而实现的。¹⁷从这种关于永恒的、循环的人类故事与人类被迫做出的偶然的的选择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念中，马基雅维利得出了成功导致失败的结论。¹⁸

或许通过个人的生活经验最容易明白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功策略：有些人只是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努力，有些人依靠灵感，有些人依赖好运，还有的人依靠朋友的善意。但如果我们成功了，迟早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种依靠原来的策略不再能取得成功的竞争之中。这时，我们发现很难去改变，部分是因为我们的策略源于我们的个人性情，部分是因为它们过去为我们带来了成功。¹⁹

^{*} 宪法第五条为制定美国宪法的修正案进行了规定，它也要求“任何一州，没有它的同意，不得被剥夺它在参议院中的平等投票权”。

马基雅维利是一位历史修辞学家，而不是一名学究。在他笔下，历史表现为一种精妙的历史故事，此时，他着力探究的是其效果而不是其“经验教训”。马基雅维利的历史编纂学既是循环的也是有方向的，其构成要素既是因时而变的也是永恒的。尤其是，它是目标明确的，因为它的目的是吸取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外交与政治职业生涯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和他从古典世界所获悉的东西，进而锻造一种新的认识，使得能够成功地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现代的、新古典的国家。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基雅维利有时被认为根本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是一位政治科学家。

因此，恩斯特·卡西尔写道：“伽利略在《对话》中所给出的和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提供的，都是真正‘全新的科学’……正如伽利略的动力学变革为我们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马基雅维利也为政治科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²⁰即使确实如此，那么马基雅维利实际上也只是政治科学的一位非常蹩脚的创建者，因为

91 他的“科学的”方法是如此不切实际。例如，考虑一下马基雅维利在1520年所写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The Life of Castruccio Castracani*）。这部传记的许多细节很明显是编造的：例如，主人公被描述为一个弃儿，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事实，然而这为马基雅维利提供了机会，以此证明伟大人物如何生来就处于中等境况而且是机运的创造物。为了使马基雅维利有机会讨论“文学与武装”这个主题，年轻的卡斯特鲁乔被富于幻想地描述为接受过武器训练（实际上，他是由牧师加以教育的）。在临终前的讲演

中——古代传记的一种常见手法——这位垂死的暴君总结，机运而非 *virtù* 是人类事务的主宰。最后，他列出了卡斯特拉卡尼的名言警句集，但其中大部分出自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

马基雅维利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对于亚里士多德——第一位政治科学家——或者大体上所有哲学著作的尊敬。在弗朗西斯科·维托里 (Francesco Vettori) 试图说服马基雅维利不应该担心瑞士在意大利日益增加的权力时，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没有被说服，并回复说，他并不了解亚里士多德对于像瑞士这样的联邦国家会说些什么，但是他——马基雅维利——只能被“具有合理存在性的东西、正在存在的东西和曾经存在过的东西”说服。²¹ 他给维托里写信说，历史提供了许多关于联邦制共和国的例子，它们完全有可能进行侵略性扩张，曾经征服了整个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无疑，这就是卡西尔曾经指出的：马基雅维利坚决地依赖于他所了解的政治的真实情况。相对于一种关于政治科学的规范性观察，一位研究政治的“伽利略”会区分事实与教条。然而，如我在前面几章努力表明的那样，事实上，尽管马基雅维利否认对传统道德美德的遵守总是会对国家产生最好的结果，但他并没有把事实与道德割裂开来。²² 毋宁说，他主张的是一种强有力的道德，它与对国家所承担的义务相伴而生。他并不仅仅试图不动情感地、漠不关心地描述事实，而是想推动他的读者们采取行动。²³

马基雅维利的进路——历史修辞学家而不是政治科学家的进 92

路——对今天的情报与战略计划具有重大的意义。如亨利·基辛格曾经指出的，“历史并不是一本提供预先实验好的食谱的烹调书。它是通过类比法，而不是通过格言来教育人的。历史可以阐明在类似的情况下的各种行动的后果。然而，每一代人必须自己去找，哪些情况是真正的类似。”²⁴

* * * * *

1502年，在试图创立一个新的波吉亚公国而发动的战争的最后阶段，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派遣他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来到罗马涅。陪同波吉亚的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他受雇成为波吉亚的首席军事工程师。当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也在那里，他受佛罗伦萨执政团的派遣，来探测波吉亚家族对佛罗伦萨所构成的威胁的性质。有些作者推测，列奥纳多是马基雅维利的主要情报来源，²⁵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两位佛罗伦萨人是朋友，他们后来在围攻比萨时还一起合作过。

列奥纳多在波吉亚家族这场战争中的角色是，研究并改进波吉亚家族所征服的那些堡垒，以及深入研究新的军事技术。²⁶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到许多这类机械装置的设计图，而且其中包括现代坦克和直升机的前身的草图。但是，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中并没有对于自行车的设计，这种机器可以在不断地重复它的轮轨的同时前进。

因此，不同于哈维受水泵的启发，或者牛顿受发条装置的启发，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与自行车无关。但是，马基雅维利另有灵感之源，那就是当时风靡佛罗伦撒的大众纸牌游戏。既不同于维科的世界的无穷无尽的周期循环，也不同于黑格尔的世界的不可逆转的进步，马基雅维利的世界进行的是重复、重组，而且分配给我们的一手新牌是同一套但却分解了的纸牌。

第三卷 小结

马基雅维利的命运哲学

93

人性是永恒不变的，但会依据历史情境表现自身；由于这些情境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因此没有人能够必然成功，这取决于性格品质是否与不断变化的时代要求相符合。因而，历史既是循环的，因为一切情境都会随时光重现；历史又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人类与其情境的互动导致了变化。

第四卷

时机

——《君主论》有趣的时间选择

马基雅维利看到了三个时机，如果能够抓住的话，或许 95
就可以创建一个新古典国家，从而摆脱法国和西班牙的威胁。
在第二个时机中，各种事件交互汇集，为实现这个目标创造出
了一个有利的机会，然而此时他已不再担任公职。尽管如此，
假如可以把他的论著送到恰当的人手中，他仍然有可能通过
他的笔来影响事件的发展。为了抓住这个机会，他中断了他关
于共和国的写作计划——最终形成著作《论李维》——转而着
手写作一部关于君主国的论著，¹即我们所熟知的《君主论》。

《君主论》第 26 章——全书最后一章——又为本书的读者们提 97
出了一个难题。¹从一开始，它的论调和措辞就与本书其他部分迥然
相异。²它的标题——“奉劝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很
明显与前面诸章有节制的标题不相一致（“世袭君主国”，“对于占
领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应当怎样统治”，“堡垒是
有益的还是无益的”）。对许多读者来说，第 26 章的华丽措辞更像
是强加上去的，似乎作者是为了某种其他目的写这一章的，而这个
目的显然与组成之前 25 章的各种小心谨慎且目光敏锐的分析没有
关系。

此外，与经典鉴书中的建议不同，那类建议意在影响君主中的
大多数，而第 26 章是完全专注于一个具体的问题：驱逐自 1494 年
以来困扰着意大利政治的法国和西班牙的势力。像礼仪书这样的鉴

书，在类型上不同于那些小册子，比如一本建议返回到金本位的小册子。一部鉴书的内容范围和处理方式是由它的目的所决定的，而它的目的就是为读者处理许多问题提供建议，这些问题的出现不受地域、时代，以及这类书所意在进谏的君主对象的影响。

同样，对许多已经了解了马基雅维利对这个不中用的洛伦佐·德·梅迪奇的激励性献词（“因此，殿下，请接受这个小小的礼品……你会达到机运之神和你的其他条件使你有希望达到的伟大地位）的荒谬性的读者来说，几乎都会被这个建议——这个 24 岁的梅毒病人应该披挂上阵，“选择新的武器并改变战术……以便意大利经过长时期之后，终于能够看到她的救星出现”³——噎得目瞪口呆。对此，最善意的评论家们的解释是“马基雅维利把《君主论》献给洛伦佐，告知了他统一意大利的策略，但是这一举动背后的整个意图……是不清楚的”。大多数批评者简单地得出结论认为，第 26 章证实了这个怀疑：《君主论》的这个章节意在提出一个奴颜婢膝的——虽然是含蓄的——建议，那就是，应该起用马基雅维利来协助完成这些伟大的目标。⁴

这样，第 26 章的问题就是：既然它看上去对本书的其他论证毫无助益，那它的意义到底何在？

下面，我试着解决这个问题，在此过程中也试着解决另一个困扰了《君主论》读者们几个世纪的问题：马基雅维利为什么在第 7 章把切萨雷·波吉亚当作新君主的模范（“因为我不知道，除这位公爵（切萨雷·波吉亚）的行动这个例子之外，对于一位新君主还

有什么更好的教训”),而且甚至为他最终的惨败进行辩解(“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因为,如马基雅维利所揭示出的,正是波吉亚对教皇选举的轻信且消极的立场导致了他的死对头朱利叶斯二世的掌权——后者竟然获得了波吉亚所控制的西班牙红衣主教的选票——而且导致了波吉亚家族的垮台和牢狱之灾?⁵

第26章并不是一篇强加上去的、极度谄媚性的跋,用来呼应前面那篇同样无用的献词(甚或更为糟糕,相当于一个为了获得任命而做出的可怜兮兮的乞求)。毋宁说,这一章申明了本书的主旨。如我前文所暗示的,《君主论》并不主要是一部鉴书,而是一篇构思精细的论文,是一部在创作《君主论》之前就已开始的更大的宪政专著的一部分。马基雅维利之所以中断他论共和国的宏大写作计划并匆忙写就一篇论君主的备忘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相信他看到了一个在意大利中部创立一个新公国(principality)的机会,可以实现罗马和教皇领地与佛罗伦萨及其属地的统一,从而成为一个可以抵抗西班牙和法国的屏障。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弄清楚马基雅维利在从1492年到1537年一直困扰意大利的宪政与战略混乱——从佛罗伦萨的统治者伟大的洛伦佐的逝世以及法国和西班牙军队入侵意大利,到他的曾孙科西莫在查尔斯五世皇帝的支持下即

99

位托斯卡纳公爵——中看到了什么。* 这将需要类似于作者本人一样的读者多一份耐心，鉴于他们并不习惯于将家族与国际政治混在一起，也不习惯同盟关系中令人头晕目眩的急剧变化，以及甚至能令好莱坞的经纪人感到恶心的转瞬即变且虚假的忠诚表演。因为，尽管这种政治常常更类似于一群荷尔蒙失调且好争吵的堂兄妹们瞬息万变的情绪和关系，但它正是孕育出现代国家的社会政治环境。

我们必须再次探究这段历史，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法国 1494 年的入侵所导致的混乱状态，理解出现在波吉亚家族和梅迪奇家族面前的诱人机会，理解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合纵连横。马基雅维利正是在这些纷乱中三次看到了可能的未来，并吃力地促之成为现实。马基雅维利寻求创立一个现代国家，使之成为能够确保共同善的宪政手段，并且成为一种能够对抗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这类欧洲强权的战略上有活力的组织。在他看来，这两个目

100 标之间是相互强化的关系。他之所以赞颂波吉亚家族以及后来的梅迪奇家族，是因为他认识到他们深受缺乏合法性之困，也因为他们拥有意志、资源、尤其是机会去创立一个统一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新的公国。这就是为什么切萨雷·波吉亚虽然未能驱逐外国列强，马基雅维利仍然赞美他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去赞美打败了波吉亚的朱利叶斯二世的原因。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马基雅维利

* 科西莫也是“伟大的洛伦佐”的叔叔老洛伦佐的玄孙，因为“伟大的洛伦佐”的长女卢克蕾齐亚的二女儿玛丽亚嫁给了她的堂兄乔瓦尼·达莱·班德·内雷，他们的儿子就是科西莫。

深信，一旦这样一个国家得以创立，就可以说服它的统治者把权力交给一个共和主义的政府。

因此，我们必须从 1492 年成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红衣主教罗德里格·波吉亚开始，而不是从梅迪奇家族开始。在这次选举中，亚历山大击败了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即后来的教皇朱利叶斯二世），令后者心生怨恨。尽管有研究表明亚历山大的叔叔、波吉亚家族的第一位教皇加利斯多三世是教皇裙带主义的一位积极实践者，而且尽管众所周知，他的前任西斯笃六世让他的侄子成为罗马涅的两块教皇俸地伊莫拉和弗利的领主；然而，两位教皇在偏宠侄子方面并不是罕见的，* 但他们都没有亚历山大六世那样的野心——建立一个世俗的王朝。在罗德里格·波吉亚当选教皇后，后来成为教皇里奥十世的乔瓦尼·德·梅迪奇警告说：“现在我们处于恶狼的掌控之下，而且或许是有史以来最贪婪的恶狼。”⁶ 要看清亚历山大是如何贪婪，人们必须考虑他掌权时意大利的形势。

亚历山大发现，教廷确实很富有，但对教皇国却只有很小的政治或军事控制力。教皇国是由从公元 4 世纪起被赠予历任教皇的各个辖地组成的，这些辖地位于罗马涅（包括大城市博洛尼亚，以及 101 弗利、伊莫拉、里米尼、切塞纳和法恩莎）、翁布里亚（包括佩鲁

* 教皇格里高利十二世的侄子成为教皇尤金四世，尤金的侄子又成为教皇保罗二世；教皇西斯笃六世的侄子成为亚历山大六世的大敌朱利叶斯二世，而且这只是其中一些例子；实际上，“裙带主义（nepotism）”这个词就源于教皇们任命侄子为红衣主教的做法。

贾各市、卡斯泰罗城、奥维多和斯波莱托)、马尔什(包括乌尔比诺市、塞尼加利亚、卡梅里诺和安科纳)、拉齐奥(包括罗马地区、布拉西诺、帕莱斯特里纳、维特尔波和奇维塔韦基亚)等,跨过阿尔卑斯山还有普罗旺斯的孔达维内桑。在这些领地,各大家族——佩鲁贾的巴利奥尼家族、博洛尼亚的本蒂沃利家族、里米尼和切塞纳的马拉泰斯塔家族、乌尔比诺和安科纳的蒙特费特罗家族,以及卡梅里诺的瓦拉诺家族——掌握着权力,虽然他们本质上是教皇的封臣,实际上只不过是教廷有权每年向地方财政征收点无多大意义的通行税。这些逐渐强大起来的城镇和乡村之所以还被认为是“牧师俸地”(vicarages),只是由于它们表面上对罗马的忠诚。现在,它们及其统治家族成为波吉亚家族的目标。

在亚历山大当选之时,教皇尚未获得相当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们的世俗角色。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亚历山大与那些君主开展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活动,这些活动的高潮就是对这些牧师俸地发起了一场军事行动,目的就是使它们处于教皇的控制之下,并为他的家族创立一个王国。⁷

在米兰,卢多维科·斯福扎正面临着一场对于他的合法性的挑战,这起因于他从他的侄子——合法继承人——那里篡夺了公爵领地,而那不勒斯国王——他的女儿是这位已被废黜的年轻公爵卢多维科的妻子——起兵索要这块领地。为了抵御强敌,斯福扎鼓动法国国王查尔斯八世发表他对那不勒斯王位的主张,并邀请他带兵经

由米兰进入意大利。*

教皇准许了法国军队取道教皇国，查尔斯八世进入那不勒斯并 102
在那里戴上王冠。但第二年，亚历山大组织神圣同盟反对法国人，
使得他们退回到阿尔卑斯山以北，而且那不勒斯国王在西班牙军队
的支持下夺回大位。促成佛罗伦萨与法国结盟的萨沃纳罗拉被教皇革
除教籍，接下来又运用传统的教皇策略禁止佛罗伦萨参加圣事活动，
从而严重地限制了它的贸易。最终，佛罗伦萨人开始反抗萨沃纳罗
拉，并于 1498 年 5 月 23 日把他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而马基雅维利
的保护人皮耶罗·索德里尼成为了佛罗伦萨的旗手（政府首脑）。

1499 年，亚历山大再次转变立场。通过一个接着一个的冷酷
策略，他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结为同盟。这些策略包括，判决新任
法王的婚姻无效而特许他同他哥哥的遗孀结婚，从而获得领土上的
利益；为他的儿子切萨雷迎娶了一位法国贵族新娘并因此获封法国
公爵爵位。路易侵入意大利，并废黜了卢多维科·斯福扎。

教皇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在路易的支持下发动了一系列战
役，试图夺取罗马涅的各个牧师俸地的权力。他首先驱逐了伊莫拉
和弗利的统治者卡特琳娜·斯福扎。接下来的一年，即 1500 年，
随着朝圣者们成群结队地来到罗马参加教皇大赦年活动，教皇的财

* 正是这次入侵摧毁了梅迪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不幸的皮耶罗——伟大的洛伦佐的儿子——在 1494 年试图通过与法国之间的一场和平谈判来重现他父亲的历史性成就，但他在谈判中的让步太多，致使佛罗伦萨人把他驱逐出城市，多明我会修士萨沃纳罗拉乘机掌握了权力，而且恢复了共和制。

政收入有了巨大改观，这使得切萨雷·波吉亚能够在不依赖法国资助的情况下重新开战。他很快从乔瓦尼·斯福扎（他的前妹夫）手里夺取了佩扎罗；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放弃了里米尼；阿斯多·曼弗雷迪丢掉了法恩莎，而且被波吉亚下令溺杀。在1501年，切萨雷·波吉亚开始围攻皮翁比诺，并于第二年攻占了它。

103 在他的安排下，他妹妹卢克蕾齐亚的西班牙丈夫惨遭谋杀，目的是使她可以嫁给费拉拉公爵的继承人。1502年，切萨雷夺取了卡梅里诺和乌尔比诺，但未能与佛罗伦萨结成同盟。在这一年，他也占领了切里，并进攻布拉西诺，最后朱里奥·奥尔西尼放弃了它。然而，到了8月上旬，他和他的教皇父亲，都患了病——看来似乎是疟疾发作，之后亚历山大于1502年8月18日逝世。

在二十六天的短暂过渡期——期间由教皇庇护掌管教廷——之后，红衣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于1503年被命名为朱利叶斯二世。失去了父亲支持的切萨雷·波吉亚试图通过认可这次选举来讨好罗韦雷，但他很快就遭到了逮捕，被剥夺了土地和封号，并且被囚禁起来。自此以后，他再未成为重要的军事或政治角色。

相比之下，朱利叶斯二世继续进行这场征服各个牧师俸地的战役，而且夺回了几个，包括被威尼斯占领的地方以及被切萨雷·波吉亚曾经驱逐的几个小暴君所占领的地方，其中有法恩莎、里米尼、佩鲁贾和博洛尼亚。到1512年，法国人已经被赶回了阿尔卑斯山以北，梅迪奇家族重回佛罗伦萨，而且教廷权威在罗马涅地区牢固地确立起来，其水平甚至超过了切萨雷·波吉亚的成就。

然而，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像赞美切萨雷·波吉亚那样，赞美朱利叶斯二世为“战神教皇”。这是因为朱利叶斯仅仅是为了寻求巩固教皇国，而亚历山大和切萨雷则试图从教皇国中创立一个新的公国。马基雅维利从波吉亚家族发动的战争中所看到的，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作战目的；他看到了把教皇的势力、金钱和基督教权威与佛罗伦萨的财富和天才结合在一起，在意大利中部创立一种新国家的可能性。

此时的意大利，那不勒斯和南方地区令人无望地落后；伦巴第和北方诸国四分五裂而且非常脆弱；威尼斯正遭受逐渐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折磨。但就在意大利的中心地带，存在着一个尚未完成的国家，它可能成为第一个真正现代的、非封建的国家。这个历史104性洞见突出地表现了马基雅维利作为国家宪政秩序研究者的卓越天分。

波吉亚家族的雄心和权势，让马基雅维利第一次看到了这种非同寻常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后来，在乔瓦尼·德·梅迪奇当选为教皇里奥十世而且他的弟弟朱利亚诺控制了佛罗伦萨时，马基雅维利第二次看到了那种潜在的可能性。⁸这解释了为何马基雅维利仓促地中断了《论李维》的写作而转去创作《君主论》，后者原本是想献给朱利亚诺的。⁹在朱利亚诺意外逝世时，马基雅维利曾反复考虑是否应把它改献给洛伦佐，因为他对洛伦佐的品质是有所了解的。但这是他唯一的机会。然而，那种可能性并没有随着洛伦佐在1517年的死亡而丧失；实际上，更有才干的朱

里奥·德·梅迪奇取代他成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但里奥十世于1521年的逝世，看来终结了马基雅维利所寻求的建立现代国家的可能性。随着艾德里安六世当选为教皇，梅迪奇家族不再能够控制教皇国，而且不再有可能把它与佛罗伦萨及其在托斯卡纳区的领土合并在一起。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这或许比他在1512年所经历的那些可怕事件——被逮捕、酷刑折磨、处罚和放逐——更为糟糕，因为它标志着他的希望破灭了。里奥逝世没多久，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索德里尼——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捍卫者，马基雅维利的资助人皮耶罗·索德里尼的弟弟——试图为佛罗伦萨恢复共和制。但他在法国的资助下所雇佣的雇佣军被打败了。那年夏天，一场试图行刺朱里奥的密谋被揭发，红衣主教索德里尼在罗马被艾德里安六世逮捕；同一个月，皮耶罗·索德里尼逝世。马基雅维利的两个伟大梦想——创立一个统一佛罗伦萨、罗马和教皇国的现代国家，把佛罗伦萨从梅迪奇家族手中夺回来并建立共和制——似乎都破灭了。

到了1523年9月，教皇艾德里安在他当选仅仅20个月后突然逝世。朱里奥·德·梅迪奇被选为他的继任者，被称为克莱门特七世。马基雅维利再一次看到了机会，一个梅迪奇教皇的权势——掌握在一个他非常了解的人手中，在1520年3月，朱里奥委托他研究佛罗伦萨的治理方法时，他们见过面，而且朱里奥和里奥十世曾经资助他撰写佛罗伦萨的历史——或许可以把教皇国与托斯卡纳统一起来，在意大利创立一个现代国家。

尽管朱里奥是在查尔斯五世皇帝的支持下当选为教皇的，但他现在背弃了他的同盟伙伴，转而试图与法国结成同盟。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越来越有权威的马基雅维利一直殚精竭虑地参与到击败帝国军队并把他们驱逐出意大利的事业之中。他似乎在年轻的乔瓦尼·德·梅迪奇身上——就是乔瓦尼·达莱·班德·内雷，他由于为里奥守孝时穿戴的黑条服饰而出名——看到了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军事领导人形象，认为他或许可以实现自己所梦想的统一大业，但这个最后的机会也随着班德·内雷在1526年的受伤病逝而破碎了。

马基雅维利的另一个梦想——一个共和制的佛罗伦萨——确实实现了；但失去了马基雅维利所设想的战略保障，它也没能维持多久。1527年4月，查尔斯五世集结了一只由德国雇佣步兵和西班牙军队组成的武装力量，向罗马发起进攻。班德·内雷死后，教皇的军队在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的指挥下无法抵抗帝国的军队。在5月份，这些士兵洗劫了罗马，而且这个破坏性事件促发了佛罗伦萨的一场叛乱，梅迪奇家族遭到了驱逐，共和国得以恢复。马基雅维利幻想市政当局或许会让他重新出任秘书长职务，但他现在已被视为梅迪奇家族的人，因此，一直到他于6月份逝世都始终没有恢复官职。

1527年的洗劫罗马事件，终结了教皇国在意大利充当抵抗外国势力的屏障的可能性。逃到圣天使堡避难的克莱门特，被迫为他的性命交付了巨额的赎金，而且把帕尔马、皮亚琴察、奇维塔韦基亚

106

和摩德纳割让给神圣罗马帝国；威尼斯利用克莱门特的无能，夺取了切尔维亚和拉文纳；而马拉泰斯塔也交还给了里米尼。在遭囚禁六个月之后，教皇通过化装逃了出来；最终于1528年10月回到了遭到严重破坏且人口稀少的罗马。伊拉斯谟写道：“遭到破坏的不仅是一个城市，而是整个世界。”¹⁰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宏大的政治雄心彻底终结了；自此以后，克莱门特采取了一种顺从帝国的政策。

尽管白兰地同盟（the League of Cognac）——佛罗伦萨与它们结盟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崩溃了，而且其他同盟国都与帝国签订了协议，但佛罗伦萨独自继续战斗。从1529年10月被围城，一直坚持到1530年8月，由于马拉泰斯塔·巴利奥尼——马基雅维利曾经警告要当心的那种雇佣兵队长——的背叛，城市最终投降了。亚利桑德罗·德·梅迪奇被任命为旗手*，克莱门特曾经从查尔斯五世那里为他购买了一个帝国公爵爵位，现在皇帝把他的私生女嫁给了亚利桑德罗。他身边的高级顾问是马基雅维利的两个密友弗朗西斯科·维托里¹¹和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¹²。随后，这里出现的暴君统治非常明显地运用了《君主论》中所描述的那些最暴力且最好诈的方法。在伊普利托·德·梅迪奇——朱利亚诺的私生子——到帝国宫廷去控诉他堂兄的暴虐时，不幸患病并死掉了；坊间普遍猜测是亚利桑德罗给他下了毒药。最终，亚利桑德罗被他的另一个堂

* 亚利桑德罗被认为是克莱门特与一位非洲用人的私生子，但公开的身份是洛伦佐·德·梅迪奇的亲生儿子。

兄弟洛伦西诺·德·梅迪奇谋杀了，后者是用色诱的方法杀害了他。在洛伦西诺所希望的暴动并没有发生时，他逃到了博洛尼亚；他写了一份辩解书为他的行为辩护，而且自比为刺杀凯撒的布鲁图斯。 107

在亚利桑德罗死后，圭恰迪尼立即赶到帝国宫廷，他在那里筹划了班德·内雷的儿子科西莫·德·梅迪奇的事业。在查尔斯五世于1537年承认科西莫为佛罗伦萨的首脑时，他只不过才20岁。他的统治长达37年，在1548年下令暗杀了洛伦西诺·德·梅迪奇，除掉了最后一个有可能与他争夺统治权的梅迪奇。如同亚利桑德罗的掠夺行为一样，科西莫也是冷酷无情地采用了《君主论》中所描述的方法，对佛罗伦萨的一些大家族斩草除根，提拔那些出身卑微从而依赖于他的人，而且与大国结盟。

然而，亚利桑德罗、科西莫和他们的马基雅维利式顾问维托里和圭恰迪尼，都没有认识到《君主论》以及马基雅维利的毕生事业的真正意义。¹³ 马基雅维利所描述的那些手段是为了在意大利中部建立并维持一个新国家——第一个现代君主国。这是《君主论》非常重要的第11章讨论基督教公国而且在结尾时提及里奥十世的目的。这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大众的共同利益。圭恰迪尼和维托里——他们都为意大利的历史著书立说，而且都对马基雅维利做过评论——积极地实施马基雅维利最残酷的策略，但具有讽刺意味的却是从没有接受他的至关重要的目标。事实上，圭恰迪尼嘲弄马基雅维利是理想主义的和不切实际的：“您在思想上极为放纵不羁，而且是新奇古怪事物的发明者。”¹⁴ 马基雅维利从1494年和法国军

队的入侵中看到了现代国家的必要性，但圭恰迪尼看到的仅仅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结束。

1530年丧失的不仅仅是佛罗伦萨的独立。一个专注于共同利益的国家的理念被弃之一旁，而且被完全放弃了；此外，随之而去还有《君主论》的创作理由。这比意大利国家的崛起提前了三个多世纪。

108 或许圭恰迪尼是正确的；马基雅维利可能是太理想主义了。但是，如果确实如此，这不是因为他不切实际，只不过因为是他将自己的现实主义用在了一个非常具有远见的理想之上。无论如何，他在他的同代人中是最现实主义的，他们最终都遭到了外国的控制——这是他告诫过他们的。毋宁说，与大多数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一样，他的洞见之所以看上去不切实际，是因为它质疑时代的假定。这样，如同现在一样，一种新的宪政秩序在那些目光短浅的人们面前隐约闪现，甚至就出现在他们眼皮底下之时，他们却毫无意识。

马基雅维利一直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决策者如何能够掌控命运？ 109

机运——不可预测之事件的无法理顺的、持续不停的变动——偏爱有 *virtù* 的领导人，即一个果断、有想象力、坚决和有勇气的人。1502 年，第一次与马基雅维利相遇时，切萨雷·波吉亚就是这样一个人，当时波吉亚确实非常受机运青睐。但到了 1504 年，同样是这个人，却被剥夺了他对教廷军队的指挥权，他的土地被没收，本人被监禁，最后被放逐到了西班牙。由此看来，只是有好机运还是不够，而且实际上过于依赖好机运是一个陷阱。

如果切萨雷·波吉亚在亚历山大六世死后还能获得新任教皇的支持，他或许已经实现了马基雅维利的希望：在意大利中部创立一个统一的君主国。他所欠缺的是他父亲的那种外交手段以及精明地运用教廷资金去贿赂红衣主教团，他本应该能够利用他的军队和他

对关键的几个西班牙红衣主教的控制来左右红衣主教团。

那么，波吉亚的失败是他个性的失败吗？首先，马基雅维利似乎曾经认为波吉亚——或许由于患病——屈服于软弱和恐慌。但他后来的结论是，波吉亚只是过于依赖机运——这个观点的另一种说法是，他最终仅仅依赖于他身上受机运女神所青睐的某种德性（virtù）。

110 人们看见某个君主今日幸福不过，明日却垮台，而没有看见他在性质上或者其他特性上有什么改变。我认为，其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我在上面已经长篇地讨论过的那些原因，这就是说，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依靠机运的话，当机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¹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基雅维利通过观察那些以截然相反的方式表现其 virtù 的人们的成就，进而得出这种观点。欧洲舞台上的每一个主要角色都取得过一时的历史性成就，然而他们在个性上迥然相异——事实上，就如同亚历山大六世与他的死敌德拉·罗韦雷之间的巨大差异，后者成为教皇朱利叶斯二世，而且毁掉了亚历山大的儿子切萨雷。每个领导人都遵循自己的天性——有的行事谨慎，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有的行事冲动，像朱利叶斯二世；还有的行事狡诈，像阿拉贡的费迪南德——而且取得了一时的

成功，当其性情与形势相一致时。*

所需要的是预先判断机运不断变化的要求并与之适应的能力：“我还认为，一位君主如果他的做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²

问题是一个人不能改变他的“行事方式”，即 *virtù* 在一个人的行为中得以表现的方式，因为这源于他的个性。马基雅维利写道：111
“没有一个人如此谨慎小心地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种情况，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离开天性驱使他走的路子，还因为他走一条路子亨通已久，他就不能说服自己离开这条路子。”³

这种顽固性是封建王国的一个致命弱点。虽然，由于王国系于一个人的意志，它们或许能取得一时的伟大成就，但这种统治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集体领导——像威尼斯的寡头统治和佛罗伦萨的委员会统治——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但它们会导致其他的问题，如迟疑不决、拖延、权责分散、或许还有最糟糕的派系恶斗。然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基雅维利有解决办法：虽然他的前辈们把 *virtù* 看作个人的特性，马基雅维利却把它考虑为一种集体 *virtù*，能够在人民的性格中发现。果断和独立自主能使社会遵从人民的冷

* “有的谨慎小心，有的急躁鲁莽，有的依靠暴力，有的依靠技巧，有的依靠忍耐，有的与此相反；而每一个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达到各自的目的。人们还可以看到两个都是谨慎小心的人，其一实现了他的目的，而另一个则否；同样地，两个具有不同脾气的人，其一谨慎，另一个急躁，都一样成功了。其原因不外乎是他们的做法是否符合时代的特性。”（*The Prince*, chapter 25.）

酷无情，用那些天性更适合当前形势的人来取代其特殊才能已不再为时代所需的领导。

马基雅维利已经在 1494 年法国入侵的后果中构想出一种新古典主义的现代国家理念。为了使城市发展出超越特定领导人的特定性情的稳定政策，并能经营好与同盟国的关系，根据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其他城市所面临的新威胁创建一支军队，这种古希腊（以及古罗马）观念需要再生并改良。现在，鉴于他对有关领导者在面对变化不定的机运时的脆弱性的洞见，马基雅维利在这些理由之外又加了一条。一个政治社会的成功所要求的不是“拥有一个在位时统治英明的君主”，而是需要“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政府的人”，即使它的命运依赖于“人民的 *virtù*”。⁴ 为了展现一种集体 *virtù*，佛罗伦萨需要一种国家（形式）以建立并保持法治，并且通过用一支
112 从人民中招募的民兵取代对雇佣兵的依赖，从而创造并培育一种新的军民关系。但是，为了使这种国家能够按照需要更换领导人，它就需要一种特定的宪法。

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所看到的，马基雅维利相信，法律通过强迫人们服务于共同善以及抑制暴力，⁵ 而且通过引导人们按照“公民模式和习惯”行为，⁶ 从而“使（大众）良善”。但是，封建制度也有法律。一个现代国家的宪法所要求的是，法律是中立的、普遍的和原则性的。也就是说，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它的规则必须做到类同事例类同处理，使大众知道可以预期什么；此外，其规则还必须清晰明了，能够被解释清楚并指导行为。犯罪必

须受到处罚，不管被告地位如何，因为“举凡治理良好的共和国，从不允许公民将功抵过；有功则赏，有过则罚；一个人立下功劳，则犒赏之；日后犯下过失，则严惩之，全然不会顾及他的功劳”。⁷ 这种规则是与封建等级统治格格不入的。

法治能够以几种不同的方式产生并增强集体 *virtù*。首先，当一个领导人或要人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法律，便树立了一个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楷模。其次，坚持法治能够使大众免受有权势者的掠夺，获得安全，从而使他们摆脱恐惧；这样，他们或许能够在自己的政治行为中做到自信和直率。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引用了一个流亡政治家的这样一段话：“我总是以为，生活在一个个人势力竟然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城市，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只有那样一个国度才是最令人向往的：在那里，人们可以安然享受财产和友谊，而不是像另外一种地方那样，这些东西会轻易被夺走；在那里，朋友们由于害怕丢掉自己的财产，在最需要朋友的关键时刻，反而被迫互相背弃。”如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认识到的，免于恐怖的自由对于集体 *virtù* 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恐怖是一种比任何个体暴君更为残酷无情的主宰者。暴君有时会发慈悲或者放松警惕，但恐怖能够掳掠我们的意志去执行它的命令，并泯灭我们的良知。 113

在《论李维》第二卷中，马基雅维利列出了法治所要求的一些权利：婚姻权、私有财产权、继承权、被选举权和劳动成果享有权。集体 *virtù*——就像个人的 *virtù* 一样——既依赖自信，也依赖充足

的资源。在一个尊重法治和上述权利的国家：

财富迅速增长——它们既来自垦殖，也来自技艺。人人都乐意让物品丰盈，努力获取他们一旦获得就能享用的东西。于是人们竞相为公私利益献计献策，这种利益的增长之快，令人瞠目结舌。而那些处在奴役中的地方与此截然相反。他们的风俗与美德越是败坏，他们受到奴役也越严重。*

现代国家必须对所有人中立地执行法治；而且它也必须创建一支国民军。但是，为何说这样一支军队对于唤起和维持集体 virtù 是至关重要的呢？

114 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看到的，马基雅维利很早就倡议建立民兵，这一定程度上是他对佛罗伦萨严重依赖雇佣兵的回应，这些雇佣兵的敲诈勒索和在战场上的反复无常令他们的雇主叫苦不迭。正是马基雅维利的民兵在围攻比萨后让他的声望在佛罗伦萨同胞中达到顶峰，但在普拉托溃败之后也给他带来了最大的耻辱。在《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宣称，佛罗伦萨以前曾经派出过一支包括

* *Discourse*, book II, chapter 2. 这段话不仅使人想起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让人想起了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著作，他坚称，法治和对财产权的尊重是民主的基本条件。

1200 名骑兵和 12000 名步兵的民兵部队；实际上，当此书的原稿呈给克莱门特七世时，马基雅维利抓住机会游说建立一支从罗马涅人中征募的教廷民兵，而且很快被教皇派到那里调查它的可行性。人们能够理解马基雅维利为何希望组建这样一支军队，以及为何要求保持军事 *virtù*；但是如何在大众中唤起这种 *virtù* 呢？

我们考察一下马基雅维利对法国宪法体系的评价。在赞美了法国人的坚持法治后 [法国的国王们“受到无数法律条款的约束，而且（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决定一切（国内）问题”]，⁸ 他批评法兰西国王像是外国雇佣兵的“附庸”，尽管“他的王国如此伟大”。他之所以做出这种批评，不仅是由于（他们）依赖雇佣兵，更是由于一种更为基本的军民关系的后果，即法国王室和贵族由于担心大众倒戈相向而不愿意去武装他们。解除人民的武装是一种错误，源于：

只顾从掠夺自己的人民中得到眼前的好处，他们避开想象的而非真实的危险，在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的长久幸福上无所作为。即使这种错误的做法能让他们苟安于一时，最终也必然导致无法挽回的伤害和灾难。⁹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伤害，是因为大众的 *virtù* 死气沉沉。事实上，¹¹⁵ 在《用兵之道》中，马基雅维利断言国家的生命与其臣民的备战水平息息相关；如果他们依赖其他人保护自己，他们就会逐渐变得消

极被动且软弱无力。

然而，除了要求一个国家外，培育集体 *virtù* 也要求一种特定的宪法。这种宪法必须能够做到迫使公众去监督国家的重要决定。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做选择是 *virtù* 的基础，它既反映 *virtù* 也唤起 *virtù*。¹⁰ 一部没有规定人民在政治决策中充当决定性角色的宪法，绝对不能唤起并维持集体 *virtù*。（这是为何马基雅维利认为需要一个现代国家的另外一个理由。只有一个战略上更具活力的宪政秩序才能保护道德选择不受外部强权的无理干涉：“在普通人中，信心由法律、协议和宪法保持；而在统治者中，它只能由军队保持。”）¹¹

马基雅维利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学家们——包括李维在内——的一般性看法是，平民百姓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群体，他们不可靠、反复无常，而且有权力时傲慢自大，无权力时卑躬屈膝。但是他把这些特性归因于公众没有受到法律的约束；他宣称法律程序能够迫使平民做出明确的判断而不是含糊不清，而且“人民即使会被大道理所骗，也不会在具体事务上自欺”。¹²

但是，这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怎样使公众以有利于共同利益的方式参与政府事务。对于这个同样也困扰着美国宪法制定者们的问题，¹³ 马基雅维利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以一种特别的宪政方式——一种受法律控制的方式——加以组织和管控的冲突，可以确保公众基于共同善参与国家。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古罗马管理政治冲突的方式，并把它与佛罗伦萨的方式相对比，掌握这一点。¹⁴

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曾经写道：“人们的所作所为，或是处于必然，或是出于选择”，¹⁵而且他在《君主论》中曾经两次指出，无论人类的个性或天性如何，他们依旧拥有自由选择。¹⁶正是通过自由选择的行动，我们认识到行动者把什么珍视为善；如果没有对这种选择所追求的目的的信奉——没有某种价值观念——选择者就不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出选择。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没有机会去选择，选择者就不能实现他的信奉。即使当贫困、灾难、恐惧或自然规律等状况缩减了选择范围时，自由意志仍然能够保证我们作为道德行为者的地位。¹⁷

这让我们想起马基雅维利在卢克莱修著作上做的旁注：在粒子的随机碰撞中，我们摆脱了决定论。这种关于机运与 *virtù* 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的影像，暗示了一个像共和国那样组织的宇宙，在那里，自由机会从各种永恒利益之间的无休无止的冲突碰撞中显现出来。¹⁸

对国家来说，宪法创造出了据以做出政府选择的基础。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

如果说侵权法是一套分配意外事故成本的体系，合同法是一套分配各种市场决策的交易成本的体系，那么，就可以把宪法看作是一套分配角色的体系——谁需要拥有权威去做出何种决定。¹⁹

但是，如果宪法能够要求人民做出选择——集体 *virtù* 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在大部分人“更倾向于作恶而不是为善”，而且倾向于把共同体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下，“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灵魂中的邪念”时，这样一部宪法如何能够确保这些选择是基于共同善做出的？²⁰

117 马基雅维利的回答源于他对罗马共和国的研究。²¹ 他指出了鼓舞人心的个人、得到严厉且坚决执行的法律、其仪式能够巩固国家的宗教，以及一个既包含显贵也包含平民百姓的“混合政府”等要素所起到的作用（最后一个要素在下文对马基雅维利的宪法设计的讨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把古罗马的制度和实践归因于这个城市的基本社会冲突，以及它在处理这些冲突的过程中所发展出的各种模式。²²

我要说，诅咒贵族和平民纷争不已的人，他们所谴责的正是让罗马保持自由的要素……他们没有顾及共和国皆有两种相反的气质，即民众的气质和大人物的气质，凡是有利于自由的法律，皆来自他们之间的不和，这从发生在罗马的事情即可知晓。从塔尔昆到格拉古，凡三百年有余，罗马的纷争甚少导致流放，更鲜有流血发生……罗马亦自有其法：民众希望获得一种法律时，他们要么（走向街头抗议，关闭店铺，或者弃城而去），要么拒绝上阵杀敌。为了安抚他们，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倘若他

们持有谬见，仍有公民大会作为补救，那里会有贤达出面，雄辩地证明他们如何陷入了自欺；正如西塞罗所言，民虽无知，若有值得信赖者告以实情，他们既有能力辨明真相，也易于服从。²³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对这个难题——一种集体 *virtù* 如何产生并得以维持——的回答：*virtù* 源于冲突，²⁴ 而且它通过那些能够把这种冲突导入理性讨论，从而使正式的决策活动受法律规范的宪法实践得以维持。有了这种制度，平民一方就会履行它作为宪法担保人的职责，并阻止贵族一方实施暴政。 118

马基雅维利承认，他的观点背离了这种普遍的看法：宁可依赖君主也不授权给人民。但他解释说，在这种看法所依据的那些事例中，出现的都是人民行动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况，而且指出，如果把这些事件与君主非法行动的事件相对比，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然而，马基雅维利的论证的关键步骤并不是他的这个推测：相较于君主的决策，大众更为可取（“就做事的可行性和稳定性而言，我认为人民比君主更精明、更稳健，判断力更出色”²⁵），而是阐明了这一点：法律为统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结构。“不受法律管束的君主，能够犯下和肆意妄为的民众一样的错误。”²⁶ 通过以宪政把《君主论》与《论李维》联系在一起——我曾指出过这一点——马基雅维利总结道：

如果说，君主在制定法律、构建文明生活、颁布新的法规政令方面优于人民，人民则在维护事物之良序上优点突出……既有长治久安的君主国，也有长治久安的共和国，它们都需要受到法律的管束……考之于俯就法律的君主、受法律管束的人民可知，见于人民的德行，总是多于君主。²⁷

在《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在对比罗马处理派系斗争的方式与佛罗伦萨的方式时，这种观点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在罗马，通过论辩的方式处理群体之间的冲突，处理结果规定为法律；而在佛罗伦萨，社会冲突通过街头战斗和谋杀来解决，导致了許多公民被放逐或杀害。在罗马，平民寻求分享授予贵族的荣耀和政治角色；
119 而在佛罗伦萨，大众寻求剥夺他们的荣耀、他们的军队和政治角色，因而激起了佛罗伦萨贵族的暴力行动。

假如能够邀请马基雅维利参加我们当前政治哲学家们的辩论，将是非常诱人的。他对理性阐述的要求是对当下的商议民主倡议者们所提出的方案的预示——或者支持——吗？或者，他对罗马的混乱的赞美，对那些赞成用超越法律的行为激进地促成改变的人来说，是有说服力的依据吗？与其劝阻这种无意义的推测，我建议用另一种方式来处理这种分歧，这种方式虽然较少规划性，但或许更为同情马基雅维利的更大视野。关键之处是他对政治现实与法律管束的文化性质的看法。难以想象，马基雅维利会把政治描述为如

同一种商谈式民主那样可以预料。但与此同时，我认为把罗马的混乱——例如，关闭店铺，拒绝应召入伍——描述为与罗慕卢斯的超越法律权限的行动相类似的事实上的“再造”是错误的。实际上，马基雅维利明确地指出，罗马共和国享国 600 多年而无需再造。他所痛惜的佛罗伦萨的“混乱”与罗马的混乱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沉溺于公共暴力。这完全不属于法治，因为法治是对明确限制的承认，而没有这种承认，法律就无法发挥作用。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曾经指出，人们在每个城市都发现“人民不愿意被贵族统治或压迫，而贵族则要求统治与压迫人民。由于这两种相反的愿望，于是在城市里就产生下述三种结果之一，不是君主统治，就是自由，否则就是无政府状态。”²⁸（这段评论支持这种看法：《君主论》和《论李维》应该被读作一部宪政专著，因为我们可以猜想马基雅维利更喜欢自由而非压迫或无政府。）

马基雅维利寻求建立一种能够维持一种特定平等——在这种平等状态中，没有哪个群体能够强大到足以压迫其他群体，从而即使有群体冲突的话，也不至于导致那种危及国家的暴力——的宪政秩序。他建议制定一部能够在两个对立的群体之间维持平衡的宪法，* 每一方都会“认真监视另一方”，从而既可以阻止“富人的傲慢自

* 我感谢我的学生罗布·古德曼——*Rome's Last Citizen: The Life and Legacy of Cato* (St Martin's, 2012) 一书的合著者，提醒我注意到已故参议员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评论：“最核心的保守主义信条是，文化而非政治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成败；最核心的自由主义信条是，政治能够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或者，人们可以加上，使之毁灭。

负”以及压迫人民的欲望，又可以阻止“人民的放纵”以及向无政府状态发展的趋向。²⁹

因此，集体 *virtù* 是宪法安排所产生的一个结果，这再次突出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主要是关于宪政的。³⁰ 这种对于基本的社会冲突与分歧的循环性解决办法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只有那些“有助于公共自由”的“法律和制度”才会得到采纳。尽管相互竞争的各个派系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但它们的行动——“像是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³¹——被引导为服务于公共利益，因此“凡是有利于自由的法律，皆来自他们之间的不和”。³²

在本书以及其他地方，³³ 我曾指出，马基雅维利明确阐释了关于最早的现代国家的理念；而且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我特别指出 *lo stato*（国家）这个词以一种与以往（用来指一种身份或地位）极为不同的方式频繁出现在《君主论》中。例如，马基雅维利对 *ragione di stato*（国家理由）这个词有争议的使用，反映出这种新的内涵，因为只有国家已经变为客观化的、脱离了君主或统治者本人，这个词才有意义。但是，在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就 *lo stato* 这个词做出一种类似的主张时，³⁴ 哈里·曼斯菲尔德回
121 应指出，马基雅维利的 *lo stato* 指的是一种个人领地、一种继承物，它更像一个封建王国，而不是一个韦伯意义上的国家——在一个固定领土内的一种不具人格的统治形式。³⁵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调和这两种博学且极富洞察力的观点呢？

至少，他们之间的分歧部分源于把早期现代国家的宪政秩序与

后来的现代国家的宪政秩序混为一谈，从而导致混淆了国家与身份(status)。如我在《阿喀琉斯之盾》(*The Shield of Achilles*)中所指出的，“君主国把中世纪封建主义的王朝惯例与一个截然不同且客观化的国家的宪法革新结合在一起”。³⁶这种宪法革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承认一个国家来合法化新的王朝。这种国家的这些持久性特征——常设性公使馆、签字人去世后仍履行条约义务、新式堡垒建筑、领土、国家的宗教承诺(教随国定)——都与它们的封建原型形成了鲜明对比。君主国的宪政秩序承诺保护君主的人身、财产和特权，尤其是他的宗教选择，而且，尽管它与韦伯意义上的国家差别很大，但它的确是一种独特的宪法革新而且无疑是一个“国家”。这种分析或许抓住了激励马基雅维利的革新性宪法精神，例如，他曾写到自己走在一条“未知的”道路上，去寻找政府的“新模式和新秩序”。正如马基雅维利最令人信服的传记作者塞巴斯蒂安·德·格拉吉亚³⁷所指出的：

在他的《论李维》的开端，尼科洛曾经暗示过这场伟大的探索。显然，他自己的探索最终没有得到什么回报，而且是可怕的。他进入了一条前人从未涉足过的道路，寻找新的秩序原则，“寻找新的模式和秩序”，这是一种意味着改革措施和新的宪法安排的政治修辞。³⁸

实际上，我们能够认识到马基雅维利为君主国所构想的宪法是

122 什么样子，这不仅因为可以在他的著作中发现它，也因为他两次应梅迪奇家族要求呈交这样一部用于统治佛罗伦萨的宪法。

这个关于马基雅维利的 *lo stato*（国家）是否真的意指一种现代国家的争论，并不能借助几个普遍的假定加以裁决，例如，认为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才是最早的现代国家的假定，或者另一个同样普遍但完全时代错误的假定：民族国家是我们所知的唯一一种后封建的宪政秩序。实际上，如果我们摆脱了这些假定，我们就可以对过去五个世纪中存在的不同的现代宪政秩序进行有效的分类，依据的标准是它们主张合法权力的方式和他们维持那种权力的方法。*

所有典型的、前现代的宪政秩序都是不稳定的——君主制堕落为暴君制，贵族制堕落为自私自利的寡头制，民主制堕落为无政府状态。每一种都产生了政治腐败，因为每种统治形式都是授权给一个阶级，因此必然会忽视公共利益，从而最终堕落为一种暴力内讧。“上述类型皆有弊端，三种好的短命，三种坏的恶劣。”³⁹ 由于这个原因，马基雅维利鄙弃赋予任何单一阶级以专权的宪法；但是也出于前文指出的更为重要的理由——逐步培养集体 *virtù*，马基雅维

* 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总结的：“大致来说，16 世纪的君主国寻求扩充君主的个人领地；17 世纪的王国试图巩固统治王朝的所有物；18 世纪的领土国努力通过获得贸易垄断和殖民地来使国家（尤其是它的贵族统治阶级）变得整体上更加富有；19 世纪的（帝国主义）国家—民族努力巩固一个主导性国族，而且寻求建立帝国；20 世纪的（工业）民族国家从 1914 年到 1990 年为了建立一个单一的、意识形态性范式而奋斗，以此改善其人民的物质福利。”参见 *Terror and Consent: The War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Knopf, 2008)。

利赞同一种“混合宪法”，其中每个阶级都拥有确定的职责。

一个类似于斯巴达政府的混合政府，创立者利库尔戈斯“在斯巴达实施的法律，把不同的角色赋予国王、贵族和庶民，使国家存续了800年，既为他本人赢得了至高的赞美，也维持了城邦的安宁”；⁴⁰或者像罗马的政府，在它通过为平民设立护民官，与罗马元老院的贵族要素、罗马执政官的国王要素和罗马公民大会的大众代表一道发挥作用，从而实现了一种混合宪法时，它就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共和国”。⁴¹

对于多元权威的这种结构要素，马基雅维利附加了两个具体的要求，这也是源于他对培育和实践集体 *virtù* 的看法。马基雅维利指出，在罗马共和国，“护民官或任何公民都能……提出制定法律的动议，在作出决定之前，每个公民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能对它发表意见……在听取各方的意见后，人民可以择善而从。”⁴²由此可以推断，宪法必须保护能够对政治决定进行辩论的理念论坛。当人们听取两个能力相当的辩护者分别为不同的提议进行辩护后，他们极少不会去选择那种相对较好的做法，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能理解并为他们所提出的道理说服。^{*}这种论坛不仅对于强健的讨论和准确的决策来说是必要的，而且也会被当作一种能够培育集体 *virtù* 的示范性要素。

*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8. 这是一个经常被陪审团——它的成员是从公众之中随机选择的，当然也有一些限定条件——面前的辩护律师加以验证的结论。

第二个宪法性要求是，官职和荣誉必须向所有人开放，而且按照功劳分配。在这样一个国家，公民们相信，如果他们的孩子是有
124 virtù 的人，“就可以成为城市的领导人”；对比之下，在一个君主制国家，这种机会是不存在的，因为君主“不敢奖挹任何公民……无论他们多么德才兼备，因他不想引起他们的猜忌”。⁴³ 一个实行法治的共和国对其公民的奖励“只出于可靠而确凿的理由，除此之外，它不会奖赏或尊重任何人”。⁴⁴ 而君主常常会发现，把公共荣誉授予腐败之人是对自己有益的。⁴⁵ 在罗马共和国，“贫穷从来不会阻断你的进路，使你无法获得官职和荣誉；人们唯德行是论，从来不问出身”。⁴⁶ 因此，应该由公众任命治安法官，而不是让这些官职成为继承物，因为这样才更有可能使那些更有能力的人担任这些职务。

1520 年 7 月，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受执政团——佛罗伦萨政府的统治执行机构——以及城市的重要人物红衣主教朱里奥·德·梅迪奇委派，去卢凯塞处理一项与佛罗伦萨有重要关系的复杂的破产事务。那个夏天，他利用闲暇时间完成了两个短篇著作：一篇是《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记》，写的是 14 世纪早期的一位残酷无情的雇佣兵队长，他后来成为卢凯塞的统治者；另一篇是《卢凯塞事务概要》（*The Summary of Lucchese Affairs*），研究的是这个城市的宪法。已经表明，后一篇论文是为红衣主教朱里奥写的，众所周知，他对为佛罗伦萨制定一部典范性宪法非常感兴趣，而且曾经力劝他的堂兄教皇里奥十世起用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总结道，卢

凯塞的宪法是有缺陷的，因为官员的任期非常短，而且由于阶级敌对，大量的人被排除在外，以至于选出的官员不能胜任统治工作。结果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不得不常常依赖私人建议，“在组织良好的共和国中，这是不可能的。在那些国家，最大数量的人选举官员，中等数量的人提供建议，少数人执行……在罗马，人民、元老院和执政官的分工就是如此；而现在的威尼斯，大议事会、参议院和执政团的分工也是如此”。⁴⁷ 如我们看到的，这种混合且负责任的治理结构的理念，是从马基雅维利关于宪制的目的的思考中得出的。此外，这些观点预示出马基雅维利为佛罗伦萨提供的两个模范宪法例子。 125

在他从卢凯塞返回并受梅迪奇家族的教皇里奥之命去写作《佛罗伦萨史》后，马基雅维利被红衣主教朱里奥·德·梅迪奇要求起草一个备忘录，详细解释他关于佛罗伦萨最佳治理方式的理想。这个论文是为教皇里奥准备的。关于朱里奥的真实动机存有争议：在遭受灾难的大众接受了洛伦佐的统治之后，需要试探梅迪奇家族的立场；而且已经表明，朱里奥希望通过在这类问题上向他们征求意见的方式，安抚像奥里切拉里花园小组这样的知识分子和贵族群体（事实上，布昂德尔蒙蒂和阿拉曼尼也受到了类似的接洽）。但是，最重要的事实是，里奥和朱里奥担任的是基督教的职务，而且都没有合法的后代。朱利亚诺和洛伦佐死后都没有合法的继承人，这样，在不远的将来，一直困扰着梅迪奇家族的合法性问题，最终变成了危机。

马基雅维利起草宪法时严格遵守了本章所概述的那些原则：他倡议一种混合性宪法结构，政府的三个主要结构分别掌握在三个不同的阶级手中，而且由多种多样的交叠性的职权上的代表来确保信任 and 减轻猜疑。然而，他在起草这个建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问题：他必须让红衣主教朱里奥确信，在红衣主教和教皇的有生之年，梅迪奇家族的影响力将是首要的。这样，与他对一种部分君主制部分共和制的政府的异议相一致，他提议了一种君主制，在这126 两个堂兄弟逝世后，再按照商定好的计划发展为一种彻底的共和制。届时，它将成为一个自我运转的机器，按照宪法蓝图发展，而不是依赖于某人或某个家族的领导。

这样，马基雅维利的提案《论小洛伦佐逝世后佛罗伦萨的政务》(*Discourses on Florentine Affairs after the Death of Lorenzo*) 包含两个部分：首先是一个序言，评估洛伦佐灾难性的插曲之后，梅迪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当前状况；接下来是一个结构详细的说明，解释如何建立一个在所有阶级之间维持平衡的国家，首先是在梅迪奇家族的统治之下，接下来是在一个自立的、共和政体结构的统治之下。

序言部分讨论了这个问题：是否佛罗伦萨不能只是回归到科西莫和伟大的洛伦佐时期的非正式的寡头制。马基雅维利的明确结论是不能：

那时，主政的梅迪奇家族，成长、受教于本城公民之间，所以他们秉政劳民，甚得支持。如今他们变得如此显

赫，鹤立鸡群于普通公民，由此他们之间的那种融洽无间不复存在。那时，在意大利没有哪只军队、哪种势力是佛罗伦萨依自己的军队所不能抵抗的……但如今，西班牙和法国的插手意大利事务，佛罗伦萨必须投靠其一以自保，一旦投错靠山，她立刻就会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那时，公民们习惯了缴纳沉重的赋税；如今若让其恢复之，必将遭人憎恨。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长期来看，梅迪奇家族的统治是不可持续的。

接下来，他转向了他所提议的宪法结构：“那些创建共和国的人应该为存在于所有城邦中的三类不同的人——上层人物、中间阶层以及底层民众——安排好恰如其分的位置……既然存在三种类型的人……就有必要在共和国里不多不少正好设立三个机构。”相应地，马基雅维利提议由代表大会（委员会）选举官员，参议院审议和采纳法律，执政团负责执行：

在佛罗伦萨，有些上层人认为自己理应高人一等。在组建共和国时，必须满足这些人。事实上，上一届政府（索德里尼政府）之所以倒台，恰恰就是因为没有满足这样一些人。对这些人而言，除非赋予共和国的最高职位以威严，而这种威严又掌握在他们手中，否则就不能让他们心满意

127

足。（因此）为了把这种威严赋予佛罗伦萨政府，必须选择……65 位 45 岁以上的公民，组成“六十五人委员会”：其中，53 人来自主要行会，12 人来自次要行会，* 他们终身任职，而且（分为四组）应该居住在市政官邸三个月（与从他们之中选出的正义旗手一起，而且每年轮换）……所有这些入一起合成执政团。

接下来是第二个机构，参议院。“它由 200 位至少 40 岁的公民组成，40 人来自次要行会，160 人来自主要行会。他们应当终身任职，并命名为‘特选委员会’。”

128 现在，剩下的便是使第三等级亦即最后一个等级心满意足。他们是公民的最大多数，如果他们的权力没有得到恢复或许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但是，如果您（里

* 佛罗伦萨的行会都是公司，从 12 世纪到 16 世纪中期它们一直控制着技术和贸易。这些行会被分为三类：大的、中等的和较小的。七个大行会包括布料商、律师与法官、银行家和医生；中等的行会有五个，包括裁缝、石匠和鞋匠。arti maggiori（七大行会）和 arti mediane（五个中等行会）合在一起构成了十二个较大行会。小行会（arti minori）主要包括酒商、旅店老板和锁匠，一共有九个。由占人口中大多数的无特别技术的劳动者、船工和其他人构成的 minuto popolo 被禁止组织行会。每个行会的成员身份都是世袭的和专业的，即申请者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是某位会员的合法儿子，而且胜任相关的职业。每个工会都有自己的章程，在佛罗伦萨范围内具有法律效力。佛罗伦萨执政团九位成员中的六位选自大行会，两个选自小行会。这样，除了保护自己的成员免于竞争以及订立生产标准外，行会还是其成员借以谋求政治权力的平台。

奥)立即恢复他们的权力,既不利于您朋友的安全,也不利于陛下您权威的维持……因此,我认为您有必要重新开放“千人议事厅”或者至少“六百公民议事厅”。他们将任命除“六十五人委员会”、“两百人会议”——这些在您和梅迪奇枢机主教的有生之年,都由你们全权任命——之外的所有的公职者和行政长官。

与美国宪法一样,这个结构并不是权力分立的结构,它们相互之间具有非常强的关联性和顺序性,从而——作为一个一般性问题——没有哪个机构可以不经其他机构的合作而单独进行统治。大众地方行政机构的代表需要与执政团相协调,而且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控诉法庭(“为了防止什么事都要上诉,除非涉案金额不少于50达克特,否则欺诈案件不得上诉;除非伤筋动骨、流血不止,或者损失总额超过50达克特,否则暴力案件不得上诉”)。

马基雅维利总结道,他寻求“一种能够使政府实现自治的宪法。当每个人都在其中占有份额,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什么人可以信任的时候,当没有哪个阶级的公民出于恐惧或野心而意欲革命的时候,政府就可以稳如泰山”。* 马基雅维利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一个共和国的宪法通过赋予社会中各个重要利益群体在国家中

* 有人或许认为,“治国之道”理念的出现与马基雅维利密切相关。我的这个想法受惠于哲学家马克·萨高夫(Mark Sagoff)。

以利害关系，能够创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吗？

129 在教皇里奥于 1520 年 12 月 1 日逝世时，马基雅维利的提议并没有被付诸实施；然而，这个事件事实上为佛罗伦萨的宪法改革赋予了新的动力。随着教皇选举会议对红衣主教朱里奥·德·梅迪奇的拒绝以及艾德里安六世的当选，梅迪奇家族开始对如何安抚佛罗伦萨的民意变得更为忧虑。在 5 月份，像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备忘录中所敦促的那样（“如果议事厅不重新开放，佛罗伦萨的大多数公民就不会满意……陛下您肯定清楚，无论谁想夺取您的权力，他都会把重新开放它视为当务之急”），朱里奥主动提出恢复大议事会（Consiglio Maggiore）。马基雅维利被再次要求解释他关于新宪法的观点，并且于 1522 年准备了另一个备忘录《论改变佛罗伦萨的政府结构》（*Discourse on Remodelling 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它是以法令的形式起草的，贯彻了第一部备忘录中的那些主要规定。⁴⁸

然而，朱里奥对宪法改革的敷衍应付激起了一起反对梅迪奇家族的密谋，组织者就是奥里切拉里花园小组中的一些成员；自 1517 年夏季以来，马基雅维利一直与他们进行交流。如马基雅维利在这些论文中所写的那样，他自己反对在存在政治变革通道的地方搞这种阴谋。然而，马基雅维利的两个朋友（他曾把自己的书呈献给他们）——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Zanobi Buondelmonti）⁴⁹和路易吉·阿拉曼尼⁵⁰——就是这场密谋的领导者，密谋还包括一个行刺红衣主教朱里奥·德·梅迪奇的计划。尽管马基雅维利反对

通过暴力改变佛罗伦萨的政权，但奥里切拉里花园小组的其他成员——例如艾阿考珀·纳迪（Iacopo Nardi）——都认为他对共和宪法的倡导是这场密谋的灵感来源。由于走漏了消息，这场密谋遭到了挫败；虽然布昂德尔蒙蒂和阿拉曼尼成功出逃，但其他参与者受到了严刑拷问，最后被处决。

或许完全可能的是，红衣主教朱里奥从来没有想过要完成这场他所许诺的且马基雅维利给予了详尽设计的改革。朱里奥成为教皇的可能性——在艾德里安于 1523 年逝世时确实出现了——或许鼓舞了梅迪奇家族的新一代去幻想他们可以通过金钱和他们身后的教廷权力继续（尽管是非法地）统治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看来预料到了这一点；因此，在第二次起草的宪法中，马基雅维利明确提出，由于亚利桑德罗和伊普利托拥有需要加以保护的利益，从而也把他们考虑在内。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梅迪奇家族到了准备牺牲佛罗伦萨的独立来永保他们权力的程度。 130

就在马基雅维利逝世的这一年（1527 年），佛罗伦萨人民发动了反对梅迪奇家族的起义，而且恢复了共和制，直到 1530 年被围攻 11 个月之后梅迪奇家族恢复统治为止。到 1532 年，共和制被完全取消，而且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原来的红衣主教朱里奥——使他的私生子亚利桑德罗·德·梅迪奇成为佛罗伦萨的公爵。马基雅维利曾警告过，梅迪奇公国——用他的宪政术语来说是“君主统治”——在佛罗伦萨是不可持续的。这里没有武装的贵族去保护君主，而且即使出现了这种力量，这个城市也不得不任外国势力的摆

布。从本质上讲，梅迪奇家族正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代理人，他们借此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用佛罗伦萨的主权交换来了皇帝对他们的公爵爵位的承认。结果表明，归根结底，问题并不是集体 *virtù*——这个问题主导了这些论文——而是一个强人对合法性的追求：《君主论》处理的是这个问题。

或许，只能以这种方式结束。毕竟，正是伟大的洛伦佐，一个具有相当程度 *virtù* 的人，触发了一系列的事件，最终使梅迪奇家族的霸权变成了一种君主制。伴随着 1478 年的帕奇阴谋——洛伦佐和他的兄弟在这场阴谋中受到攻击，而且他的兄弟朱利亚诺被杀，背后支持者教皇西斯笃六世与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德结盟，对佛罗伦萨发动了军事进攻。这场战争进行了数月之久，期间这个城市还受到了教皇的禁令限制，而且直到洛伦佐深入虎穴，潜入那不勒斯进行谈判，才使得战争终止。然而，这种激动人心的 *virtù* 行动的后果之一，就是共和国政府内的一系列宪法变化，从而使梅迪奇家族的权力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下面是洛伦佐的激动人心的诉求——一种对共同善的诉求——尽管它播下了使这个共和国最终崩溃且被公国取而代之的种子：

在我们的城市所处的危险环境中，深思熟虑的时代已经过去。必须采取行动……我已经决定，而且获得了你们的许可，立即乘船到那不勒斯；相信由于我是我们敌人的

眼中钉，因此我自投罗网的话，或许可以为我们的同胞挽回和平。由于我已经拥有比当下任何人更多的荣誉和更大的责任，我也就比其他人更有义务去为我们的城市服务，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辞。出于这种想法，我现在就要出发。或许上帝希望这场始于我们兄弟两人之血的战争，应该通过任何手段加以结束。我的希望是，不管是我的生或死、幸运或不幸，能够对我们城市的福祉有所贡献……我满怀希望而去，祈祷上帝的恩典，使我能够完成每个公民都应时刻准备为自己的国家所履行的职责。⁵¹

然而，马基雅维利的梦想或许不应该限定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些立场迥异的学者，如美国保守主义者哈维·曼斯菲尔德、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莫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和新左派批评家戈帕尔·巴拉克里什南（Gopal Balakrishnan），似乎都同意马基雅维利是美国宪法的“精神导师”。⁵² 一个自由且强大的共和国，一种公民宗教（美国人对他们的宪法的崇敬），既有一位古罗马式的创建者（辛辛纳图斯式的人物，乔治·华盛顿）又有一位重建拯救者（全面战争的倡导者，亚伯拉罕·林肯）——这些都是马基雅维式政体的要素，而且迄今为止，此种政体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功。

第四卷 小结

马基雅维利的视野

131

我们应该对马基雅维利和其他的人心存感激，他们只是描述人们的作为，并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除非人们了解了毒蛇的所有情况：它如何在地下生活，如何用腹部爬行，如何缠绕、狡猾，它的忌妒、毒牙，等等，也就是说罪恶所有的情形和特性，否则人们是不可能把毒蛇的狡诈与鸽子般的天真结合在一起的。因为缺乏这类知识，德行就是敞开的，没有防御的。一个诚实的人如果对罪恶一无所知，想要帮助那些邪恶的人改邪归正也是不可能的。

弗朗西斯·培根

马基雅维利
悖论之解

本书始于关于《君主论》的五个结构性假定，几个世纪以来，133
这几个假定一直激发着学术界和民间关于其含义的争论。这种持续的
辩论反映出关于这位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悖论：为何他的成就如
此之高，影响如此深远，而与此同时关于他写了什么，却有如此多
的争论？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发挥着持续的影响，源于他抓住了
国家的病理学和演变规律，而这些都是系列纷繁却又各不相关
的、与人类愿望发生的战略上和法律上的冲突所导致的。他早在查
尔斯·达尔文和亚当·斯密之前，就描述出了这种相互作用的有机
形态学。这种影响与人们对于他的著述的持续兴趣混淆在一起，这
源于他刺激性的、颇为戏剧化的、冷酷的写作风格。后者并不必然
是表达清楚的，甚至不是前后一致的（例如，“对人们应当加以爱

抚，要不然就应当把他们消灭掉”)。但正是前者——常常遭到忽视——说明了他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原因。这种新古典国家是他的智识和道德上的创造。这是他所展望且我们已经实现的世界，因此，马基雅维利著述的影响力与那些激发了最持久的争论的假定毫无关系，而且这些假定事实上基于一种忽视其著述的宪政主义本质的严重误读。正是这个贡献——以及那种试图服务于它的精明且精巧的手段——自现代国家诞生以来一直引人关注，即使在我们并不确定它的来源时，也是如此。

134 那五个背景性假设是：《君主论》是一部鉴书，是马基雅维利所写的一部献给统治者的劝告与建议性体裁的手册；《君主论》主张独裁，与此对照的是《论李维》赞美共和；《君主论》区分了政治与伦理；《君主论》称赞切萨雷·波吉亚的手段，作为一个男人，他表明通过运用男子气概的 *virtù*，虽然很残酷，是可以征服机运的；《君主论》臭名昭著的最后一章与其他部分并没有实质性关系。大体而言，这些是关于这部著作的很少有争议的“箴言”，是无数学生从大学课堂上获得的常识。

但它们每一个都对围绕马基雅维利这部最著名的专著所产生的尖锐分歧和大量争议负有责任，而且每一个都是极度误导性的。

《君主论》是一部鉴书

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它就是这种体裁的一个极为糟糕的例子，因

为它完全颠覆了古典的和基督教的劝告。传统认为善即是真——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人，一个人只需要遵守传统德性的道德标准就可以了，因为最理性的行为总是最道德的。柏拉图让我们铭记的这些传统德性有智慧、正义、勇敢和节制。这些被忠实地反映在西塞罗的鉴书《论义务》中，而且他又加上了——特别针对君主——守信（西塞罗用它意指遵守诺言和得体地对待他人）、宽宏大量和慷慨这些德性。¹ 西塞罗强调，虽然许多人相信“有德的事情可能是没利的，而有利的事情则可能是缺德的”，² 但其实他们受了蒙骗，因为有利与恰当的道德行为总是一致的。³ 文艺复兴时期，为君主而作的鉴书的作者们都接受了这个观念，而且对之进行了扩展。例如帕特里 135 西的《国王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King*）一书，加上了这种基督教理念：即使一位统治者今生通过牺牲传统德性去采取更有利的做法而斩获颇多，但来生他必将遭受相应的苦难，因此，总体而言，行缺德之事依旧是不理性的。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观点与《君主论》格格不入。马基雅维利指出，没有哪个成功的君主能够依靠那些德性维持他的成功，“某些事情看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⁴ 而且，事实上上帝非但没有在来生实施惩罚，反是赞扬那些通过违背传统德性而建立起持久政权的领导人。马基雅维利坚持认为，统治者必须受迫切必要的指导，而且依据每个行动对于国家的后果对之进行判断。“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

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⁵ 非但不建议慷慨，他还写道：“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给你带来这两者。”⁶ 马基雅维利也不要求君主信守承诺，而是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君主应该拒绝而不是遵守自己的盟约承诺。*

136 这些段落非常有名，因为它们是如此骇人听闻，尽管如同亨利·米勒小说中被无数次翻阅的那些段落一样，过去的20世纪已经使它们不再如此令人震惊。尽管如此，由于它们与我们惯于期望从鉴书中所获得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从而引发了一些问题：如加勒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所提议的，《君主论》是对鉴书体裁的讽刺且没有打算严肃对待吗？⁷ 或者，如斯宾诺莎、卢梭、乌戈·福斯克洛（Ugo Foscolo）和路易吉·里奇（Luigi Ricci）所深信的那样，它是一种警告，一个告诫故事，让我们了解一位暴君会做什么事情，从而使我们能够去抵抗他吗？或者如玛丽·迪茨（Mary Dietz）所主张的，它是一个试图令梅迪奇家族垮台的圈套，如果其中的建议被他们采纳，就会破坏他们的统治？⁸ 它是用密码书写的，因为马基雅维利不敢进一步引起梅迪奇家族和教会的不信任？但如果它是用密码书写的，它就并不意味着它表面所意味的那样，那么

* “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而且原来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The Prince*, chapter 18.）

密匙是什么？⁹或者，如果它本意就是它表面所意味的那样——查尔斯·亚当斯为孩子们所写的一本忠告书——那么，它就应该被宣布为禁书吗？在教皇于1532年签署它出版后，天主教教会于1559年把它列入禁书目录（*librorum prohibitorum*）。

我曾经指出，《君主论》根本不是一部鉴书，而是一部宪政专著。马基雅维利为政治家们提出的具体建议完全从属于他更一般的宪政目标。如他在第一次讨论这个课题时向弗朗西斯科·维托里解释的那样，“我写成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君主论》，在这部书里，我竭力深入探索这个课题，讨论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如果你读到它的话，就会看到我对治国之道的研究已经有十五年了……。”¹⁰色诺芬是马基雅维利提及的唯一一位君主鉴书作者，*而且他的引用具有专门的历史目的。许多读者都受到了《君主论》第15章中首段话的误导：

现在尚待考察的是，君主……应该采取的方法和行动。

137

关于这一点，我知道有许多人已经写过文章，我现在也写起文章来，特别是当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观点与

* “《君主论》中并没有提及彭塔诺（Pontano）、帕特里（Patrizia）和卡斯蒂利奥奈（Castiglione），斯金纳也没有提供另外的证据证明马基雅维利关注过他们。”参见 Nathan Tarcov, “Quentin Skinner’s Method and Machiavelli’s Prince”, *Ethics*, vol. 92, no. 4 (July 1982): 704。

别人的不同，因此，我恐怕会被人认为倨傲自大。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著名的段落与紧接着一段中的这些话联系在一起时，我们会理解，马基雅维利指的并不是那些鉴书的作者们，而是那些政治哲学家们——如柏拉图，他们勾画出了统治者为之奋斗的理想世界。

因为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

《君主论》主张独裁，而《论李维》赞同共和政体

放在一起看，这两本书似乎是相互对立的。这也导致了几个难题。随着年事日高而且被起用的希望渺茫，马基雅维利是否不再抱有幻想，并且开始对一个梅迪奇君主国的可能性不以为然？或者《君主论》根本就是一本虚伪且愤世嫉俗的小册子，¹¹ 试图在一个驱逐了作者的保护人的强大家族眼中，抹掉自己作为一位热情的共和拥护者的形象？或者，如伦佐·塞雷尼（Renzo Sereni）曾暗示的那样，《君主论》是一个满腔怨恨之人的幻想之物，不应视之为关

于治国之道的深思熟虑的思考，而《论李维》则是与一群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数年讨论的结果？¹²有些批评者曾经主张，马基雅维利企图用他的建议蒙骗君主，诱导他们采取那些会破坏君主国的行动，从而使它们更容易为共和国所取代。¹³或者，马基雅维利只是一位缺乏一致性的作者，完全不理睬这两部著作之间的深刻矛盾？¹⁴

我已经表明，这两部著作之间完全没有矛盾。我相信，在马基雅维利于1513年春季被驱逐出佛罗伦萨时，他首先开始创作的是《论李维》，而且是在那一年夏季暂停了关于共和国的工作，着手写作《君主论》。¹⁵如他在《君主论》第2章所指出的，他将“撇开共和国不予讨论，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详尽地论述过了。我打算单独地转到君主国这方面来，探讨这些君主国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下去”。出于这个理由，我认为马基雅维利最好被理解为写出了一部伟大的宪政专著——《论国家》（*Lo Stato*）——其中部分章节关于共和国，部分关于君主国。

这就是仅仅阅读《君主论》会对马基雅维利观点产生如此曲解的原因。并不是他在最终完成《论李维》时，改变了自己关于君主国与共和国对比效能的想法。毋宁说，他认为这些宪政秩序各自更适于不同的角色——君主建立国家，大众共和国维持国家——而且认为第一步，即在中部意大利建立一个国家，必须由一位君主来完成；这就是他如此准确地加以预言的君主国。

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曾经提醒，“比任何其他词更加象征着（权力）的垂直聚焦……这个词就是‘君主’，马基雅维

利选择《君主论》(1513)作为书名,绝非偶然”。¹⁶ 然而,并非如此。值得强调的是,《君主论》是在马基雅维利逝世五年后的1532年出版的。在1513年以及至他去世的所有时间内,马基雅维利把这部著作命名为《论君主国》(On principalities),而不是《君主论》。¹⁷ 此外,在它的创作期间和以后,马基雅维利多次提及这部著作是“我论述君主国的专著”。* 在《君主论》中,他从未提议把君主统治而非共和制当作维持国家的首选宪政方式。马基雅维利的遗作出版者把拉丁文 *principatibus* 译为意大利文 *principe*, 是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拙劣直译,因为他也没有认识到马基雅维利在君主 (the prince) 和君主国 (the princely state) 之间做出的开创性的区分; 这个区分对于他的伦理学和他的共和主义具有极其深刻的后果,而且也反映出了他关于这种崭新的、正在浮现的宪政秩序的基本洞见。

的确,《君主论》对单个人的行为花了许多笔墨,而没有怎么关注在《论李维》中极为重要的集体意志问题。但这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我们在《论李维》中也可以发现大量对单个领导人的行为——从个人 *virtù* 到建立国家——的讨论,尽管对于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单个人的统治是不能胜任的。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建国者的角色对共和国的诞生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为了使建国者的 *virtù* 普及给公民,适当的秩序 (*ordini*) 便是不可或缺的一样。

* 参见 *Discourses*, book II, chapter 1 (*nostro trattato de' Principati*)。

《君主论》区分了政治与伦理

“政治与伦理相分离的观点更明确地与马基雅维利相关……在他简洁而又著名的论著《君主论》中，他不仅坚持这种二分法，而且建议统治者或君主为了强化他的权力而去无视一切伦理考虑。”¹⁸像前面的成见一样，这种论点普遍而且顽固，尽管它引起了大量的争议。

那么，马基雅维利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吗，如克罗齐所主张的 140 那样，他把政治领域从伦理中分离出来，从而使统治者在决策时可以合法地选择较轻的恶？或者如列奥·施特劳斯所指出的，马基雅维利是这样一个人物吗，他通过把现代与统治性道德原则相分离而开启了它，而且如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所总结的，这种分离导致了智识的“突变”？或者又如恩斯特·卡西尔、¹⁹ 奥古斯丁·雷诺德（Augustin Renaudet）²⁰ 和莱昂纳多·奥勒斯吉（Leonardo Olschki）²¹ 等所断言的，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位政治科学家，他之于政治学正如伽利略之于物理学，从不偏不倚的经验基础得出结论？

事实上，马基雅维利是一位相当深刻的伦理学家，坚持一种我称之为“后果论义务”的非常苛刻的准则。这种伦理准则并不与基督教相对立。大体而言，马基雅维利的伦理学承认，不同的生活形式要求不同的伦理规则。当我代表自己行动时，我应该遵守古典的和基督教的德性；当我的行动受上帝支配时——像摩西那样，他杀

戮了无数人——我就应该顺从他的意志，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当我代表国家行动时，我就应该按照共同利益的要求行事，把自己的意志和偏好置于从属地位。与其说马基雅维利不再坚持“道德的总是理性的”这种观点——这很容易遭到曲解——不如说他含蓄地断言：当一个人代表他人行动时，理性的总是道德的。

这种立场很容易与“角色道德”（role morality）相混淆，这种观念认为特定的角色优先于我们通常的道德义务。²² 例如，告解神父的角色会要求他保守秘密——如犯罪行为——而换做其他人则会觉得有义务去揭发它。律师伦理准则则力主代理人应忠诚于他的委托人的利益，而不需要按照平等关怀他的委托人和对方当事人的方式行动。他不必对事件提出诚实的解释，而是要努力破坏对方当事人的解释的可信性，即使他相信对方的解释事实上是诚实可信的；他可以合法地推进委托人的目的，即使他相信这些目的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在某些案件中，如果委托人拒绝去减轻他人的痛苦，他也必须照办。²³ 像会计和医疗²⁴ 这类专业领域的类似例子，常常被描述为“角色”道德与“普通”或“背景”道德之间的差异。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关于道德实际上由何构成的一种错误解释，²⁵ 认为它产生于特定的生活形式，而并非普遍存在的；但无论如何，这并不是马基雅维利所倡议的。²⁶

141

的确，把马基雅维利的进路与角色道德混为一谈，就会认识不到他的努力的重要意义，也会误解他的洞见。²⁷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后果论义务——当一个人作为大众的代表行动时，服务于公共利益

的义务要优先于实现自己的目的，其中也包括自己个人的道德目的——源于这个事实：这个行为者之所以拥有权力，只是因为大众把权力委托给了他。因此，这个行为者没有合法权威去违背共同善行事。

现在，对一些人来说，这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纽伦堡”问题。在一位官员基于“他只是在服从命令”这种理由而否认应该为其行为承担责任时，就会产生这个问题。人们可以从马基雅维利那里获得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奥秘在于他坚持认为国家官员应该忠诚于法治（the rule of law）。在 1945 年的纽伦堡审判过程中，纳粹官员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指出，他们只是在按照上级的命令行事；然而，无论如何他们是这个可怕的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毫无理由地对合法国家波兰发动攻击，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中，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侵略别国是不合法的。²⁸ 与此类似，今天那些做出种族灭绝、奴役、海上掠夺、酷刑折磨或其他违反国际公认的强制性规范的行为的官员，不能自我辩解说他们在遵守本地法。但是，把 142 这种解决方法应用于马基雅维利时代的国家体系——那里没有现在的国家体系——以及一个侵略战争可以得到国际规范认可的年代，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时代错置；但是，假定马基雅维利的后果论义务意味着，官员们在违反内在于共同善的某些基本规范时——甚至在它们没有得到法律认可时——可以被免除谴责，仍然是一种时代错置。马基雅维利对费迪南德在西班牙所进行的大规模人口驱逐的谴责，以及对阿加索克利斯在叙拉古的残酷统治的谴责，就表明

了这一点。

斯金纳曾经指出，²⁹ 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即使在今生或许可以证明违背基督教道德的行为是可取的，但最终是否并不是如此呢，因为在来世的审判日我们都会被要求——为了永生——去加以解释。³⁰ 但是，这忽视了马基雅维利事业中最重要的宪政方面，即他通过把国家与基督教人格相分离，对国家进行了具体化和客观化；而且，它假定上帝要求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这并不符合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也是那时和现在许多基督教神学家的观点——即必要即是上帝的意志（*necessity is God's will*）。³¹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理解这种区别：一方面是没有伦理或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有一套适用于特定职责的独特的伦理或道德原则。马基雅维利在一段著名的段落中写道：

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而且原来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³²

这段话被当作外交伦理中的一条重要格言，³³ 但它只不过是陈述了国际公法中的情势可变原则（*clausula rebus sic stantibus*）。³⁴ 这个原则规定，当订立条约时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在订立条约之前发生的话，缔约方就不会去承诺他们的条约义务，那么，已经生效的条约规定就不是必须

执行的。这并不是不道德的；实际上，它是条约法的伦理法理学中的一个必要要素，因为对缔约方产生约束的是他们在最初的深思熟虑后同意承担的义务。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经常被引用的这句话的含义：“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强调为本书作者所加）；随后是一句较少被引用的话：“关于这一点，我能够提出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它们表明，许多和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强调为本书作者所加），即缔约一方由于另一方违反或放弃他的义务而不必再去履行自己的义务的例子。

有足够多的例子可以证明，马基雅维利所提议的政治家伦理并不仅仅是一种权力辩护，一种对“强权即是公理（might makes right）”主张的文饰。在他写道，一位希望拥有绝对权力的新君主必须改变国家中的一切——破坏它的城市，并且强迫所有居民迁徙到他处——此外，他补充说：

这些手段极为残忍，与任何生活方式相悖，不但忤逆基督教，而且有违人性，任何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宁肯做一介平民，也不愿意做这种戕害世人的国君。³⁵

这表明，即使在统治者的权力危如累卵之时，也存在着一些必然对他的行为予以规范的伦理原则；与之相对照的是，在公共利益的维系处于危险之中时，也存在这种原则。时至今日，我们已经

看到，联合国安理会在 2011 年首次承认，联合国宪章允许对一个计划屠杀自己人民的政权予以干涉，即使它并不打算去危害其他国家——这个原则就是对马基雅维利的区分的承认。³⁶

马基雅维利既肯定又否认人可以控制他的命运

144 表面上看，这个流俗之见是有一定的文本支持的。在《君主论》第 25 章中，马基雅维利写道：

我认为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当它怒吼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毫无能力抗拒它。事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使将来水涨的时候，顺河道宣泄，水势不至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

而且，他在第 7 章中讨论切萨雷·波吉亚时写道：

我觉得应当像我在上面提出的把公爵提出来，让那些由于幸运或者依靠他人的武力而取得统治权的一切人效

法。因为他具有至大至刚的勇气和崇高的目的，他只能采取这种行动，舍此别无他途。只是由于亚历山大短命和他本人患病，才使他的鸿图终成画饼。

合在一起看，这些段落或许暗示着，一个具有充分 *virtù* 的人，如果足够聪明足够幸运的话，是能够实际上控制他的命运的。³⁷ 但是，其实这聚焦于错误的问题上了，因为它把《君主论》看作是一本关于某个令人兴奋的人物的故事书，而不是把它看作一部讨论新的宪政秩序的专著。即使就这个人来说，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诗歌《头十年》（*The First Decennale*）中总结道，“作为一个对抗基督的人”，波吉亚罪有应得。也就是说，由于他借助教廷的力量来实现其家族的野心，他应该受到谴责而不是赞赏；虽然在治国技巧方面，他也称得上是一位大师（*virtuoso*）。对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贴一个标签的话，“目的至关重要”要比“目的证成手段”更好。³⁸

145

事实上，关于马基雅维利对 *virtù* 与机运之关系的看法，我们得出了一种相当合乎逻辑的理解，因为机运的轮盘——与一个人的孕育其 *virtù* 的个性不同——滚滚向前，永不停歇。如果一个人有一半的可能去决定自己的命运——比如说，在玩轮盘赌时——那么，他仍然迟早会失去一切。例如，关于朱利叶斯二世取得的令人瞩目的一连串成功，马基雅维利写道：

于是朱里奥以迅猛的行动完成了一项事业，这是任

何其他一个教皇以人间最高的深谋远虑都不能成功地做出的……。他的生命短促使他没有相反的经历；因为，如果时光流转到了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毁灭了。³⁹

马基雅维利试图通过创造集体 *virtù* 来解决这个问题，人民具备这种品质之后，通过运用他们的集体能力，就可以自己转动轮盘，依照环境和形势的需要改换领导人。正是大众的这种无情，而不是君主的冷酷，才可以挽救国家。例如，戴高乐将军之所以成为在阿尔及利亚造就和平的领导人，恰恰是因为只有他可以实现大众的这个无情愿望：放弃法国对“黑脚丫们”（the *pieds noirs*）* 的承诺。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这种例子。杰拉尔德·福特本来是水门事件的创伤之后为总统职位重建正直感的恰当人选；他的同时代人们相信他会加速理查德·尼克松的离开。但是，他与华盛顿当局的密切联系使得公众拒绝了他，转而支持一位局外人、佐治亚州前州长吉米·卡特；卡特不仅显示出诚实可靠，而且在获得权力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大众极其厌恶的党派腐败污点。但如果说卡特是为总统职位恢复荣誉的合适之选的话，他却不是率领国家应对苏联咄咄逼人之态势的恰当之人，这或许是因为他对暴力的敌视。相反，像罗纳德·里根这样老练的雄辩家之所以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缓和措施使自己，

* “黑脚丫”意指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译者注

或者大众，或者苏联卸掉了重压。

《君主论》第26章夸夸其谈地敦促解放意大利，

显得与本书其他部分极不相称

费里克斯·吉尔伯特曾经指出，“在马基雅维利的所有著作中，没有哪个像《君主论》这样得到如此多的评论，而且在《君主论》的所有章节中，没有哪章像最后一章这样得到如此多的讨论”，他把这一章描述为“暗示性的、令人困惑的和难以捉摸的”。⁴⁰在《君主论》最后一章，马基雅维利——如同在献词中一样——直接向洛伦佐·德·梅迪奇讲话。他有点荒唐地暗示，洛伦佐就是那个将把意大利从法国和西班牙这些“蛮族”手中解放出来之人。在与本书其他部分放在一起考察时，这一章——哈维·曼斯菲尔德称之为“意大利爱国主义的突然迸发”——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反常的；在前面诸章就事论事的风格与最后一章的极富感情色彩——它用彼得拉克的诗歌《我的意大利》中的句子结尾——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对阿兰·吉尔伯特（Alan Gilbert）来说，这一章说明了马基雅维利为残酷、背叛和欺诈进行辩护的原因：只要能够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任何政府形式和任何行动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类似地，有人曾经宣称，《君主论》最后一章与下面这种看法相矛盾：马基雅维利是一位超然的、科学的事件观察者，遵循客观的技术而且不带政治感情（这使他能够既为梅迪奇家族服务也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服务）。⁴¹

有人暗示，这一章是在其他部分完成两年后加上去的，回应的是朱利亚诺之死所造成的洛伦佐地位的变化和法国于1515年8月初的入侵。⁴²也有人指出，这一章与本书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应该被看作不过是一种纯粹修辞性的、人文主义的夸夸其谈。现今最常见的一种解读是——更有可能的是——这一章是附加上去的，是对接受者的献媚，以换取对作者的任用。*

实际上，列奥·施特劳斯也识别出了最后一章与其他部分之间的这条裂缝：

因而，《君主论》的最后一章，其实是一个对于效仿的吁请，是一个对于在当代意大利境内对古代的巅峰业绩实行最辉煌的效仿所发出的吁请，然而，与此同时，《君主论》总的学说……却恰恰是任何效仿的对立面，无论这个效仿多么完美都是如此；当代意大利所可能产生的最辉煌的功业，在于对古代所已经产生过的最辉煌功业的效仿，然而与此同时，当代意大利所可能产生的最辉煌的理论成就，却是“全新的”。⁴³

*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基雅维利拒绝了雇佣兵队长普洛斯彼罗·科隆纳主动提供的秘书肥差，同样也拒绝了出任拉古萨共和国大法官的邀请；尽管在那段时间，除了写作《佛罗伦萨史》获得了微薄佣金外，他长期失业。

但是，如果按照我所指出的思路——如果我们把《君主论》看作一部宪政专著，而且把它看作与《论李维》一起构成了一部更大的专著《论国家》；这部宏大著作提出了一种服务于国家的伦理学；它依据领导人对共同善的贡献（与君主的个人获益相对立）来评判他们的成功；它赞同共和主义和法治，因为它们最有可能促进共同善——来看待前面几个命题的话，第五个所谓悖论也是不成立的。在意大利中部创立一个统一的、新型国家，不是本书的目标，但它也不是多余的：它是本书论证的高潮。并不是说前面诸章提出的各种方法服务于这个民族主义理想，毋宁说，这样一个国家是产生一种服务于共同善的政治统治方式的通道。这种解读与古典修辞学以行动号召作为论证高潮的结构相符合。 148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君主论》写于创立一个意大利君主国——一种“新的”宪政秩序——的三次机会中的第二次期间。⁴⁴第一次机会出现于1502年，教皇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试图从教皇俸地罗马涅地区为自己的家族创立一个封建王朝式公国；第二次出现于1513年，当时看上去教皇里奥十世极有可能把教皇国和佛罗伦萨及其领地统一在一起，建立一个由教皇的兄弟朱利亚诺·德·梅迪奇统治的国家；第三次出现于1520年，当时另一个梅迪奇教皇克莱门特七世试图重启创立一个世袭性梅迪奇王国的计划。⁴⁵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为何在1513年突然停止他关于《论李维》的写作，以及《君主论》最初是写给朱利亚诺的原因。这也是为何他在1520年呼吁梅迪奇家族启动把佛罗伦萨转变为一个共和国的

原因。正是这种促成了《君主论》诞生的机会的刺激，以及背后的现代国家概念——马基雅维利是这种概念的预言家和赞美家——为本书第 26 章提供了支撑。⁴⁶

注意到这个事实是很有帮助的：《君主论》是写给“新”君主的——那些不能依赖朝代性法律基础为其提供合法性的君主。梅迪奇家族或许已经成为一个“新”王朝；然而他们不具备世袭性统治合法性。在《君主论》使用“新”这个词的意义上，波吉亚王朝或许也是一个“新”王朝。但是，在这些合法性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新的”宪政秩序问题：需要一个单一的创建者的君主国——因此，《君主论》广泛地讨论了摩西、罗慕卢斯、忒修斯和居鲁士等所有宪政创建者们。正如列奥·施特劳斯对第 26 章的评注所说的，“意大利的解放者被描述为一位新的君主，因为解放意大利的先决条件，将是引入新的法律和新的秩序——他必须为意大利做出摩西为以色列人所曾经做过的那种业绩。”⁴⁷ 类似地，认识到在前面各章中切萨雷·波吉亚并不是这种新君主的唯一模
149 范，也是很有帮助的。在第 21 章，马基雅维利在讨论阿拉贡的费迪南德时指出，他或许：

可以称作一位“新”君主，因为他凭借自己的盛名与光荣，从一个弱小的君主，一跃而为基督教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国王。如果注意观察他的行动，将会看到它们全部都是雄心勃勃的，而且其中有些是卓越非凡的……他依靠教

会和人民的金钱得以维持他的军队，并且在（与摩尔人）长期的战争中，给他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而这支武装力量一直给他带来荣誉。

也就是说，费迪南德为西班牙做到了马基雅维利希望切萨雷·波吉亚为罗马涅做的事情，而且做到了他在第 26 章奉劝“救世者”为意大利所做的事情。但是，马基雅维利也非常明确地指出，虽然创建一个新国家需要一位创始人，一位具有 *virtù* 的人，但维持这样一个国家需要的却是共和政体。他分别在 1520 年和 1522 年为佛罗伦萨拟定的宪法，就是他的伟大的、未被承认的专著《论国家》的直接产物，这部著作包含两个部分，分别是《君主论》和《论李维》。

* * * * *

那么，马基雅维利自己的 *virtù* 又是什么呢？是这种 *virtù* 使得他能够剪裁自己的理念以及对它们的倡议来适应时代需要吗？并非如此。如我们在第七章最后部分看到的，他所处时代的智识与道德氛围更适合维托里和圭恰迪尼。实际上，马基雅维利与他的同时代人步调极不协调，以至于在他还在世时就被称作“撒旦式的恶魔”。

马基雅维利与他的时代极不协调——因此他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掌控机运女神的“伟大人物”——这个事实与他的天分有着密切

关系，他看到了出现一种新的宪政秩序——现代国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尽管他的活动受困于垂死的封建王国的各种预期和制度之中。引人注目的是，预示着这种死亡的三部伟大著作——莫尔的
150 《乌托邦》、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都是创作于1513年。自他逝世后，在五个多世纪的国家演变过程中，正是他的洞见，而不是他的大师级表演——包括他的极富煽动性的预演（aperçus）——赋予了他持久的（而且可能是不断增加的）影响力，并且确定了他的当代相关性。

撒旦的神学家

结语

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有时我想，我天生的 151
不受个人情感影响和客观性的品质，以及为了保护
它的基本价值而对它的——局部的——牺牲，具有
某种史诗般的壮美。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写给他女儿

“Scottie”的信，1940¹

如果忽视马基雅维利人生与著作中的宪政维度，那么我们今天将无法从其伟大著作中获益。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能比马基雅维利对其时代出现一种新宪政秩序的洞见更为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正要经历这种历史现象的重演。

现在，我们不再生活于君主国之下（尽管还存在这种形式的一

些残余，甚至还有个别的例外，如文莱)。我们生活在工业民族国家，这种宪政秩序发端于 19 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和德国，而且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取代了自 18 世纪末开始主导欧洲和世界的帝制的国家—民族。

152 宪政秩序的标志是它对合法性的声明。民族国家说，赋予我们权力，我们将改善你们的物质福利。劳埃德·乔治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过这些话，弗拉迪米尔·列宁和阿道夫·希特勒也说过这样的话，因为他们都是同一种基本国家形式的领导人（尽管他们对如何实现这个承诺各有不同的理念）。工业民族国家的宪政秩序为我们带来了免费的大众教育、授予无财产的男性和女性以投票权的大众参政权、养老金和失业保障金、科学公共基金、类似航空公司铁路公司和通信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以及针对民族的大规模战争。我们在民族国家中已经生活如此之久，以致逐渐忘记了民族并不等同于国家；事实上，某些民族——库尔德人、巴勒斯坦人、切罗基人——并没有自己的国家。马基雅维利提醒道，我们并非一向生活在现代国家之中，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自 1648 年起——像许多未经思考的主张所宣称的——就已经生活在当前的民族国家形式之中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相信，封建制之后已知的唯一宪政秩序是民族国家，那么我们将很难认同这种观点，即当前的宪政秩序正在逐渐衰落，或者一种新的宪政秩序正在出现。相反，我们更可能认为，唯一的替代方案是：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是虚幻的；或者国家本身行将消亡——一种最不可能的事件。但是如果认

识到，历史车轮的旋转——这将导致一种宪政秩序的终结并且用另一种秩序来取代前者——仅仅是一次向文艺复兴时代回归的新近重
复，我们或许就会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变化变得更加敏感。

这些变化包括：一个阻止任何民族国家垄断其文化的全球性
沟通体系，它能渗透至每一个社会共同体并激活其中的社会网络技
术；一个阻止任何国家完全控制其国民经济的全球性国际贸易与金
融系统，它也导致了每个国家逐渐增加的脆弱性，这产生于对国家
金融行为起评估作用的市场所做的决定；一个优先于任何国家法
(national laws) 的国际人权体系，近来这已经成为在国际法庭起诉
民选领导人和独裁者们的依据，它也使得可以合法地对一个并没有
对他国造成威胁而只是对本国人民表现出屠杀倾向的国家进行武装
打击；像 AIDS、SARS、气候变化、全球性非国家形式的恐怖主义
这类跨国性危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其外或者靠一己之力阻止
它们；最后，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商品化，它们的一些关键部
件能够在黑市上买到或交换到（例如 A. Q. Khan 公司使巴基斯坦
核武器工厂得以创建的各种手段），或者可以简单地通过互联网进
行下载（例如把鼠痘转变为人病原体的技术信息）。 153

在 21 世纪初的今天，我们仍生活在民族国家之中，它们的合
法性使命——改善我们的物质福利——依旧界定着当代国家。然而
这个使命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而且大众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几
乎没有当代的民族群体——除了像巴勒斯坦人、泰米尔人和巴斯克
人这种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之外——在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去

寻求成就感。民族国家越来越难以行使它在取代国家—民族时在自己的职能表上所增加的那些功能：不仅在维持能够确保其公民实际安全的耗资巨大的工业战争机器方面，而且在借助选民之间的商谈来维持公民秩序、体现单一民族道德传统的司法规范的执行、为了使所有阶层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而对社会经济加以控制——这种控制已经让渡给了市场——以及一个经由政府授权而不断扩展的物质福利范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这些权利剧增所带来的成本，政府财政越来越难以为继。

正如英国政治家道格拉斯·赫德（Douglas Hurd）所指出的：

154 世界是以某种悖论的方式运行的，一方面，基本的忠诚对象仍旧是民族国家，而且世界上存在接近 200 个这样的国家。另一方面，无论哪个民族国家，即使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也无法单枪匹马确保其公民所要求的安全、繁荣和适宜的环境。

然而，这些困难并非预示着国家的终结，即使民族国家的宪政秩序将让位于一种新的（宪政）形式；毋宁说，国家将会通过调整它与大众进行协商的条款来重新界定承诺，以便达到维持其合法性的目的。那么，新的宪政秩序会是什么样子呢？

杰出的外交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把这种新形式称作“后现代国家”。依据非常相似的理路，也有人

称之为“市场国家”。何谓市场国家？

一种定义指出，“正在出现的宪政秩序承诺为其人民创造最大化的机会，趋向于把许多国家活动私人化，并且使代议制政府对消费者承担更多责任。这与当前的民族国家——20 世纪占支配地位的宪政秩序，其合法性奠基于承诺去改善其人民的物质福利——形成了鲜明对照”。正如“2005 荷兰皇家壳牌公司远景”（the 2005 Royal Dutch Shell Scenarios）所指出的：

从民族国家向市场国家的逐渐转型，意味着需要重新界定国家的基本承诺：从民族福利的最大化转变为市民社会和公民的机会最大化。处于发达的市场民主中的国家，并不是依据其对抗市场力量的能力——如不久前欧洲所出现的情况——来界定其自身的成功，而是依据其促进市场扩张以（供应）范围广大的公共……利益的能力。

这样的国家依赖于国际资本市场以及——在相对较少的程度上——现代跨国贸易网络，需要它们与民族或超民族的政治实体协力去创造世界经济的稳定性。这种国家政治制度的代议性要比民族国家低（尽管在某些方面更为民主）。与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所展望的优雅的选举代议制度或者罗斯福和约翰逊的大众竞选运动相比，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the Open Markets Committee of the Federal Reserve）和公民电子投票（现象的两个极端）更是市场国

家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与民族国家相似，市场国家依据其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与服务的能力来评价其经济的成功与失败；但与民族国家不同的是，它把国家仅仅看作最小的供应者或再分配者。如果说华盛顿和拿破仑是帝制国家—民族的总建筑师的话，林肯和俾斯麦则是工业民族国家的首创者。民族国家针对市场来确定其活动：它不信任市场，而且寻求掌控市场。因此，林肯在 1863 年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而且不到 20 年后俾斯麦提出了一个老年人社会保障和伤残保险的计划。与此相对照，市场国家利用市场和市场机制来管理其活动。民族国家通过成为维持人民（民族）福利的工具来证成自身；而市场国家为了最大化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享受的机会而存在，而且承认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好地利用这些机会，从而必然导致不断加大的不平等。对民族国家来说，本国货币是交易媒介；而对市场国家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商品。对工作机会来说大致也是如此：对于民族国家，充分就业是一个重要的而且常常是首要的目标；而对于市场国家，人民实际就业人数对于创造经济机会来说只不过是变量之一，而且并不具备高于一切的内在意义。如果人民大量失业更有效率——因为为这些人提供工作岗位去完成市场并不怎么需要的任务，社会耗费的代价会更大——的话，那么社会就会接受大量的失业人口。

156 市场国家是无阶级的，而且对人种、种族、性别和性取向采取中立立场；它的评价标准是可量化指标。实际上，比起民族国家来，市场国家对于所有社会来说，在文化上的可行性要大得多；传播其

信息的统计资料和媒体影像，并不需要读者精通任何具体的自然语言。如果说民族国家的特征在于法治的话，市场国家很大程度上对正义规范漠不关心，或者说，就这一点而言，只要法律不妨碍经济竞争，市场国家就对任何特定的道德价值组合毫不关心。由于市场国家也毫不在意忠诚，尊敬牺牲、政治能力、隐私和家庭的价值，因此，它们对市民社会提出了一个重大挑战：或者是这些价值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必须得到支持，或者是我们将以市场的价值来取代它们，而市场很大程度上看起来是赞扬娱乐和积累财富的。

人们已经能够看到，市场国家宪政秩序的一些要素正在进入当前国家的实践之中。国家从依赖法律法规——民族国家的典型特征——正在转变为不仅撤销对工业的管制，而且更要的是，撤销对妇女生育的管制；如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几个最强大的国家所做的那样，国家从征兵转变为完全由志愿者组建军队；国家结束它们的高等教育免费政策，实行额外收费与择优为本的奖学金相结合的政策；我们从直接现金补偿——像失业救济和工人抚恤之类的事项——转变为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工作训练和技能；主权财富基金取代国有企业；像普选、罢免投票和选民倡议这样的直接民主制度，开始优先于代议系统来扩张——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都注意到了宪政秩序发生变化的开端。市场国家说：赋予我们权力，我们将使你的机会最大化（你怎么利用它，完全取决于你）。

这不仅会对我们的政治带来更多的抱怨，因为不同的群体会感到政府抛弃了他们，或者背叛了他们的价值；²而且这也将导致这个

问题：更加难以使这些国家的大众会为了一个不再捍卫其文化价值的国家的利益，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和未来。通过忠诚于基本价值凝聚而成的单一政体感，是市场国家所无法培育的。然而，这种文化上的漠不关心，确实使市场国家成为文化多元主义的理想环境。经过帝制国家—民族的经营，国家试图把民族加固为一个整体。在民族国家时代，国家担负着为各个群体提供福利的责任。而在市场国家中，国家的责任是最大化个体所能获得的选择机会。这意味着减少了个体选择的交易成本，而且有时意味着抑制而不是加强政府。因此，我们看到了像建议缩减政府从 GDP 中抽取的百分比这样的措施；也看到了法院推翻种族优待的纠正歧视行动计划，或者限制联邦为了无人会反对的目标（例如，学校禁枪）而管制商业的权力，而且否決了某些刑事制裁（像那些针对避孕或堕胎或同性恋的制裁）。与此同时，最大化公民的机会也可以意味着扩张政府的权力，使它们能够维持目前很大程度上由私人掌握的基础设施——既包括像互联网这样的有形物，也包括像健康和教育这样的无形物；而且使它们能够在潜在地无法更改的事态——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民族大屠杀、致命性传染病的出现——必须被加以阻止时进行境外干涉。

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一次以“欧洲的未来”为主题的会议上，主发言人一开始就断言：“欧洲没有未来。过去 60 年的后现代整合是一次为了适应特定的历史环境而进行的一场实验，但这些环境已不再有效……
158 因此，欧洲将返回到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的民族国家。”他接着指

出，曾经导致欧洲整合的基本条件——对法德和解的需要、共产主义的威胁、德国的分裂以及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承诺——现在都不相关了，因此，在欧洲有着“300 多年生命力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在将重申自己的主张。

只可惜欧洲并没有 300 多年的民族国家历史，而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没有开创如这位发言人所讲的“用教会的外部权力换来了国家安全”的民族国家。^{*} 实际上，这种交换的发生时间要早得多，《奥格斯堡和约》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它确立了本地统治者能够决定其臣民的宗教忠诚——新教或天主教——的原则。

《奥格斯堡和约》令君主国的卓越成就彪炳千秋，而君主国的杰出政治哲学家就是马基雅维利。他给我们的教训是，欧洲和世界除了 20 世纪的工业民族国家外，还经历了许多种宪政秩序。这种教训会打破桎梏着我们思想的单一宪政秩序神话，这个神话已经对政治想象产生了一种瘫痪性影响。正是由于这位发言人无法想象任何对于民族国家的替代物，因此他不得不假定要么欧洲必须成为一个横跨整个大陆的超民族国家（布鲁塞尔许多人所深爱的“欧洲合众国”），要么它必须回复到它曾经试图加以整合的普通民族国家状态。

此处，马基雅维利是最为相关的，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去想象新的宪政秩序，例如欧盟、美国和中国正在飞速转变成的市场国家。与 16 世纪的君主国一样——实际上，像所有后来的宪政秩序一样，

^{*} 勉强可以说是引自罗伯特·库珀。

159 市场国家作为对战略环境变化的一种回应，正在成为现实；而且与之前的宪政秩序一样，它进而将使这个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市场国家不只是“超民族的”，实际上更是去中心化的、网络化的，拥有全球利益，并且通过利用（而非拒绝）市场来维持国家合法性。

在市场国家中，媒体与政府形成直接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媒体往往会取得成功，因为它们已经市场活动中得到了训练，要比受程序性规则所束缚的官僚机构更为灵活，善于迅速辨别民众倾向，能够把巨额资本和不断巩固的权力聚集于几个媒体帝国手中，而且是当代信息交换技术与公共关系技巧（遗憾的是，也包括对个人信息的收集）的最高超运用者——在这一点上远超过政治家们。最后，在许多国家，媒体受法规和宪法修正案的保护，因此摆脱了许多约束着政府官员们的法律与政治限制。

事实上，人们可以说，向市场国家的转变所产生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信息媒体权力的极大增加。考虑到英语世界普遍出现的报纸和杂志明显无法逆转的溃败，这看上去或许有些出乎意料；但如果我们认识到，正在出现的宪政秩序是一个信息性秩序——正如其正在取代的秩序是一个工业性秩序一样——那么，这一点就不会那么令人困惑了。虽然传统的信息载体正在衰落，但就是这些毁灭它们的力量正在创造无数新的更易利用、更为廉价的信息源。随着民意——通过民意调查、投票、选民创制以及其他途径——在治理中扮演更为紧要的角色，媒体指挥大众的权力也随之增强。人民的心声即传媒的声音（*Vox populi, vox rumoris*），而且感谢海量的互联

网“出版物”；反之，亦是如此。

在市场国家中，媒体的竞争性、批判性功能类似于民族国家中左翼政党的功能。左翼一直是立宪政府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指 160
摘、抨击、质疑现状。当然，左翼也寻求执政，但即使左翼政党掌权时，它们也常常迅速向中间立场转变，吸收右翼的观点，或者被右翼吸收。现在，虽然左翼在市场国家中名誉扫地，但它的竞争性功能已经被媒体所继承。

马基雅维利或许会赞成这种发展，因为他在佛罗伦萨热切地为公共监督者寻求这种类似于罗马共和国中的护民官的角色。这些护民官代表着平民的利益。³ 他们能够否决罗马元老院通过的决议，并且事实上撤销某个以不利于穷人的方式分配利益的方案。当然，媒体是否会事实上充当未被代表者的护民官，还需要观察。

面对这种历史性变化——这种滔天巨变大约每个世纪只有一次——我们不可能指望马基雅维利的指导，但是我们可以接受他的警告。正是由于他的同代人没有意识到君主国时代的来临，才注定了意大利受外国的控制。在我们这里，威胁我们的并不是外国的霸权——虽然我们已经如此地习惯于用这些术语思考，以致我们无休无止地在我们的视野内审视，寻找潜在的竞争者——而是内部的瓦解和对我们自己制度的厌恶。或许有人会说，这正好与马基雅维利和佛罗伦萨在 15 世纪末所面临的情况相反。然而，这也是一种与我们的伟大前辈的共鸣（虽然是一种不谐和的共鸣）。

然而，虽然并不是这些与当代生活的重要共鸣维持着马基雅维利

这个名字的鲜活性——以及把他作为撒旦神学家的错误形象——但它们与他之于我们的持久吸引力并不是不相关的。这是因为，尽管宪政秩序的变革极为少见，但我们对国家有着持续且强烈的兴趣，而且我们对它的恐惧和怀疑与对它的希望一样多。

161 马基雅维利在大众头脑中的印象，加剧了这种复杂的情感。传奇的马基雅维利似乎预见到了这种不断释放的、存在主义的绝望，它出现于人们意识到“一切都是许可的”而且许多人认为上帝已死——即使他们就生活在基督教世界或宗派世界——之时。那种把马基雅维利当作魔鬼——“老尼克”（Old Nick）——的描述，也对我们具有某种磁铁般的吸引力，毕竟，如强烈谴责马基雅维利的弥尔顿所言，他为撒旦提供了最佳辩解（实际上，其中大多数看起来出自《君主论》）。

然而，马基雅维利是一位深刻的伦理作家。比起他的建议的工具性价值来，这个事实更能解释他的这种强烈的坚持：我们要按照世界的真实面目来看待它，而不对它加以伪装，以免由于按照我们的陈词滥调行动而造成对大众的伤害。我们需要他的洞见，因为他针对我们的幻觉加以当头棒喝。然而反讽的是，我们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正是他的欺骗命运——最大的幻觉——的名声。

马基雅维利的建议对政治家们的教训是：不要欺骗你自己。困扰并挫败马基雅维利的正是他的同时代人们愿意佯称，按照几个非常简单的程式来做，就能实现符合共同利益的统治任务：“君主应该言出必行”，“君主应该慷慨大方地运用他的财富”，“君主应该宽

厚仁和，而且应该总是践行仁政”。人们可以看到，他急迫地想要做到以下几点：解释西庇阿对反叛者的饶恕并不是真正的仁慈，因为这导致了进一步的反叛而且需要更加严厉的镇压；⁴ 指责那些为了获得慷慨之美名的君主们不得不对其臣民横征暴敛，并且最终被迫变得更为吝啬，而若不去搏此虚名，也不至于此；⁵ 暗示君主在代表大众利益行动时，遵守那些自己之前不明智地订立的约定，并不总是符合他们的利益。⁶ 人们只需留意一下日常事件中的那些一厢情愿的想法和严重的公共不成熟——随便翻开一家著名报纸的社论版，或许就能有所发现——就会明白，自马基雅维利的时代以来，162 这个方面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思考问题，即认为对它的解决也应该运用那些过去为我们带来成功的方法，是一个常见的错误——或许我们应该称之为索德里尼谬误。一个迄今一直是通过与他人讲道理来实现其目标的人，很可能会倾向于认为他的所有对手都是通情达理的；一个成功的辩护律师会认为审判是威吓恐怖分子的唯一方法；而一位退伍军人会认为经过验证是可取的福利手段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随机性的命运华尔兹总是对社会大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相信，只要他们能够移动得更快，胳膊伸展得更长，他们就能够掌握未来，使其服从他们的目标，并且远离过去的负担沉重的轨道。相反，马基雅维利对我们的忠告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并勇于面对不愉快的局面。

他的人生验证了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的思想受到忽视或者被同化为你的同时代人的那些思想，以至于真正新的且具有启发性的

思想遭到误解或者歪曲，以符合潜在于当时的政治正统观念之下的流俗之见，那么，你对此不必感到震惊。

本书始于一种或许有些学究气的讨论，即让蒂耶这位严肃的学者和有天分的语言学家——尽管或许有些平庸——是如何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的一代一代人如何想象马基雅维利。如电影剧本所说的，⁷ 他是一个努力毁灭某个大人物的小人物。关于《君主论》，今天的大学生们一定会比之前的各代人——他们是让蒂耶的巧妙的剪裁术的继承人——获得一种理解更加充分的观点。我想，我们必须深信未来的学者们一定会从各种曲解谬见中寻觅出真相。或许这就是我从事这项研究的一个动机，因为“撒旦的神学家”这种称号事实上完全不适用马基雅维利；在《阿喀琉斯之盾》的一位批评者看来，它适用于我！

163 我有时真的担心，马基雅维利对国家——他的治国之道意在服务于它——的研究所获得的真知灼见，的确不能为未来所用。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他的策略性建议，那么如我的同事桑福德·莱文森（Sanford Levinson）所指出的，每个成功的国家都在进行自我确认（self-validating）。这样，纳粹国家与它试图毁灭的议会民主制国家就是同样合法的。^{*} 这触及到了理解马基雅维利事业的宪政本质的

^{*} 事实上，法西斯独裁者的事例促使许多读者去研究马基雅维利，这或许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就是“纯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教义”的反映。参见 A. P. d' Entreves 对 Chabod 的《马基雅维利与文艺复兴》一书所作的导言。

根本重要性，因为这种视角清楚地表明，国家的本质——它对依据法律涵盖所有阶级和群体的共同的、公共利益的承诺——就是使国家配得上马基雅维利认为它应得的那种忠诚的东西。⁸ 结果确实重要，但并不恰好是任何结果都会证成任何手段。

本书的结束语必然属于马基雅维利。在文艺复兴期间最著名的的一封信——他写给维托里的信——的最著名的一段话中，描述了他遭到驱逐之后的乡村生活：

我现在生活在我的农庄里，自从我遭受了最后一次不幸后，我待在佛罗伦萨的日子总共不到二十天……早上我日出而作，然后去我正在让人砍伐的一片森林。我在那里逗留几小时，巡视前天的工作，和伐木工一起消磨一段时间，他们总有一些现成的不幸故事，要么说他们自己，要么说他们的邻居……离开小树林，我就去泉边，然后去几处我布置了鸟网的地方。我在胳膊下夹几本书，或是但丁的，或是彼特拉克的，或是某个二流诗人的，诸如提布鲁斯、奥维德等类。我读着他们的爱情，想着自己的，这些遐想让我得到片刻的快乐。然后，我顺路走向客栈，跟过路的人聊天，问问他们村子里有什么新闻，听听五花八门的事情。我观察人类，观察他们形形色色的爱好和幻想。在这之后，就该吃饭了。我和家人吃一些这个贫瘠的农场和我微薄的家产所能提供的食物。吃完以后，我就回到客栈，那里有

164

店主，通常还有一个屠户、一个磨坊主、两个烧窑工。在一天余下的时光里，我和他们在一起，自甘下流，玩牌下棋。这些游戏造成了数不清的争吵和无休止的谩骂……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了沾满尘土的白天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宫廷，受到他们的热心款待；我在只属于我的精神食粮中汲取营养，这是我天生就适于食用的。在那里，我毫无顾忌地和他们交谈，问他们出于什么动机而做出那些行动，他们亲切地回答我的问题。在四个钟头里，我丝毫不感不到疲倦，我忘记了一切烦恼，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完全被他们迷住了。但丁说过，已知道的东西不等于学问，除非把它记录下来；他们的谈话对我大有助益，我记下了一切，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君主论》。在这本书里，我尽我所能专研这个主题，探讨君主国是什么，它们有哪些类型，如何获得，如何维持以及为何丧失。*

* 这一大段话的译文完全出自《马基雅维利全集·书信集·下》，段保良译。——译者注

看起来，同意就马基雅维利的名著《君主论》写一本小书，多少有些荒唐。 181

首先，《君主论》本身就是一部小篇幅著作，而且是以简洁易读的风格写成的。它不需要总结概括，这种画蛇添足只会事与愿违地损害这部名著的简洁性。

其次，已经有昆廷·斯金纳的一本卓越的小书描述了《君主论》的论证、历史背景和哲学观点，书名就叫作《马基雅维利》；而且还有莫里奇奥·维罗里的一本篇幅更小因而不得不在全面性方面有所牺牲的优秀著作《怎样阅读马基雅维利》(*How to Read Machiavelli*)。

最后，这本书是受托之作，与其他九本书构成一个系列，而且这些作者都是非常杰出的学者，他们都按时交稿了。我为我未能及

时交稿，从而可能导致延迟了这些书的出版或者在某个方面损害了这个我有幸加入的非常成功的系列，而感到羞愧。但是这个出版计划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基雅维利的研究学者们将很快认识到，我对他的著作的几乎所有引用和引文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无论我的读者是否被我的论述所说服，他们都不会认为它依赖于很少人知道的资料来源。虽然在每一个论证节点我都尽力不去引用其他参考文献，基本上都是引自《论李维》，但也从马基雅维利的信件和戏剧中引用能够证明我的观点的部分。然而，这对我当初承诺撰写182 的那种篇幅的著作来说是不可能的。无疑，有些读者会对这一点表示欢迎，但它依旧困扰着我。

在大西洋出版公司的出版商托比·芒迪要求我写一本关于《君主论》的小书时，我坦陈自己早就想写一本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书，但我并没有给出原因。或许在我动手去写它时，我也还没有真正搞清楚自己的想法。确实，我当时想更为详尽地处理一下一些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主张和自己在之前几本书中对马基雅维利的阐释。但或许不止于此。

对于注意本书注释的细心读者来说，很快就会发现，我对马基雅维利的重现，简直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所谓的每一个作者都在创造他自己的初期形式的例证。我在《阿喀琉斯之盾》中提出的，取代封建秩序并且早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前一个世纪就开启了现代国家时代的宪政秩序理念，以及对那本书极为重要的战略与法律之间的“场域”关系理念，还有构成《恐怖与同意》一

个重要要素的公共领导人必须承担“后果论义务”的理念，都是这样一个创造过程的实例。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一生先后做过官员、剧作家和法学家。在每一个角色中，他都展现出一种真实地描述生活的罕见能力，客观全面地呈现它的矛盾和复杂性、它的历史性决定因素和未曾预料的命运转折。更可贵的是他承受那些逆境的能力，巍然屹立于现代欧洲诞生之前的封建板块的位移和裂变时代。

作为一名官员，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把足够的权力将他的观点加诸他所服务的执政团成员。在索德里尼倒台——这部分源于索德里尼不愿接受他的建议——后，马基雅维利被从官衙扫地出门，在这里，他作为佛罗伦萨秘书工作了14年之久，而且他所服务的共和国实际上被梅迪奇家族推翻了。马基雅维利相信《君主论》会向佛罗伦萨复辟的统治者说明，他们如何能把这个他们正在创建的、除名称外全新的君主国加以合法化，而且他也希望这个说明能使他官复原职。对那些从未在政府任职的人来说，或许难以相信一个正直的人可以去充当两面派——共和派和君主派。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马基雅维利相信——这有充分的依据——他对佛罗伦萨情况的理解要比其他许多人好得多，而且如果在野的话，他就不能为他所深爱的城市有所贡献，那么，我们或许就会多一些同情。

183

出于偶然的机会，马基雅维利成为一名剧作家。在《君主论》没有引起梅迪奇家族重新起用他的兴趣的情况下，马基雅维利转向一种全新的创作体裁，创作了《曼陀罗》这样一部讽刺喜剧。但他

并没有假装创作剧本是他首选的人生工作。¹

然而，无需怀疑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创作戏剧方面具有高超的水准；《曼陀罗》就是一部喜剧名作，跻身于意大利戏剧界的最伟大作品之列。使马基雅维利作为剧作家扬名的是他剧中人物的丰满性。与莎士比亚相比，马基雅维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抛掉了塑造完全冷漠无情的恶棍和完美无瑕的英雄的创作方式，而是使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服从于人类的愚蠢，而且每一个人物都会对他们的窘境做出令其懊悔的判断。²除了这种情景性反讽，马基雅维利还运用了戏剧性反讽（例如，《曼陀罗》）的关键就在于一位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愚蠢地未能识破一场别人试图勾引他年轻妻子的阴谋，而观众对此心知肚明），而且随着每个人物暴露出与我们期望相反的堕落，对话中也添加了喜剧性反讽（例如，正是这位化装成医生的修士，说服了丈夫为了生一个子嗣而去牺牲一个无辜的人；而正是这位虔诚善良的妻子，被勉强说服允许一个陌生人上她的床，接着又说服自己相信这种形势变化是神所安排的，因而应该加以实现）。

184 维多利亚·卡恩的评论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马基雅维利的反讽并不是仅仅在于说东指西；而更多的是常常在描述一种想要同时拥抱这两种可能性的态度”。³

马基雅维利的父亲伯纳德被培养成一名律师，而且是律师行会——佛罗伦萨的一个有声望且有权势的群体——的一名成员。尽管尼科洛没有追随其父进入法律界——他父亲可能已经被禁止从事律师业务，原因是拖欠市政债务，而且这也会阻碍后代从事律师行

业⁴——但马基雅维利的大部分法理学具有律师的特征。他的基本理念——道德自主不同于（也并不必然高于）统治事业——就是一种律师特有的理念，而且无疑也是律师受到普遍敌视的一个缘由。例如，马基雅维利对 *ragionare* 这个词的使用最好被翻译为“合理化”（*rationalizing*）——从提供理由的意义上来讲——而不是推理（*reasoning*）；⁵ 而且，这同样是律师和法官的一个特征，为了使某一规则的运用合法化，他们必须解释应用它的原因，而非说明某个规则用途（参考政治活动，或者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倾向）的意愿。⁶ 对辩护律师来说，是委托人的困境引发了行动，而且这就是马基雅维利对上帝的绝对必然性和机运女神的反复无常造成的限制的宪政解决方案的范式。正是冲突——这是想要勇敢面对限制所产生的结果——激发了马基雅维利的宪政提议，不仅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为他的方案提供根据。

马基雅维利的三种生活经历也令我深感兴趣，因为我自己的职业生活——相对来说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也经历了学院、政府和写字间的转换。而且最后，对我来说——对马基雅维利也是如此——最能提供安慰与鼓舞的还是朋友。

我应该对他们致敬，因为他们在如此多的方面——常常是在他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对本书做出了贡献。首先，我必须感谢我的老奥斯丁圈子——斯蒂夫和路易斯·温伯格、保罗·沃道夫、劳伦斯·赖 185 特，尤其是贝蒂·休·弗劳尔斯——对原稿做出的评论。同样感谢我伦敦的朋友们——菲利普·齐格勒、西蒙·詹金斯爵士、安东尼·史

密斯、马科斯·黑斯廷斯爵士、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特别是迈克尔·霍华德爵士——对我的支持和慷慨。

或许并不出人意料的是，我在撰写本书时还曾向外交官们寻求帮助。我要感谢彼得·韦斯特马克特爵士、汉内勋爵、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罗伯特·库珀爵士、罗夫·埃克乌、罗伯特·哈钦斯、伊沃·达尔德等大使，尤其是要感谢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从我的论题来看，我也必然受惠于宪法学家们，其中包括我30年的老同事桑福德·莱文森，以及阿希尔·阿马尔、亨利·莫娜汉、杰克·戈德史密斯和罗伯特·波斯特等教授；感谢令人尊敬的法学家迈克尔·伯丁法官和圭多·卡拉布雷西法官；感谢国际律师肯尼斯·安德森、莎拉·克里夫兰、迈克尔·里斯曼和露丝·韦奇伍德；感谢一些卸任的政府官员，其中包括我的老朋友格雷戈里·特雷弗顿、理查德·丹泽、斯蒂芬·西蒙、保罗·蒙克、埃德温·威廉森、马修·韦克斯曼，以及已故的迈克尔·昆兰爵士；感谢约翰·格雷、吉尔伯特·哈曼、丹尼斯·帕特森等哲学家，尤其是马克·塞戈夫；感谢社会批评家理查德·森尼特和迈克尔·林德；感谢历史学家玛格丽特·迈克米兰、尼奥·弗格森和罗格·路易斯；感谢外交政策分析家查尔斯·库普坎和蒂莫西·加顿·阿什；感谢包括已故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马修·德·安科纳和本杰明·维特斯等媒体人；尤其是要感谢我亲爱的编辑阿什贝尔·格林——我们最近刚刚失去了他，还要感谢编辑和出版人亨利·瑞斯；感谢经济学家约翰·威格士和詹姆斯·K. 加尔布雷思；感谢

剧作家理查德·布罗克曼；感谢诗人罗伯特·平斯基和大卫·菲利；最后，还要感谢博学多才的爱德华·宾克夫斯基，尤其是大卫·博达尼斯。而如我前面所指出的，马基雅维利的一生汇集了所有这些角色：外交官、宪法学家、公务员、哲学家，以及社会批评家、历史学家、随笔作家、剧作家和诗人。

我的才华横溢的秘书珍妮弗·拉马尔再次充当了我的著作的助产士。她的同事泰瑞·格曼尼和她的家人的精心照料，使我得以在令人愉悦的环境中工作。我还要感谢我年轻的朋友们：特拉维斯·潘丁、汤姆·施密特和温斯罗普·韦尔斯——在我撰写本书初稿时他们都是法学院的学生——以及我勤勉至极的研究助手雅各布·菲德尔曼和新任的罗布·古德曼——他们所有人的勤勉工作都对本书做出了贡献。 186

哥伦比亚法学院院长大卫·施奈泽设法为我申请到了学术休假。自我来到纽约以后，他已经成为我的忠实朋友。罗格·赫托格——他凭一己之力通过自己的建设使讨论大战略的研讨班重回大学课程体系——为一门针对哥伦比亚的大学生和法学学生开设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课程提供了支持。我勇敢无畏的朋友比尔·帕沃斯——德克萨斯大学的校长——和那里的法学院院长劳伦斯·萨格尔，以及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同事詹姆斯·施泰因伯格，都紧密协作为我的写作时间提供支持。

在大西洋出版公司，我受到了公司首席执行官托比·芒迪的温和耐心的庇护，当然还有两位勤奋的编辑，奥兰托·怀特菲尔德和

在他为了追求光辉灿烂的艺术世界而辞职后继任的善于交涉但又坚定不移的玛格丽特·施泰德。才华横溢的作家本·杜普雷也证明了自己也是当前——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技术编辑。

2012年6月30日，随着菲利普·拜恩斯·尼扎米·博比特——他的妈妈，玛雅·翁达丽科古鲁·博比特和我称他为“帕夏”——的降生，我的生活改变了。马基雅维利最温情的信件之一就是写给他的儿子圭多的；现在，我想我了解他的感受。帕夏来到的这个世界，在许多方面远好于我当时所降生的世界，而且远不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那样充满危险，但它也绝非不存在可怕的挑战。我希望帕夏有朝一日会翻阅这本书，并且通过他对马基雅维利宪政方面的思想的钻研而有所收获，因为将来他的世界中最多的不愉快之事，就是国家性质的变化所导致的，就如同马基雅维利的时代一样。或许，帕夏会在对这种演化加以塑造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最后，我感谢上帝为我带来了无以伦比的玛雅。她的温柔鼓励和无尽风趣，令我的生活充满诗意，尽管我过去曾习惯并满足于（我自己认为的）散文。我们的初次相识之地，就是一个关于《君主论》和《论李维》的研讨会，现在看起来——鉴于我欠马基雅维利如此之多——本书是最棒的回报。

菲利普·博比特

伊斯坦布尔

2013.1.1

梅迪奇家族

伟大的洛伦佐（一世）（1449—1492），佛罗伦萨统治者（1469—1492），文艺复兴时期完美的统治者，艺术的资助人，也是“国家之父”科西莫·德·梅迪奇的孙子。

朱利亚诺（1453—1478），“伟大的洛伦佐”的弟弟，在帕奇阴谋中被刺伤洛伦佐的行刺者杀害。

不幸的皮耶罗（1472—1503），“伟大的洛伦佐”的长子，从1492年开始统治佛罗伦萨，直至1494年被佛罗伦萨大众驱逐，当时法王查尔斯八世在入侵那不勒斯途中，正停留在托斯卡纳地区。

乔瓦尼（1475—1521），“伟大的洛伦佐”的二儿子，佛罗伦萨的统治者（1512—1513），1513年当选为教皇，号称里奥十世。

朱利亚诺（1479—1516），“伟大的洛伦佐”的三儿子，佛罗伦萨的统治者（1513—1516），他的统治被洛伦佐二世继承。

洛伦佐（二世）（1479—1516），皮耶罗的儿子，佛罗伦萨的统治者（1513—1519），他的继承者是朱里奥。

朱里奥（1478—1534），“伟大的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的儿子，佛罗伦萨的大主教，佛罗伦萨的统治者（1519—1523），1523年当选为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他的统治被伊普利托继承。

166 乔瓦尼·达莱·班德·内雷（1498—1526），卡特琳娜·斯福扎与乔瓦尼·德·梅迪奇（“伟大的洛伦佐”与他的弟弟朱利亚诺的堂弟）之子。班德·内雷是教皇里奥十世和克莱门特七世手下极富盛名的雇佣兵队长。

伊普利托（1511—1535），“伟大的洛伦佐”的儿子朱利亚诺的私生子，从1523到1527年，他的权威由一位摄政者红衣主教帕瑟里尼行使，当时，随着帝国军队入侵意大利，梅迪奇家族再次被佛罗伦萨大众驱逐。

亚利桑德罗（1510—1537），朱里奥的私生子，合法身份是洛伦佐二世的唯一儿子，而且伴随着梅迪奇家族的回归和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终结，他于1531年成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梅迪奇家族科西莫这一分支的最后一位男性成员，而且是唯一获得继任公爵身份的人。

教 皇

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罗德里格·波吉亚

庇护三世（1503年9月22日—10月18日），弗朗西斯科·皮科洛米尼

朱利叶斯二世（1503—1513），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

里奥十世（1513—1521），乔瓦尼·德·梅迪奇

艾德里安六世（1522—1523），艾德里安·布因思

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朱里奥·德·梅迪奇

君 主

法王查尔斯八世（1483—1498）

法王路易十二（1498—1515）

法王弗朗西斯一世（1515—1547）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86—1519）

查尔斯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8）

阿拉贡的费迪南德二世（1479—1516）

其他人物

切萨雷·波吉亚（1476—1507），瓦伦蒂诺公爵

167

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1483—1540），佛罗伦萨的政治人物
和历史学家

李维（公元前 59 年—公元 17 年），古罗马历史学家

贝纳多·卢切莱（1448—1514），佛罗伦萨贵族

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1452—1498），多明我会神父和政治
领导人

卡特琳娜·斯福扎（1463—1509），弗利的女伯爵

卢多维科·斯福扎（1452—1508），米兰公爵

皮耶罗·索德里尼（1450—1522），佛罗伦萨共和国领导人

弗朗西斯科·维托里（1474—1539），佛罗伦萨外交官

下面的内容分作两个相对应的部分，一部分是马基雅维利亲身经历的事件*，与之并列的是意大利同时期的政治与军事事件。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于1469年5月3日出生在佛罗伦萨，出生第二天在圣乔瓦尼教堂受洗。他的父亲是伯纳德·马基雅维利，一名法学博士——尽管显然是由于拖欠市政债务（这些债务可能源于他父亲和叔叔的遗产），阻碍了他加入从业律师行会。马基雅维利父子的人生见证了梅迪奇家族的支配地位、他们的垮台、复辟以及被第二次从佛罗伦萨逐出。

168

* 以下特殊字体内容为马基雅维利的亲历事件。

1434 年，科西莫·德·梅迪奇接管佛罗伦萨政府并使自己成为一个由同盟者和委托人组成的寡头集团的首脑时，伯纳德还只是一个孩子。1454 年，科西莫订立了《洛迪和平条约》，在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几个城市国家之间确定了权力均衡。教皇国、那不勒斯以及一些较小的城市也很快加入了这个条约，组成了意大利同盟。

1469 年，科西莫的继任者，他的儿子皮耶罗逝世，佛罗伦萨的统治权传到了皮耶罗的儿子洛伦佐手中，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伟大的洛伦佐”。

科西莫的权力均衡所实现的和平是他的伟大成就，而且一直延续到 1494 年；这一年，那不勒斯的新王阿方索与波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结盟，并且对米兰公国领地声索继承权利，而这个地区已于 1450 年被雇佣兵队长弗朗西斯科·斯福扎（他是《洛迪和平条约》的签署者之一）占领。斯福扎的四儿子卢多维科现在是米兰的统治者，他试图通过与法王查尔斯八世结盟来化解这种威胁，而且邀请法国人侵入意大利，许之以那不勒斯的王座。这开始了国外列强（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竞相征服意大利的历史。随后的法国入侵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随着法国军队从米兰经由托斯卡纳地区向南方的那不勒斯的进军，对佛罗伦萨构成了威胁。此时，皮耶罗·德·梅迪奇，伟大的洛伦佐的长子和佛罗伦萨的新统治者，试图通过献出比萨要塞来安抚法国人，但佛罗伦萨大众出于义愤而爆发反叛，梅迪奇家族被迫出逃。这个城市虽然名义上仍然由执行委

员会执政团来统治，但实际上处于多明我会煽动叛乱者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的影响之下。

然而，随着查尔斯八世在福尔诺沃的失败并于 1498 年逝世，法国军队随即撤出意大利。同年，佛罗伦萨成为教皇禁令的限制对象，而且萨沃纳罗拉由于他对教廷的抨击而被开除教籍；他在佛罗伦萨的统治随之垮台并遭处决。

一定程度上，由于佛罗伦萨领导权的这种变化，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被任命为第二秘书厅秘书长（大概相当于英国外交部中的副部长，或者美国制度中的副国务卿）和“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的秘书，监管外交和军事事务（或许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官员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

第二年，佛罗伦萨重新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及威尼斯结盟，反对米兰的卢多维科·斯福扎，后者现在开始寻求西班牙的保护。受其父亲教皇的保护，切萨雷·波吉亚——拥有一个法国爵位，即瓦伦蒂诺公爵——开始了在罗马涅地区的征服战争，这个地区名义上属于教廷，但实际上受地方领主或教区牧师的控制，他们的土地被称作牧师俸地。

1499 年，马基雅维利代表执政团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外交

活动，他被派去与雇佣兵队长雅各布·德·阿皮亚诺——皮翁比诺的统治者——协商，后者要求提供更多的金钱以继续佛罗伦萨对比萨的围攻。之后一年，马基雅维利的第二次外交任务是出使弗利，去说服传奇的卡特琳娜·斯福扎劝导她的长子奥塔维亚诺——一位年轻的雇佣兵队长——在不增加酬金的情况下，延长他与佛罗伦萨的契约。

在那段时间，佛罗伦萨处于皮耶罗·索德里尼的领导之下，他是一位温和的调解型人物，被大议事会所挑选的选举者们推选为正义旗手——政府首脑。他的政策是使佛罗伦萨与法国结盟，目的是维持佛罗伦萨共和国并把梅迪奇家族（以及波吉亚家族）排除在外。

1500年，马基雅维利出使里昂，就法国借给佛罗伦萨的雇佣兵的行为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与法王路易十二协商，后者曾经许诺把比萨交还给佛罗伦萨，条件是佛罗伦萨支付给法王一大笔钱，而这笔钱现在也并未支付。

1501年，马基雅维利被派往皮斯托亚，为这个内战——发生在它两个派系之间——之后的城市恢复秩序。

1502年，执政团选举索德里尼为终身的正义旗手。之前，执政团的8位成员，以及他们的首领（正义旗手）只有两个月的任期，期间他们居住在市政官（Palazzo della Signoria）。这种短暂的任期

是必要的，因为官员们来自各个不同的行会，而且这种有限的公共服务是他们抛开自己的个人与商业事务而愿意贡献的极限了。

马基雅维利曾经起草法律，以使他的保护人索德里尼能够无限期地延长他正义旗手的任期。

171

1502年6月，马基雅维利受派遣，第一次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切萨雷·波吉亚会晤，几个星期以前，波吉亚已经通过一次娴熟的阴谋诡计征服了乌尔比诺公国。波吉亚威胁要废除佛罗伦萨现政府，恢复皮耶罗·德·梅迪奇的统治，除非执政团保证承认他的征服，并且支付他为佛罗伦萨担任雇佣兵队长的酬金。

1502年10月，索德里尼再次把马基雅维利派往伊莫拉，命他报告切萨雷·波吉亚的动向，此时波吉亚正受到不满的雇佣兵队长的威胁，因此他暗中寻求佛罗伦萨的支持。

12月，波吉亚进军切塞纳，他在这里残酷地处决了他的副手拉米罗·德·洛卡。接下来，他又向塞尼加利亚进发，去面对与他敌对的雇佣兵队长，后者已经占领这个城市。

马基雅维利写作了《记述瓦伦蒂诺公爵在塞尼加利亚残杀维特罗佐·维特里、奥利夫奥托·达·菲莫和他人的手段》(*On the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Duke of*

Valentinois to Kill Vitellozzo Vitelli, Oliverotto da Fermo and Others)(这些人是波吉亚的几个不受管束的指挥官)。

1503年8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

1503年9月，马基雅维利出使罗马，观察教皇选举事宜。

教皇庇护三世胜出，但他仅仅在任职26天后便去世了，随后，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当选为教皇朱利叶斯二世。尽管长期以来罗韦雷都是波吉亚家族的死敌，但他通过诱使切萨雷·波吉亚要求其所控制的几个西班牙红衣主教投他的票——作为交易，他许诺波吉亚继续担任教皇军队的指挥官——而赢得了选举。一经当选，罗韦雷便取消了承诺，而且剥夺了波吉亚的头衔，并逮捕了他。失去了他父亲的政治与财政支持，切萨雷·波吉亚的初具雏形的罗马涅君主国便瞬间崩溃了。

172 12月，西班牙军队在那不勒斯北部的加里利亚诺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法国军队。

1504年1月，受西班牙胜利的影响，马基雅维利出使法国宫廷，试图消除佛罗伦萨的恐惧；他想让路易十二承诺，一旦西班牙军队从那不勒斯向北进军，法国将确保佛

罗伦萨不受西班牙人的侵害。

到月末的时候，随着《里昂和约》的签订和那不勒斯被割让给西班牙，这个保证变得毫无必要了。和约达成的协议就是，法国控制北意大利，而西班牙控制西西里和南意大利。

马基雅维利创作了《论佛罗伦萨军队的组建》(*Discourse on the Arming of the State of Florence*)，敦促创建一支保卫共和国的国民军。这是他毕生的伟大军事夙愿。

1505年，执政团采纳了马基雅维利起草的关于组建军队的法律。次年，成立了一个九人委员会来监管这支军队的活动；马基雅维利出任该委员会秘书。

1506年，马基雅维利创作了《论军事力量的目的》(*The Purpose of Military Force*)，还被派往罗马去会见教皇朱利叶斯二世，并评估教皇的目的。

1506年，朱利叶斯二世——众所周知的“战神教皇”——担任教皇军队的指挥官，并且开始了从地方军阀手中夺回教皇国的战役。切萨雷·波吉亚倒台后，这些军阀就占据了罗马涅和翁布里亚的各个城镇和要塞。这一年，朱利叶斯二世收复了博洛尼亚和佩鲁贾。

1507 年春，随着西班牙对佛罗伦萨威胁的减弱，另一个危及中部意大利的强大势力逐渐逼近。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开始筹备一次
173 罗马之旅，他将在此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担心帝国趁机把法国人从米兰驱逐出去，以证明马克西米利安自己对这个城市的权利。这令与法国结盟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惊恐万分，于是便派弗朗西斯科·维托里——一位年轻的贵族——去对事态进行评估；由于索德里尼的反对，马基雅维利被留在佛罗伦萨，从而没有陪同维托里出使。

12 月，索德里尼说服执政团派遣马基雅维利出使帝国宫廷。马基雅维利的报告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马克西米利安无法组织一次入侵行动。

马基雅维利的判断得到了证实，2 月份，帝国军队在临近维琴察的地区攻击威尼斯的军队，但遭到了决定性的挫败。接下来，马克西米利安签署了一个为期三年的休战协议，对佛罗伦萨的威胁从而被消除了。

1508 年，朱利叶斯二世组织了一个联盟——康布雷同盟，包括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要把威尼斯从罗马涅的占领区中驱逐出去；1509 年，威尼斯在安那迪劳战役中被击败。

1508 年，马基雅维利被派往比萨，督战他所组建的

佛罗伦萨军队对比萨的围攻。

1509 年，比萨最终投降。

1510 年初期，朱利叶斯二世破坏了他所建立的康布雷同盟，而且与威尼斯达成和平协议；进而，他动员威尼斯与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他从瑞士地区雇佣的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法国。这使佛罗伦萨处于一种危急状态，因为索德里尼所依靠的一直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与法国的结盟，而且还发生了一次针对索德里尼的谋杀行动，人们普遍相信这是由梅迪奇家族和教皇策划的。

1511 年 6 月末，索德里尼再次派马基雅维利出使法国
宫廷。任务是鼓励路易去安抚教皇，以避免发生冲突，从
而避免教廷军队——他们很有可能会恢复梅迪奇家族的统
治——侵扰佛罗伦萨共和国。

174

1511 年 1 月 2 日，朱利叶斯离开他在博洛尼亚的病床，指挥教廷军队在大雪中包围米兰多拉，一个与法国结盟的城市。法王利用他与佛罗伦萨的关系，企图在比萨召开一次地方主教会议来推翻朱利叶斯。尽管法国于 1512 年 4 月在罗马涅地区取得胜利，但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资助一支瑞士武装入侵伦巴第，使法军不得不从意大利撤退。6 月，朱利叶斯要求索德里尼交出权力。

这时，西班牙军队开始向佛罗伦萨进军。伴随着佛罗伦萨的一个殖民地普拉托——自14世纪中期以来就属于佛罗伦萨——遭到血腥洗劫，在亲梅迪奇派冲入市政官时，佛罗伦萨共和国垮台了。索德里尼逃往罗马，而且随着朱利亚诺·德·梅迪奇——“伟大的洛伦佐”的三儿子——进入佛罗伦萨，梅迪奇家族于1512年9月1日恢复了权力；他的兄弟红衣主教乔瓦尼·德·梅迪奇随后也于9月14日进入佛罗伦萨。

索德里尼曾要求马基雅维利去协商他从佛罗伦萨到罗马的安全通行权。随着梅迪奇家族的复辟，基本的共和制度大议事会被取消了，而且曾在普拉托之战中令自己蒙羞的佛罗伦萨国民军也被解散了。11月7日，马基雅维利被撤职；12月10日，他被要求交了一大笔保证金，并被判处国内放逐。因而他被禁止进入市政官。是年，他43岁；担任公职14年，而且再也没有机会作为其官员进入市政官。

1513年2月，一个谋杀朱利亚诺·德·梅迪奇和其侄子的密谋被揭发。共谋者也被暴露了，因为这个密谋的领导人阿戈斯蒂诺·卡普尼意外丢落了一页记着二十几个人名的纸，但这些人卡普尼与他的共谋者彼得洛·保罗·博斯科利希望加入这场密谋的人。175 这两个人遭到拘捕，严刑拷问并被砍头处决。

在这个名单上，马基雅维利的名字排在第七位。1513年2月18日晚上，他遭到逮捕并被投入监狱。他受到酷刑拷问但并没有供认；这个名单只能表明至少其中一个密谋者曾接触过他，但不能证明他们的接触产生了什么结果。

2月21日，朱利叶斯二世去世；3月9日，“伟大的洛伦佐”的二儿子乔瓦尼·德·梅迪奇当选为教皇里奥十世。虽然自童年起他就是红衣主教，但直到3月15日才被任命为牧师，两天后担任主教圣职，3月19日被加冕为教皇。这一年他37岁，在教皇宝座上坐了8年。

陷入各种热情洋溢的庆祝之中的佛罗伦萨，发布了一次大赦命令，随即马基雅维利于3月11日或12日被释放。

在1513年春夏的某个时间，马基雅维利开始写作一系列关于共和国的论文；但随着他以前在第二秘书厅的同事们一个个官复原职，他中断了这个方面的写作，开始创作一篇关于另一种国家形式——君主国——的长文，题献对象是朱利亚诺·德·梅迪奇。

1513年6月，法国人被一支瑞士军队打败，并被赶出米兰；卢多维科的儿子马西米利亚诺·斯福扎恢复了对米兰的统治。

1513年12月，马基雅维利给弗朗西斯科·维托里写信，要他对这个尚未完成的手稿《君主论》（这个名字就形成于此刻）加以评论，因为他考虑最终完成后把它献给朱利亚诺。

1514年12月，维托里要求马基雅维利为里奥十世写一个备忘录，以帮助教皇决定与法国结盟还是与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结盟。

176 1515年初，马基雅维利开始会见教皇的秘书，弗朗西斯科的兄弟保罗·维托里。如果教皇能够成功地使他的弟弟朱利亚诺成为罗马涅的统治者，那么，保罗就极有可能被任命去统治这个新王国的某个城市。马基雅维利建议梅迪奇家族应该把罗马涅地区统一为一个单一的君主国。但是马基雅维利重获起用的希望被朱里奥·德·梅迪奇破灭了；朱里奥是里奥和朱利亚诺最亲近的堂兄弟，他告诫维托里不要与马基雅维利有任何来往。

1515年，法国新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在马里尼亚诺击败了瑞士人并且再次征服米兰。

朱利亚诺于1516年3月去世时，马基雅维利改写了《君主论》的献词，并把它献给了洛伦佐·德·梅迪奇，朱利亚诺的侄子、佛罗伦萨的继任统治者。

在 1516 年的《努瓦永条约》中，西班牙再次承认了法国对米兰的权利，而法国人也再次宣布放弃了他们对仍处于西班牙统治之下的那不勒斯的权利。

1517 年夏，马基雅维利加入了一个由贵族知识分子和人文主义者组成的群体，他们定期举行讨论会。这个群体逐渐被称为奥里切拉里花园小组，这个名字源自他们经常举行会谈的帕拉佐·卢切莱家的花园的名称。

里奥希望在罗马涅为梅迪奇家族创立一个乌尔比诺公国，因此他组织了一个反对法国的新联盟，从英格兰的亨利八世那里借到了 15 万达克特，并获得了西班牙的帮助。随后的乌尔比诺战争从 1517 年 2 月持续到了 9 月，而其顶峰就是成功地使洛伦佐·德·梅迪奇成为乌尔比诺公爵。

1518 年，马基雅维利创作了一部讽刺喜剧《曼陀罗》，解释说 he 之所以转向戏剧创作是因为他“没有别的去处 / 可以让他露个脸 / 因为他已被禁止 / 展现其德性的其他方面……”。这部喜剧的首次出演地就是奥里切拉里花园，获得了激动人心的成功。

1519 年 5 月，26 岁的洛伦佐死于梅毒。此后，佛罗伦萨由佛

罗伦萨大主教朱里奥·德·梅迪奇统治。

177 1519年6月，里奥十世认可了西班牙的查尔斯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五世，这个举动进一步疏远了法国。

1520年3月，朱里奥与马基雅维利会面，委托他研究如何统治佛罗伦萨。这篇论文《论小洛伦佐去世后佛罗伦萨的政务》为佛罗伦萨设计了一部能够保护共和国的宪法（大议事会重新组织运作，以及设置一个终身的正义旗手），但是需要在朱里奥和里奥的有生之年，为梅迪奇家族的显要地位设置一种过渡性角色。

4月，奥里切拉里花园小组的一位成员通知马基雅维利，教皇里奥希望《曼陀罗》能够在教皇宫廷上演，并且计划委托他承担进一步的任务。

1520年夏，马基雅维利被派往卢凯塞，去向一位破产的卢凯塞商人讨要债务。不久后，他完成了一篇关于14世纪一位统治卢凯塞的雇佣兵队长的简短传记——《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这本书献给了奥里切拉里花园小组的两位成员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路易吉·阿拉曼尼。

1520年11月，马基雅维利接受了朱里奥和里奥十世的一项重要委托，去撰写正式的佛罗伦萨历史。

1521年春，马基雅维利受监管外交事务的八人委员

会的派遣出使卡尔皮，目的是控制这里的方济各会。

1521年5月，里奥十世与查尔斯五世缔结了一个条约，试图把法国人驱逐出米兰，后者在马里尼亚诺战役之后就已经被弗朗西斯一世占领。里奥曾经计划与法国、英格兰和威尼斯结盟，以反对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但是查尔斯劝说他停止了这个谋划。现在，11月，米兰沦陷了。

1521年8月，马基雅维利出版了《用兵之道》，在他的所有著作中，这是在他有生之年唯一出版的著作。这部著作采取的是对话的形式，场景就设定在奥里切拉里花园。

1521年12月1日，里奥十世去世。很快，皮耶罗的弟弟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索德里尼与法国结盟，雇佣雇佣兵企图把梅迪奇家族从佛罗伦萨驱逐出去，但他的军队被佩鲁贾的统治者的私生子、佣兵队长奥拉齐奥·巴格里奥尼打败。

1522年，一场刺杀朱里奥·德·梅迪奇的密谋被揭发。弗朗西斯科·索德里尼在罗马被里奥的继任者教皇艾德里安六世逮捕。6月13日，皮耶罗·索德里尼去世。

两位意欲行刺红衣主教朱里奥者，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路易吉·阿拉曼尼，是奥里切拉里花园小组的成

员，也是热情的共和主义者；马基雅维利曾经把《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献给他们。

教皇艾德里安六世逝世于 1523 年 9 月，仅仅在位 20 个月。朱里奥·德·梅迪奇当选为第二位梅迪奇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尽管朱里奥曾经赞成与查尔斯五世（他在一定程度上对朱里奥当选教皇居功至伟）结盟，但一经即位，克莱门特便疏远他的皇帝前盟友，而且开始与法国协商结盟。

1524 年 11 月，法国重新夺回米兰，而且在 12 月，克莱门特与弗朗西斯签署了一个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秘密条约。

1525 年初，马基雅维利完成了他的《佛罗伦萨史》。

1525 年 2 月，法国军队在帕维亚被皇帝雇佣兵击败。弗朗西斯成为阶下囚，成为自 1356 年普瓦捷战役以来第一位在战斗中被俘获的法国君主。米兰重新被帝国军队占领。5 月，查尔斯五世与教会签订了一个条约。

马基雅维利旅行到罗马，把他的《佛罗伦萨史》献给克莱门特。他在写给克莱门特的献词中承认，书中经常出现对梅迪奇家族的批评。在他与教皇的会谈中，马基雅维利试图说服他在教皇国全境组建国民军，抵御外来入侵，

拱卫其安全。克莱门特派马基雅维利到罗马涅考察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在这里，他遇到了这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

1526年2月，依据《马德里条约》，弗朗西斯把米兰割让给西班牙，并且再次确认了西班牙人在那不勒斯的权威。然而，弗朗西斯在5月获释并回到法国后，马上废除了该条约，并且与克莱门特、斯福扎、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组成白兰地同盟，试图把查尔斯五世赶出意大利。

《用兵之道》为马基雅维利赢得了军事工程师的美誉——该书用了很长的篇幅讨论防御工事——而且于1526年春受邀到罗马向克莱门特汇报佛罗伦萨防御工事的状况，以预测能否抵挡住帝国军队的进攻。随后，他被任命为城防督察处的秘书和军需官。

1526年夏，马基雅维利受命到伦巴第，在著名的佣兵队长乔瓦尼·德·梅迪奇的指挥下整顿处于马里尼亚诺的步兵。

乔瓦尼·德·梅迪奇——即乔瓦尼·德拉·班德·内雷——是卡特琳娜·斯福扎与乔瓦尼·德·梅迪奇·波波拉诺的28岁的儿子，是梅迪奇家族次子支族的一员。科西莫·德·梅迪奇的这位重侄孙

或许是意大利最负盛名的佣兵队长，而且教皇就把自己的命运放在他的手中。

马基雅维利参与协商克莱蒙纳向教皇联盟——神圣同盟——投降事宜。

1526 年 11 月 25 日，帝国军队——包括一支被称作兰斯奈奇的庞大德国分遣队，他们中许多人是马丁·路德的追随者——与班德·内雷指挥的军队交战，结果是内雷战亡。失去了班德·内雷的克莱门特面对帝国军队，决定去贿赂他们。1527 年，他与皇帝签署了一个条约，许诺支付 20 万达克特以诱使帝国军队撤退到阿尔卑斯山以北。但是神圣同盟军队的一个较小胜利又促使克莱门特废除了这个条约。随着西班牙步兵的增援，帝国军队于开始 3 月 31 日向南方进军，直指佛罗伦萨。

面对马基雅维利的防御工事，帝国军队决定绕过佛罗伦萨。

5 月 4 日，帝国军队兵临罗马，他们要求教皇支付 30 万达克特。克莱门特拒绝了这一要求，第二日，帝国军队开始攻城。随即发生的占领与洗劫罗马事件，是这个世纪最广受谴责的掠夺行为。

当时，马基雅维利身在佛罗伦萨，他被派往奇维塔韦基亚去安排教皇从圣天使城堡的撤退事宜。

随着帝国军队占领罗马，5月16日，佛罗伦萨的梅迪奇政府也被推翻了。共和国恢复了，而且大议事会以及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也重新组织起来。

马基雅维利现在希望他能够重新被任命为秘书厅的秘书，但尽管布昂德尔蒙蒂和阿拉曼尼——他们结束流亡返回了佛罗伦萨——极力推动此事，他并没有获得任命。对这些拥护共和政体者来说，虽然他在《论李维》中支持他们的事业，但他现在与梅迪奇家族的关系太密切了，正如在1512年时，梅迪奇家族认为他与皮耶罗·索德里尼——共和国的维护者——的关系密切一样。

教皇克莱门特在圣天使城堡成为一名阶下囚，6个月后通过化妆成功出逃。1529年6月，他与查尔斯五世皇帝签订了《巴塞罗那和平条约》，其中一个条款要求恢复梅迪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权力。1530年，经过长达12个月的围攻，佛罗伦萨共和国被帝国军队击败，教皇的私生子亚利桑德罗正式就任公爵。1537年，26岁的亚利桑德罗被一个远房表兄弟刺杀身亡，此人试图恢复共和国，但未获成功。

序言 治国之道——马基雅维利的悖论

1 去年一年，仅英语世界就新出版了有关马基雅维利的三本传记和三本研究专著，分别是：John McCormick,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Cambridge UP, 2011)；John M. Najem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chiavelli* (Cambridge UP, 2010)；Miles Unger, *Machiavelli: A Biography* (Simon & Schuster, 2011)；Niccolò Capponi, *An Unlikely Prince: The Life and Times of Machiavelli* (Da Capo Press, 2010)；Maurizio Viroli and Antony Shugaar, *Machiavelli's God* (Princeton UP, 2010)；Paul Oppenheimer, *Machiavelli: A Life Beyond Ideology* (Continuum Books, 2011)。

2 Harvey C. Mansfield, Jr., *Machiavelli's New Modes and Orders: A Study of the "Discourses on Livy"* (Cornell UP, 1979), p. 7.

3 关于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宪政秩序，即“市场国家”(market state)的论点，参见 Philip Bobbitt, *The Shield of Achilles: War, Peace,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Knopf, 2002), pp. 213 ff.；也参见 Robert Coope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21st Century* (Atlantic, 2003)；以及 *Shell Global Scenarios to 2025: Trends, Trade-offs, and Choices* (Shell International Ltd., 2005)。

4 John T. Bookman, "Machiavelli Scholarship: An Essay and List of Works in English", *Philosophy Research Archives* 9 (1537) (1983) ; Eric Haywood, "Touring The Hall of Fam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62, issue 4 (Autumn 2000) : 833.

5 马基雅维利 1513 年 12 月 10 日写给弗朗西斯科·维托里 (Francesco Vettori) 的信, 收录于 James B. Atkinson and David Sices (trans. and ed.) , *Niccolò Machiavelli,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Their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N. Illinois Press, 1996) ; 也参见 John Najemy, *Between Friends: Discourses of Power and Desire in the Machiavelli-Vettori Letters of 1513-1515* (Princeton, 1993)。

邪恶巫师与他的媚臣宝书

1 Peter Bondanella and Mark Musa (ed. and trans.) , *The Portable Machiavelli* (Penguin, 1971) , p. 21.

2 Maurizio Viroli, *Machiavelli: Founders of Modern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Oxford UP, 1998) , p. 95. 参见 Patricia Vilches, "Discourses on Livy" (reviewing the *Discourses* translated by Julia Conway and Peter Bondanella) ,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36, issue 1 (Spring 2005) : 27; Albert Russell Ascoli, *Speculum* 70, 4 (1995) : 952 (essay on Najemy's *Between Friends: Discourses of Power and Desire in the Machiavelli-Vettori Letters of 1513-1515*)。

3 Victoria Kahn, "Reading Machiavelli: Innocent Gentillet's Discourse on Method", *Political Theory*, vol. 22, issue 4 (Nov. 1994) : 539; Antonio D' Andrea,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ontext of Innocent Gentillet's Anti-Machiavel",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23, issue 4 (Winter 1970) : 397.

4 L. Amdd Weissberger, "Machiavelli and Tudor England",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42 (1927) : 589-590.

5 参见英国学者约翰·凯斯 (John Gase) , 他对马其雅维利的作品极为熟稔, 但是乐于承认让蒂耶提供的对马其雅维利学说的充分概括。参见 N. W. Bawcutt, "The 'Myth of Gentillet' Reconsidered: An Aspect of Elizabethan Machiavellianism", *Modern*

6 转引自 Bawcutt, “The ‘Myth of Gentillet’ Reconsidered”, p. 873。“一本关于国家、政府问题和反对马基雅维利——朝臣和诸如此类之人——的书, *Summun Phytagoreum* 指出, 他不明白为什么, 但马基雅维利的书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朝臣可兰经, 他们对这些书的评价, 丝毫不亚于土耳其人对可兰经和他们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的崇拜。”

7 同上, 866 页。“我并不怀疑, 但是许多朝臣——他们处理高贵的事务——和其他具有他们那种心情之人, 将惊奇地发现我竟然这样评价他们的伟大导师马基雅维利; 他的著作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法国朝臣可兰经, 他们给予了这些著作如此高的评价; 效仿并遵循他的原则和格言, 丝毫不亚于土耳其人对他们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的可兰经的崇拜。”

8 关于对让蒂耶和他著作的讨论, 参见 Philip Bobbitt, *The Shield of Achilles: War, Peace,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Knopf, 2002), pp. 496—500。

9 转引自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Routledge, 1992), p. 641。

10 正如今日我们通过奥利弗·斯通的大众电影《刺杀肯尼迪》所看到的一样。在 2010 年, 有报道称 80% 的美国人相信刺杀肯尼迪总统事件是一场阴谋, 尽管有许多值得尊敬的历史学家反复且旗帜鲜明地否认这种说法。斯通的电影就是对历史本身的谋杀。

11 Christopher Marlowe, *The Jew of Malta* (Dover, 2003); see also Joseph Khoury, ‘Marlowe’s Tamburlaine: Idealized Machiavellian Prince’, in Patricia Vilches and Gerald Seaman (eds.), *Seeking Real Truths: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Machiavelli* (Brill, 2007)。

12 参见 Avery Plaw, “Prince Harry: Shakespeare’s Critique of Machiavelli”, *Interpretation*, vol. 33, issue 1 (Fall/Winter 2005): 19. More generally, John Roe, “Machiavelli and Shakespeare”, in Patricia Vilches and Gerald Seaman (eds.), *Seeking Real Truths: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Machiavelli* (Brill, 2007)。

13 Barbara Riebling, “Milton on Machiavelli: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tate in *Paradise Lost*”,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49, issue 3 (Autumn 1996): 573 (1996); Dilek Kececi,

“Satan as the Machiavellian Hero in ‘Paradise Lost’”, *Ethos: Dialogu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1 (Jan. 2009) : 1.

14 参见 Guido Calabresi and Philip Bobbitt, *Tragic Choices* (Norton, 1978)。

第一卷 秩序——《君主论》的重要结构

第一章 现代国家的出现

1 Aldo Scaglione, essay on J. H. Whitfield’s *Discourses on Machiavelli*, 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32, issue 2 (June 1971) : 214, 217.

2 参见 J. H. Whitfield, “On Machiavelli’s Use of *Ordini*”, *Italian Studies*, vol. 10 (1955) : 19, 38。“只是由于他的批评者坚持在《论李维》中寻找《君主论》的作者（迄今为止，他们的发现存在许多问题），而不是在《君主论》中辨别《论李维》的作者，因此，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词汇表中的关键要素……并没有被认识到。”怀特菲尔德发现，*ordini* 这个术语在《论李维》中出现了至少 761 次，在《君主论》中则有 65 次，而且自从马基雅维利明确断言它与专制帝国（*imperio assoluto*）是不相容的之时起，就存在统计学的理由去怀疑说这两部著作在提倡专制主义。

3 Scaglione, essay on Whitfield’s *Discourses*, p. 217.

4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Routledge, 1992) , p. 96.

5 *Discourses*, book 2, chapter 17.

6 *The Shield of Achilles*, pp. 80–81。我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从 *The Shield of Achilles* 和 *Terror and Consent* 中摘录了这些段落，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源于我的懒惰，部分原因是为了不去加入任何未在原文出现的要素建议，而且部分原因则是因为马基雅维利自己也习惯这么做：从他的信件或主要著作中摘取一些段落甚至几页，直接把它们插入后来正在撰写的著作中。

7 Ibid. p. 81.

8 Ibid.

9 关于在票据创建过程中“信用”的出现，参见 Niall Ferguson,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Allen Lane, 2008) ;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Allen Lane, 2001)。

10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164 ; 也参见 *The Shield of Achilles* 中的引用之处, p. 836, n. 22。

11 这个辩论在 *The Shield of Achilles* 中得到了展开, pp. 83–84。

12 *The Prince*, chapter 26.

13 Ibid.

14 *The Prince*, chapter 6.

第二章 政治家能够升入天堂吗?

1 参见 Francesco Patrizi's *The Education of the King*; Giovanni Pontano's "*De Principe*", in E. Garin (ed.) , *Prosatori Latini del Quattrocento* (Milan, 1952) , p. 1024; Bartolomeo Sacchi (Platina) , *De Principe*。

2 关于西塞罗以及他与马基雅维利著作的关系, 参见 Curtis L. Hancock, "Cicero Versus Machiavelli: Does the End Justify the Means?" ,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vol. 16, issue 6 (Nov.–Dec. 1994) : 14–18 ; J. N. Stephens, "Ciceronian Rhetoric and the Immorality of Machiavelli's Prince", *Renaissance Studies*, vol. 2, issue 2 (Oct. 1988) : 258–267; Marcia L. Colish, "Cicero's 'De Officiis' and Machiavelli's 'Prince'" ,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9, issue 4 (Winter 1968) : 80–93。

3 Marcus Tullius Cicero, *De officiis*, published as *On Du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book I, chapter 41.

4 关于这个著名的段落, 参见 Timothy J. Lukes, 'Lionizing Machiavelli'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issue 3 (Sept. 2001) : 561。

5 *The Prince*, chapter 18.

6 Cicero, *De officiis*, book II, chapters 58, 77.

7 有大量的文献讨论“厌恶损失”(Loss Aversion), 它的意思是, 比起获得收益来, 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避免损失, 甚至在这样做是不理性之时也是如此。抛开其他内涵,

这种人类癖好似乎是在说，一个丢了 100 美元的人遭受的痛苦要大于一个发了 100 美元横财的人获得的满意；类似地，人们更喜欢避免 5 美元的额外支出而不是得到 5 美元的折扣。参见 D. Kahneman and A. Tversky,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39, no. 4 (1984): 341。

8 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p. 9–10。然而，人们应该注意到，施特劳斯也指出“马基雅维利身上真正令人钦羡的品质素质：他的思想的勇敢无畏，他的目光的深邃广阔，以及他的语言的优美雅致”。参见 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Washington Press, 1969), p. 13。

9 Cary J. Nederman, 'Niccolò Machiavelli',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Autumn 2009 edition), ed. Edward N. Zalta, accessible at <http://plato.stanford.edu>。

10 见汤姆·施密特 (Tom Schmidt) 写给作者的信。

11 参见 Mark Hulliung, *Citizen Machiavelli* (Princeton, 1983)，它看起来反对这种区分。

12 Thomas Nagel, 'War and Massacre',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1 (1972): 123–144。

13 Michael Walzer, 'Political Action: The Problem of Dirty Hands', in Sanford Levinson (ed.), *Torture* (Oxford UP, 2004), pp. 61–62。这个讨论取自 Philip Bobbitt, *Terror and Consent: The War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Knopf, 2008), pp. 363–364。

14 Walzer, *op. cit.*, pp. 64–65。

15 Isaiah Berlin, "The Originality of Machiavelli", in Myron P. Gilmore (ed.), *Studies on Machiavelli* (Sansoni, 1972), pp. 147–206。

16 *The Prince*, chapter 18。

17 Isaiah Berlin, "The Originality of Machiavelli", 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7), pp. 269–325; Maurizio Viroli, *Machiavelli's God* (Princeton UP, 2010)。

18 *Discourses*, book III, chapter 40。

19 Maurizio Viroli, *How to Read Machiavelli* (Granta UK, 2009), p. 34。

20 关于用心理学词汇来呈现这一点的一篇论文，参见 Cary J. Nederman, "Machiavelli and Moral Character: Principality, Republic and the Psychology of 'Virtù'",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21, issue 3 (Autumn 2000) : 349。

21 Sebastian de Grazia, *Machiavelli in Hell* (Vintage, 1994) , pp. 300–399.

22 *The Prince*, chapter 15.

23 *The Prince*, chapter 18.

24 *The Prince*, chapter 6.

25 参见 Erica Benner, *Machiavelli's Ethics* (Princeton UP, 2009) , p. 427。

26 Paul E. Norton, “Machiavelli's Road to Paradise: ‘The Exhortation to Penitence’” ,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4 (Spring 1983) : 31–32.

27 Machiavelli, *Exhortation to Penitence*.

28 Machiavelli, *The Art of War*, book 7.

第二卷 论国家——《君主论》与《论李维》的关系

1 *The Prince*, chapter 1.

第三章 共和国的“后果论义务”

1 C. D. Broad, *Five Types of Ethical Theory* (Harcourt and Brace, 1930) , pp. 277–278 (强调标示为附加上的)。大概来说,在写为“目的论的”(teleological)或有明确目标的(purposeful)之处,我一直使用的是“后果论的”(consequential)这个词,但此处的区别是相同的。

2 后果论义务是我在《恐怖与同意》(*Terror and Consent*)一书中提出的一个理念,而且与21世纪民主制中的官员们的义务密切相关。关于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后果论,参见 Eugene Garver, “After ‘Virtù’: Rhetoric, Prudence and Moral Pluralism in Machiavelli” ,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17, issue 2 (Summer 1996) : 195–222; Eugene Garver, “Machiavelli: Rhetoric and Prudence” , in Patricia Vilches and Gerald Seaman (eds.) , *Seeking Real Truths: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Machiavelli* (Brill, 2007) ; G. H. R. Parkinson, “Ethics and Politics in Machiavelli” ,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5

(Jan. 1955) : 37-44; Raymond A. Belliotti, “Machiavelli and Machiavellianism” , *Journal of Thought*, vol. 13 (Nov. 1978) : 293-300; Lee Thayer, “Machiavelli and the History of Prudence” , *Clio*, vol. 17, issue 3 (Spring 1988) : 309; Carlo Ginzburg, “Pontano, Machiavelli and Prudence: Some Further Reflections” , in *From Florence to the Mediterranean and Beyond: Essays in Honour of Anthony Molho* (Firenze, 2009)。关于这种两难的一个当代例证, 参见 Paul Starobin, “A Moral Flip-Flop? Defining a War” , *New York Times Sunday Review*, 6 August 2011; see also Tara McKelvey, “Interview with Harold Koh, Obama’s Defender of Drone Strikes” , *The Daily Beast*, 8 April 2012。

3 De Grazia, *Machiavelli in Hell*, pp. 54–55.

4 萨沃罗拉组织焚烧了佛罗伦萨妇女们设计精美的连衫裙; 而六个世纪后, 沙特道德引导和预防恶习委员会却任将那些服装被认为不合适的妇女被烧死。参见 2002 年 3 月 11 日的事件, 沙特宗教警察阻止 15 名女孩逃出一间着火的校舍, 原因是她们的穿着不合适。参见 “Saudi police ‘stopped’ fire rescue” , BBC News, 15 March 2002, 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1874471.stm。

5 Cicero, *De officiis*, book I, chapter 159.

6 *Discourses*, book III, chapter 41.

7 Cicero, *De officiis*, book III, chapter 41.

8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9.

9 Viroli, *How to Read Machiavelli*, p. 35.

10 De Grazia, *Machiavelli in Hell*, p. 311。类似地, 萨姆·休斯敦无情地试图通过拒绝增援阿拉莫的守卫, 目的是保护他的主力部队, 从而保护得克萨斯革命; 而乔治·华盛顿出于同样的理由采取了一种费边式策略——尽管非常厌恶他。

11 *Discourses*, book II, chapter 21.

12 Sergio Bertelli, “Machiavelli and Soderini” ,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28, issue 1 (Spring 1975) : 1.

13 *Discourses*, book III, chapter 3.

14 参见 Maurizio Viroli, “Books in Review” , *Political Theory*, vol. 19, issue 2 (May 1991) : 292-293。维罗里写道: “当共同善得到最好的遵守时, 国家就实现了至善, 即这样一

个共和国：实行法治，妇女得到尊重，公职基于德性向所有公民开放，拥有适度的社会平等，而且每个人都能安全地打理他的生意并享受他的财富和资产。‘这是要中之要’”。

15 参见 *Terror and Consent*, pp. 180–186。

16 Viroli, *How to Read Machiavelli*, p. 78.

17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16 (强调标识为本书作者所加)。马基雅维利相信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但他已经看到了战争条件在他有生之年发生的变化，而且它们在国家的历史中持续地发生变化。当前，我们处于与全球恐怖网络的战争——尽管我们所坚持使用的术语会把我们从这个可怕的事实中解脱出来——之中。由于马基雅维利被认为是“目的证成手段”这个原则的倡导者，但这意味着他会赞成用无所禁忌的手段来执行这种战争吗？在 21 世纪，当民主国家受到恐怖分子运用比恐怖集团过去所采用的武器更具杀伤性的重武器的攻击时，这些伦理问题——包括酷刑问题、定点清除问题以及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平民伤亡问题——会变得更加急迫。保护人民免于恐惧——维护“公共效用，人们从中获得自由的生活方式……能够自由而且无恐惧地享受他的所有物……不用为自己担心”——而且允许公民去做他们有合法权利去做的事情，是马基雅维利的重要关切。因此当人们最终看到，国家在法律范围之内保护自身，而且国家的公民不会感到它比可能会攻击它的恐怖网络更为恐惧时，他们或许真的会断定马基雅维利要比人们所认为的更加正直。

18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参见 Timothy J. Lukes, “Descending to the Particulars: The Palazzo, The Piazza and Machiavelli’s Republican Modes and Order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1, issue 2 (April 2009) : 520 ; Cary J. Nederman, “The Renaissance of a Renaissance Man”, *European Legacy*, vol. 4, issue 5 (Oct. 1999) : 102 ; 一种关于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国的偏好的一种较为有所遮掩的观点，参见 Harvey C. Mansfield, *Machiavelli’s Virtue* (Chicago, 1996) , p. 302。

19 *Discourses*, book II, chapter 2.

20 Ibid.

21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58.

22 亚伯拉罕·林肯，转引自 Mark E. Neely, Jr., *The Fate of Liberty: Abraham Lincoln*

and Civil Liberties (Oxford UP, 1991), p. 12。对比一下这种类似的情形，即为了避免破坏法律的目的而忽视法律条文：“一条规定了任何‘故意妨碍……邮件通行’的人都要受到刑事惩罚的法律，从来没有打算去因为一位警官在巡逻途中逮捕一名邮递员杀人魔而惩罚他……一条规定了‘任何在街头致人流血的人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的法令……并没有打算去由于一位医生对一位在街头突发疾病的人不得不当众实施紧急手术而惩罚他。” John F. Manning, ‘The Absurdity Doctrine’,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6 (2003): 2387, 2402。警告“不要践踏草地”的标志，不可能实际适用于要努力保持草皮茁壮生长的场地管理员（尽管应该指出，曼宁是在批判我们应用这种规定的的能力）。

23 Cicero, *De officiis*, book II, chapter 43.

24 P.T. 巴纳姆和马克·吐温都把这句话归之于林肯。

25 De Grazia, *Machiavelli in Hell*, p. 296.

26 *The Prince*, chapter 18.

27 Ibid.

28 *The Prince*, chapter 7.

29 Adam Minter, “Machiavelli, Violence and History”, *Harvard Review of Philosophy*, vol. 2, issue 1 (Spring 1992): 25–33.

30 Victoria Kahn, “*Virtù* and the Example of Agathocles in Machiavelli’s *Prince*”, *Representations*, vol. 13 (Winter 1986): 63.

31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25.

32 Machiavelli, *History of Florence*, book II, chapter 8.

33 Ibid.

34 Ibid.

35 参见 *Terror and Consent*, p. 470。

36 *The Prince*, chapter 17.

37 Ibid.

第四章 武备精良，法律严明

1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ambridge UP, 2009); Jean Bodin,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Basil Blackwell, 1955) .

2 *The Prince*, chapter 3.

3 *The Art of War*, Preface.

4 关于法律的强制方面，参见 Robert Cover, *Narrative, Violence and the Law: The Essays of Robert Cover* (Michigan, 1995)。(“法律解释发生于一个痛苦与死亡的领域。在几种意义上这千真万确。法律解释行为预示并引发对其他人强加的暴力：一位法官阐释她对某个条文的理解，而结果是，某人丧失了他的自由、他的财产、他的孩子甚至他的生命。法律解释也是对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暴力的证成。一旦解释者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就常常抛弃受害者，这些人的生命已经被这种对于暴力的有组织的社会实践弄得支离破碎。法律解释以及它所引发的暴力都不能在彼此脱离的情况下得到恰当的理解。”) 参见 C. K. Y. Shaw, “Quentin Skinner on the Proper Meaning of epublican Liberty”, *Politics*, vol. 23, issue 1 (Feb. 2003) : 46。

5 *The Prince*, chapter 12.

6 *The Art of War*, Preface.

7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3.

8 *The Prince*, chapter 7.

9 参见 Timothy J. Lukes, “Martialing Machiavelli: Reassessing the Military Ref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issue 4 (Nov. 2004) : 1089.

10 Machiavelli, *I Primi Scritti Politici 1499–1512*, ed. Jean-Jacques Marchand (Padua: Antenore, 1975) , p. 432.

11 *The Prince*, chapter 2.

12 Sean Erwin, “A War of One’s Own: Mercenaries and the Theme of *Arma Aliena* in Machiavelli’s *Il Princip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18, issue 4 (Sept. 2010) : 541.

13 *The Prince*, chapter 12.

14 有证据表明，索德里尼实际上主导了对米凯罗特的任命。参见 Roslyn Pesman Cooper, “Machiavelli, Francesco Soderini and Don Michelotto”, *Nuovo Rivista Storica*, vol. 66, issue 3/4 (Sept. 1982) : 342。

15 参见 *The Shield of Achilles*, pp. 86–87。更多关于马基雅维利参与制定 1506 年佛罗伦萨《步兵条例》的文献，参见 Mikael Hörnqvist, ‘*Perché non si usa allegare i Romani: Machiavelli and the Florentine militia of 1506*’,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55, issue 1 (2002) : 148–191。

16 对比一下当前时髦的“基于效果的战略”；参见 Thomas Kane, ‘Building Thrones: Political Effect as an Emerging Principle of War’,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4, issue 5 (Dec. 2005) : 431。

第三卷 virtù 与机运——上帝并不想决定一切

第五章 virtù 来自于战神，机运来自于维纳斯

1 Felix Gilbert, “Bernardo Rucellai and the Orti Oricellari: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12 (1949) : 101–102.

2 Maurizio Viroli, *Machiavelli* (Oxford, 1998) , p. 20。其中引用了马基雅维利的《歌四章》中的一首诗《论机运》。

3 转引自 de Grazia, *Machiavelli in Hell*, p. 98。

4 *Discourses*, book III, chapter 9.

5 参见 Patricia Vilches, “Discourses on Livy” (reviewing the *Discourses* translated by Julia Conway and Peter Bondanella) ,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36, issue 1 (Spring 2005) : 265; Oded Balaban, “The Human Origins of Fortuna in Machiavelli’s Thought”,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11, issue 1 (1990) : 21, 此文指出，由于机运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因而 virtù 是采取适合于人们的目标导向的行动之结果的方法的能力；也请参见本书第三章对“后果论义务”的讨论。

6 比较 Mansfield, *Machiavelli's Virtue*, p. 7。

7 斯金纳评论道：“这个信念……在西塞罗《图斯库兰论说集》中体现得非常清楚，他明确指出，真正男人的标志就是拥有最高程度的 *virtus*。李维在《罗马史》中充分探讨了这一论断的内涵。书中罗马人的每次胜利几乎都是用同样的逻辑解释的：机运喜欢追随甚至侍奉 *virtus*，并喜欢降福于展示 *virtus* 的人。”参见 Skinner, *Machiavelli: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p. 29。比较一下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并不把企业家的能力描述为学习能力，而是描述为“发现珍奇事物的能力和天赋”。“企业家的洞察力”处于“我们能够有意控制的力量之外”，因而它不能被概括为“机械的程序”；它的改革性力量是自发且不可预测地发生的。参见 Hayek on Liberty, 3rd edition (Routledge, 1998), p. 36。

8 *The Prince*, chapter 25.

9 *Discourses*, book II, chapter 29.

10 De Grazia, *Machiavelli in Hell*, p. 27.

11 Ross King, *Machiavelli: Philosopher of Power* (HarperCollins, 2007), p. 212.

12 Machiavelli, *The Literary Works of Machiavelli: Mandragola, Clizia, A Dialogue on Language, and Belfagor, with Selections from the Private Correspondence*, ed. J. R. Hale (Greenwood, 1979)。

13 *Discourses*, book III, chapter 31.

14 Quentin Skinner, *Machiavelli: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P, 2000), p. 61.

15 *The Art of War*, book I.

16 *Discourses*, book III, chapter 41.

17 *The Prince*, chapter 25.

18 Ibid.

19 *The Prince*, chapter 26.

20 Kyung-Hee Kim, “Machiavelli’s Political Matrix of Virtù: His Theory of Humor and Mode of Proceeding”。这篇重要的论文一直作为草稿放在网上，它的作者不希望被引用。由于我迄今无法联系到作者，也无法获得引用他的论文的许可，因而选择了违背他的要求而不是遗漏对他的著作的尊重。

21 *Discourses*, book III, chapter 9.

22 Victoria Kahn, “*Virtù and the Example of Agathocles in Machiavelli’s Prince*”, *Representations*, vol. 13 (Winter 1986) : 71.

23 Kyung-Hee Kim (参见上面的注释)。

第六章 马基雅维利的历史观

1 特拉维斯·潘丁 (Travis Pantin) 曾经提出了这种有趣的观点, 它与我关于马基雅维利与宪法的关系的论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鸣。他写道: “我常常想, 马基雅维利对历史的运用——从教学的视角来讲——非常类似于人们在法学院遇到的案例教学法。这两种教育方法都运用具体的例子——表面上看它们的基本原则是相互冲突的——目的是砥砺读者的判断力。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读者的头脑中造成了不协和音 (尤其是通过对圣经人物的独特刻画), 目的是唤醒他们, 并提醒他们, 真实的政治既要求制定规则也要求违反规则, 而不仅仅是遵从它们。案例教学法同样暗示, 法律并不完全被理解为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或一个普遍真理体系, 也被理解为一种依赖于某种类似于实践智慧 (*phronesis*) 的能力——人们只能通过经验和对恰当例子的研究获得它。”2013年1月3日写给作者的信。

2 参见 Margaret Leslie, ‘In Defense of Anachron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 8, issue 4 (Dec. 1970) : 433。

3 *Discourses*, book III, chapter 43.

4 如维罗里所指出的, “马基雅维利坚持认为, 通过历史上的事例, 演说者能够生动地引发人们对腐败、野心和贪婪的憎恶; 他能触及听众的情感和想象, 而不仅仅是他们的理智, 并且迫使他们摆脱恶习, 践行美德。”Viroli, *How to Read Machiavelli*, p. 54。

5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10.

6 关于马基雅维利把历史用于修辞的讨论, 参见 Peter Bondanella, *Machiavelli and the Art of Renaissance Histor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Desmond Fitzgerald, “Machiavelli and Histor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vol. 43 (1969) : 121; Eugene Garver, “Machiavelli and the Politics of Rhetorical Invention” , *Clio*, vol. 14, issue 2 (Winter 1985) : 157; Mark Phillips, “Representation and Argument in Florentine Historiography” ,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issue 10 (1986) : 48; William E. Wiethoff , “The Martial ‘Virtue’ of Rhetoric in Machiavelli’s *Art of War*” ,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 64, issue 3 (Oct. 1978) : 304.

7 *Institutio oratoria*, XIII.II, pp. 29–31.

8 *Discourses*, book I, Proem (强调标识为本书作者所加)。

9 但是, 请参考维罗里, 他认为马基雅维利相信历史是循环的而不是“不断进步的”。Viroli, *How to Read Machiavelli*, p.50。

10 Machiavelli, *The Golden Ass*, 5.103–104.

11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2.

12 Ibid.

13 Harvey C. Mansfield, *Machiavelli’s New Modes and Orders: A Study of the Discourses* on Livy (Chicago, 2001) . 关于对曼斯菲尔德 (以及施特劳斯) 对马基雅维利的现代性的论断的一种异议, 参见 Neal Wood, ‘Mansfield on Machiavelli’ ,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5, issue 1 (1985) : 45。

14 先于克劳塞维茨三个多世纪。马基雅维利通常被批评低估了火炮的重要性, 参见 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The Renaissance in the Art of War’ , in Peter Paret (ed.) ,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UP, 1986) , pp. 11–31; Azar Gat, ‘Machiavelli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lassical Notion of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n the Study of War’ , *Military Affairs*, vol. 57 (Oct. 1988) : 203–5。但他清楚地认识到火炮技术的发展对于堡垒的弱点的影响。参见: Timothy R. W. Kubik, ‘Is Machiavelli’s Cannon Spiked?’ ,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1, issue 1 (Jan. 1997) : 7; 也请参见 Ben Cassidy, ‘Machiavelli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Gunpowder Weapons in the *Art of War*’ ,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7, issue 2 (April 2003) : 381; Timothy J. Lukes, ‘Martialing Machiavelli: Reassessing the Military Reflections’ ,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issue 4 (Nov. 2004) : 1089。

15 参见 *Terror and Consent*, pp. 183–184, 208–209; *The Shield of Achilles*, p. 10。

16 我注意到，我的大学同事斯坦福·列文森——他是一位非常雄辩的鼓吹者，倡议一个更为平等主义的参议院[参见 *Our Undemocratic Constitution: Where the Constitution Goes Wrong (And How We the People Can Correct It)* (Oxford, 2006)]——能够摆脱这种谬误，因为他并不宣称他所主张的大会能够无视这个要求：各州全体一致地同意重新分配参议院议席是任何自称要这样做的修正案能够获得通过的必要条件。

17 参见 Calabresi and Bobbitt, *Tragic Choices* (Norton, 1978), pp. 195–109。

18 Salvatore DiMaria, “Machiavelli’s Ironic View of History: The ‘Istorie Fiorentine’”,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45, issue 2 (Summer 1992): 248.

19 参见 *Discourses*, book III, chapter 9 and *The Prince*, chapter 25; Tracy Goss, *The Last Word on Power* (Doubleday, 1996)。

20 Ernst Cassirer, *The Myth of the State* (Yale, 1946), p. 130.

21 Najemy, *Between Friends*, p. 172.

22 参见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23 Viroli, *How to Read Machiavelli*, p. 4.

24 Henry Kissing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1979), p. 54。这表明需要用远景规划 (scenario planning) 来补充战略计划。远景规划提出关于未来的各种替代性描述，它们因驱动每一个远景的决定与个体的不同而不同；远景规划是一种从当前推断未来的正式方法，目的是就为将来发生何事提出一种单一的、可测量的、最有可能的预言。也就是说，战略计划假定了一种对于远景规划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想要何种的未来？远景规划的时间范围一般是 5~25 年；战略计划通常不会超过 1~3 年。远景规划的输入项更多是定性的——即，它们共享关于未来的特定的事实评估，但是强调能够为不同的文化、领导人和群体所利用的不同可能性。战略计划的输入项更多倾向上是定量的，关注过去的表现、预测和可能性。因而，远景规划利用不确定之事物，允许提出多种替代性未来设想；战略计划试图把不确定性降至最低。远景规划会得到多个可供选择的结果，而战略计划所寻求是基于最可能的情况之上的量化的唯一结果。此外，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远景规划能够通过给我们描绘未来的图画——我们希望通过当前采取行动而加以实现（或避免）它——产生鼓舞作用。

25 “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清楚的是，来自这位‘朋友’的大部分信息，确实直接来自

于一个渠道，而且这个关键信息正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和同胞、佛罗伦萨人列奥纳多·达·芬奇。” Paul Strathern, “Machiavelli, Leonardo and Borgia: A Fateful Collusion”, *History Today*, vol. 59, issue 3 (March 2009) : 15–19。

26 关于列奥纳多和马基雅维利的，参见 Paul Roazen, “A Partnership of Geniuses?”, *American Scholar*, vol. 67, issue 4 (Autumn 1998) : 141; Roger D. Masters, *Fortune is a River: Leonardo da Vinci and Niccolò Machiavelli's Magnificent Dream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Florentine History* (Plume, 1999)。

第四卷 时机——《君主论》有趣的时间选择

1 “这几个月——7月到12月（1513年）——见证了专题论文《君主论》的诞生。而对李维的注释则被放在一边。” 参见 Federico Chabod, *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 trans. David Moore (Bowes & Bowes, 1958) , p. 12。

第七章 波吉亚家族与梅迪奇家族

1 Hans Baron, “The *Principe* and the Puzzle of the Date of Chapter 26”,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vol. 21, issue 1 (1991) : 83.

2 关于把第26章整合入《君主论》其他各章的一种奇怪努力，参见 Joseph M. Parent, “Machiavelli's Missing Romulus and the Murderous Intent of ‘The Princ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26, issue 4 (Winter 2005) : 625。

3 “读者们或许确信斯宾塞运用他的艺术来实现他谋求在伊丽莎白宫廷获得一份美差的野心，但是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种假设足以包容他们对《仙后》——就像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的感受，它完全超出了可以标签化为‘求职申请书’的一种鼓吹者地位的情况。M. F. N. Dixon, *The Politicke Courtier: Spenser's The Faerie Queene as a Rhetoric of Justice* (McGill-Queens UP, 1996) , p. 19。

4 “博比特用极为钦佩的语气谈论 ‘The Inquiry’ ——这是众议院在十月革命后组建的一个由126位专家组成的秘密机构——收集数据，为美国在欧洲建立一种‘美国主

导的安排’提供事实性和分析性基础。他解释说,美国今天所需要的是一种类似的‘愿景小组’,而且也应该秘密召集,但现在不仅要像威尔逊时代那样包括律师和科学家,而且也要包括企业主管,为总统提供正确的战略指导。众议院的合适人选并不难猜测。Gopal Balakrishnan, “Algorithms of War”, *New Left Review* 23 (Sept.–Oct. 2003)。实际上,我认为适合这个职位的人是贝蒂·苏·弗劳尔斯博士 (Dr. Betty Sue Flowers)。

5 G. Sasso, *Machiavelli e Cesare Borgia: Storia di un giudizio* (Rome, 1966) , p. 235.

6 James Reston, *Dogs of God* (Anchor, 2005) , p. 287.

7 Daniel Pellerin, “Machiavelli’s Best Friend” ,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27, issue 3 (Autumn 2006) : 423.

8 参见 J. H. Whitfield, “Machiavelli and the Problem of the Prince” , in *Discourses on Machiavelli* (Cambridge, 1969)。

9 参见 H. Butterfield, “Professor Chabod and the Machiavelli Controversies” ,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 issue 1 (March 1959) : 78。他认为想要准确确定《论李维》第一部分的写作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存的历史资料太少、太粗略而且太难以把握”。赫克斯特 (J. H. Hexter) (基于马基雅维利需要关于波利比乌斯的译本,而这个译本的出现不会早于 1515 年) 和汉斯·巴隆 (Hans Baron) (基于马基雅维利于 1513 年 12 月 10 日写给维托里的一封信中一定会提到他在动手写《君主论》之前的工作) 都反对把《论李维》前几部分的写作日期界定在《君主论》之前。我的论述并不依赖这种时间确定,尽管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正确的,因为没有其他的手稿能够对应于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说的他已经开始写作一部关于共和国的大部头著作。

10 Erasmus, Ep. 988.

11 Najemy, *Between Friends*.

12 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 Century Florence* (Princeton, 1956) 。

13 “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活到亲眼看见这位佛罗伦萨共和主义者的背叛者和折磨者、暴君亚利桑德罗的顾问和辩护者、最后成为科西莫公爵的幕后操纵者的这些所作所为。” Scaglione, essay on J. H. Whitfield’s *Discourses on Machiavelli*, p. 216; 也参见 J. H. Whitfield, ‘The Case of Guicciardini’ , in *Discourses on Machiavelli*。

14 [E]stravagante di opinione . . . et inventore di cose nuove et insolite, Guicciardini to Machiavelli, 18 May 1521, quoted in Erica Brenner, *Machiavelli's Ethics*, p. 46.

第八章 马基雅维利的宪法

1 *The Prince*, chapter 25.

2 Ibid.

3 Ibid.

4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11.

5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3.

6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s 25, 37.

7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24.

8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16.

9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30.

10 这是马基雅维利对锡拉库扎的暴君阿加托克雷的这段著名评论的基础，否则就是难以理解的：“他毫无或者很少可以归功于幸运之处。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的，他取得了君权并不是依靠他人的好意，而是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在军队中逐级提升得来的；其后他继续保持这个地位，则是有赖于许多勇敢的冒着风险的决策。但是，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够称作有能力的。以这样的方法只是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不能赢得光荣”（*The Prince*, chapter 8）。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光荣是道德选择的一个结果。参见 Dan Eldar, “Glory and the boundaries of public morality in Machiavelli's thought”,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7, issue 3 (Winter 1986) : 419.

11 “关于筹款的演说辞”，这是马基雅维利 1503 年为索德里尼写的演讲稿，他在文中指出，如果人们想在外交事务中有所选择，而不是面对入侵者的意志丧失选择的能力，就必然需要建立自己的军队。

12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48. 因此，约翰·麦克考密克（John McCormick）指出：“马基雅维利暗示，那些批判人民的作者无可救药地混淆了公共舆论和公共判

断。人们常常在小酒馆、自己家中或街头宣称自己想要这或想要那，但当他们得到正式授权去就关于在一个选择集合中做出选择而进行协商时，他们常常选择非常不同的东西……马基雅维利表明了，正式授权人民自己做出决定的制度安排，如何实际上促使人们去澄清他们的偏好——在它们不明确时——并且节制他们的冲动——在它们趋于过分之时。”“Defending the people from the professors”，available at www.artoftheory.com/mccormick-machiavellian-democracy (blog)。

13 关于马基雅维利在英利坚合众国建国中的地位，已有学者做出充分论述，参见 J. G. A. Pocock in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rinceton, 1975)，and Gisela Bock et al. in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 (Cambridge, 1990)；比较 Paul Rahe (ed.)，*Machiavelli's Liberal Republican Legacy* (Cambridge UP, 2006)。

14 “解决这个问题（创造并维持集体 *virtù*）的关键是确保公民‘有序地组织起来’，用特定的组织方式强迫他们获得 *virtù*，维护自身的自由……若要理解古罗马的 *virtù* 为何‘经历如此多世纪仍保存如此之好’，我们就需要考察它的‘组织方式’……要知道罗马为何能‘踏上将它引向完美终点的正确道路’，我们首先应该研究它的 *ordini*——它的制度，它的宪法安排以及管理和组织公民的方法。”Quentin Skinner, *Machiavelli: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p. 69。

15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1.

16 机运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The Prince*, chapter 25）；上帝并不想“把我们的自由意志夺去”（*The Prince*, chapter 26）。

17 De Grazia, *Machiavelli in Hell*, p. 110.

18 这种有趣的说法得益于汤姆·施密特，见 2011 年 8 月 9 日他写给作者的信。

19 Philip Bobbitt, *Constitutional Fate: Theory of the Constitution* (Oxford UP, 1984)，p. 182.

20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s 9.

21 参见 Mansfield, *Machiavelli's Virtue*, p. 302。

22 Filippo del Lucchese, “Crisis and Power: Economics, Politics and Conflict in Machiavelli's Political Thought”，*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30, issue 1 (Spring 2009) : 75.

23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4.

24 Bondanella 和 Musa 对这一点做了很好的论述：“（人性和经济匮乏使得）政治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冲突并不被看作一种反常状态，也不是一个已经消除了社会斗争的国家……的目标……但仅仅承认社会中存在冲突并不足以确证马基雅维利观点的独创性。在这个方面，真正原创的观念是马基雅维利的这个信念：这种冲突事实上可能造成有益的结果，即产生一个受稳定的政治制度调控的组织得当的政府。” Bondanella and Musa, *The Portable Machiavelli*, pp. 28–29。

25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58.

26 *Ibid.*

27 *Ibid.*

28 *The Prince*, chapter 9.

29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2.

30 尽管我们用“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这个术语来描述虚弱不堪或饱受战争折磨的国家所做出的创造有活力的政治社会的努力，但事实上我们意指的是“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而且尽管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代价高昂且棘手的探索之后，对此类计划的热情已经消退，但国家建构这个问题并没有消失。关于布什政府 2003 年所组织的入侵伊拉克的行動的基本动机是否是建立一个民主政权来取代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统治，当然可以进行各种质疑。但一旦美国军队占领了伊拉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取代旧政权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民主政府。而且，因此随着战争开始变得愈加激烈——尽管美国人宣称胜利了——造就一个和平且温和的民族国家的战争目的形成了。

如我所指出的，民主运动正在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科特迪瓦、也门和叙利亚悄然展开。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友们一直支持这些运动，甚至达到了武装干涉利比亚的程度。然而许多国家也认识到，根本不能确定这些斗争的结果是产生一个比之前所存在的更加亲西方的政局。就这个问题展开的标准论辩围绕着以下几个焦点展开：民主制能够由一支占领军成功地施加给一个国家吗？民主制政府比其他形式的政府更有可能避免武装冲突吗？它们更关心人权吗？经济上更有活力吗？在我们逐渐削弱旧的、但非自由的盟友时，我们是否是在牺牲我们的战略利益——在继续进行反恐怖主

义战争，或减少对美国的毒品出口，或确保地区稳定等方面的利益？勇敢的罗伯特·卡普兰曾经写道：

西方的赌博是，只有民主制——恰恰是因为它授予每个利益集团一定的行动空间——才能逐步培养出像科特迪瓦的温和暴政和利比亚的非温和暴政所不能发展出的国家气质。

Robert Kaplan, "Beware the Void under Tyranny",

Financial Times, 6 April 2011

卡普兰的关切是，像伊拉克、利比亚、也门、科特迪瓦和其他此类后殖民社会，从未形成稳定的国家；而且它们的统治者通常安排自己偏爱的部落和家族，去残酷统治在人为划定的边界内组合在一起的各个凝聚力极强的群体，这事实上加剧了殖民主义的某些最糟糕的方面。

31 Skinner, *Machiavelli: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p. 75. 关于一种联系到亚当·斯密的类似比喻，参见 Roger D. Masters, *Machiavelli, Leonardo, and the Science of Power* (Notre Dame, 1995)，他认为马基雅维利是达尔文主义者的原型；也请参见 Mary G. Winkler, "Prophets of Modernity", *Hastings Center Report*, vol. 28, issue 2 (March/April 1998): 43。

32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4.

33 *The Shield of Achilles*, pp. 85–88.

34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ume 1: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UP, 1978)。

35 Harvey C. Mansfield, *Machiavelli's Virtue*.

36 *The Shield of Achilles*, p. 91.

37 这里绝无轻视以下几部杰出著作之意：Pasquale Villari, *Life and Times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trans. Linda Villari (1972)；Roberto Ridolfi, *Life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by (Chicago, 1954; trans. Cecil Grayson, 1963)；Ross King, *Machiavelli: Philosopher of Power* (Atlas, 2007)。这几部著作都非常有价值，但 de Grazia 的研究具有一种文字上

的优点，令人想起马基雅维利自己的风格。还有一部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而且颇具佛罗伦萨味道，参见 Niccolò Capponi, *An Unlikely Prince* (Da Capo, 2010)。

38 De Grazia, *Machiavelli in Hell*, p. 21.

39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2.

40 Ibid.

41 Ibid.

42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18.

43 *Discourses*, book II, chapter 2.

44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16.

45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58.

46 *Discourses*, book III, chapter 25.

47 *Summary of Lucchese Affairs*; 参见 J. R. Hale, *Machiavelli and Renaissance Italy*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1961), p. 198。

48 “我们伟大而杰出的执政大人们，考虑到就被人们所赞扬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组织一个统一、自由的共和国，在这样的共和国里，私人利益从属于共同福祉，而且对虚假荣耀的贪欲烟消云散，而鼓励与推动这一事业的乃是最杰出的枢机主教朱里奥·德·梅迪奇阁下，而且以万能天主之名，兹颁布以下规定和命令。”关于马基雅维利为梅迪奇家族所写的这两个白皮书的题目，需要解释一下。维罗里（*Niccolò's Smile*, pp. 219–220）和伯纳德（*Why Machiavelli Matters*, pp. 14–15）把马基雅维利1520年为里奥所写的这个备忘录称作《论小洛伦佐逝世后佛罗伦萨的政务》，这与 Judith A. Rawson 在 *Machiavelli: The History of Florence and Other Selections*, ed. Myron P. Gilmore (New York, 1970) 一书中的译名一致。维罗里和伯纳德把他1522年为朱利奥所写的备忘录称作《论改变佛罗伦萨的政府结构》，但阿兰·吉尔伯特在他为《马基雅维利主要著作集》所做的翻译中，把第一篇称作《论改变佛罗伦萨的政府结构》（*Chief Works*, 1: 101）。许多评论者在这个问题上重复了吉尔伯特的做法，这无疑是因为他们——以及我——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直都依赖他的翻译。但在这个问题上，我选择了同意维罗里等人的看法，原因只是为了更清楚一些。重要的事实是，无论我们如何命名它们，都存在两篇意义重大且内容类似的备忘录，它们都详尽地解释了马基

雅维利为佛罗伦萨所做的宪法设计。

49 马基雅维利把《论李维》和《卡斯特鲁乔·卡斯泰拉卡尼传》都献给了他。

50 马基雅维利把《卡斯特鲁乔·卡斯泰拉卡尼传》献给了他。

51 Lorenzo de' Medici, "Letter to the Magistrates of Florence", 7 December 1479, reprinted in Christopher Hibbert, *The House of Medici: Its Rise and Fall* (William Morrow, 1999) .

52 关于一篇有趣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文, 参见 Gopal Balakrishnan, "Future Unknown: Machiavelli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Left Review* 32 (March–April 2005)。

马基雅维利悖论之解

1 Skinner, *Machiavelli: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p. 40.

2 Cicero, *De officiis*, book II, chapter 9.

3 Skinner, *Machiavelli: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p. 41.

4 *The Prince*, chapter 15.

5 *The Prince*, chapter 18.

6 *The Prince*, chapter 16.

7 Garrett Mattingly, "Machiavelli's 'Prince' : Political Science or Political Satire?" ,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27 (1958) : 482; 参见 Andrew Villalon, "Machiavelli's 'Prince' : Political Science or Political Satire? Garrett Mattingly Revisited" , *Mediterranean Studies*, vol. 12 (2003) : 73。

8 Mary Dietz, "Trapping the Prince: Machiavelli and the Politics of Deception"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issue 3 (Sept. 1986) : 777.

9 参见 Peter Donaldson, "John Wolfe, Machiavelli, and the Republican Arcana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 in *Machiavelli and Mystery of State* (Cambridge UP, 1992) , p. 86。

10 Letter from Machiavelli to Francesco Vettori, 10 December 1513.

11 “马基雅维利是个正直的人, 也是个善良的公民; 但由于依附梅迪奇家族, 所以不得不在举国压迫之下把自己对自由的热爱伪装起来。他选择那样一位可诅咒的英雄切

萨雷·波吉亚这件事本身，就充分显示了他的秘密意图；而他的《君主论》一书中的准则与他的《论李维》和《佛罗伦萨史》两书相矛盾，也说明了这位深刻的政论家的读者们至今都是一些浅薄的或腐化的人。”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book III.

12 Renzo Sereno, “A Falsification by Machiavelli”, *Renaissance News*, vol.12, issue 3 (1959): 159–167.

13 Mary Dietz, “Trapping the Prince: Machiavelli and the Politics of Decep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issue 3 (Sept. 1986): 777.

14 关于马基雅维利著作中的“矛盾之处”，参见 Heinrich Kuhn, “Niccolò Machiavelli: A Good State for Bad People”, in Paul Richard Blum (ed.), *Philosophers of the Renaissance* (Catholic UP, 2010), p. 116, n. 3。

15 然而，如大家将会看到的，我的论证并不依赖这种日期界定。关于《君主论》和《论李维》的创作时间的界定，参见 Felix Gilbert,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Machiavelli’s *Discorsi*”,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14, issue 1 (1953): 137–139; Federico Chabod, *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 trans. David Moore (Bowes & Bowes, 1958), p. 12; Herbert Butterfield, “Professor Chabod and the Machiavelli Controversie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 issue 1 (1959): 81–83; Viroli, *Niccolò’s Smile* (Hill and Wang, 2002), pp. 154–155。

16 Giovanni Sartori, “What is ‘Politics’?”, *Political Theory*, vol. 1, issue 5 (1973): 10; 参见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De Principatibus*), ed. Brian Richardson (Manchester UP, 1979)。

17 关于《论李维》中对《君主论》的两次引用，Heinrich Kuhn 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参见 Heinrich Kuhn, “Niccolò Machiavelli: A Good State for Bad People”, in Paul Richard Blum (ed.), *Philosophers of the Renaissance* (Catholic UP, 2010), p. 119。尽管《论李维》中只在第二卷第2章提到一次《君主论》(*De Principe*)，但 Kuhn 论证说这很可能是一种省略。就我所知，没有哪个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研究成果证明他曾经把自己的著作称为 *Il Principe*。

18 Sayyid Hasan Islami, “Ethics and Politics Relationship” (part 1), *Rafed.net*, 16

October 2010, http://en.rafe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685&catid=78&Itemid=843; 参见 William T. Bluhm, "Machiavellian *Virtù* and the Emergence of Freedom Values: Machiavelli, 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ories of Group Process", in *Theori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Classics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Prentice Hall, 1978), p. 199; 也参见 Jacques Maritain, "The End of Machiavellianism",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 issue 1 (Jan. 1942): 1-33, 他称马基雅维利把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与政治相分离, 是“人类智识所遭受的最粗暴的突变”; Narayani Basu, "Morality and the State", *Philological Quarterly*, vol. 25 (1958): 25.

19 “所有这些劝告都是‘设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至于目的是否合理、是否善良的问题这里并不涉及, 而只是为了达到目的, 人们必须这样做。一个医生为把病人完全治愈做出的决定, 和一个放毒者为了保证把人毒死做出的决定, 就它们都是服务于意图的实现来说, 在价值上没什么两样。’(康德)这些话是对马基雅维利的态度和方法的精确描述。他从来不对政治行动进行责备或赞扬, 而纯粹是给予一种描述性的分析, 和医生对某种疾病所做的描述用的是同样的方式。……马基雅维利以化学家研究化学反应的同样方式来研究政治行动。确实, 一个在实验室里制作一种剧毒药的化学家对这种毒药的后果是不负责任的。毒药在熟练的医生手里, 可能会救一个人的生命; 在谋杀者手里, 却可以害人, 在这两种情况下, 我们都不能对化学家给予赞扬或责备。” Ernst Cassirer, *The Myth of the State* (Yale, 1946), p. 154。

20 Augustin Renaudet, *Machiavel: Etude d'histoire des doctrines politiques* (Paris, 1942)。他认为, 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 一种科学路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刻”。

21 Leonardo Olschki, *Machiavelli the Scientist* (Berkeley, 1945); 参见“Machiavelli scienziato”, *Pensiero politico*, vol. 2 (1969): 509-535。

22 参见 Arthur Applbaum, *Ethics for Adversaries: The Morality of Roles in Public and Professional Life* (Princeton UP, 1999); Arthur Applbaum, "Professional Detachment: The Executioner of Pari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09 (1995): 458-486。

23 Robin West, "The Zealous Advocacy of Justice in a Less Than Ideal Legal World",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51 (1999): 973, 975。

24 Robin Radtke, "Role Morality in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How Do We Compare to

Physicians and Attorneys?” ,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 79 (May 2008) : 279.

25 关于一种富有说服力的批判, 参见 J. Andre, “Role Morality as a Complex Instance of Ordinary Morality” ,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28 (1991) : 73–80。

26 参见 Daniel Markovits, *A Modern Legal Ethics: Adversary Advocacy in a Democratic Age* (Princeton UP, 2008) 。 See also Gilbert Harman, *The Nature of Morality* (Oxford UP, 1977) 。

27 参见 Greg Russell, “Machiavelli’s Science of Statecraft: The Diplomacy and Politics of Disorder” ,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16, issue 2 (June 2005) : 227. Russell 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 角色道德实际上掌控了马基雅维利对外交的理解和实践。

28 参见 Leo Gross, “The Criminality of Aggressive War”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1, issue 2 (April 1947) , 他在违法和犯罪之间进行了区分, 但是拒绝事后辩护 (ex post facto defence) , 他的理由是任何此类运用国际法的推定都能够被国际共同体推翻。

29 Skinner, *Machiavelli: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p. 42.

30 Hillary Zamora 宣称, 即使没有来生的话, 不朽也可以通过荣耀获得, 而且暗示马基雅维利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参见 “A World without a Saving Grace: Glory and Immortality in Machiavelli” ,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28, issue 3 (Autumn 2007) : 449。

31 Cary J. Nederman, “Amazing Grace: Fortune, God and Free Will in Machiavelli’s Thought” ,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0, issue 4 (Oct. 1999) : 617; 参见 Viroli, *Machiavelli’s God*。

32 *The Prince*, chapter 18 (强调标示为本书作者所加) 。

33 G. R. Berridge, “Machiavelli: Human Nature, Good Faith, and Diplomacy”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issue 4 (Oct. 2001) : 539.

34 参见 Hersch Lauterpacht, “Chapter XIII: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Doctrine ‘Rebus Sic Stantibus’” , in *The Function of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xford, 1933) 。对比一下《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62 条 (1969 年通过, 1980 年生效) , 可从以下网址获得: http://untreaty.un.org/ilc/texts/instruments/english/conventions/1_1_1969.pdf。也请比较 *Discourses*, book III, chapter 2 (“被迫做出的许诺不应该遵守”) 。

35 *Discourses*, book I, chapter 26.

36 《联合国 1973 年安全理事会决议》(2011 年 3 月 17 日), 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11/268/39/PDF/N1126839.pdf>。该文件授权运用武力反对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的残酷政权。

37 Najemy 指出, 马基雅维利与维托里的通信使他从这种立场转变为更加怀疑人有能力掌控“事件的无法控制的易变性”。参见 Najemy, *Between Friends: Discourses of Power and Desire in the Machiavelli-Vettori Letters of 1513-1515* (Princeton, 1993)。

38 我的解释受到了 Najemy 对 *si guarda al fine* (依据结果进行判断) 这个著名短语的极富说服力的重建的鼓励, 参见 *Between Friends*, pp. 187-188。

39 *The Prince*, chapter 25.

40 Felix Gilbert,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sm in Machiavelli’s *Prince*”,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vol. 1 (1954): 38-48.

41 Sheldon Wolin, *Politics and Vision* (Little Brown, 1960), pp. 203-204.

42 Hugo Jaekel, “What is Machiavelli Exhorting in His Exhortatio? The Extraordinaries”, in Jean-Jacques Marchand (ed.), *Niccolò Machiavelli: Politico, Storico, Letterato* (Rome, 1996), pp. 59-84; and Francesco Bausi, “Petrarca,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in Marchand, *op. cit.*, pp. 41-58.

43 Leo Strauss, “Machiavelli’s Intention: *The Prince*”, in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44 比较 Thomas Berns, “Knowing the Occasion: Rome and Fortune in Machiavelli”,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vol. 28, issue 2 (2007): 89-102。

45 到 1515 年初, 已经很显然的是, 里奥决定让朱利亚诺成为“罗马涅的统治者, 而由于保罗·维托里与朱利亚诺是好朋友, 因此他几乎肯定要成为这个新的君主国里某个城市的总督……保罗和马基雅维利开始在佛罗伦萨会面, 商讨如何统治一个新君主国, 请马基雅维利提供建议。马基雅维利建议保罗效仿切萨雷·波吉亚……专注于将罗马涅统一为一个国家”。Ross King, *Machiavelli: Philosopher of Power*, p. 164。

46 参见马基雅维利 1513 年 8 月 10 日写给维托里的信: *The Letters of Machiavelli*, ed. and trans. Allan Gilbert (Univ. of Chicago, 1988), p.124。

结语 撒旦的神学家

1 F. Scott Fitzgerald 于 1940 年写给他女儿 Frances Scott Fitzgerald 的信，收录在 Edmund Wilson (ed.) , *The Crack-Up* (Scribners, 1945)。

2 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的卫生保健法令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它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在市场中购买健康保险——而不是建立一种国家保健服务，或者向公众征税以支付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因而，这个计划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国家策略。这样，它在这个问题上从两个方面都引起了民族国家政治组织的反对：自由主义者会喜欢一种单一保险人体系（如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而保守派则愤怒于他们为自己投保或完全不投保的自由被剥夺了。因而，市场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分歧完全不是一个左—右的问题：在保守派接受反堕胎法令或反色情法律时，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与自由主义者在提议憎恨言论罪或倡议纠正歧视行动措施时所做事情，是完全相同类型的事情。他们正在利用国家来促进国民价值，以对抗市场的力量。

3 约翰·迈克考米克 (John McLormick) 在好几种著作中发展了这种观点，例如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Controlling Elites with Ferocious Populism"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issue 2 (June 2001) ;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Cambridge, 2011) ; "Machiavelli against Republicanism: On the Cambridge School's 'Guicciardinian Moments' " , *Political Theory*, vol. 31, issue 5 (Oct. 2003) : 615.

4 *The Prince*, chapter 17.

5 *The Prince*, chapter 16.

6 *The Prince*, chapter 18.

7 电影《人言可畏》(1951 年) 中沙德森对埃维尔教授的说的话。

8 参见 A. J. Parel, "Machiavelli's Notions of Justice: Text and Analysis" , *Political Theory*, vol. 18, issue 4 (Nov. 1990)。

致谢

1 Machiavelli, *The Literary Works of Machiavelli: Mandragola, Clizia, A Dialogue on Language, and Belfagor, with Selections from the Private Correspondence*, ed. J. R. Hale (Greenwood, 1979) .

2 在莎士比亚戏剧的所有角色中，对观众来说，理查德三世在愤世嫉俗方面最像马基雅维利，但即使是他也不公正地遭受到了毁灭性伤残，而这也为他赢得了我们的同情。

3 Victoria Kahn, 'Greeks in Florence' , i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010) , reviewing Capponi's *An Unlikely Prince*, Viroli's *Machiavelli's God*, and Benner's *Machiavelli's Ethics*. 今日，关于这一点的一个巧妙例子或许可以在哈罗德·品特的戏剧《背叛》中发现，剧中，剧作家以倒叙的方式展现了一场不贞恋情，一开始登场的是一个背叛了他最好的朋友的男人，告解说自己感到受到了背叛，因为这位好朋友从未告诉他知道自己知道这件事；或者也可以在汤姆·斯托帕德妙趣横生的名作《世外桃源》中发现，其中各个人物都有两个世纪前的对应者（各自由同一位演员扮演）；或者也可以在迈克尔·弗雷恩的《哥本哈根》中发现，其中同一个事件在若干年后被每一个参与者给出了各自不同的描述。

4 然而曾有人主张，伯纳德欢迎被排除在法律业务之外，以保持一种低度的反梅迪奇派形象；参见：Robert Black, 'Debts, Dowries, Donkeys: The Diary of Niccolò Machiavelli's Father, Messer Bernardo' , in *Quattrocento Florenc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8, issue 479 (Nov. 2003) : 1368.

5 Victoria Kah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7, issue 4 (Dec. 1995) : 956 (reviewing Najemy's *Between Friends*) .

6 Kahn, 'Greeks in Florence'。卡恩的评论再次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对马基雅维利来说，行为总是对已存必要性的反应，而且必要性并不对行动构成如此大的障碍以至于会刺激行为者制定他们自己的法律并用法律规范他们自己的自由。”

书中引自《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段落和文字，都是我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学者、小说家丽萨·希尔顿·摩罗（Lisa Hilton Moro）通力合作的产物，但是这位优秀的作者不必为我作为著者的决定承担责任。我一直试图呈现出马基雅维利的语句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重现他的作品的笔调、风格和目的，而不仅仅是直译。为了纠正这种自以为是以及由于我的无知和愚蠢而可能已经导致的错误，我在参考文献中提供了我所喜爱的马基雅维利译者们的各个卓越版本。当然，文责完全由我来负。

- Machiavelli: The Prince* (trans. Russell Price) (Cambridge UP, 2000).
- The Prince* (trans. Peter Bonadella) (Oxford UP, 2008).
- The Prince* (trans. Peter Constantine) (Modern Library, 2008).
- The Prince* (trans. Harvey C. Mansfie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dn, 1998).
- The Prince* (trans. David Wootton) (Hackett, 1995).
- Discourses on Livy* (trans. Harvey C. 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Discourses on Livy* (trans. Julia Conway Bonadella and Peter Bonadella) (Oxford UP, 2009).
- Machiavelli: 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trans. and ed. Allan Gilbert), 3 vols (Duke UP, 1989).
-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chiavelli* (trans. Peter Constantine) (Modern Library, 2009).
- Andre, J., 'Role Morality as a Complex Instance of Ordinary Morality',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28 (1991): 73–80.
- Applbaum, Arthur Isak, *Ethics for Adversaries: The Morality of Roles in Public and Profession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9).
- Applbaum, Arthur Isak, 'Professional Detachment: The Executioner of Pari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09 (1995): 458–86.
- Ascoli, Albert Russell, 'Review: *Between Friends: Discourses on Power and Desire in the Machiavelli–Vettori Letters of 1513–1515*', *Speculum*, vol. 70, issue 4 (Oct. 1995): 952–5.
- Atkinson, James B., and David Sices, eds.,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Their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Dekalb, IL: Northern Illinois UP, 1996).

- Austin, Kenneth, 'Review: *Well-Ordered License: On the Unity of Machiavelli's Thought*',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33, issue 2 (2002): 539–40.
- Balaban, Oded, 'The Human Origins of Fortuna in Machiavelli's Thought',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11, issue 1 (1990): 21–36.
- Baron, Hans, 'The *Principe* and the Puzzle of the Date of Chapter 26',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vol. 21, issue 1 (1991): 83–102.
- Basu, Narayani, 'Morality and the State', *Philological Quarterly*, vol. 25 (1958): 25–8.
- Bausi, Francesco, 'Petrarca, Machiavelli, *Il Principe*', in Jean-Jacques Marchand, ed., *Niccolò Machiavelli: Politico, Storico, Letterato* (Rome: Salerno Editrice, 1996): 41–58.
- Bawcutt, N. W., 'The "Myth of Gentillet" Reconsidered: An Aspect of Elizabethan Machiavellianism',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99, issue 4 (Oct. 2004): 863–74.
- Belliotti, Raymond A., 'Machiavelli and Machiavellianism', *Journal of Thought*, vol. 13 (Nov. 1978): 293–300.
- Benner, Erica, *Machiavelli's Eth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9).
- Berlin, Isaiah,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An Anthology of Essay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7): 269–325.
- Berns, Thomas, 'Knowing the Occasion: Rome and Fortune in Machiavelli',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vol. 28, issue 2 (2007): 89–102.
- Berridge, G. R., 'Machiavelli: Human Nature, Good Faith, and Diplom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issue 4 (Oct. 2001): 539–56.
- Bertelli, Sergio, 'Machiavelli and Soderini',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28, issue 1 (Spring 1975): 1–16.
- Black, Robert, 'Debts, Dowries, Donkeys: The Diary of Niccolò Machiavelli's Father, Messer Bernardo', in *Quattrocento Florenc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8, issue 479 (Nov. 2003): 1368–70.
- Bluhm, William T., *Theori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Classics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3rd edn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78).
- Bobbitt, Philip, *Constitutional Fate: Theory of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Oxford UP, 1982).
- Bobbitt, Philip,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Oxford: Blackwells, 1992).
- Bobbitt, Philip, *Terror and Consent: The War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Knopf, 2008).
- Bobbitt, Philip, *The Shield of Achilles: War, Peace,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New York: Knopf, 2002).

- Bock, Gisela et al.,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0).
- Bodin, Jean,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5).
- Bondanella, Peter E., *Machiavelli and the Art of Renaissance History* (Detroit: Wayne State UP, 1971).
- Bondanella, Peter E. and Mark Musa, eds. and trans., *The Portable Machiavelli* (New York: Penguin, 1971).
- Bookman, John T., 'Machiavelli Scholarship: An Essay and List of Works in English', *Philosophy Research Archives* 9 (1537) (1983).
- Broad, C. D., *Five Types of Ethical Theory*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 1930).
- Butterfield, Herbert, 'Professor Chabod and the Machiavelli Controversies',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 issue 1 (March 1959): 78–83.
- Calabresi, Guido, and Philip Bobbitt, *Tragic Choices* (New York: Norton, 1978).
- Capponi, Niccolò, *An Unlikely Prince: The Life and Times of Machiavelli* (Cambridge, MA: Da Capo, 2010).
- Cassidy, Ben, 'Machiavelli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Gunpowder Weapons in the *Art of War*',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7, issue 2 (April 2003): 381–404.
- Cassirer, Ernst, *The Myth of the State* (New Haven: Yale UP, 1946).
- Chabod, Federico, *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 trans. David Moore (Cambridge: Bowes & Bowes, 1958).
- Cicero, Marcus Tullius, *On Duties*, ed. E. M. Atkins, trans. Miriam T. Griffi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1).
- Colish, Marcia L., 'Cicero's "De Officiis" and Machiavelli's "Princ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9, issue 4 (Winter 1968): 80–93.
- Cooper, Robert,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Atlantic, 2003).
- Cooper, Roslyn Pesman, 'Machiavelli, Francesco Soderini and Don Michelotto', *Nuovo Rivista Storica*, vol. 66, issue 3/4 (Sept. 1982): 342–57.
- Cover, Robert, *Narrative, Violence, and the Law: The Essays of Robert Cov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 Cover, Robert M., *Justice Accused* (New Haven: Yale UP, 1975).
- D'Andrea, Antonio,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ontext of Innocent Gentillet's Anti-Machiavel',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23, issue 4 (Winter 1970): 397–411.

- De Grazia, Sebastian, *Machiavelli in Hell* (New York: Vintage, 1994).
- Del Lucchese, Filippo, 'Crisis and Power: Economics, Politics and Conflict in Machiavelli's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30, issue 1 (Spring 2009): 75–96.
- Dietz, Mary, 'Trapping the Prince: Machiavelli and the Politics of Decep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issue 3 (Sept. 1986): 777–99.
- DiMaria, Salvatore, 'Machiavelli's Ironic View of History: The "Istorie Fiorentine"',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45, issue 2 (Summer 1992): 248–70.
- Dixon, M. F. N., *The Politicke Courtier: Spenser's The Faerie Queene as a Rhetoric of Justice* (Montreal: McGill-Queen's UP, 1996).
- Donaldson, Peter, *Machiavelli and Mystery of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2).
- Eldar, Dan, 'Glory and the boundaries of public morality in Machiavelli's thought',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7, issue 3 (Winter 1986): 419–38.
- Erwin, Sean, 'A War of One's Own: Mercenaries and the Theme of Arma Aliena in Machiavelli's *Il Princip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18, issue 4 (Sept. 2010): 541–74.
- Ferguson, Niall,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2008).
- Ferguson, Niall,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London: Allen Lane, 2001).
- Fitzgerald, Desmond, 'Machiavelli and Histor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vol. 43 (1969): 121–9.
- Fitzgerald, F. Scott, *The Crack-Up*, ed. Edmund Wilson (New York: Scribners, 1945).
- Garver, Eugene, 'After "Virtù": Rhetoric, Prudence and Moral Pluralism in Machiavelli',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17, issue 2 (Summer 1996): 195–222.
- Garver, Eugene, 'Machiavelli and the Politics of Rhetorical Invention', *Clio*, vol. 14, issue 2 (Winter 1985): 157–78.
- Garver, Eugene, 'Machiavelli: Rhetoric and Prudence', in Patricia Vilches and Gerald Seaman, eds., *Seeking Real Truths: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Machiavelli* (Leiden: Brill, 2007): 103–22.
- Gat, Azar, 'Machiavelli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lassical Notion of the Lessons of History in the Study of War', *Military Affairs*, vol. 57 (Oct. 1988): 203–5.

- Gilbert, Felix, 'Bernardo Rucellai and the Orti Oricellari: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12 (1949): 101-31.
- Gilbert, Felix,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65).
- Gilbert, Felix, 'Machiavelli: The Renaissance in the Art of War',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6): 11-31.
- Gilbert, Felix,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Machiavelli's *Discorsi*',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14, issue 1 (1953): 137-56.
- Gilbert, Felix, 'The Concept of Nationalism in Machiavelli's *Prince*',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vol. 1 (1954): 38-48.
- Ginzburg, Carlo, 'Pontano, Machiavelli and Prudence: Some Further Reflections', in Curto, Diogo Ramada et al., eds., *From Florence to the Mediterranean and Beyond: Essays in Honour of Anthony Molho* (Florence: Olschki, 2009): 117-26.
- Goss, Tracy, *The Last Word on Power: Re-invention for Leaders and Anyone Who Must Make the Impossible Happen* (New York: Doubleday, 1996).
- Gray, John, *Hayek on Liberty*, 3rd edn (London: Routledge, 1998).
- Gross, Leo, 'The Criminality of Aggressive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1, issue 2 (April 1947): 205-25.
- Hale, J. R., *Machiavelli and Renaissance Italy* (London: 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1961).
- Hancock, Curtis L., 'Cicero Versus Machiavelli: Does the End Justify the Means?',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vol. 16, issue 6 (Nov.-Dec. 1994): 14-18.
- Harman, Gilbert, *The Nature of Morality* (New York: Oxford UP, 1977).
- Haywood, Eric, 'Touring the Hall of Fam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62, issue 4 (Autumn 2000): 833-5.
- Hibbert, Christopher, *The House of Medici: Its Rise and Fall* (New York: Morrow, 1999).
- Hobbes, Thomas, *Leviatha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9).
- Hörnqvist, Mikael, 'Perché non si usa allegare i Romani: Machiavelli and the Florentine militia of 1506',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55, issue 1 (2002): 148-91.
- Hullington, Mark, *Citizen Machiavelli*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3).
- Islami, Sayyid Hasan, 'Ethics and Politics Relationship - Part 1', *Rafed.net*,

- 16 October 2010, http://en.rafed.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685&catid=78&Itemid=843.
- Jaeckel, Hugo, 'What is Machiavelli Exhorting in His Exhortatio? The Extraordinaries', in Jean-Jacques Marchand, ed., *Niccolò Machiavelli: Politico, Storico, Letterato* (Rome: Salerno Editrice, 1996): 59–84.
- Kahn, Victoria, 'Greeks in Florence', i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9 Dec. 2010.
- Kahn, Victoria, 'Reading Machiavelli: Innocent Gentillet's Discourse on Method', *Political Theory*, vol. 22, issue 4 (Nov. 1994): 539–60.
- Kahn, Victoria, 'Review: *Between Friends: Discourses of Power and Desire in the Machiavelli-Vettori Letters of 1513–1515*',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7, issue 4 (Dec. 1995): 956–7.
- Kahn, Victoria, 'Virtù and the Example of Agathocles in Machiavelli's *Prince*', *Representations*, vol. 13 (Winter 1986): 63–83.
- Kane, Thomas, 'Building Thrones: Political Effect as an Emerging Principle of War',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4, issue 5 (Dec. 2005): 431–8.
- Kaplan, Robert, 'Beware the Void under Tyranny', *Financial Times*, 6 April 2011.
- Kececi, Dilek, 'Satan as the Machiavellian Hero in "Paradise Lost"', *Ethos: Dialogu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 issue 1 (Jan. 2009): 1–7.
- Khoury, Joseph, 'Marlowe's Tamburlaine: Idealized Machiavellian Prince', in Patricia Vilches and Gerald Seaman, eds., *Seeking Real Truths: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Machiavelli* (Leiden: Brill, 2007): 329–56.
- King, Ross, *Machiavelli: Philosopher of Power* (New York: Atlas Books/HarperCollins, 2007).
- Kissinger, Henry, *The White House Years*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79).
- Kubik, Timothy R. W., 'Is Machiavelli's Cannon Spiked?',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1, issue 1 (Jan. 1997): 7–30.
- Kuhn, Heinrich, 'Niccolò Machiavelli: A Good State for Bad People', in Paul Richard Blum, ed., *Philosophers of the Renaissance* (Washington: Catholic UP, 2010): 116–23.
- Lauterpacht, Hersch, *The Function of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xford: Oxford UP, 1933).
- Leslie, Margaret, 'In Defense of Anachron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 8, issue 4 (Dec. 1970): 433–47.
- Levinson, Sanford, *Our Undemocratic Constitution: Where the Constitution Goes Wrong (And How We the People Can Correct It)* (New York: Oxford, 2006).

- Lukes, Timothy J., 'Descending to the Particulars: The Piazza and Machiavelli's Republican Modes and Order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1, issue 2 (April 2009): 520-32.
- Lukes, Timothy J., 'Martialing Machiavelli: Reassessing the Military Ref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issue 4 (Nov. 2004): 1089-1108.
- Lukes, Timothy J., 'Lionizing Machiavell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issue 3 (Sept. 2001): 561-75.
- McCormick, John P., 'Machiavelli against Republicanism: On the Cambridge School's "Guicciardinian Moments"', *Political Theory*, vol. 31, issue 5 (Oct. 2003): 615-43.
- McCormick, John P.,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1).
- McCormick, John,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Controlling Elites with Ferocious Popu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issue 2 (June 2001): 297-313.
- Machiavelli, Niccolò, *I Primi Scritti Politici*, ed. Jean-Jacques Marchand (Padua: Antenore, 1975).
- Machiavelli, Niccolò, *Il Principe (De Principatibus)*, ed. Brian Richards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79).
- Machiavelli, Niccolò, *The Literary Works of Machiavelli: Mandragola, Clizia, A Dialogue on Language, and Belfagor, with Selections from the Private Correspondence*, ed. J. R. Hale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79).
- Manning, John F., 'The Absurdity Doctrine',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6 (2003): 2387-486.
- Mansfield, Harvey C., *Machiavelli's New Modes and Orders: A Study of the 'Discourses on Livy'* (Ithaca: Cornell UP, 1979).
- Mansfield, Harvey C., *Machiavelli's Virt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Mansfield, Harvey C., 'Review: Machiavelli',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3, issue 4 (1999): 964-5.
- Maritain, Jacques, 'The End of Machiavellianism',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 issue 1 (Jan. 1942): 1-33.
- Markovits, Daniel, *A Modern Legal Ethics: Adversary Advocacy in a Democratic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8).
- Marlowe, Christopher, *The Jew of Malta* (New York: Dover, 2003).
- Masters, Roger D., *Fortune Is a River: Leonardo Da Vinci and Niccolò*

- Machiavelli's Magnificent Dream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Florentine History* (New York: Plume, 1999).
- Masters, Roger D., *Machiavelli, Leonardo, and the Science of Power* (Notre Dame, IN: Notre Dame Press, 1995).
- Mattingly, Garrett, 'Machiavelli's "Prince": Political Science or Political Satire?',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27 (1958): 482-91.
- Minter, Adam, 'Machiavelli, Violence and History', *Harvard Review of Philosophy*, vol. 2, issue 1 (Spring 1992): 25-33.
- Nagel, Thomas, 'War and Massacre',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1 (1972): 123-44.
- Najemy, John M., *Between Friends: Discourses of Power and Desire in the Machiavelli-Vettori Letters of 1513-1515*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3).
- Najemy, John M.,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chiavelli*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0).
- Nederman, Cary J., 'Amazing Grace: Fortune, God and Free Will in Machiavelli's Though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0, issue 4 (Oct. 1999): 617-38.
- Nederman, Cary J., 'Machiavelli and Moral Character: Principality, Republic and the Psychology of "Virtù"',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21, issue 3 (Autumn 2000): 349-64.
- Nederman, Cary J., 'Niccolò Machiavelli',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Autumn 2009 edition), ed. Edward N. Zalta, accessible at <http://plato.stanford.edu>.
- Nederman, Cary J., 'The Renaissance of a Renaissance Man', *European Legacy*, vol. 4, issue 5 (Oct. 1999): 102-5.
- Neely, Jr., Mark E., *The Fate of Liberty: Abraham Lincoln and Civil Liberties* (Oxford: Oxford UP, 1991).
- Norton, Paul E., 'Machiavelli's Road to Paradise: "The Exhortation to Penitenc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4 (Spring 1983): 31-42.
- Olschki, Leonardo, 'Machiavelli scienziato', *Pensiero politico*, vol. 2 (1969): 309-35.
- Olschki, Leonardo, *Machiavelli the Scientist* (Berkeley, CA: Gillick, 1945).
- Oppenheimer, Paul, *Machiavelli: A Life Beyond Ideology* (London: Continuum, 2011).
- Parel, A. J., 'Machiavelli's Notions of Justice: Text and Analysis', *Political Theory*, vol. 18, issue 4 (Nov. 1990): 528-44.

- Parent, Joseph M., 'Machiavelli's Missing Romulus and the Murderous Intent of "The Princ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26, issue 4 (Winter 2005): 625-45.
- Parkinson, G. H. R., 'Ethics and Politics in Machiavelli',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5 (Jan. 1955): 37-44.
- Pellerin, Daniel, 'Machiavelli's Best Friend',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27, issue 3 (Autumn 2006): 423-53.
- Phillips, Mark, 'Representation and Argument in Florentine Historiography',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issue 10 (1986): 48-63.
- Plaw, Avery, 'Prince Harry: Shakespeare's Critique of Machiavelli', *Interpretation*, vol. 33, issue 1 (Fall/Winter 2005): 19-44.
- Pocock, J. G. A.,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5).
- Pontano, Giovanni, 'De Principe', in E. Garin, ed., *Prosatori Latini del Quattrocento* (Milan: Riccardo Ricciardi, 1952): 1021-67.
- Quintilian, *Institutio Oratoria*, trans. H. E. Butl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20).
- Radtke, Robin, 'Role Morality in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How Do We Compare to Physicians and Attorney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 79 (May 2008): 279-97.
- Rahe, Paul A., ed., *Machiavelli's Liberal Republican Legacy*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6).
- Renaudet, Augustin, *Machiavel; Étude d'histoire des doctrines politiques* (Paris: Gallimard, 1942).
- Reston, James, *Dogs of God* (New York: Anchor, 2006).
- Ridolfi, Roberto, *Life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trans. Cecil Gray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 Riebling, Barbara, 'Milton on Machiavelli: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tate in *Paradise Lost*', *Renaissance Quarterly*, vol. 49, issue 3 (Autumn 1996): 573-97.
- Roazen, Paul, 'A Partnership of Geniuses?', *American Scholar*, vol. 67, issue 4 (Autumn 1998): 141-3.
- Russell, Greg, 'Machiavelli's Science of Statecraft: The Diplomacy and Politics of Disorder',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16, issue 2 (June 2005): 227-50.
- Salter, F. M., 'Skelton's *Speculum Principis*', *Speculum*, vol. 9 (1934): 25-37.

- Sartori, Giovanni, 'What is "Politics"?', *Political Theory*, vol. 1, issue 1 (1973): 5–26.
- Sasso, Gennaro, *Machiavelli e Cesare Borgia* (Rome: Edizioni Dell'Ateneo, 1966).
- Scaglione, Aldo, 'Review: *Discourses on Machiavelli*',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32, issue 2 (June 1971): 214–18.
- Sereno, Renzo, 'A Falsification by Machiavelli', *Renaissance News*, vol. 12, issue 3 (1959): 159–67.
- Shaw, C. K. Y., 'Quentin Skinner on the Proper Meaning of Republican Liberty', *Politics*, vol. 23, issue 1 (Feb. 2003): 46–56.
- Shell International Ltd., *Shell Global Scenarios to 2025: Trends, Trade-Offs, and Choices* (London: Shell, 2005).
- Skinner, Quentin, *Machiavelli: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P, 2000).
- Skinner, Quentin,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ume 1: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78).
- Stephens, J. N., 'Ciceronian Rhetoric and the Immorality of Machiavelli's Prince', *Renaissance Studies*, vol. 2, issue 2 (Oct. 1988): 258–67.
- Strathern, Paul, 'Machiavelli, Leonardo and Borgia: A Fateful Collusion', *History Today*, vol. 59, issue 3 (March 2009): 15–19.
- Strauss, Leo,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 Thayer, Lee, 'Review: *Machiavelli and the History of Prudence*', *Clio*, vol. 17, issue 3 (Spring 1988): 309.
- Unger, Miles, *Machiavelli: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 Vilches, Patricia, 'Review: *Discourses on Livy* by Niccolò Machiavelli',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36, issue 1 (Spring 2005): 265–7.
- Villalon, Andrew, 'Machiavelli's "Prince": Political Science or Political Satire? Garrett Mattingly Revisited', *Mediterranean Studies*, vol. 12 (2003): 73–101.
- Villari, Pasquale, *Life and Times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trans. Linda Villari (London: Scholarly Press, 1972).
- Viroli, Maurizio, 'Books in Review', *Political Theory*, vol. 19, issue 2 (May 1991): 292–3.
- Viroli, Maurizio, *How to Read Machiavelli* (London: Granta UK, 2008).
- Viroli, Maurizio, *Machiavelli* (Oxford: Oxford UP, 1998).
- Viroli, Maurizio, *Niccolò's Smile* (New York: Hill & Wang, 2002).

- Viroli, Maurizio, and Antony Shugaar, *Machiavelli's God*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10).
- Walzer, Michael, 'Political Action: The Problem of Dirty Hands', in Sanford Levinson, ed., *Torture* (Oxford: Oxford UP, 2004): 61-77.
- Watson, Adam,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2).
- Weissberger, L. Arnold, 'Machiavelli and Tudor England',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42 (1927): 589-607.
- West, Robin, 'The Zealous Advocacy of Justice in a Less than Ideal Legal World',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51 (1999): 973-89.
- Whitfield, J. H., *Discourses on Machiavelli* (Cambridge: Heffer, 1969).
- Whitfield, J. H., 'On Machiavelli's Use of *Ordini*', *Italian Studies*, vol. 10 (1955): 19-39.
- William E. Wiethoff, 'The Martial "Virtue" of Rhetoric in Machiavelli's *Art of War*',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 64, issue 3 (Oct. 1978): 304-12.
- Winkler, Mary G., 'Prophets of Modernity', *Hastings Center Report*, vol. 28, issue 2 (March/April 1998): 43-4.
- Wolin, Sheldon, *Politics and Vision*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60).
- Wood, Neal, 'Mansfield on Machiavelli',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5, issue 1 (1985): 45-52.
- Zamora, Hillary, 'A World without a Saving Grace: Glory and Immortality in Machiavelli',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28, issue 3 (Autumn 2007): 449-68.

索引

(本索引依据英文原本索引翻译,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bortion 堕胎, 157, 216

Addams, Charles 查尔斯·亚当斯, 136

Adrian VI, Pope 教皇艾德里安六世, 104, 129, 178

affirmative action 纠正歧视行动, 157

Afghanistan 阿富汗, 88n, 208

Africa 非洲, 81

Agathocles 阿加托克雷, 54—5, 142, 206

Agnadello, battle of 安那迪劳战役, 173

Alamanni, Luigi 路易吉·阿拉曼尼, 10, 125, 129, 177—8, 180

Alexander VI, Pope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24, 27, 62, 92, 100—3, 109—10, 168—9, 171

Alfonzo, king of Naples 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 168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145

American Civil War 美国内战, 51

Ancona 安科纳, 101

Appiano, Jacopo d' 雅各布·德·阿皮亚诺, 170

Aquinas, Thomas 托马斯·阿奎那, 29

aretaic theories 德性理论, 45n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3, 29, 91

armies, volunteer 志愿军, 156

see also citizen militias 也参见国民军

Arno, river 亚诺河, 67

Art of War, The 《用兵之道》, 39, 61, 68, 115, 177, 179

artillery 火炮, 21, 69, 202

Athens 雅典, 15, 50, 56

Attlee, Clement 克莱门特·艾德礼, 81

autocracy 独裁, 4, 46, 50, 134

Bacon, Francis 弗朗西斯·培根, 11, 132

Baghdad 巴格达, 89n

Baglioni, Malatesta 马拉泰斯塔·巴利奥尼, 106

Baglioni, Orazio 奥拉齐奥·巴格里奥尼, 178

Balakrishnan, Gopal 戈帕尔·巴拉克里什南, 131, 205

Barckley, Sir Richard 理查德·巴克利爵士, 11

Baron, Hans 汉斯·巴隆, 205

Basques 巴斯克人, 153

Bentivoglio, Giovanni 乔万尼·本蒂沃利奥, 80

Berlin, Isaiah 以赛亚·伯林, 7, 37

Bismarck, Otto von 奥托·冯·俾斯麦, 155

Bobbitt, Philip 菲利普·博比特

The Shield of Achilles 《阿喀琉斯之盾》, 59n, 69n, 70n, 87n, 121, 162, 182, 192

- Terror and Consent* 《恐怖与同意》, 122, 182, 192, 195
- Boccaccio, Giovanni 乔万尼·卜伽丘, 47
- Bodin, Jean 让·博丹, 59
- Bologna 博洛尼亚, 80, 101, 103, 106, 172, 174
- Borges, Jorge Luis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82
- Borgia, Cesare 切萨雷·波吉亚, 4, 27, 67, 109—10, 134, 144, 211
- conquest of the Romagna 征服罗马涅, 54, 57, 92, 102—3, 148—9, 169—71, 215
- fall and exile 失败与流亡, 109—10, 172
- and liberation of Italy 与意大利的解放, 98, 100, 102—3, 148—9
- murder of *condottieri* 谋杀雇佣兵, 64—5, 171
- Borgia, Lucrezia 卢克蕾齐亚·波吉亚, 102
- Boscoli, Pietro Paolo 彼得洛·保罗·博斯科利, 175
- Botticelli, Sandro 桑德罗·波提切利, 47
- Bracciano 布拉西诺, 101, 103
- Broad, C. D. 布劳德, 45
- Brunei 文莱, 151
- Bruno, Giordano 乔尔丹诺·布鲁诺, 73
- Buonodelmonti, Zanobi 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 125, 129, 177—8, 180
- Calixtus III, Pope 教皇加里斯多三世, 100
- Camelot* 百老汇, 13n
- Camerino 卡梅里诺, 101, 103
- Capponi conspiracy 卡普尼密谋, 55, 75, 174—5
- Carpi 卡尔皮, 177
- Carter, Jimmy 吉米·卡特, 88n, 145
- Cassirer, Ernst 恩斯特·卡西尔, 90—1, 140, 213
- Castel Sant' Angelo 圣天使堡, 105, 180

Castiglione, Baldassare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奈, 3n, 136n
Castracani, Castruccio 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 90—1, 124, 177
Caudine Forks 考迪纳隘口, 48—9
Ceri 切里, 103
Cervia 切尔维亚, 106
Cesena 切塞纳, 54, 101, 171
Charles V, Emperor 查尔斯五世皇帝, 60, 62, 99, 105—7, 177—80
Charles I, King of Spain 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一世, 174, 177
Charles VIII, King of France 法兰西国王查尔斯八世, 21, 67, 101—2, 169
Cherokee nation 切罗基民族, 152
China 中国, 158
Church, the 教会, 15, 20, 62, 136, 149, 158, 178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81
Cicero 西塞罗, 3, 14, 29—31, 47, 52, 117, 134, 200
citizen militias 民兵, 27, 66—9, 75, 78, 111—14, 172, 174, 178
Città di Castello 卡斯泰罗城, 101
Civitavecchia 奇维塔韦基亚, 101, 106, 180
Clarendon, Lord 克拉伦登勋爵, 11
Clausewitz, Carl von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202
Clement VII, Pope 教皇克莱门特七世, 27, 62, 105—6, 114, 130, 148, 178—80
Cleomenes 克莱奥梅尼, 47n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 153
Clizia 《克莉齐娅》, 78
Cold War 冷战, 46
Colonna, Prospero 普洛斯彼罗·科隆纳, 147n
common good, the 共同善, 49—51, 56—7, 63, 107, 112, 115—16, 131, 148
communications, global 全球沟通, 152

communist parties 共产党, 66n

Comtat Venaissin 孔达维内桑, 101

condottieri 雇佣兵, 21, 27, 64—8, 74, 104, 106, 112, 114, 178

Cesare Borgia's murder of 切萨雷·波吉亚对雇佣兵的谋杀, 64—5, 171

conscience, recursion to 递归良心, 16

consequentialism 后果论, 16, 45—51, 140—2

Constantinople, fall of 君士坦丁堡沦陷, 20—2

constitutional order (*ordini*) 宪政秩序, 19—28, 112—31

changes in 宪政秩序的变化, 151—60

and collective virtù 与集体德性, 111—17, 120, 122, 130, 139

and the common good 与共同善, 112, 115—16

and equality 与平等, 120, 126

modern paradigms of 宪政秩序的现代范式, 122n

and offices and honours 与官职和荣誉, 123—4

and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与政治决策, 123

and rule of law 与法治, 111—14, 118—19

constitutions 宪法

Florentine 佛罗伦萨宪法, 122, 124—30, 149, 177

'mixed' “混合” 宪法, 122—5

republican 共和主义宪法, 126—9

contraception 避孕, 157

Côte d' Ivoire 科特迪瓦, 208—9

Cover, Robert 罗伯特·卡沃, 51n, 154, 158n

Cremona 克莱蒙纳, 179

Croce, Benedetto 贝内德托·克罗齐, 33, 140

cruelty 残酷, 54—7, 142, 146

currencies, national 国家货币, 155

Cyrus 居鲁士, 148

Dante 但丁, 163—4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133

de Gaulle, General Charles 戴高乐将军, 145

de Grazia, Sebastian 塞巴斯蒂安·德·格拉吉亚, 39n, 52, 64n, 121

democracy 民主, 113n, 119, 152, 155—6, 159, 163

democracy movements 民主运动, 208—9

deontological absolutes 义务论绝对原则, 45, 47—8

deregulation 撤销管制, 156

dictators 独裁者, 46, 152

Dietz, Mary 玛丽·迪茨, 136

Diogenes Laertius 第欧根尼·拉尔修, 91

'dirty hands' problem “脏手”问题, 34—6

disability insurance 伤残保险, 155

Discourse on Florentine Affairs 《论小洛伦佐逝世后佛罗伦萨的政务》, 126, 177, 210

Discourse on Remodelling 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论改变佛罗伦萨的政府结构》, 129, 210

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Livy 《论李维》

constitutionalism 宪政, 6, 19, 118—19, 147

dating of 写作日期, 205

dedication 题献, 211

English translation 英文译本, 10

initial publication 首次出版, 9

interruption in writing 写作中断, 95, 98—9, 104, 148, 175

setting in Rucellai gardens 卢切莱花园背景, 73

- writing of 《论李维》的写作, 137—8
- education 教育, 152, 156—7
- Egypt 埃及, 83, 208
- elected office, access to 被选举权, 113, 123—4
- Elizabeth I, Queen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10
- embassies 大使, 21, 27
- enterprises, state-owned 国有企业, 152
- Epicurus 伊壁鸠鲁, 71
- epidemics 传染病, 153, 157
- Erasmus, Desiderius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106, 3n, 29
- Esquire* magazine 《时尚先生》杂志, 29
- ethics 伦理
 - lawyers', 律师职业伦理 140—1
 - and politics 与政治, 5, 26, 33, 134, 139—43
- Etruscans 伊特鲁里亚人, 91
- Eugene IV, Pope 教皇尤金四世, 100n
- Europe, future of 欧洲的未来, 157—8
- executions 处决, 56
- 'Exhortation to Penitence' “劝忏悔”, 39
- Fabius 费比乌斯, 81
- Faenza 法恩莎, 101—3
- Ferdinand, king of Aragon 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德, 56, 67, 110, 142, 149
- Ferdinand, king of Naples 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德, 130
- Ferdinand and Isabella, marriage of 费迪南德与伊莎贝拉结婚, 22
- Fermo, Oliverotto da 奥利夫奥托·达·菲莫, 64, 171

Ferrara 费拉拉, 66, 102

feudalism 封建制, 7, 14, 23, 112, 121, 152

Florence 佛罗伦萨

chronology 年表, 168—80

and citizen militia 与民兵, 27, 66—7, 75, 111—12, 114, 172, 174

collapse of republic 共和国的垮台, 68, 75, 101n, 130—1, 174, 180

expulsion of Medici 驱逐梅迪奇家族, 67, 74, 101—2n, 105, 130, 169, 180

fortifications 防御工事, 179—80

influence of Savonarola 萨沃纳罗拉的影响, 46—7, 169

Medicis' exercise of power 梅迪奇家族掌权, 79—80, 125—6, 129—31

model constitutions 模范宪法, 122, 124—30, 149, 177

restoration of Medici 梅迪奇家族复辟, 75, 103, 106—7, 130, 174, 180

restoration of republic 恢复共和国, 102n, 105, 130, 180

social conflicts 社会冲突, 116, 118—19

Florentine guilds 佛罗伦萨行会, 127n

Florentine Histories 《佛罗伦萨史》, 112

Florentine Senate 佛罗伦萨议会, 126—8

Florentine Signoria 佛罗伦萨执政团, 24, 64, 74, 92, 105, 111, 169—71, 174

establishes citizen militia 建立民兵, 67, 172

and model constitutions 与模范宪法, 124, 126, 127n, 128

Flowers, Betty Sue 贝蒂·休·弗劳尔斯, 205

Ford, Gerald 杰拉尔德·福特, 88n, 145

Forlì 弗利, 100—2

Fornovo, battle of 福尔诺沃之战, 169

fortune, and virtù 机运与 virtù, 4—6, 19, 73—82, 91, 109—10, 116, 134, 144—6, 200

Foscolo, Ugo 乌戈·福斯克洛, 136

Fra Bartolomeo 弗拉·巴尔托洛梅奥, 47

France 法国

constitutional system 宪制, 114

dominance in Europe 主导欧洲, 87

religious wars 宗教战争, 60

Francis I, King of France 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 176—9

Frayn, Michael 迈克尔·弗雷恩, 184n

Frederick III, Emperor 弗雷德里克三世皇帝, 24

free will 自由意志, 1, 71, 80, 116, 207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66n, 69

Freud, Sigmun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85n

Galileo 伽利略, 1, 90, 140

Gardiner, Stephen 斯蒂芬·加迪纳, 10

Garigliano, battle of 加里利亚诺战役, 172

genocide 种族灭绝, 141, 157

Gentili, Alberico 阿尔贝里科·贞提利, 11

Gentillet, Innocent 让蒂耶, 9—11, 14, 36, 40

Germany 德国, 19, 23, 151, 158

Nazi 纳粹, 81, 163

Gilbert, Allan 阿兰·吉尔伯特, 146

Gilbert, Felix 费里克斯·吉尔伯特, 73, 146

Gray, John 约翰·格雷, 77n

Gregory XII, Pope 教皇格里高利十二世, 100n

Guicciardini, Francesco 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 61, 105—8, 149, 179

Habsburg-Valois conflict 哈布斯堡—瓦卢瓦战争, 60

Hamilton, Alexander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155

Hannibal 汉尼拔, 79, 81

Harvey, Gabriel 加百利·哈维, 11

Harvey, William 威廉·哈维, 92

healthcare 卫生保健, 157, 216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92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 3n, 62, 176

Heraclitus' Fallacy 赫拉克利特谬误, 89

Hexter, J. H. 赫克斯特, 205

history 历史, 83—93

- and human nature 与人性, 82, 85, 89, 93
- Machiavelli's use of 马基雅维利对历史的运用, 201
- and modernity 与现代性, 88

History of Florence 《佛罗伦萨史》, 105, 114, 118, 125, 147n, 177—8, 210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13n, 151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59

Holmes, Oliver Wendell 奥利弗·文德尔·霍尔姆斯, 64

Holy League 神圣同盟, 102, 179—80

Houston Sam 萨姆·休斯敦, 196

Huguenots 胡格诺教徒, 9

human nature 人性, 38, 82, 85, 89, 93

human rights 人权, 152

humanists,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 5, 25

Hurd, Douglas 道格拉斯·赫德, 153

Hussein, Saddam 萨达姆·侯赛因, 208

hypocrisy 伪善, 52—3

Imola 伊莫拉, 100—2

-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 禁书目录, 136
- information exchange 信息交换, 159
- inheritance, rights of 继承权, 113
- internet 互联网, 153, 157, 159
- intervention, doctrine of 干涉学说, 143, 153, 208—9
- Iran 伊朗, 83, 88n
- Iraq 伊拉克, 208—9
- Italian language 意大利语, 10
- Italic League, 168
- Italy 意大利
- emergence of princely states 君主国的出现, 20—8, 59—60, 160
 - foreign domination 外国支配, 97—108, 146—9, 160, 169, 172—80
 - Hannibal's invasion 汉尼拔入侵, 79, 81
- Jefferson, 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 51
- Jews 犹太人, 20, 56—7
- Johnson, Lyndon 林登·约翰逊, 155
- Julius Caesar 凯撒·朱利叶斯, 107
- Julius II, Pope 教皇朱利叶斯二世, 4, 27, 66, 80, 110, 171—5
- and liberation of Italy 与意大利的解放, 98, 100, 103, 145
- Kahn, Victoria 维多利亚·卡恩, 82, 183, 217
- Kant, Immanuel 伊曼纽尔·康德, 213
- Kaplan, Robert 罗伯特·卡普兰, 209
- Kennedy, John F 约翰·F. 肯尼迪, 191
- Khan, A. Q. A. Q. 卡恩, 153
- Kissinger, Henry 亨利·基辛格, 92, 203

Kurds 库尔德人, 152

Landsknechts 雇佣步兵, 105, 179

law

American 美国法律, 63—4

coercive aspects of 法律的强制方面, 198

‘good’ “善” 法, 63

International 国际法, 141—2, 152, 214

letter of the 法律条文, 197

rule of 法治, 50—1, 111—14, 118—19, 141, 147, 156

and strategy 与战略, 61—70

League of Cambrai 康布雷同盟, 173

League of Cognac 白兰地同盟, 106, 179

Left, the 左派, 159—60

Lenin, V. I. 列宁, 151

Leo X, Pope 教皇里奥十世, 27, 78, 100, 104—5, 107, 124—5, 128, 148, 175—8, 215

Leonardo da Vinci 列奥纳多·达·芬奇, 22, 67, 92, 204

Levinson, Sanford 桑福德·列文森, 163, 203

liberality and meanness 慷慨与吝啬, 32—3, 134—5, 161

Libya 利比亚, 208—9

Life of Castruccio Castracani 《卡斯特鲁乔·卡斯泰拉卡尼传》, 90—1, 124, 177—8, 211

Lincoln, 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50—1, 131, 155

Livy 李维, 115, 121, 200

Lloyd George, David 大卫·劳埃德·乔治, 151

Lorca, Ramiro de 拉米罗·德·洛卡, 64, 171

loss aversion 厌恶损失, 193

Louis XII, King of France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 61, 67, 102, 170, 172—3

- Louisiana purchase 购买路易斯安那, 51
- Lucca 卢卡, 124—5, 177
- Lucretius 卢克莱修, 71, 116
-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 15, 62, 149, 179
- Lycurgus 利库尔戈斯, 53, 123
- McCormick, John 约翰·麦克考米克, 207
- Machiavelli, Bernardo 伯纳德·马基雅维利, 61, 168, 184, 217
- Machiavelli, Niccolò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 chronology 年表, 168—80
 - and citizen militias 与民兵, 67—9, 75, 78, 111—14, 172, 174, 178
 - conspiracy and torture 阴谋与刑讯, 55, 75—6, 104, 175
 - contemporary reception 当代的反应, 149—50
 - his death 逝世, 105, 180
 - English reception of his work 英语世界对他的著作的反应, 9—12
 - exiled from Florence 被放逐出佛罗伦萨, 76, 104, 174
 - life in exile 放逐中的生活, 163—4
 - personal honesty 个人诚实, 40, 75n
 - his salary 他的薪水, 40
 - service to Florence 在佛罗伦萨任职, 5, 40, 47, 53, 67—8, 74—6, 92, 146, 182—3
 - success as playwright 成功的戏剧作家, 78, 176—7
- Machiavelli Paradox 马基雅维利悖论, 3—6
- Madison, James 詹姆斯·麦迪逊, 64, 155
- Malatesta, Pandolfo 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 102
- Mandragola* 《曼陀罗》, 53, 78, 176—7, 183
- Manfredi, Astorre 阿斯多·曼弗雷迪, 102
- Mansfield, Harvey 哈维·曼斯菲尔德, 2, 13n, 38, 66, 120, 131, 146

Marcos, Ferdinand 费迪南德·马库斯, 83

Marignano, battle of 马里尼亚诺战役, 176—7, 179

Maritain, Jacques 雅克·马里坦, 140

markets 市场, 152—3

Marlowe,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马洛, 12

Marranos 马拉诺人, 56

marriage, right to 婚姻权, 113

Mary, Queen 玛丽女王, 10

Mattingly, Garrett 加勒特·马丁利, 136

Maximilian I, Emperor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 110, 172—4, 177

media 媒体, 159—60

Medici, Alessandro de' 亚利桑德罗·德·梅迪奇, 106—7, 130, 180

Medici, Catherine de' 凯瑟琳·德·梅迪奇, 9

Medici, Cosimo de' 科西莫·德·梅迪奇, 24, 99, 107, 126, 168, 179

Medici, Cardinal Giovanni de' 红衣主教乔万尼·德·梅迪奇, 75—6, 100, 104, 174—5
see also Leo X, Pope 也参见教皇里奥十世

Medici, Giovanni dalle Bande Nere 乔瓦尼·达莱·班德·内雷·梅迪奇, 61, 99,
 105, 107, 179

Medici, Giuliano de' 朱利亚诺·德·梅迪奇, 5, 75, 104, 130, 146, 148, 174—6,
 215

Medici, Cardinal Giulio de' 红衣主教朱里奥·德·梅迪奇, 104—5, 124—5,
 129—30, 176—8, 120
see also Clement VII, Pope 也参见教皇克莱门特七世

Medici, Ippolito de' 伊普利托·德·梅迪奇, 106, 130

Medici, Lorenzino de' 洛伦西诺·德·梅迪奇, 106—7

Medici, Lorenzo de' (the Elder) (老) 洛伦佐·德·梅迪奇, 99n

Medici, Lorenzo de' (the Magnificent) (伟大的) 洛伦佐·德·梅迪奇, 46, 99,

- 130—1, 168, 175
- Medici, Lorenzo de' 洛伦佐·德·梅迪奇, 5, 79, 106n, 125—6, 146, 174
and dedication of *The Prince* 与《君主论》的题献, 97—8, 104, 176
- Medici, Piero de' 皮耶罗·德·梅迪奇, 168
- Medici, Piero de' (son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皮耶罗·德·梅迪奇 (伟大的洛伦佐之子), 33, 67, 101n, 169, 171
- Medici Popolano, Giovanni de' 乔瓦尼·德·梅迪奇·波波拉诺, 179
- Medici 梅迪奇家族
exercise of power 掌权, 79—80, 125—6, 129—31
expulsion of 被驱逐, 67, 74, 101—2n, 105, 130, 169, 180
legitimacy problem 合法性问题, 125
restoration of 复辟, 75, 103, 106—7, 130, 174, 180
- Mehmet II, Sultan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21
-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 22
- Michelotto, Don 唐·米凯罗特, 68, 199
- Milan 米兰, 22, 24, 56, 80, 101, 168—9, 173, 175—9
- Milton, John 约翰·弥尔顿, 12, 161
- Mirandola 米兰多拉, 174
- mirror books 鉴书, 3—4, 14, 17, 29—32, 97—8, 134—7
- Modena 摩德纳, 106
- morality, personal 个人道德, 33—6, 40, 50—1, 91, 134
role morality 角色道德, 140—1
- More, Sir Thomas 托马斯·莫尔爵士, 149
- Moses 摩西, 38—9, 53, 140, 148
- Moynihan, Patrick 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120n
- Mugello, the 莫格罗, 67
- multiculturalism 文化多元主义, 157

multinational businesses 跨国贸易, 154

Mussolini, 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 13n

Nagel, Thomas 托马斯·内格尔, 34

Naples 那不勒斯, 22, 24, 101—3, 130—1, 168—9, 172, 176, 179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波拿巴, 13n, 69, 155

Nardi, Iacopo 艾阿考珀·纳迪, 129

nation-building 民族建构, 208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56

necessity 必要性, 38—9, 48—50, 142

Netherlands 荷兰, 23

Newton, Isaac 艾萨克·牛顿, 92

Nixon, Richard 理查德·尼克松, 145

‘Nuremberg’ problem “纽伦堡”问题, 141

Obama administration 奥巴马政府, 216

October Revolution 十月革命, 205

old-age pensions 养老金, 152, 155

Olschki, Leonardo 莱昂纳多·奥勒斯吉, 140

‘On Fortune’ 《论机运》, 75

On the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Duke of Valentinois 《论瓦伦蒂诺公爵采用的手段》, 171

ordini 秩序, *see* constitutional order 参见宪政秩序

ordini (the term) 秩序(术语), 19, 192

Orsini, Francesco 弗朗西斯科·奥尔西尼, 64

Orsini, Giulio 朱里奥·奥尔西尼, 103

Orsini, Paolo 保罗·奥尔西尼, 64

Orti Oricellari 奥里切拉里花园小组, 10, 73, 125, 129, 176—8

Orvieto 奥维多, 101

Otto di Practica 八人委员会, 177

Ottoman Turks 奥斯曼土耳其人, 20

Ovid 奥维德, 163

Pakistan 巴基斯坦, 153

Palestinians 巴勒斯坦人, 152—3

Palestrina 帕莱斯特里纳, 101

Pantin, Travis 特拉维斯·潘丁, 201

papacy 教廷, 23, 62, 100—1, 130, 144

papal militias 教皇军, 114, 178

papal nepotism 教皇裙带关系, 100

Papal States 教皇国, 100—5, 148, 168, 172, 178

papal vicarages 教皇俸地, 28, 54, 99—103, 148, 170

Parma 帕尔马, 106

Parmenides' Fallacy 巴门尼德谬误, 88—9

Patrizi, Francesco 弗朗西斯科·帕特里西, 135, 136n

Paul II, Pope 教皇保罗二世, 100n

Pavia 帕维亚, 178

Pazzi Conspiracy 帕奇阴谋, 130

Peace of Barcelona 《巴塞罗纳和约》, 180

Peace of Lodi 《洛迪和约》, 168—9

Peace of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59—60, 158

Perugia 佩鲁贾, 101, 103, 172, 178

Pesaro 佩扎罗, 102

Petrarch 彼特拉克, 73, 146, 163

Philip II, King of Spain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10

Philippines 菲律宾, 83

Piacenza 皮亚琴察, 106

Pinter, Harold 哈罗德·品特, 217

Piombino 皮翁比诺, 102, 170

piracy 劫掠, 141

Pisa 比萨, 67—8, 75, 92, 114, 169, 173—4

Pisistratus 皮西斯特拉图斯, 50

Pistoia 皮斯托亚, 57, 170

Pius III, Pope 教皇庇护三世, 103, 171

Plato 柏拉图, 134, 137

Poitiers, battle of 普瓦捷战役, 178

Poland 波兰, 141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科学, 90—1, 140

Pontano, Giovanni Gioviano 乔万尼·吉奥维亚诺·彭塔诺, 136n

popular opinion 民意, 159, 207

Potsdam Conference 波茨坦会议, 81

Prato 普拉托, 68, 75, 114, 174

Prince, The 《君主论》

- dedication 题献, 9, 97—8, 104, 176
- as 'employment application' 作为“求职申请书”, 5, 98, 137, 147
- English translation 英文译本, 10
- initial publication 初次出版, 9
- as mirror book 作为鉴书, 3—4, 17, 29—32, 97—8, 134—7
- problematic final chapter 令人疑惑的最后一章, 97—8, 134, 146—9
- river metaphor 河流隐喻, 4
- timing of 时机, 95

- title 题目, 138—9
- property rights 财产权, 113
- public relations 公共联系, 159
- Purpose of Military Force, The* 《论军事力量的目的》, 172
- ragione di stato* 国家理由, 120
- Ragusa 拉古萨, 147n
- Ravenna 拉文纳, 106, 174
-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88n, 146
- referenda 普选, 155—6, 159
- religion 宗教, 36—9
 - in ancient Rome 古罗马的宗教, 117
 - civil 公民宗教, 131
 - cuius regio, eius religio* principle “教随国立” 原则, 59—60, 121, 158
- Renaudet, Augustin 奥古斯丁·雷诺德, 140
- reproduction, control of 计划生育, 156—7
- republicanism, in *The Prince* 《君主论》中的共和主义, 137—9, 147
- republics 共和国, 13, 34, 43, 46, 50, 81, 91, 99
 - and constitutions 与宪法, 126—9
- Ricci, Luigi 路易吉·里奇, 136
- Richard III, King of England 英格兰国王理查德三世, 216
- Rimini 里米尼, 66, 101—3, 106
- Romagna, Borgia's conquest of 波吉亚对罗马涅的征服, 54, 57, 92, 102—3, 148—9, 169—71, 215
- Roman Senate 罗马元老院, 160
- Rome 罗马, 22, 24, 87, 174, 178
 - and liberation of Italy 与意大利的解放, 99—100, 104—6

- papal jubilee 教皇大赦年, 102
- sack of 洗劫罗马, 105, 180
- Rome, ancient 古罗马, 47—50, 54, 81, 86—7, 207
- mass executions 大规模处决, 56n
- mixed constitution 混合宪法, 123—5
- social conflicts 社会冲突, 116—19
- tribunes of the people 护民官, 160
- Romulus 罗慕卢斯, 47—8, 53—4, 119, 148
- Roosevelt, Franklin D 富兰克林·D. 罗斯福, 51, 151, 155
- Rouen, cardinal of 鲁昂红衣主教, 61
- Rousseau 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136, 212
- Royal Dutch Shell 荷兰皇家壳牌公司, 154
-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157
- Rucellai, Giovanni 乔万尼·卢切莱, 73
- Rucellai gardens 卢切莱花园, 73, 176
- Sagoff, Mark 马克·萨高夫, 128n
- 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 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 9
- Sartori, Giovanni 乔万尼·萨托利, 138
- Sartre, Jean-Paul 让—保罗·萨特, 34n
-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195—6
- Savonarola, Girolamo 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 15, 39, 46—7, 74, 102n, 169, 195
- scenario planning 远景规划, 203—4
- Schmitt, Carl 卡尔·施密特, 66
- science, funding of 科学基金, 152
- Scipip 西庇阿, 79, 81, 161
- Second World War “二战”, 46, 151

Sereno, Renzo 伦佐·塞雷尼, 137
 Sforza, Caterina 卡特琳娜·斯福扎, 102, 170, 179
 Sforza, Francesco 弗朗西斯科·斯福扎, 24, 66, 80, 169
 Sforza, Giovanni 乔瓦尼·斯福扎, 102
 Sforza, Ludovico 卢多维科·斯福扎, 101—2, 169, 175
 Sforza, Massimiliano 马西米利亚诺·斯福扎, 175
 Sforza, Ottaviano 奥塔维亚诺·斯福扎, 170
 Shakespeare, 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12, 183, 216
 Shakur, Tupac 图派克·夏库尔, 13n
 Sicily 西西里, 172
 Sinagallia 西纳加利亚, 64, 68, 101
 Sixtus VI, Pope 教皇西斯笃六世, 100, 130
 Skelton John 约翰·斯凯尔顿, 3n
 Skinner, Quentin 昆廷·斯金纳, 120, 136n, 142, 181
 slavery 奴隶制, 51, 141, 155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113n, 133
 social scarcity 社会稀缺, 16
 Soderini, Cardinal Francesco 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索德里尼, 104, 178
 Soderini, Giovan Battista 乔万·巴蒂斯塔·索德里尼, 79—80
 Soderini, Piero 皮耶罗·索德里尼, 4, 49, 76, 102, 104, 170—1, 173—4, 178, 207
 and citizen militia 与民兵, 67—8, 199
 Machiavelli's patron 马基雅维利的保护人, 53, 74, 180, 182
 Soderini's Fallacy 索德里尼的错误, 162
 Soto, Hernando de 赫尔南多·德·索托, 113n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57
 sovereign wealth funds 主权财富基金, 156
 Soviet Union 苏联, 145—6

- Spain, mass expulsions from 大规模驱逐出西班牙, 56—7, 142
-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 66n
- Sparta 斯巴达, 123
- Spenser, Edmund 埃德蒙德·斯宾塞, 204—5
- Spinoza, Baruch (Benedict de) 巴鲁（或本尼迪克特·德）·斯宾诺莎, 136
- Spoletto 斯波莱托, 101
- state, the 国家
- lo stato* (the term) 论国家（术语）, 6, 43, 120—2
 - interior and exterior relations 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 61—70
 - Napoleonic imperial state 拿破仑式帝国, 60, 88n
 - ‘postmodern state’ “后现代国家”, 154
 - and use of violence 与运用暴力, 49, 54—7
- states 国家
- classical 古典国家, 15
 - emergence of princely states 君主国的出现, 2—3, 19—28, 59—60, 80—1, 87, 138, 148, 158, 160
 - imperial 帝国, 60, 87—8n
 - and medieval society 与中世纪社会, 19—20
 - market 市场国家, 154—60, 216
 - nation states 民族国家, 19, 23, 60, 122, 151—60
 - neoclassical 新古典国家, 15, 25, 61, 90, 95, 111, 133
 - ‘states of terror’ and ‘states of consent’ “恐怖之国”和“同意之国”, 50
 - Weberian 韦伯式国家, 121
 - see also* republics 也参见共和国
- statesmanship, idea of 治国之道, 128n
- Stockwood, John 约翰·斯托克伍德, 11
- Stone, Oliver 奥利弗·斯通, 191

Stoppard, Tom 汤姆·斯托帕德, 217
strategy, and law 战略与法律, 61—70
Strauss, Leo 列奥·施特劳斯, 33, 140, 147—8
Summary of Luccese Affairs 《卢凯塞事务概要》, 124
Swiss, the 瑞士, 67, 91, 173—6
Syracuse 锡拉库扎, 55, 142, 206
Syria 叙利亚, 208

Tamils 泰米尔人, 153
taxation 征税, 32—3, 161
tercios 征服者, 68
terrorism 恐怖主义, 89n, 113, 153, 162, 196—7
Texas Revolution 得克萨斯州革命, 196
Theseus 特修斯, 148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 59n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15
Tibullus 提布鲁斯, 163
torture 酷刑, 35, 55—6, 141, 175
treaty obligations 条约义务, 121, 135, 142—3, 161
Treaty of Augsburg 《奥格斯堡和约》, 59—60, 158
Treaty of Lyon 《里昂条约》, 172
Treaty of Madrid 《马德里条约》, 179
Treaty of Noyon 《努瓦永和约》, 176
Tunisia 突尼斯, 208
Twain, Mark 马克·吐温, 83

unemployment 失业, 152, 155—6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143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 19, 151, 154, 158, 205

Urbino 乌尔比诺, 80, 101, 103, 171, 176

US Constitution 《美国宪法》, 51, 56n, 89, 115, 128, 131

US Federal Reserve 美国联邦储备, 155

vendettas 世仇, 39

Venice 威尼斯, 21—3, 66, 103, 106, 111, 125, 168—9, 173, 177, 179

Vettori, Francesco 弗朗西斯科·维托里, 91, 106—7, 136, 149, 163, 173, 175,
214—15

Vettori, Paolo 保罗·维托里, 175—6

Vicenza 维琴察, 173

Vico, Giambattista 詹巴蒂斯塔·维科, 92

violence, the state's use of 国家对暴力的运用, 49, 54—7

Viroli, Maurizio 莫里奇奥·维罗里, 13n, 131, 181

virtù

collective 集体 *virtù*, 79—82, 111—17, 120, 122, 130, 139, 145, 207

and fortune 与机运, 4—6, 19, 73—82, 91, 109—10, 116, 134, 144—6, 200

and history 与历史, 86—7

meaning of the term 这个术语的含义, 76—7

'problem-oriented' “问题导向的”, 82

without Christian virtue 非基督教德性, 12—13

virtus, 77

Vitelli, Vitellozzo 维特罗佐·维特里, 64, 171

Viterbo 维特尔波, 101

Walzer, Michael 迈克尔·沃尔泽, 34—6

war 战争

civil 内战, 66n

epochal 划时代的战争, 60

inevitability of 战争的必然性, 196—7

total 全面战争, 131, 152

War of Urbino 乌尔比诺战争, 176

Washington, George 乔治·华盛顿, 131, 155, 196

Watergate scandal 水门丑闻, 145

Waterloo, battle of 滑铁卢战役, 13n

Watson, Adam 亚当·沃森, 20, 23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53, 157

welfare states 福利国家, 81

Wheeler, John 约翰·惠勒, 71n

Wilson, 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66, 205

Wyatt, Thomas 托马斯·怀亚特, 10

Xenophon, *Cyropedia* 色诺芬《论居鲁士的教育》, 29, 136

Yemen 也门, 208—9

《朝服》一书之译事历时三载有余，今日提笔撰写后记，心中既有轻松喜悦之感，也有惶恐不安之意。前者缘于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而后者在于并不能确定自己的译笔是否信实可靠，核心概念的翻译是否准确。然而，即使是丑媳妇也总得见公婆，这些都交给方家和读者来批评指正吧！

马基雅维利作为西方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历来为我国学术界和翻译界所重视。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马氏著作的中译本陆续有所刊行，至 2011 年更是出版了八卷本的《马基雅维利全集》。这些译本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莫大帮助，本书大部分源自马氏著作的引文都参考了其中译本，有些甚至是一字未改的“拿来主义”。这里，特别对此加以说明，也借此机会向所有马氏著作的中译者们致谢！此外，在本书翻译过程中，作者也曾向应奇教授、刘训练教

授及同门学弟请教，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文责由我自负。

最后，附上去年译完书中“马基雅维利年表”之后所写的一段感言，向伟大的马基雅维利致敬：

短短几页“马基雅维利年表”，呈现了亚平宁半岛几十年间之乱象：列强环伺，诸侯争霸，合纵连横，导致时局变幻莫测。期间多少王朝兴衰更替！多少枭雄功败垂成！更有多少生灵涂炭！身处如此动荡格局，马基雅维利苦心孤诣，高瞻远瞩，欲以一本《君主论》谋求指导某一能当大任者于意大利中部建一新型君主国，进而一统意大利，此为意大利万民福祉之根本！然身处如此乱世，犹怒海之一叶扁舟，虽有宏愿，时运不济，终不能实现。且缘于此念之坚定，也致马氏命运多舛。译完之后，令人唏嘘不已！崇敬之心油然而生！

杨立峰

2016年9月12日于西安



马基雅维利历来是欧洲主流思想诟病的主要对象；攻击最甚且流传最广者，莫过于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君主论》也因对缺失基督教德性的“马基雅维利式君主”的推崇，以“恶毒的小册子”“媚臣宝典”等诸多恶名流传于世。然而，同时存在的是对包括《君主论》在内的马基雅维利著作的隐秘推崇，再加之马基雅维利思想对于500年以来世界现实政治的影响之深远，这种极具张力的马基雅维利现象，就足以让人好奇、疑惑而无法揣测。

菲利普·博比特，不仅担任过四届美国总统特别顾问，更对宪法理论、法学、国际形势甚有心得。他凭借近50年的从政经历和治学基础，对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诸多案例进行剖析，指出了马基雅维利邪恶形象的由来，以《君主论》中的“马基雅维利悖论”为线索，发掘“论国家”的宏大主题下《君主论》与《论李维》的一致性，进而阐明马基雅维利对欧洲封建秩序终结、新古典主义国家兴起的隐秘预言。博比特还对马基雅维利思想在欧洲宪政史上的地位做了精准阐述，并且在当代政治语境下，指出了一种不同于民族国家形式的市场国家在当今时代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博比特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将马洛和莎士比亚反复提及的人（马基雅维利）推上了研究的优先位置。本书也堪称了解拿破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必读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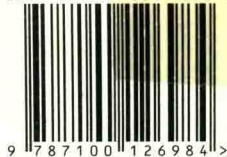
——《新墨西哥州圣达菲报》

博比特从宪政维度对《君主论》进行了精辟而巧妙的阐释，同时也将“马基雅维利”推上了美国宪法之“精神先驱”的地位。

——《旁观者》

上架建议：社科文化、政治哲学

ISBN 978-7-100-12698-4



9 787100 126984 >

定价：48.00元